

王文耀 王保春 著

「文革」前後時期的
陳伯達
秘書的證言

本書二位作者「文革」前即已擔任陳伯達的秘書，後又跟隨陳伯達經歷了「文革」的前半期，也見證了他由興旺到衰落的整個歷程。作者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再現了他們在「文革」中親歷的人和事，特別是與陳伯達朝夕相處過程中，對他的為人、愛好、性格、喜怒哀樂、心之所繫，以及其對待家庭生活，妻兒的態度都作了客觀的回憶與詮釋。特別講述了陳伯達在江青的淫威下逐漸「失寵」的苦悶，心靈掙扎與無奈，以至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翻船」的細節。尤其是陳伯達晚年的撰述及其與中央領導人的關係，許多材料乃首次披露。

書中有些篇章已見諸報端。一些未曾發表過的篇章和陳伯達在保外就醫期間向中央轉送的一些意見和材料，今天一併結集成冊，將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片段及這位「中央文革小組帶頭人」真實地擺到讀者面前。從一個側面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ISBN : 978-988-8254-82-8



9 789888 254828

H.K.\$ 9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王文耀 王保春 著

「文革」前後時期的
陳伯建
秘書的證言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

作者 王文耀、王保春

責任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G及H座

電話：2558 6229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4年6月 / 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4

ISBN : 978-988-6254-82-8

目 錄

陳伯達簡歷 6

第一章 「文革」前

一、我給主席送信	10
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	14
二、陳伯達的工業調查	28
三、陳伯達試圖重新編輯《毛主席語錄》	38
四、一直不放鬆對工業、農業的調查	40
五、一次神秘的活動	41

第二章 「文革」中

一、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和變化過程	44
二、中央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	47
三、陳伯達改對聯	48
四、彭真等人一夜之間被人抓去	49
五、紅衛兵在北京站「維持秩序」	51
六、這些文物不能毀	53
七、打條子領走被關教師	56
八、在政協禮堂展覽打人的兇器	58

九、陳伯達的大權旁落	59
一〇、陳伯達哭了	68
一一、江青對周榮鑫發怒	70
一二、由批判會變成歡迎會	74
一三、陳伯達轟趕圍攻中南海的學生	75
一四、張際春請求工作	77
一五、陳伯達為甚麼堅持不換秘書	79
一六、陳伯達與汪東興	82
一七、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	84
一八、戚本禹從中央文革消失	93
一九、陳伯達錯捕王廣宇	95
二〇、傅崇碧衝釣魚台前後	99
二一、陳伯達與江青的恩怨	109
二二、陳伯達被審查	126
二三、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的經過	128
附：陳伯達對馬列主義研究院幹部下放前的指示	133
二四、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一段精彩爭執	134
二五、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	136
二六、陳伯達的職務有多少	145
二七、陳伯達與劉叔晏	148
二八、陳伯達與軍隊人員的交往	158
二九、陳伯達請客吃飯	160
三〇、紀念列寧誕辰一百週年的文稿被槍斃	162
三一、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	164
三二、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也是我們國家元首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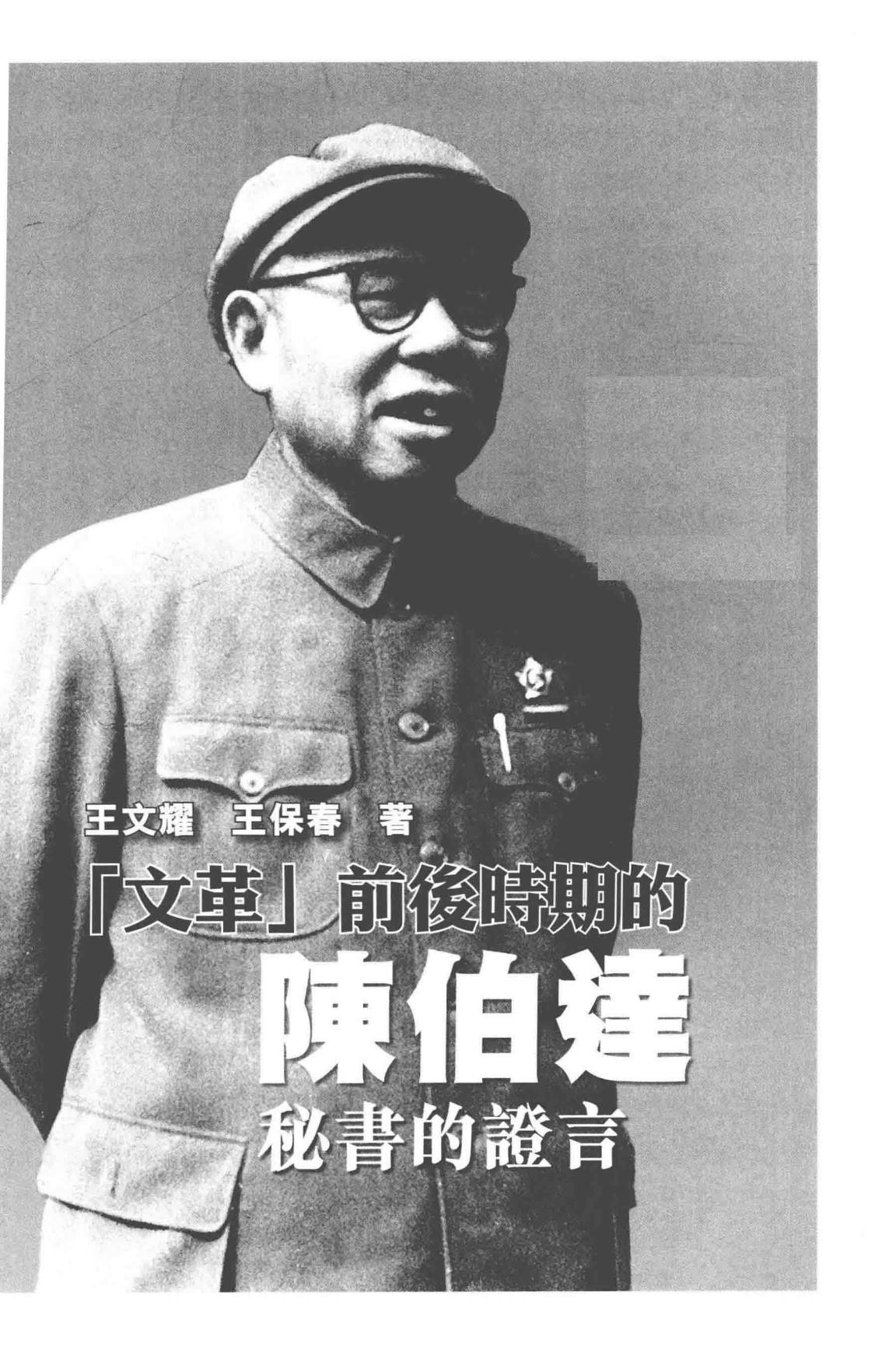
三三、「天才」語錄的結果	182
三四、陳伯達權力最後的行使	184
三五、下了廬山的陳伯達	186
三六、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	191
三七、毛澤東與陳伯達	199
三八、劉少奇與陳伯達	224
三九、林彪、葉群與陳伯達	233
四〇、周恩來與陳伯達	239
四一、陶鑄與陳伯達	246
四二、康生與陳伯達	250
四三、鄧小平與陳伯達	253
四四、彭真與陳伯達	258

第三章 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

一、接到一個意外通知	262
二、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王保春、 王文耀下達一個特殊任務	263

第四章 陳伯達後事處理

一、陳伯達突然去世	316
二、將陳伯達去世情況告知領導同志	319
三、籌辦喪事	321
四、遺體告別	323



王文耀 王保春 著

「文革」前後時期的
陳伯達
秘書的證言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

作者 王文耀、王保春

責任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G及H座

電話：2558 6229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4年6月 / 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4

ISBN : 978-988-8254-82-8

目 錄

陳伯達簡歷 6

第一章 「文革」前

一、我給主席送信 10

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 14

二、陳伯達的工業調查 28

三、陳伯達試圖重新編輯《毛主席語錄》 38

四、一直不放鬆對工業、農業的調查 40

五、一次神秘的活動 41

第二章 「文革」中

一、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和變化過程 44

二、中央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 47

三、陳伯達改對聯 48

四、彭真等人一夜之間被人抓去 49

五、紅衛兵在北京站「維持秩序」 51

六、這些文物不能毀 53

七、打條子領走被關教師 56

八、在政協禮堂展覽打人的兇器 58

九、陳伯達的大權旁落	59
一〇、陳伯達哭了	68
一一、江青對周榮鑫發怒	70
一二、由批判會變成歡迎會	74
一三、陳伯達轟趕圍攻中南海的學生	75
一四、張際春請求工作	77
一五、陳伯達為甚麼堅持不換秘書	79
一六、陳伯達與汪東興	82
一七、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	84
一八、戚本禹從中央文革消失	93
一九、陳伯達錯捕王廣宇	95
二〇、傅崇碧衝釣魚台前後	99
二一、陳伯達與江青的恩怨	109
二二、陳伯達被審查	126
二三、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的經過	128
附：陳伯達對馬列主義研究院幹部下放前的指示	133
二四、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一段精彩爭執	134
二五、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	136
二六、陳伯達的職務有多少	145
二七、陳伯達與劉叔晏	148
二八、陳伯達與軍隊人員的交往	158
二九、陳伯達請客吃飯	160
三〇、紀念列寧誕辰一百週年的文稿被槍斃	162
三一、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	164
三二、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也是我們國家元首	180

三三、「天才」語錄的結果	182
三四、陳伯達權力最後的行使	184
三五、下了廬山的陳伯達	186
三六、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	191
三七、毛澤東與陳伯達	199
三八、劉少奇與陳伯達	224
三九、林彪、葉群與陳伯達	233
四〇、周恩來與陳伯達	239
四一、陶鑄與陳伯達	246
四二、康生與陳伯達	250
四三、鄧小平與陳伯達	253
四四、彭真與陳伯達	258

第三章 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

一、接到一個意外通知	262
二、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王保春、 王文耀下達一個特殊任務	263

第四章 陳伯達後事處理

一、陳伯達突然去世	316
二、將陳伯達去世情況告知領導同志	319
三、籌辦喪事	321
四、遺體告別	323

陳伯達簡歷

陳伯達，1904年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惠安縣。曾先後在集美師範學校、上海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初參加北伐軍，任第一軍獨立第四師秘書、東路軍軍官學校教官。同年4月，因反對國民黨清黨並掩護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而遭通緝，旋赴上海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底回國。1931年4月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1932年初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營救下獲釋。1933年在張家口參加抗日同盟軍。1935年參加領導北平「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曾主編《實話報》、《華北烽火》、《國防》、《人民之友》等救亡刊物，並先後在天津法商學院、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6年秋發起文化界「新啟蒙運動」，宣傳抗日和民主，曾出版文集《真理的追求》、《在文化戰線上》，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

1937年秋赴延安，任教於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並曾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同時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在延安期間，他發表過《三民主義概論》、《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和《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新論》、《近代中國地租概說》等學術論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理論家。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發表過《論毛澤東思想》等論著，並是《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編輯者。1949年和1957年曾兩次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分別同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會談。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是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主要起草人，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他曾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並主張以發展電子新技術為中心帶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但均受到批評和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經周恩來推薦，由毛澤東提名，中共中央決定，陳伯達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在由各級黨委派出的工作組與部份群衆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他提出撤銷工作組，主張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從而與劉少奇、鄧小平當時的主張產生分歧。在運動之初，他曾率先反對以人的階級出身定是非的作法，提出那是一種「血統論」。同時，他執行了毛澤東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方針。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繼續當選。在起草九大報告時，他提出應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但被否決。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因所謂贊成「天才論」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職務。之後，全國開展「批陳整風」（即「批修整風」）運動。報刊上稱他為「劉少奇一類騙子」。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指責他曾一再提出「唯生產力論」，大會並以所

謂「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將其永遠開除出黨。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關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的審判，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8年10月刑滿釋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工作。1989年9月去世。終年85歲。

第一章：「文革」前

我給主席送信

1961年困難時期，毛主席派他的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分三組分赴廣東、浙江、湖南的農村進行農業調查。陳伯達被指定到廣東調查。按照主席的指示每組要找六個高水平的人做組員，陳伯達就找了鄧力群（《紅旗》雜誌）、許立群（中央宣傳部）、王祿（中央辦公廳）、吳介民（《紅旗》雜誌）、梅行（中央辦公廳）和陳麒章（中央辦公廳），他們幾個人又分成兩個小組，每組又有三個成員。我（王文耀）當時在中宣部辦公室工作，就被選中作為陳伯達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中辦保健組的韓定昌等一同調查去了。

當時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他的大力幫助下，我們跑了許多村子，最後在番禺縣作了一個月的調查，吃住在農民家中，陶鑄曾多次下去探望，非常關心。

我們大約在1961年2月回到廣州，按照毛主席原定的計劃，中央這時準備在廣州開會討論農業問題。陳伯達及其隨行人員住在東山小島二號樓，主席住在右邊的一號樓，少奇同志住在左邊的三號樓，我們對面樓住的是主席的隨行人員羅光祿秘書等。四棟樓中間是個院子，我常常看到少奇同志由王光美陪同在院子裏散步，少奇同志的散步不是漫步走，而是像齊步走式的快走。有時王光美急步跟上，兩人並肩齊步走，沉默地在思考着。少奇同志散步時，我們是不出樓的，只在室內的窗前仰慕地看着。

陳伯達在調查中對一些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記得在農村，他和一些領導同志爭論得很厲害，像吵架一樣。那時，有人腦子仍然很熱。我記得有一次他和廣東省委管農業的常委安平生談到一些問題，安平生對陳伯達說：「新興縣里洞公社蒙坑大隊黨支部書記梁紀南是個轉業軍人，他主張不要公共食堂，說公共食堂不好，說好是假的。公共食堂有幾大壞處，如社員不能養豬、養『三鳥』（雞、鴨、鵝）；食堂大量燒柴而濫砍亂伐樹林；滋生多吃多佔貪污偷竊；吃過頭糧等等。同時，他認為公社以隊為核算單位較好，這種主張還是不多的。」安平生也是有這種想法的人，陳伯達聽了以後，非常高興，對安平生說：「那你把他找來咱們和他談談好嗎？」安說好，陳又說：「那你馬上找！」

當天下午，就在省委大樓裏一個小會議室和梁紀南座談，參加的人不多，總共五、六個人，由於對公共食堂、核算單位設在哪一級的問題，他的意見安平生已經向陳伯達講過，大家對這類問題考慮時間較長了，所以座談中幾乎是陳伯達和梁紀南一問一答，時間不長就結束了。

晚上我們整理出一份很短的談話記錄。記錄搞好後，陳伯達很高興，寫了個信封封好後交給我說，送給主席。我拿着信送到我們對面樓秘書住的地方，只見屋裏開着燈，但沒有聲息。羅光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看樣子很疲勞，我向前叫他「羅秘書」，連叫三聲，他都沒睜眼，只嗯了一聲，我對他說：「伯達同志給主席一封信，請你交給主席。」他還是嗯了一聲。我說：「我給你放在這裏啦！」說着，我隨手撥開蚊帳，把信放在他的枕頭旁邊就走了。

回到陳伯達的臥室，陳問我給了吧。我說羅秘書睡覺了，我放在他枕頭旁邊，告訴他請他交給主席。這時，陳躺在床上也沒有睡意，我們倆就閒聊上了，話題還是農業問題和那個座談記錄。陳說：

「這個支部書記的意見不錯，安平生同志他是管農業的，其實他也贊成這個意見，但是他在省委不敢說。」我問為甚麼，陳說：「現在大家腦子都還很熱，說了也沒人聽……」聊了一陣，他還惦着那封信，陳問我：「不知道羅秘書給主席送去了沒有？」我說我去看一看。我過去一看，那封信仍放在那兒。我便說：「羅秘書，您還沒有給主席送去呢？伯達同志在催了！」他嗯了一聲翻了個身，沒睜眼說：「一會兒去。」我又回到陳的身邊，陳問：送去了吧？我說羅秘書說一會兒就去。我們還接着閒聊，說東話西、天文地理，但當時正在搞農業調查，因此還是談農業多。

已經到了下半夜，陳又說：「現在他送去了吧？」我說再去看一看。進了羅秘書的房間，看見他還在睡覺，我想羅秘書太累了，便說：「羅秘書，您太累了，我把這封信交給張素蘭，請她轉交主席好了。」羅秘書嗯了一聲，我就將信拿走了。

主席的門衛認識我是陳的工作人員，就沒有問，進了門就是大走廊，正好碰見服務員張素蘭從主席那邊過來，我便攔着她說：「小張，伯達同志給主席一封信，請你轉交給主席。」她說：「我不管，你去給小周（指周福明）吧，他現在在主席屋裏。」我說我沒有去過，她說一拐彎就是，說罷便走了。

我只好向前走進大玻璃走廊，一拐彎到了主席門口，房門大開着，房間很大，顯得空曠，我一跨進門就看見主席只穿着個大褲衩子，腰上搭着一條毛巾被，面朝裏躺在床上看書。屋裏只有主席一人，不見衛士小周，這時我有點心慌，進、退都不行了，心裏想主席不認識我，太冒失了，把主席嚇一跳可不行。我站在距主席三米遠的地方，他又背對着我，於是我就喊：「報告！」這時主席慢慢轉過身來，我馬上作自我介紹：「我是伯達同志那裏的工作人員，伯達同志給您一封信。」主席聽了將手伸了過來，這時，我急步向前雙手將信

交給主席。」主席接信後，緩慢地說：「你叫甚麼名字呀？」我回答：「叫王文耀！」主席說：「謝謝你。」我說：「主席不謝。」我確實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信後就拆開信看，我立即向後退兩步，還未退出，這時主席身邊衛士小周穿着背心，雙手端着臉盆從浴室出來，看樣子是主席剛洗完澡，他在給主席洗衣服。我給他使了個眼色，意思是：你這傢伙才出來。隨即我就離開了主席的臥室。

回來後，陳伯達問我：「他送給主席了嗎？」我很愉快地說送去了，是我親自交給主席的。陳伯達驚訝地說：「你說甚麼？」我說：「羅秘書太累了，我告訴他，我送去給小張，讓小張轉給主席，可小張不管，我就直接交給主席了。」陳伯達笑笑說：「主席也不認識你，你不會闖禍吧？」我說：「不會的，我已向主席作了自我介紹，說我是您這裏的工作人員，主席還問我叫甚麼名字呢。」陳說：「嗯，你可別闖禍。……」

第二天晚上，陳伯達開會回來說：「那個談話記錄主席批准印成會議文件了。你看主席還說你到他臥室這件事，以後別這樣做了。」後來汪東興同志也對我說：「以後有文件都交給羅秘書好了。」這個談話記錄印成了文件，我看到主席的批示是：

一個重要文件，印發各同志討論。

毛澤東

3月16日上午1時

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幾十年都忘不了，儘管我是違犯了紀律，但是安平生同志反映的這個生產隊黨支部書記的意見得到了黨中央主席的重視，印成了中央會議文件，後來又被中央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所採用，心裏是非常高興的。（王文耀）

難忘的事總會在腦海裏縈繞着，1999年大約5、6月份，一個偶然的機會與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劉志男談及此事，他說安書記現在是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領導，此事可以和安書記直接核對，我很高興，便對劉志男說想見見安平生，談談他當時反映的這件事的經過。劉志男告訴說，安平生身體不好，他可以將我想見安老的願望報告他，讓我等他的安排，在適當的時候，與安老見面談話。可我等到國慶節前夕，卻看到報上說安老逝世了，這使我痛心不已，成為終生遺憾！

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

這次由北京來到廣東的農村調查組，是由中央辦公廳、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央宣傳部、國家計劃委員會、《紅旗》編輯部等單位十二個同志組成的。這個組分為兩個小組，分別由許立群、鄧力群擔任小組長。

調查組於1961年1月28日到達廣州，先後聽了陶鑄同志以及趙紫陽同志、安平生同志關於廣東農村和整風整社情況的介紹，黃文俞同志關於番禺縣大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情況的介紹。1月30日，參加了由廣東省委組織的南海、新興兩個大隊幹部的座談會，主要談的是食堂問題和供給、工資三七開的問題。

2月1日，調查組到了番禺縣大石公社，聽了公社黨委關於情況的介紹；2日，分別到了沙溪、西二兩個生產大隊。這兩個大隊經過兩個來月的工作，整風整社運動即將結束，現在已經轉入生產運動。沙溪大隊基本上是一個好隊，西二大隊原來是一個喪失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隊。經過整風整社，這兩個大隊的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群衆的生產積極性出現了新的高漲。西二大隊幾個主要的不好的幹部已經撤換。沙溪大隊一些幹部原來存在的特殊化作風，經過群衆的批評和幹部的自我批評，已經有了改變。

調查組在這兩個大隊，用家庭訪問、個別談話、開調查會等方式，向不同階層群衆和幹部進行調查。

西二大隊的調查工作，從2月2日進行到10日。11日，這個小組到大石，調查了社有經濟的情況。

沙溪大隊的調查工作，從2月2日進行到8日。這個小組9日回到廣州，當日轉到兩陽縣，調查一個糧豬並舉取得出色成就的生產大隊，即崗列大隊。

從這一段時間調查所接觸的情況看來，生產上有兩種類型的隊：一種類型是，幾年來比較單一地發展了糧食生產，顯著地提高了糧食的商品率，但是經濟作物、飼養業有很大的減少。另一種類型是，糧豬並舉，互相促進，結果，糧豬兩項都大大地發展，使糧食生產有了鞏固的肥料基地，同時也使豬、三鳥（雞、鴨、鵝）和其他牲畜有了鞏固的飼料基地。調查組同志們覺得，後者是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比較完善的類型。

此外，調查組還比較多地接觸了公社三級所有制經濟發展問題，公社體制問題，分配問題，食堂問題，農村商業問題，幹部作風問題等。

現在把調查組了解到的一些主要問題分別記錄如下：

（一）生產問題

大石公社的沙溪、西二兩個大隊在1955年冬天實現合作化，在1956、1957年先後從初級社轉為高級社。

沙溪大隊在高級社以前，兩季稻穀平均畝產600-700斤，1956年突破1,000斤，1958、1959年達到1,100斤，1960年則為1,082斤。

西二大隊的兩季稻穀平均畝產，1956年為730多斤，1957年達到870-880斤，1958、1959、1960年平均畝產比1956年增加，但是比1957年減少。

沙溪大隊的稻穀平均畝產所以能夠一直保持在1,000斤以上，主要

是因為大隊幹部和群衆共同頂住了瞎指揮風。西二大隊稻穀平均畝產在1957年以後之所以減少，是因為大隊幹部大搞瞎指揮。

沙溪大隊和西二大隊在稻穀平均畝產增減方面雖然不同，但是，這兩個大隊幾年來有一個共同情況，就是：經濟作物的面積、產量，都大大減少，當地大量的著名特產，如茨菇、荸薺、蓮藕的耕種面積，90%以上都改種了稻穀。三鳥的飼養量也大大減少。西二大隊因為靠近廣州，過去每年飼養的三鳥約在10萬隻以上，在1960年只有10,000隻多一點。

沙溪大隊在1957年，茨菇、荸薺、蓮藕的收入約佔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現在所佔比例很少。西二大隊經濟作物和飼養業的收入，在最多的年分估計約有十幾萬元，而在1958年只有36,000多元，在1960年只有24,000多元。

兩個大隊都派了事業隊在廣州清壕，西二大隊還搞市區的短途運輸，都得了相當可觀的收入，用於彌補因經濟作物、飼養業減少而造成的一部份損失。1960年，沙溪大隊清壕收入26萬元，約佔大隊總收入的40%以上；西二大隊清壕和短途運輸的收入16萬元，約佔大隊總收入的37%以上。

總的說來，由於經濟作物、飼養業和家庭副業的減少，又由於積累過多，成本過高，雖然有清壕和短途運輸的大量收入，但是，幾年來，社員的勞動收入卻相對地、或多或少地有所降低。沙溪大隊歷年集體經濟分配的數字說明了這種情況。

年度	每人平均（單位：元）
1956	140.56
1957	132.89
1958	121.81
1959	100.14
1960	118.05

西二大隊社員的集體收入雖然逐年略有增加，但是家庭副業收入下降，每個社員的總收入也因之減少。

兩陽縣崗列大隊是另一種情況。

崗列大隊在1955年養豬達到每戶1.3頭，1956年學習毛主席推薦的陽谷縣石門宋鄉養豬經驗以後，養豬事業連年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同時，三鳥也大發展了。

根據崗列大隊提供的材料，從1955年到來，該大隊的稻穀、豬和三鳥的發展數字，如下列三表：

一、歷年稻穀的產量（單位：斤）

年度	總產量	兩造合計畝產量
1955	1,265,710	352
1956	2,149,649	588
1957	2,486,765	677
1958	3,221,000	1,022
1959	3,492,860	1,278
1960	3,522,042	1,290

二、歷年豬的產量（單位：頭）

年度	飼養量	年終存欄數	其中公養數	私養數	賣給國家數
1955	724	588	215	373	150
1956	1,630	670	298	372	327
1957	3,902	1,875	1,176	699	672
1958	8,695	2,723	2,723		1,155
1959	7,375	2,752	1,902	670	1,135
1960	10,939	3,477	2,850	646	1,194

（註：表內歷年飼養量與年終存欄數的差額很大，原因是：除了賣給國家的以外，還賣出了大量的豬仔，也有一部份死亡。）

三、歷年三鳥的產量（單位：隻）					
年度	飼養量	年終存欄數	其中公養數	私養數	賣給國家數
1955	12,135	3,675	500	3,175	5,943
1956	32,818	6,445	1,533	4,912	21,654
1957	20,235	8,815	3,311	5,504	6,410
1958	24,777	8,851	7,051	1,800	8,946
1959	33,979	16,265	14,965	9,100	6,282
1960	26,962	14,225	6,713	7,512	5,850

崗列大隊發展經濟的經驗，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豬糧互相促進，綜合發展農村經濟」這個指示的正確性。這個大隊養豬業的發展，給農業提供了優質的有機肥料，因而保證了農產品的逐年增長。1960年，每畝地上豬肥30擔左右（每頭60斤重的豬，每天下3斤半糞，15斤尿）。同年，稻穀總產量同1955年比較，增加了將近兩倍。

由於經濟的綜合發展，崗列大隊的糧食、瓜菜等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由1955年的85%，變為1960的71%；飼養業的比重，由1955年的6%，變為1960年的16%。

生產發展了，生活也逐步富裕了。該大隊歷年的集體分配情況如下：

年度	每人平均收入（單位：元）
1955	40.50
1956	48.20
1957	50.18
1958	74.91
1959	92.60
1960	99.50

如上表所列，每個社員的集體收入在六年中平均增加了一倍。

這個大隊每人每年吃豬肉，在1955年是2.4斤，1960年是12.5斤。

由此可見，崗列大隊經濟的綜合發展，比沙溪、西二兩個大隊有很多的優點。一般說來，各個公社、各個生產大隊都具有綜合發展經濟的不同的潛在可能性。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需要兩個主要條件：第一，要有正確的領導；第二，要有適當的糧食配備。崗列大隊所以能夠實現糧豬並舉，就是因為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沙溪、西二兩個大隊所以沒有做到糧豬並舉，除了領導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為徵購糧的增長率，大大地超過了糧食生產的增長率。比如，1960年，沙溪大隊徵購糧佔總產量的65%，西二大隊徵購糧佔總產量的70%。同年，崗列大隊徵購糧只佔總產量的32%。這就是說，崗列大隊在留糧方面，比起沙溪和西二兩個大隊，有了養豬的有利條件。1956年，崗列大隊的糧食產量有很大增長，但沒有增加公糧和購糧的任務，這就對該大隊養豬業的發展和成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調查組同各級黨委負責同志議論過關於解決糧豬關係和豬飼料的問題，有了以下的一些想法：

一、要使糧食過關，必須是糧食與多種經濟並舉，糧食與畜牧業並舉。大力地發展糧食生產，是完全必要的，是我們的最根本的方針。但是，如果僅是「單打一」地發展糧食生產，即使糧食每年都有所增長，也會由於缺少畜肥，影響糧食增產速度；並且，由於食品過於單純，勢必增加口糧的需要。這樣，就不容易緩和糧食緊張的狀況。沙溪大隊總支書說：「過去每餐半斤米吃不完，現在每餐十二兩米還不夠吃。」廣東省委的同志說，廣州市1955年平均每人每月口糧20.5斤米，1959年平均每人每月口糧21.6斤米，並沒有叫喊糧食不夠；1960下半年開始，平均每月每人口糧24.39斤米，反而吵糧食緊張。這就是因為食品太單純了。

二、各地農村都有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有的差別很大，要做到糧豬並舉，養豬公私並舉，應當發動群衆討論，根據不同的條件，採

取不同的方法和步驟。在目前情況下，大多數農村發展養豬業應當以私養為主。崗列大隊從1955年開始也是以私養為主，經過五、六年的時間，才發展到現在的公養的規模，但是私養也還佔着相當的比例。如果不顧可能的條件，不經過一定的發展過程，片面地、勉強地集中公養，是不對的，走不通的。大體看來，要普遍地發展到像崗列大隊現在那樣的糧豬生產的水平，可能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因此，各公社、各生產大隊應當根據自己的條件（包括飼料、好豬舍、技術、管理、防治疫病，等等），適當地擬定實現糧豬並舉的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加強正確的政治領導和業務領導，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實行包養的責任制和獎勵制。

三、在目前，需要按照飼料的情況，適當地調整養豬數量。能增加的就增加，但飼料不足而飼養頭數過多的，可以考慮適當減少飼養頭數，把現有的飼料集中使用，真正養好養肥一批豬，然後再逐步發展。不要只務頭數很多的虛名，而忽視質量，結果養不好、養不大、養不肥，甚至造成很多死亡，浪費飼料、人力、資金。據沙溪大隊的幹部說，該大隊現有飼料，只能養大養肥400頭豬，但是，卻養了1,100多頭。由於分散了飼料，豬就養不好，不久以前還死了100多頭。

四、發展養豬的根本問題是，應有必要的飼料保證。這種保證似乎要從兩方面解決：一方面是，組織社員種好自留地，多種可作飼料的高產作物，例如番薯、焦芋和蔬菜等，好的給人吃，次的給豬吃。各公社、各生產隊也要根據養豬的需要，發展這類高產作物以及水浮蓮等水生作物，同時合理地分配米糠。用這些辦法，從集體和個人方面解決全部粗飼料和一部份精飼料。另一方面，國家可以考慮騰出一部份糧食，供應養豬的需要。廣東的出口豬，外貿部有過規定，收購100斤豬肉，由國家補助100斤糧食。廣東的同志認為這個規定很好，他們提出，是否可以在全國一律採取這個辦法，來發展養豬。如果這樣做，全國補助100億斤糧食，就可以按價收購到1億頭肥豬，即至少100億斤豬肉。同時，這反轉過來又會

鼓勵農民對於糧食生產的積極性，由此增產的糧食或許將不只100億斤。有的同志說，如果更好地組織集體和個人生產更多的飼料，那末，由國家補助養豬的精飼料，100斤豬肉可能不需要100斤糧食，有六、七十斤或五、六十斤就夠了。目前我們的糧食比較少，可以考慮在二、三年內進口一部份糧食或米糠，作為擴大養豬事業的底墊，幾年以後，就不必要再進口了。

五、現在一等豬的收購價格是每擔（100斤）45元，比國際市場價格要低得多。為着鼓勵農民養豬，國家有步驟地、適當地提高豬的收購價格，是必要的。

除了解決養豬問題以外，還需要積極發展三鳥，發展漁業，同時還應當發展奶羊、奶牛。奶羊主要吃草，只需要少量的糧食；奶牛吃的糧食比較多，但是可以發展薯類和其他作物來解決。奶羊、奶牛可以長期擠奶，奶品多了，可以減少人對糧食的需要，又可以提高食品的質量。牛羊的發展，還可以增加好肥。

（二）公社體制和社有經濟問題

農村整風整社運動，克服了不利於發展農村人民公社經濟的消極因素，三級所有制進一步鞏固了，公社內部三級之間、以及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都有很大的改善。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農村人民公社在現階段類似一種「聯邦制」。調查組同志認為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正確說明了農村人民公社社一級現階段的根本性質。調查組同志曾經同大石公社黨委同志交換意見，認為似乎可以明確地規定：公社是各生產大隊的聯合。這種聯合，在一方面有利於合辦各生產大隊共同需要而又可能舉辦的經濟事業，在另一方面又保留各生產大隊的自治權。弄清這種性質，對於今後正確處理公社和各生產大隊的關係，會有很大的好處。

過去公社一級颳「共產風」，亂調各生產大隊的資金和勞力，社營企業的發展又沒有很好地執行為各大隊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的方針，因此，公社一級過去相當嚴重地脫離了社員群衆。經過這次整風整社運動和算賬退賠，公社幹部已經認識到不能繼續過去的錯誤。但是，他們對於公社一級今後應當辦些甚麼事，對於社營企業今後主要應當為各生產隊的經濟發展和社員的生活服務，還需要進一步地明確起來，具體地進行規劃。

我們接觸的大石公社，經過退賠之後，社有經濟還有相當的基礎和潛在的力量。現在社有五個工廠，兩個農場，共有固定資產60多萬元。如果好好地整頓，還大有可為，可以辦很多事情。當前問題的中心在於公社要善於徵求各生產隊社員群衆的意見，發揮現有社營企業的生產能力，採取正確有效的辦法，幫助生產隊發展各種經濟事業，而不是向生產隊提取大量的公積金，妨礙隊有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在幫助各生產隊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來發展社有經濟，那末，社有經濟是不能走上健全發展道路的。

在解決公社體制和社有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後，如果公社一級為了各生產大隊共同的需要，有必要進行某些項目的建設，需要從各生產大隊徵集一定資金的時候，必須把徵集數額和資金用途，向各生產大隊的社員說清楚，經過他們的充份討論，才能作最後的決定。由於各生產大隊收入多少各不相同，各生產大隊提供資金的數量也可以有多有少。生產大隊提供的資金作為向社有經濟的投資，依照合同，享受規定的權益，分取一定的利潤。這樣，就能夠根本改變過去公社一級任意向各生產大隊提取公積金的作法。

今後一切社辦企業都必須認真實行經濟核算。公社的收入和開支都必須定期向公社社員代表大會報告，由代表大會審查和批准，並且定期向各生產大隊公開賬目。

過去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已經在前幾年同國營商業合併，現在農村只有

國營商業「一條腿」，不能完全同農村的供求情況相適應。看來，公社有必要重新設立供銷部，同國營商業分工，同時又作為國營商業的助手，負責經營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副產品的收購。為此，供銷部應當同生產大隊、生產隊訂立定期的供銷合同。這樣，就能夠更好地、更經常地了解和解決各生產隊在供銷方面的需要，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我們同意主席的意見，把現在所稱的「生產小隊」，一律改稱生產隊。現在的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叫做生產大隊，有的地方叫做生產隊，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區，以後也一律改稱生產大隊。

現在有的生產大隊把富村和窮村勉強地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原來收入較多的村的社員意見很多，可以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自然條件和群衆意見，劃分為不同的基本核算單位。現在的生產小隊（今後叫做生產隊），有的規模過大，不利於組織生產，可以根據群衆意見，適當地縮小。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規模經過適當調整以後，應當穩定下來，不要再去變動。

生產隊（即現在的生產小隊）的包產任務，有一種意見認為，可以按照上年正常實產量（不是按照災年產量）包下來，而且可以三年固定不變。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可以考慮規定今後包產指標三年調整一次，調整的幅度，應該根據過去三年實際產量的平均數，並留有一定的餘地。

生產隊（即現在的生產小隊）在包產任務以外，發展各種經濟的潛力還很大。要使這些潛力充份發揮，應當進一步解決有關生產隊的收入和分配的問題，生產大隊在目前最好不要去提成。關於這個問題，調查組打算繼續研究。

(三) 分配、食堂問題

公社各級的關係，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颱「共產風」問題以後，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

平均主義。

現在，還有一些社、隊，在分配上不很合理。例如，新興縣里洞公社蒙坑大隊，是由原來兩個高級社合併起來的。這兩個高級社，一個在山上，副業門路多，收入高，一個勞動日一元二角。另一個社在平地，副業門路少，收入低，一個勞動日七角。現在拉平了，都是四角，原來收入高的，很有意見。該大隊總支書記說，不解決這個問題，隊與隊之間的「共產風」還是沒有克服。調查組同志認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凡是居住分散、自然條件不同、收入高低不同的，都應當適當地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那些由幾個村合起來的大隊，如果收入比較平衡，群衆在分配問題上也沒有意見的，就可以不要再去變動。例如，南海縣大瀝公社的同志們說：「我們那裏合了的，還是不分好。這是平原地區，居住比較集中，原來各高級社收入差別不大，後來又實行了電力排灌，機耕，拖拉機下田一天就是100畝，小了不好。1958年合併就是因為有這些發展生產的要求。在成立公社以前，幾個高級社合夥買了一台抽水機，到天旱的時候，你要用，他也要用，矛盾很大，最後只好賣掉了。公社一成立，這個矛盾解決了，現在如果再分開，光爭水就要打破頭。」

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義，現在主要表現在供給與工資的比例和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瀝公社的同志們說，他們那裏平均每月發工資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給的糧食、菜、油、鹽、柴，合計每月約2,600元。按勞分配的工資部份，還佔不到總分配數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給部份，卻佔總分配數的80%多。根據他們的說法，採取這樣的分配辦法，「勞動力強的和弱的都一樣地吃，能擔100斤泥的人沒有勁了，勞動力弱的也不積極了，有些人就走自發，誰也瞧不起工分了。勞動力多的、少的、強的、弱的，勞動好的、勞動不好的人，相互之間有很大的矛盾」。

根據西二生產大隊第一生產小隊的調查，（1）在農村各個階層中，

都有勞動力多、人口少的家庭，這些家庭約佔總戶數的40%多。（2）在農村各階層中，也都有勞動力少、人口多的家庭，這些家庭約佔總戶數的近20%。（3）勞動力和人口大體相稱的家庭，在各階層中也都有，這些家庭約佔總戶數的近40%。因此，應該說，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對農村各階層，對貧農和下中農，都是有利的。

在分配比例上，供給部份和工資部份，倒三七，倒四六，甚至倒二八，這類情況不少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供給的項目太多，數量太大，不只供給糧食，而且全部供給菜、油、鹽、柴。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特別是這次整風整社以後，有些社隊感覺到了這個問題，並且採取了一些辦法，或多或少地改變了這種情況，在鞏固公社和發展生產方面起了好的作用。

例如，沙溪大隊的食堂1959年就不全部供給菜、油、鹽，而是按照每人的勞動情況和年齡情況，每月分別預先發給一元、八角、六角、四角菜金，歸每人自由支配，可以多買，也可以少買，多買部份由自己負擔。實行這個辦法，就把工資部份提高到佔分配總數的60%左右。

根據廣東省委的材料，南海大瀝公社一些食堂，最近實行了供菜三七開的辦法（一角錢的菜收七分，由社員自己出錢），據小隊幹部反映，食堂吃菜因此大為節約，有菜上市了，這是1958年以來未曾有過的事。而且，因為賣菜，小隊自己也有工資發了；社員的積極性都很高漲，小學生也出勤勞動了；幹部作風也隨着有了改變。

看來，公社的分配制度必須認真改變供給和工資倒三七、倒四六、甚至倒二八的狀況，認真執行中央十二條指示信中關於供給部份不要超過30%、工資部份不要少於70%的原則。這裏所說的30%，不能只算生產大隊供給的糧食，而且應當把食堂供給的菜、油、鹽、柴，統一計算在內。如果這些東西總算起來，超過了分配給社員總數的30%，就應當適當地減少供給。這樣，才能真正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更好地實行按勞分配的

制度，又適當地照顧老幼病弱。

同時，應當創造條件，使公共食堂逐步走向企業化，實行經濟核算。除了糧食節約歸己，社員在食堂吃菜，還應當逐步實行自己拿錢買菜的辦法。這樣才能把食堂辦好，使食堂正常化，使食堂真正鞏固起來。

公共食堂可以多種多樣，有大有小。有的食堂也可以農忙多辦，農閒少辦。總之，必須積極辦好，自願參加。不願參加的，或者為了養豬而願意自己作飯的，應該適當地給以方便。

（四）幹部參加勞動問題

公社各級幹部參加勞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從這次整風整社運動的反映中看來，農村幹部不參加勞動，是很不得人心的。西二大隊的農民對過去的幹部有一句諷刺的話：「大小官員三十六，個個指甲縫裏沒有泥。」為了改進幹部同群衆的關係，省、地、縣、公社各級黨委在安排工作和幹部會議的時候，都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在同公社、大隊幹部談話的時候，調查組同志提出，可否實行大隊幹部固定在一個小隊參加勞動的辦法。大隊幹部應當以普通社員身份參加勞動。在工作上，小隊幹部受大隊幹部領導，但在勞動上，大隊幹部要受小隊幹部的領導。這個辦法，既便於大隊幹部深入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又使大隊的幹部能夠得到群衆的監督，認真參加勞動。

調查組的同志還提出，為保證大隊幹部參加勞動的時間，大隊的日常事務，可以考慮採取輪流值日的辦法。比如，沙溪大隊有七個專職幹部，除了開必要的會議以外，在平常的時候，如果輪流值日，一人一天，每星期就有六天可以參加勞動。

大隊的幹部開始認為這些辦法做起來有困難，後來說，他們可以考慮這樣做。

以上說的這些材料，未經仔細核對，可能有些出入。有些觀點，是否

妥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參加調查的同志是：陳麒章、韓定昌、王錄、許立群、王文耀、梅行、陳伯達、鄧力群、吳介民、周國全、姚錫華、姜毓仁。

幫助調查組工作的，還有廣東省的一些同志。

輯錄人：鄧力群、許立群、王錄、陳伯達

1961年2月17日

二

陳伯達的工業調查

根據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精神，1961年陳伯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作農業調查並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以後，1963年他又進行工業方面的調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為着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打破常規。這就是說，我們發展工業所走的道路，應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也要與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們不但不能因循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常規，也不能因循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常規。而要根據新的條件，開創出我們自己一個獨創的、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道路。根據這些原則，開始進行工業調查。

（一）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調查

陳伯達主要是在上海、天津進行調查，同時在北京和彭真同志聯繫較多，幾個地方穿插進行。他對新技術興趣特別大。在北京看了好幾家小的科研廠，甚麼粉末冶金、單晶硅、激光照排（印刷排版）等等。他在考察中說，科研不能停留在深宅大院裏，這樣弄不出東西來。就是辛苦多年研究成功了，但是要形成生產力，那時間還長着呢。所以他說，必須要搞科研、教學、生產三結合，才能很快出成果，並且盡快形成生產力，這樣就可以走出一個發展工業的捷徑來。他經常到北大、清華、首鋼、酒仙橋電子城（798聯合廠），讓他們

互相聯繫，結成一個整體。首鋼的第一部電腦就是他指示有關部門從日本買來的。直到「文革」中，他也沒有完全中斷去這些單位。

他說我們在高新技術上，要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首先應該立足於超，這樣趕上自然就不成問題了。如果立足於趕，那就老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邊，老是趕不上，老是差一截。所以他提出必須立足於超，才能達到趕上的目的。

到唐山去看「氧氣頂吹」轉爐煉鋼之後，他感到激勵，到處講，我們國家第一個「氧氣頂吹」轉爐煉鋼是唐山鋼廠，他說我們不算落後，日本有了（世界獨一），我們也有了，所以就可以提高鋼的產量了。為了知道新技術的研製進展情況，1966年的7月份，還讓上海的陳丕顯帶着從礦石直接煉出鋼的樣品來釣魚台給他看。當時陳丕顯說：含碳量太高不能用。陳伯達說沒關係，第一步煉出來就好，以後逐步完善嘛。

他對科技方面趕在世界前列，非常有信心，他說我們比資本主義要快，首要條件就是我們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好集中力量，像攻克一個堡壘似的，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電子工業，像激光這樣的技術，世界上出現激光之後的五、六年，我們也就有了，這樣應該說我們不算落後，一定要趕上去。這種高科技，他在天津看了，在上海也看了，我們也都和他去看了不少次的激光科研表演，在科研人員的操作下，將相距約20米遠，有幾分厚的鋼板，「啪！」一下就打穿一個洞。這要用在國防上，打飛機、攔截導彈那多方便。在天津南開大學看完激光表演之後，陳伯達詢問科研人員，你們現在在研究甚麼？他們回答說：我們在研究激光電視。陳說，那好。然後鼓勵他們說：那你們能不能研究激光炮，可以攔截敵人的導彈呢？也可以在這方面研究研究。給他們指出這個路子。

在天津他去看部隊的魚雷快艇，想體驗它的先進性和速度感，便

乘坐在小艇上，讓戰士開動。在廣闊的海面上飛快前進，在前進中，兩人在一起說話都無法聽見，他還大聲對戰士喊話：「還能不能再快點……！現在達到多少馬力啦？」他是想看看最高時速，可是像他這樣的領導坐在艇上，部隊只能以安全係數之內的速度跑。而他腦子想的是我們的軍隊應該超過敵人，他說我想知道現在我們的時速達到多高，將來能達到多高，和別人差距是多少。在研究世界工業發展中感悟到，科學技術發展最快、最先進的是軍事工業，以軍事工業帶動民用工業的發展。而世界上最好的工業是德國工業，我們要多從德國工業中汲取經驗。所以他特別關注高新技術的發展，甚麼激光、電子等等，在文革中他一直都沒有放棄。

他對電子工業特別重視，在參觀798聯合廠時，他在一次專家座談會上說：你們看能不能這樣說，電子工業的第一代是電子管，第二代是半導體晶體管，那麼第三代就是激光、芯片？他似乎是問在座的專家，好多專家們也覺得應該是。陳伯達認為發展電子工業將是促進所有工業的核心。他經常跑一些工廠，參觀考察，不是大廠而是些小的實驗工廠。矽不是金屬，是從礦石提煉出多晶硅，多晶硅雜質多，不能用，然後再把它熔煉，拔出單晶硅來。在北京看過，在天津也看過了，一台一台的小機器，那時拔出的單晶硅，只有胡蘿蔔那麼粗細，再大的我們還弄不出來。但是拔出來的單晶硅還不能用，需把單晶硅切成薄片，然後做成集成電路板（芯片），國外的容量比我們大，但我們已經有了。他勉勵大家說：「目前是有些差距，但不算很大，我們努力會趕過他的。」當時北京拔出的單晶硅，因為沒有設備，不能切片，只能去天津加工。陳伯達就北京、天津多次來回跑，為他們協調，爭取更快地共同發展。那時他在主席那兒，用了不少時間探討工業發展的問題。陳伯達那時就抓這個，從北京、天津搞出的樣品都送給他看。我們也受鼓舞。那時他給我們的感覺就是迫不及

待，電子就是工業發展的方向，是核心。他覺得太慢了，他說外國的先進技術一定要學，借鑑經驗，少走彎路，走出捷徑，超過他們。在「文革」期間為了不讓人說他單幹，不合作，不協調（江青多次批評他單幹，轉移方向），他就拉了姚文元去看電子工業，然後給主席寫了個不長的報告。主席在上面有個挺長的批語。原來的電子工業部就把它放大字體，鑲嵌在辦公大樓一進門的牆壁上，非常醒目。可是等陳伯達倒台，姚文元批評他是電子中心論。

陳伯達除在這些城市調查外，他還到東北的大慶和中國西部的大三線多次進行考察。看了不少的廠子，有大工廠、小工廠，包括民用廠和國防工業廠都去看，經常在外邊跑。在參觀考察過程中，他看得多說得少，主要是開座談會聽彙報。

（二）東北工業地區之行

1964年陳伯達在天津調查期間，他想去東北工業地區考察。便於6月14日從天津坐飛機去哈爾濱，隨同去的有劉叔晏，天津市委工業部的李樹夫、宣傳部的侯克一，還有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馬傳中和王保春等。早上7點30分起飛，上午10點50分就到了哈爾濱市。到機場迎接的有黑龍江省委文教書記王一倫，宣傳部長陳元直，省委秘書長張向凌和哈爾濱市委第二書記呂其恩等同志。在哈爾濱待了一天半，參觀了幾家工廠，和省、市的領導同志開了座談會。

6月15日下午2點30分，由哈爾濱乘坐91次火車，經過五個多小時的旅途，當天晚上就到了大慶油田。到車站迎接的有石油部副部長徐今強和石油管理局局長焦力人及陳李中。晚上和先期到達大慶油田的《紅旗》雜誌社的劉義立、李智勝，徐道何等人一起開會。為了方便考察工作，陳伯達提議臨時成立一個學習小組，分別由陳元直為組

長，李樹夫為副組長。主要了解企業的幹部參加勞動問題和政治學習問題以及怎麼當好班、組長，如何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如何把群衆中的潛藏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出來等等。

大家先後參觀了油井、打井、集油庫、煉油廠、注水井等等。並且組織了好幾個專題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彙報。

在大慶油田，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緊張調查之後，6月21日下午4點鐘又去了長春市。吉林省的鄭季翹、富振聲等領導到車站迎接。晚上吳德書記請大家吃了晚飯。在長春又作了短暫停留，參觀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6月23日便乘火車去了鞍山市，在鞍山參觀了鋼鐵廠的軋鋼車間等，同時開了幾次座談會。

(三) 攀枝花之行

1966年初，陳伯達等人在上海調查期間，他又準備去大三線考察，主要是去看渡口，那裏儲藏着大量的天然氣和鐵礦，準備在那裏建廠。出發前陳伯達先讓楊波、李樹夫、劉義立三個人去四川的成都作好準備，待他忙完事隨後就去。

幾天之後的1966年1月25日，陳伯達在王保春的陪同下，從上海乘坐一架蘇式伊爾18飛機飛往成都，到機場送行的有上海市領導人馬天水、王一平。在路途中儘管機身很大，飛得很高，但是在路過秦嶺大山的時候，還是顛簸得很厲害，桌子上的茶杯震得嘩嘩作響。機長怕陳伯達受驚，便從駕駛艙內跑出來，向陳伯達解釋說：「首長，現在我們正在飛過秦嶺大山，氣流太大，顛簸得厲害，我們盡量繞着山峰走，您放心……。」陳平靜地說：「沒事，沒事，聽你們的。」

中午到了成都機場，由於來的是中央首長，當地領導以為來人很多，便開來了好幾輛空車迎接，熱情地請陳上車，而自己卻遲遲不

上，又不停地向機艙上張望，但不見再有人下來，便問王保春：「王秘書，還有人嗎？」王保春說：「咱們走吧，沒有人啦。」那個省委交際處長和警衛處長小聲的對保春說：「就你們倆呀！」

在成都我們住在「金牛壩」招待所的七號樓，與楊波等人會合。當天晚上程子華和省委周秘書長來看望陳伯達，並且一起安排了這次來四川之行的日程，計劃在成都參觀兩天，再到德陽、瀘州、重慶和成昆鐵路，然後到攀枝花參觀考察，總計約十五至二十天。

1月26日上午，陳伯達在廖井丹、周頤秘書長的陪同下開始參觀考察，首先看了420廠等。在考察過程中，陳伯達對於技術革命興趣很大，在和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座談時，他啟發鼓勵大家創新。他拿現在的設備與原來的設備作比較，拿蘇聯的與英國的作比較。「原來蘇式機器體積大重11噸，而英國的只有7.4噸。」陳伯達向他們提出：「我們是不是不光在體積上要減輕，而且要搞自動化，這樣可以減輕勞動，而且越改體積越小，精密度越高，質量越好呢！」他拿鐘錶作例子，反覆說明這個道理，如「鐘錶從座鐘——掛鐘——懷錶——手錶——小手錶——電子錶……；收音機也是如此，從大到小，從簡單到複雜，再從複雜到簡單，從電子管到半導體晶體管、單晶硅、芯片、激光……。體積很小，但質量、效率很高。」

下午我們又去參觀了172廠（雷達），在參觀中談到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問題時，陳伯達說：「我認為首先是立足於『超』，有了超的雄心壯志，『趕』就不成問題了。超是第一位的，力爭『上上』。過去不是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嗎？我們要爭取『上上』。」他鼓勵大家說：「人生來有一雙手，用手去勞動才發達了腦子。中國人吃飯用筷子，這是本事，外國人用刀子、叉子，有的用手抓。他們用筷子就不會，但是我們用刀子、叉子一學就會了，這說明中國人是很聰明的呀。所以在工業發展

中，趕與超的關係上，還是要多想想，我主張首先強調『超』。各工業部門之間還是有聯繫的，要互相促進，不要截然分開。」在成都等地除了看了些軍工廠外，還看了民用工廠以及其他企業。

陳伯達在成都等地經過了四、五天的調查之後，最終目的是到渡口去考察。因此2月1日乘坐伊爾14飛機，飛到使人感到極不舒服的海拔4,600米，越過了峨眉山和大、小涼山等大山，下午到達西昌。

在西昌坐汽車，要越過海拔3,000多米高的大山。警衛處的負責人介紹說，要越過這樣險要的大山，中途絕對安全，不出現任何問題，只能乘坐從德國進口的『奔馳』汽車。那是最好的汽車，車型很漂亮，座椅還可以向後放，累了可以斜躺着。當時國內只進口了幾輛，主要就放在大西南，作為考察備用車。只有這種車能爬這樣的山路。

在西昌，我們換乘「奔馳」車去渡口，離開西昌市區不久，就開始爬山。爬山時車速不算慢，走了一段路程約一個小時之後，保春提出休息一下，陳以為保春照顧他，便說：「噢，不用休息了，我不累。」保春對他解釋說：「走這種路太險，咱們沒有甚麼，主要照顧司機同志，讓他放鬆一下。」陳馬上理解地說：「是呀是呀，是這樣，那好，讓司機同志休息一下吧……」

當車停下來以後，大家下車從山上往下一看，天哪！可怕極了，好似站在高空中，使人頭暈目眩，山谷下便是綠色的河流，真可謂萬丈深淵！保春對陳伯達說，你看這種路，讓開車的司機同志怎麼能不緊張，特別是給中央首長開車，他們就更加緊張。所以必須讓司機開上個把鐘頭以後，下來休息，放鬆幾分鐘，然後再走。陳說：「對對，不要太緊張，不要太緊張……。」

那時的攀枝花還沒建成，也不叫攀枝花，只是說渡口地區。進山以後都是簡易的盤山公路，沒有鐵路，只能坐汽車進去，要走好長

時間。這時我們翻過大山，到了那個不太大的小山坡，坡下有一塊空地，再下去是一條不小的河流。後邊山上都是鐵礦，離這兒很近，對面是一座老高老高的大山，陪同的人介紹說，賀龍元帥也來過，賀老總說：這個地方比較安全，將來等工廠建成以後，把高射炮部隊就安在對面那座高山頂上，一有戰事，這個地方還比較安全。

我們在礦區的總指揮李兆平的陪同下，參觀了金沙江大橋的施工工地，以及礦區的發電廠、鋼廠、化肥廠、製氧廠。還訪問了弄弄坪的幾戶農民家庭。

陳伯達到這個地方參觀時，興奮地用手指着說：「這個地方好哇，這大山裏多安全，你看這後邊是豐富的礦山，這邊是特別富足的天然氣，煉鋼煉鐵不用煤，下邊有河水，多好哇！」

這裏基本上都是正在籌建階段，已經打出了幾眼氣井，工人們給我們作了個試驗表演。在我們不遠的山溝裏，支一個像水管似的噴頭，工人們把閥門一開，只聽見『啪！』地一聲，打到對面距離約100米遠的山坡上。頓時就看見那山坡上的野草呼呼地燒了起來，把土都燒焦了。看得出那地下天然氣的壓力真大呀！陳伯達當時看了着急地對工人們說：「快關上！快關上閥門！」他怕浪費了天然氣。那麼多的天然氣，這點算甚麼，可是他不行，讓馬上關閘。

陳伯達越看越聽越高興，他說：「你們看，這裏有天然氣，有鐵礦、有水，條件多好啊，就地煉鋼嘛！就在這裏大搞，建立鋼鐵廠、鋼材加工廠，減少往返運輸，降低成本，太好了。」

這個地方在大山裏，附近有個地方叫「渡口」，是金沙江、大渡河（當地群衆叫金河口）江河交叉匯合之地，而老百姓將方圓地區都統稱為「渡口」。（河水都是從高山上流下來的，在此我們曾下車到河邊洗手，感到刺骨的涼。）這個山溝本來沒有地名，就是荒山野嶺，可是要在此地建廠得有個地名，正好這裏生長着一棵特別引人

注目的古樹，滿枝條開着花，當地人都叫它攀枝花樹。這棵樹特別高大，兩三個人都圍摟不過來。陳伯達看着這棵大樹，對那裏的人說：「這棵樹，你們應該想辦法，把它留下來，保護起來，『攀枝花』嘛，應該起這個名字。把周圍的地方都挖平了，就給它留一塊地方圍起來。」

隨後陳伯達在那裏和工人們多次座談。這些工人都是從全國各地支援三線建設來的，來自四面八方。有來自內蒙古包頭市「包鋼」的，有來自上海市「上鋼」的，有來自湖北武漢市「武鋼」的，有來自遼寧省鞍山市「鞍鋼」的，還有來自天津市鋼鐵廠的等等。全國各地好多鋼鐵廠的工人和技術人員都有。工人們建設祖國的熱情很高，陳伯達也在這種熱情的激奮下，給他們題寫了「為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為祖國建設，為世界革命而奮鬥的渡口的英雄們萬歲！」

經過兩年多近三年的調查，材料和參考材料堆放起來有一米多高，有一次在天津我們出去辦事，陳伯達想找一個材料，他翻了半天沒找到，急了一頭汗，這時我們回來了，一下就給找到了，他笑着說，看來沒有你們還不行吶。

那時隨同他經常外出進行調查的有，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楊波，天津市委工業部長李樹夫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劉義立等等。最後在1965年下半年，他給中央寫了個上萬字的〈工業問題〉的報告，當時毛主席看了他的報告也很高興，還留他一起吃了頓飯，主席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有了一條辦工業的路子了。」可是在中央常委開會時，主席高興地問大家怎麼樣，有人表示不贊成說「還不成熟」，有的說：「不符合『以鋼為綱』的方針。」毛主席這時一句話沒說，結果報告被否定了。這時陳伯達心情很不好，痛苦極了，他曾給接近他的同志訴說自己的苦惱，這位老同志多方安慰他說：「你別老放在心上，沒關係，沒有通過是正常的，不成熟，再搞，逐步就成熟了

嘛。」關於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經濟方面的問題，陳伯達直到「文革」開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還沒有轉過來，在1966年的8月30日和江青、康生接見中國科學院的群衆大會上，他還大講發展經濟的問題，講「趕」和「超」的關係，鼓吹大家在科學技術方面趕上和超過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三

陳伯達試圖重新編輯《毛主席語錄》

1965年軍隊裏出了一本《毛主席語錄》風行全國，這是件很好的事，通俗易懂，便於學習毛主席著作。當時強調突出政治，中央宣傳部等好幾個地方都在編毛主席語錄。11月底，中央書記處的彭真，希望能有一本較為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思想的語錄。因此他就想在軍隊出版的那本語錄的基礎上，從理論上更加系統地加以充實，編一本新語錄，於是就委託陳伯達作這件事。陳受託之後，帶了一班人在杭州試搞起來。當時參加的都是《紅旗》雜誌社的人，有范若愚、揚丁、邵鐵真、李佩華等等。

在杭州工作了一段時間，中途王文耀生病了，發高燒不退，住進了浙江醫院。這時陳伯達身邊無人，急壞了在北京的陳伯達夫人劉叔晏，劉急忙去找中央宣傳部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童大林，要求王保春前去陳伯達身邊協助工作。

王保春借下鄉搞「四清」的機會，從陳伯達那裏出來去參加「四清」。「四清」完了回來之後正趕上「戰備」，當時童大林就留保春在中宣部辦公室抓戰備工作，給他派了幾名剛從大學畢業分配來的學生，組成了一個工作組，讓他帶領這個組去河北省的「小三線」，在那裏建立一個中央宣傳部的文書檔案庫。

童大林接到劉叔晏的請求後，不得不改變原來的主意，便急速找王保春商量說：「保春呀，看樣子你不能去河北了。」王保春不解

地說：「為甚麼？」童說：「王文耀病了，你得馬上出差去南方接替他，非你莫屬啊。河北那兒你就別去了，這兒急你就去這兒吧。」王保春覺得自己好容易出來，就對童大林說：「唉呀，我去河北的車票都買了……」童大林說：「買了那就讓別人去，你就去南方吧。」後來由秦寶來接替王保春帶領工作小組去了河北，王保春儘管心裏不願意再當秘書，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他急急忙忙第二天就去了杭州到任。

陳伯達在杭州期間，先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參加討論哲學問題，接着編那本《毛主席語錄》。編完之後印了60冊，先送給一部份領導人提意見。都送給誰，陳伯達很重視，由他自己口述，王保春記下來，然後分送出去。當時是送給胡喬木一本，陳丕顯一本，陶鑄兩本，王任重兩本。

這本語錄編出以後，送給了一些人，還沒有來得及聽取返回的意見，「文革」就開始了，從此也就擱置下來，不了了之。

四

一直不放鬆對工業、農業的調查

在編寫《毛主席語錄》期間，陳伯達從未放鬆抓工業、農業兩大問題。不論到哪裏，他都要談工業、看工廠，看甚麼研究所、軍工廠等。我們記得他還說要發展工業必須研究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道路、經驗，但是決不能亦步亦趨地走它的老路，而是要走捷徑，學它最先進的東西。當時他覺得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是德國，在上海時從上海圖書館借了不少有關德國發展工業方面的資料。他還說從歷史上看，都是從軍事工業帶動民用工業發展，軍事工業刺激民用工業發展。

陳伯達在上海讓《紅旗》雜誌社的杜敬和天津市委的方紀，到山西的大寨去一趟，取取經，看看大寨是怎樣處理分配問題的。杜、方兩人回來以後向陳伯達作了彙報，陳伯達又讓杜敬、方紀向上海介紹了大寨的農業情況。另外，他還特別關心在天津蹲點的小站。他向小站提出了不少怎麼做的建議，陳伯達讓王保春從上海打電話給天津市委的王亢之，請王亢之將他的建議向市委彙報一下。後來王亢之回電話說他向胡昭衡市長和萬曉塘書記彙報過了。

五

一次神秘的活動

1965年，江青在上海和張春橋、姚文元秘密地搞他們所謂的「紀要」，並經毛主席多次修改後，主席讓江青找陳伯達給看一看。

1966年初，陳伯達到了上海，江青向陳伯達談了主席的意見。這時周揚動了大手術，身體虛弱，和愛人蘇靈揚也到上海休養。得知陳伯達在上海，他們平時關係不錯，他想去看一看陳。陳知道周揚在上海又要來看他後，便告訴江青，江青反對，陳有些為難了。因為江青很神秘地向他轉告了主席讓他修改「紀要」的意思和談了她的打算，不讓告訴任何人，也不許他和更多人接觸，這又是關係到文藝界的事，陳伯達想來想去，決定派王保春代表他去看周揚，並向周解釋因工作太忙，不便會見表示歉意，陳希望周、蘇兩位好好保重。

1966年2月，毛主席在杭州，將陳伯達召去杭州，為江青修改那個後來被捧上天的甚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在修改過程中，陳是杭州、上海兩地跑。他將這個稿子改了一遍後，一天把王保春叫去，很嚴肅地交代說：「這個文件很重要，很機密，你要用黨性作保證，不許向外人傳，將它絕對安全地送到上海，交給張春橋。」

陳伯達交代任務之後，王保春當天就動身，臨行前浙江省委警衛處派專人護送王保春去上海，到上海交接後，警衛自己返回杭州。王保春將稿子交給張春橋，然後住在上海市委招待處坐等回音。

江青、張春橋他們收到稿子後，經過仔細閱讀、推敲，提出修改意見，加封之後，張春橋的秘書將稿子交給了王保春，並說有人陪你回去。上海市委警衛處派了兩個保衛幹部，護送保春回到杭州。

當時王保春的工作日記是這樣寫的：

4月18日 星期一（晴）

上午和康老乘火車8點50分離滬，11時左右到達杭州。
住西冷飯店四樓。下午5時我去滬取文件。晚11時張春橋同志辦公室交接文件。

4月19日 星期二（晴）

早晨1點25分乘315次車由上海警衛處許明山、大孫二同志陪同來杭州，6時到達。上午9時半至下午3時半在西冷開會。5時半去南山開會。

晚飯後（陳）囑咐給張春橋打電話，請他告訴關鋒同志來幾天，來以前要同江青、劉志堅說明是康和我（陳）商量找他來這裏談記錄的事。

第二章：「文革」中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和變化過程

1964年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以後，還有過兩次變化。最先是在1966年初批判「二月提綱」以後，毛主席在外地批評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對其下發的「二月提綱」不滿意，認為有問題。提出要撤銷收回。

當時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讓王力起草文件，王力寫了一個很簡短的通知：中央以前的幾月幾日轉發的這個提綱現予以撤銷收回。這個稿子毛主席看後說：只說撤銷，不講理由不行，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沒有講實質性的問題嘛。因此，就讓陳伯達負責重新起草。

陳當時手頭沒有「二月提綱」這份文件，是康生將中辦原發給他的那份文件，交給陳伯達參考起草，陳拉了王力和吳冷西協助他寫了個初稿，交政治局修改後報送毛主席。主席覺得需搞一個文件起草小組來修改。讓陳伯達提名建立這個小組，陳以為這個小組的性質主要是寫文章，按當時的情況，他提名張春橋、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部隊的謝鎧忠、劉志堅當組員。

我們從陳伯達當時從會議上帶回的文件夾着的紙條上看見，陳寫着「請康生當組長」，另外像是周總理的字迹，將紙條上的康生圈去，還是寫上讓陳伯達當組長。陳又用另一紙上推薦另一人當，都被對方（周）劃去拒絕了。這樣的紙條有三、四張，能看出他在會上，

除口頭講以外，還在私下傳遞紙條。陳伯達回來對我們講，他對總理說：「那我作顧問，讓康生當組長行不行。總理說：「不要再說了，主席已說到這種程度了，我就不好再說甚麼了。」這些紙條我們在整理文件時，都按開會時間收入在文件櫃中。

在中央的會議上，還是確定陳伯達當組長，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鎧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這算是最初的文革小組。

後來中央在杭州召開大區書記會議時，又決定文革小組成員，擴大到每個大區都得有人參加。當時代表華北的是郭影秋、東北是鄭季翹、西北是楊植霖、西南是劉文珍、中南是王任重、華東是張春橋。六個大區各有一個人成為小組的正式成員。組長還是陳伯達，副組長裏加了個王任重。

由於小組成員擴大了，有人建議，小組的名稱應該改為中央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樣有別於已受批評的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同時組長職務也可變成主任、副主任。陳伯達堅決反對，他說我只能做個小小的小組長，文革小組只是政治局下屬的辦事機構。他這一反對，也就還維持文化革命小組的舊稱，沒有再改變。

隨着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文革小組的權力驚人地畸形膨脹，文革小組成員也像剝筍似地迅速減員。陳伯達在小組內部也是大權旁落，威信消失，完全由江青說了算。陳對外，只是一個橡皮圖章式的工具。在小組內開會時常挨江青的訓斥，陳伯達對我們說，他曾幾次在會上生氣地把帽子摘下來，往桌子上一甩說：「我不幹了！」而江青對陳軟硬兼施。陳伯達形象地用手揪着自己的耳朵說：「她對我像三娘教子似的訓斥！——你還給我再說你不幹了，嗯！」陳伯達也不願意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多次受到主席的批評。而後，在1967年2、3月間，中央決定由周恩來主持，以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名

義，來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有關的中央黨政軍領導同志都參加。這樣江青雖不滿意，但她也無可奈何。

中央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

1966年5、6月間，國內政治形勢逐步趨於緊張，報紙上常有批判「三家村」等學術問題的文章，還牽連一些人。政治運動算是開始。《解放軍報》領先，《人民日報》趕不上趟，常轉載軍報一些文章。《人民日報》是黨中央報紙，那時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為扭轉這種被動局面，開會決定派陳伯達率領一個小組進駐《人民日報》社。由於軍報領先，陳伯達就匆忙地從《解放軍報》社要了幾位骨幹，從《紅旗》雜誌社調了幾位，組成了一個小組進駐《人民日報》社。

大約是6月1日前一天晚上，軍報同志就送來一篇文章，陳修改了標題，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了。從此，他要求報社每天發一篇社論，連發了8篇社論。陳伯達當時也就去報社兩三次，其餘的事都是工作組向他報告。據我們知道當時凡是重要文章、新聞稿件，他都要送中央領導看。給我們印象較深的是要發表一個在7月9日舉行的盛大宴會的新聞稿，陳伯達將稿中自己的職務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刪去了。當周恩來總理看到稿子後，給陳來電話，不同意刪除，儘管陳堅持很久，但最後還是照總理的意見發表了。

三

陳伯達改對聯

1966年7、8月間，「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西安門接待站，很多紅衛兵在那裏辯論，幾天不肯散去，要求「中央文革」接見。辯論中佔壓倒優勢的是一些幹部子弟，他們認為自己是最革命的，因此就提出了一副對聯，叫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認為出身在革命的家庭裏，自然就是紅的、革命的；出生在反革命的家庭裏，自然心也就是黑的、反動的，是他們老子的孝子賢孫，就罵他們是「狗崽子」。

陳伯達於8月6日下午，到國務院接待站見了他們，和他們一起討論。陳伯達說：「這個提法不妥當，不全面，是血統論，是不科學的，是違反辯證法的。老子英雄，兒子不一定就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子也不一定就是混蛋呀！我看是不是這樣改一下，父母英雄兒追趕，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你們看好不好呀！」小部份人同意，大部份高幹子弟起哄，不同意。會場上人很多，秩序也亂，辯論無法進行。這時，我們和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同志商量，讓陳伯達先撤離會場。

由於陳伯達的福建地方口音很重，大家聽不太懂，當時陳回來後，還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請來一位女播音員，在釣魚台十五號樓一層會議室裏錄製了陳的講話，在接待站向學生播放。

四

彭真等人一夜之間被人抓去

1966年下半年，紅衛兵運動初起，先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破四舊」，把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把住在城裏的一些出身地主的人揪鬥、遊街，然後押送回鄉。緊接着就是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央的事情，那就是1966年12月20日一夜之間，多位副部長以上的負責人被抓走了。據我們當時知道的有彭真、劉仁、萬里、夏衍、田漢和住東城區弓弦胡同的許立群、林默涵等，這些人被抓走後去向不明。

當時，這一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事先打聽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線，準備了車輛。據說他們的通訊聯絡工具都是用高級幹部才有的保密的紅色電話機，而不是普通的電話機。他們的行動迅速，在夜裏2點多鐘夜深人靜之時一起動手，跳牆而入，不許被抓者和家屬說話，從睡夢中將人叫醒後綁架帶走的。

情況報告周恩來總理後，總理非常着急，在懷仁堂召開緊急會議，追查此事。陳伯達得知後也慌了，他當時真是急了，連聲說：「怎麼，怎麼，是甚麼人幹的?!」。「中央文革」的其他人也在着急，總理問誰誰不知道。總理讓公安部、衛戍區趕快把人找回來，並說，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總理還派周榮鑫向有關的紅衛兵組織打聽被抓者的下落。



「文革」中，彭真被批鬥。（網絡圖片）

不知是誰給提供了線索，說是四個藝術院校的紅衛兵抓的人，並且把人藏起來了。被抓者的家屬說他們都是穿着軍大衣、很神氣。

情況查明後，總理批評了有關紅衛兵組織的這種綁架行為，要求他們絕對不能搞遊行示衆，趕快將人交出來。起初他們不願意交人，後來總理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須把人交出來，轉交給衛戍區看管。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涉，這才將人轉交給衛戍區。這時，總理馬上指示衛戍區制定保護措施和方案，必須將人保護好。

紅衛兵在北京站「維持秩序」

外地的紅衛兵來京串連，北京西城區的紅衛兵以維持秩序為名，他們除在大街和旅館查問外，同時到北京火車站查問。外地進京的火車一到站，他們便守住車門，讓下車的學生報出身成份。「你是甚麼出身？」對方如果一說是革幹家庭，便說「走！」放行了。如果說是貧農，也是「走！」。如果說是「中農」，「是團結對象，可以下來」。如果說是「出身地主」，就是「狗崽子，滾回去！」不讓下車。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同樣不讓下車，讓隨車返回原地。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就哭着回去了。

陳伯達看到《快報》反映的這些情況以後，很不高興地說：這都是些孩子，而且來北京是看毛主席的，為甚麼這樣對待呢？這不是還在搞唯成份論嗎！

陳讓人查這件事，他自己也親自到處查問。

一天夜裏，陳伯達散會後，根據記者報告的情況，他到西城區西北邊的一個胡同裏，這兒有個很大的王府式的四合院，說是紅衛兵的司令部，內有幾個院子，有的屋裏還放着不少樂器，如皮鼓、銅號等等。裏邊住了不少的紅衛兵，他們在屋裏打了地鋪，用具都是軍隊的，鋪着綠色的軍毯、軍用被子，軍大衣都是新的，男女混在一起睡覺。

陳伯達進去後他們都起來了。陳和他們聊了一會兒然後說：你

們男女都在一起不好嘛……。陳伯達問他們的軍大衣、軍毯是哪裏來的，他們很爽快地說是發的，是上邊發的。陳說：是不是所有的紅衛兵都發呀？你們是不是太舒服了呀！我覺得你們還是應該回家去住好。

後來聽說這些都是國務院秘書長安排的。

六

這些文物不能毀

1966年8、9月間的一天，戚本禹拿來一封人民來信給陳伯達看，信中反映紅衛兵在「破四舊」、抄家中毀掉了不少文物。信中說紅衛兵把抄來的銅佛像、銅香爐等都集中在一起化成了銅。寫信人說你把它變成銅能值多少錢，你再多的銅也沒有一個小小的佛像值錢，這些文物不應該毀掉。

陳伯達看信後着急地說：文物不能毀，趕快找人管起來，向紅衛兵說清楚，文物是文物，四舊是四舊，不能混為一談，對文物要保護。他和戚本禹商量去找北京市委，讓他們派人管這件事。我們記得當時找了北京市的丁國鉅，通過北京市成立了一個文物清理小組，辨認哪些是「四舊」，哪些是文物需要保護。當時，陳伯達給他們的任務是必須一件件地登記下來，不要丟失。

這些文物分了好幾個地方存放着，主要存放在東城區的府學胡同。記得文物清理小組多次告急，說收回的文物存放不下，實在沒有地方了。當時，陳伯達曾去過府學胡同看過，我們也同去了，看到府學胡同那兩進的大四合院裏，全堆滿了古銅瓦器、古舊書籍字畫。一進屋裏無法下腳，就在前後迴廊裏也堆積如山。參加清理小組的中國書店的賈書玉向陳伯達反映說：外邊走廊裏放不下，有的書籍都被雨水淋壞了。陳伯達一方面對他們說一定要保護好這些東西，同時說向北京市裏再借用一些房子堆放。

這些文物、圖書、字畫，都收回集中起來了，但是它們來源於何處，清理小組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經過文物清理小組同志們的辛勤努力，在府學胡同的大四合院裏，這些東西都分門別類地上了架，擺得非常整齊，而且每件都寫有價格標在上面。

1967年這些東西清理好以後，陳伯達看見清理得整齊有序，很高興地說這些同志辦了件好事，同時，他還明確對清理小組的同志們講：凡是發現是從故宮裏流落出來的（包括文物字畫等等），一律送還給故宮，任何人不許拿走和買去；有些東西知道是哪兒來的先放一放再說，不知道的，可以作價，但不能太便宜了。

1968年以後，陳伯達常去府學胡同翻閱古舊書籍，康生當然也常去。陳伯達每次去我們都隨他一起去，因為陳不會花錢，他自己從不帶錢，帶上也會弄丟的，所以都是我們為他代付款，憑發票回來向管理員李玉元報銷，老李那裏有一大箱子發票——包括他文革前在琉璃廠買的書。陳伯達買圖書字畫較多，只有少量古玩。而康生是除圖書字畫以外，購買硯台古玩較多，而且康生是自己付款，一般不讓秘書代勞。

附：

此條是1966年下半年，有人反映紅衛兵在除「四舊」時抄出許多文物，當「四舊」毀掉。陳知道後指示要立即採取措施保護文物，不能隨便銷毀，因此寫了這一張條。

(二) 手稿封的，一律替封不動，
已還出的，一律還給。
送度待重理，石要保
送還公司。

(三) 指還商店是公司的，石
革行重視，石要保
這意保後。

陳伯達手書。「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陳伯達知道後立即提出三條保護文物的意見。

打條子領走被關教師

1966年11月，北京紅衛兵在「破四舊」中，到處抓人、打人，首先是從學校裏開始的。當時，陳伯達根據「中央文革」簡報組記者的情況反映，知道一所學校裏關着人，於是他就約王力和戚本禹，後來又通知了謝富治等人一起去北京市第六中學，聽說裏邊關着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師，紅衛兵設立了關押老師的「監獄」，把守很嚴，房頂設有瞭望哨，地上設有三道防線，每一道防線的把守人員都是按家庭出身情況排列的。

陳走進學校，碰到了第一道防線，是紅衛兵的外圍組織、團結對象，相當於中農出身的學生，他們手裏拿着棍子在站崗。站崗的人看到來了一幫子大人，有些緊張。陳伯達上前問裏邊是不是關着老師，他們不說話，陳又問你們的負責人在哪兒？孩子說不知道，用手指着說：你問裏邊去。陳伯達往裏面走，看到房頂上還設了瞭望哨，門口又有一個小孩站崗，這個孩子看到有人來了，就抱着棍子蹲在門口，依着門框裝睡，陳伯達看出了這個小詭計，就叫他，他半天才應聲，說他是下中農，問別的不知道，並用手指着裏邊。陳隨即往裏走，站最後一道崗的是幹部子弟，說他們的頭頭都出去了，裏邊關着牛鬼蛇神。陳伯達說自己是「中央文革」的人，想進去看看，小孩子先說需要他們的頭頭批准，以後就猶豫了一下，說同意讓進去看看就出來。於是，門就給打開了，一看裏邊關了好幾個男、女老師。起初，這些

老師非常緊張，不知道來了甚麼人，又要幹甚麼。陳伯達對他們說：給你們換個地方，把你們保護起來。老師們都想趕快離開這裏。陳出來對看守的小孩說：我是「中央文革」的，叫陳伯達，這些老師我把他們帶走，你別害怕，我給你寫個把人帶走的條子，你們頭頭回來後，你就給他說我陳伯達把人帶走了，沒有你的責任。

小孩同意了，陳伯達當場寫了個收條交給他。同時，陳讓謝富治把這些老師帶走保護起來。

在政協禮堂展覽打人的兇器

在「中央文革」的《快報》上得知，某某中學紅衛兵將學校傳達室的一個看門老教工說成是資本家，抓起來嚴刑拷打。大冷天把他關在澡塘裏，脫光衣服，先是用涼水澆，然後又用滾燙的開水澆，把好好一個人活活地給折磨死了。

後來經過了解，這哪是甚麼資本家，這個被拷打折磨的人名叫徐需田，解放前是個拉洋車的工人，辛苦多年後賺了一點錢，開了個車行（修自行車），最多也不過是個小業主。徐需田解放後在第六中學傳達室當看門工，年已80多歲，被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誣為殘渣餘孽。經過一頓毒打，施用所謂「開水洗澡刑」，即將滾開的鍋爐水往身上澆，徐需田被燙得全身都是燎泡死去。

像這類事件還有不少，陳伯達請鄭維山、傅崇碧、謝富治等人派人繳獲了不少紅衛兵打人的兇器，有甚麼棍棒、匕首、刀子、皮鞭子、繩子等等。陳伯達叫擺放在政協禮堂展覽。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發佈了「重要通告」。通告發佈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北京市六中「勞改所」參觀後，指示：「無論對甚麼人，都不能這樣搞。」並嚴令「西糾」立即解散所謂「勞改所」。

陳伯達的大權旁落

1966年8月間的一天，在釣魚台的十六樓忙得暈頭轉向的陳伯達，東搖西晃地從會議室裏出來上廁所，正在十六樓的王保春看到陳滿面通紅，有點異常，便上前問他怎麼了？陳說有些不太舒服。待他上完廁所，王保春便請江青的保健護士許春華在休息室裏給陳試了一下體溫，試完後，小許驚叫一聲：呀，40度！陳一聽自己高燒40度，也許是精神作用吧，馬上感到不行了，站立不穩，立即被攬扶回到十五樓陳的住所。

陳伯達回到十五樓，一進臥室就一頭扎到床上再也起不來了。不一會，文革小組的幾位成員也都過來了。江青一進門就找陳的夫人，她扯開嗓子高聲問「劉叔晏哪兒去了？」我們告訴她說，在新建胡同參加某某專案組的工作呢。江青一聽就很生氣地說：「通知她馬上過來，伯達同志都病了，還搞甚麼專案！哪個重要？還有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我們就按她的話馬上通知劉叔晏急速過來。

這時，醫生也都請來了，他們就研究治療方案。開始想送陳伯達到北京醫院住院治療，但又說北京醫院現在太亂，不安全。江青說小組工作這時很忙，帥不能離位，她提出病房就設在十五樓裏。江青的意見不可違抗，大夫們經過反覆商量，覺得病房設在十五樓，一些檢查、治療用的大型設備實在難以搬運過來。又經過請示江青同意，最後決定住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即301醫院）南樓的高幹病房治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及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網絡圖片）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及江青在天安門城樓。（網絡圖片）

療。這時江青當即規定，陳伯達住院後，文革小組成員可隨時向陳伯達請示工作。江青臨走時當面命令劉叔晏：「你的主要任務就是守護照顧好伯達同志，不要出去亂跑了！」

看得出劉叔晏是憋了一肚子氣，無奈只好聽着，當江青一離開，劉氣得在屋裏直轉圈，嘴裏自語道：「嗯，甚麼出去亂跑……！」轉過頭來對我們說：「你們好好照顧首長喲！我還有事。」說完就下樓走了。她算是將任務轉交給了我們。

陳伯達是1966年8月26日上午8時許住進了301醫院，當時請了北京醫院的陶主任和耿大夫來會診，診斷陳伯達患的是急性肺炎，當天下午試體溫還在39.5度，一時不能出院。劉叔晏安排我們倆分頭值班，王保春陪陳伯達住院，王文耀在釣魚台十五樓辦公室值班。

這時不知是有人授意，還是陳伯達被江青的「殷切」關懷所感動，他親筆給主席和林彪寫了封信，說在他生病住院期間，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毛主席和林彪看後圈閱退回，江青看到這個批示後極為高興。起初江青以自己不便親自去醫院看望陳伯達為由，讓她的貼身保健護士許春華代表她去醫院看望。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張春橋則是經常去醫院看望、商談工作，一談就沒有個完，和以前一樣親密無間。尤其是康生，很特殊，差不多每天來電話詢問陳伯達的病情，問得非常仔細，甚麼體溫多少、白血球高不高，有多少，吃飯怎麼樣……等等，不知甚麼用意。當然，在這期間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不斷去醫院看望陳伯達，如陶鑄、聶榮臻、楊成武、張平化，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一天好幾批直到深夜。

以下便是陳伯達住院期間我們記的部份日記：

8月26日

下午4時30分，體溫39.5度。

8月27日

晨3時55分，體溫38.8度，心跳104次／分。6時，體溫39.3度。

下午4時30分，體溫37.8度，心跳80次／分。下午5時，陶鑄、張平化同志來院探望。

8月28日

上午9時，體溫38度，白血球7400。

上午10時，楊成武代總長來探望。

下午楊代總長來電話告訴：首長上午交待辦的幾件事已向林總（林彪）報告過，他都表示同意，並建議首長（陳伯達）寫個便條送給林總批示傳閱。首長得知後，寫了信已送到林辦趙秘書。首長交辦給曹大姐（曹軼歐）回電話：前幾次來電話約談，總因身體不佳未談成，表示歉意，望待一、二日，體溫下降時再約談。

8月29日（星期日）

晨1時，體溫39度。

上午9時，體溫37.8度。

上午10時30分，首長提出約王力、關鋒同志來院談昨天開會的情況。

下午4時，體溫36.9度。

下午5時，約唐平鑄等來醫院談寫一篇社論問題。

下午7時，約王力來談。王力聽說寫社論的事，當即批評了首長「應好好治病，不要談社論事」。首長對王的批評極為不滿。

7時半，體溫上升為37.4度。

晚8時，十一樓首長（江青）派許春華代表她來探望首長。

晚9時半，唐平鑄等送來社論清樣。

8月30日（星期一）晴

上午體溫37.4度。

上午首長情緒不好，問起社論修改情況。對王力昨天的批評表示不滿，特別是王力說「現在你寫東西，將來你覺得不舒服，別人也會不舒服的」很有意見。

8月31日（星期二）

體溫37度。

晚上首長囑給唐平鑄打電話：「聽王力說，我（陳伯達）生病了，《人民日報》的社論送中宣部陶鑄同志看，就照這樣辦吧。上次我找他和胡穎來還不知道，後來才聽說的。」

9月1日（星期三）晴

體溫36.6度。

上午劉志堅同志來醫院看望首長。

晚上9時許，唐平鑄、胡癡同志來談今天天安門大會的情況，並且談到《人民日報》社論〈要讓群衆聽到黨的聲音，同時讓黨聽到群衆的聲音〉。

9月2日（星期四）晴

體溫36.6度。

下午3時40分，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來醫院看首長，談了一個多小時。

9月3日（星期五）晴

體溫36.3度。

下午7時，關鋒來談話。

晚上9時與葉主任（葉群）通電話。然後讓把劉叔晏叫來醫院。

晚10時許，唐平鑄拿來一篇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沒有讓唐見首長，留下社論，首長未看。

9月4日（星期六）陰

上午11時30分，葉主任（葉群）來看望首長，下午1時30分離去。

下午，關鋒、張春橋來談，告訴他們首長精神不好，他們說看看他，稍談一會就走。其間催了三、四次都不肯走，談了1小時55分鐘。

晚上，總後邱會作來探望首長。晚11時許，唐平鑄、胡癡來，告訴他們首長已睡未見即離去。

9月5日（星期日）陰雨

下午4時，唐平鑄、胡癡來改寫社論〈要文門不要武門〉，至晚7時吃晚飯後才走。

夜22時，首長與陶鑄同志通電話。

9月6日（星期一）晴

上午10時，謝富治來探望。

上午11時許，聶榮臻同志來探望。

中午，劉叔晏來了和首長一起吃午飯。

下午，文耀來電話說趙易亞（研究院）報告柴沫同志昨晚服毒自殺了，今天下午才發現，已沒救了。寫了三封遺書，一封給首長（寫伯達同志親收），一封給他愛人，一封給趙易亞。研究院準備派劉義立去他愛人單位談談情況。劉叔晏的意見因為首長有病，暫不告訴他，信讓文耀先存起來。下午4時半，陶鑄同志來談，5點多離開。下午5時30分，唐平鑄、胡癡同志來談。

晚8時20分，葉群來探望，11時40分離去。晚，文革辦事組矯玉山同志來電話說，關鋒、王力今晚去一組（主席）開會，想來談談。首長夜12時與關鋒通電話，說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就在陳伯達住院期間，江青得到了代組長的頭銜之後十分得意，一切工作就都想攬了起來，人馬也多了起來，除了張春橋、姚文元原來就是跟隨她的人以外，王力、關鋒、戚本禹也都追隨了江青。8月底，毛主席在天安門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她代表中央文革出席、

講話。

1966年8、9月間的國內政治形勢發展極快，到處告急，儘管陳伯達連續高燒三天，在體溫有所下降時，他常要看一些文件和新華社每天清樣及《人民日報》的版面，以及佈置寫一些社論甚麼的，但都會遭到一些冷落。上述王力來看陳伯達，陳談到寫社論的事詳情是這樣的，王力說：你別忙着寫甚麼社論了，你將來會不舒服，別人也會不舒服。說完後，在離開時走在病房的走廊裏，王力還流露出不滿，嘴裏嘟囔着：有病就好好養病嘛，還看甚麼版面，寫甚麼社論！工作有人做並不是沒人管！正好也被劉叔晏聽見了，隨後就告訴了陳伯達，陳有些不大相信，劉便把王保春叫去當面向陳複述一遍王力說的原話。陳聽了很不高興。

陳伯達大約住了十幾天醫院，出院後的釣魚台十五樓就不像以前那樣熱鬧了，熱點已逐步轉移到了釣魚台的十一樓——江青那裏去



1966年八次接見人民群眾時，周總理專車走到天安門前，車上站着的左起：陶鑄、周恩來、陳伯達，後排是作者王文耀。



1967年，毛澤東、周恩來與陳伯達八次接見人民群眾，陳伯達身後為王保春。

了，有事都去十一樓請示。過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來十五樓見陳，都要先問一下我們工作人員陳是否起床了。現在不這樣，到十五樓一上樓便直闖陳的臥室，攔也不能攔。後來在陳休息時，醫護人員便在陳的房門上掛一張小紙條，寫着「未起床」。那也不行，還是推門而入，特別是戚本禹、王力，神氣十足，揚着頭，甚麼「江青同志那兒有重要事情」，你敢不讓進？給人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原來日夜圍着陳伯達轉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現在已經較明顯地轉移到江青那裏去了，已經不大聽陳伯達的了，而且開始對陳不太尊重了。

陳伯達哭了

1966年底，天津一些學生步行串聯到北京，錢、糧全都在路上用完了，晚上住在一個旅社裏。這時，北京的紅衛兵糾察隊進來查房，得知是外地來京的，不問青紅皂白，進門先將燈泡打碎，摸黑用棍子亂打了一陣。然後將這些外地孩子攆出房門，不讓在北京停留，這些孩子在黑夜裏哭着離開了北京。

陳伯達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手裏拿着《快報》稿，從他的辦公室急匆匆地走到我們的辦公室說：「你們看這個消息了沒有？這都是些孩子呀！他們遠道步行走來是看望毛主席的，是毛主席的客人呀，怎麼把人給打回去了呢！他們的錢、糧票都用完了，現在怎麼樣，是不是安全？……」

陳越說越激動，說着說着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看到這種情景，我們倆就安慰他說：「你不要激動，我們一定把他們找到，安全地送回去。」

我們趕緊打電話給「中央文革」的《快報》組，找到寫消息的記者問明了情況。陳伯達不放心，便立即派王保春同這位記者馬上沿路追蹤去找，要把他們安全地送回天津。

我們向「中央文革」辦事組要了一輛小車，臨走前，陳伯達還將他自己的糧票和一點錢帶給學生，在回家的路上使用。王保春和《快報》組的那位同志，夜裏9、10點鐘，出了朝陽門，沿途一個單位一

個單位地敲門詢問查找。過了國棉一廠，快到八里橋時，在靠近右邊的一個旅館裏找到了線索。一問有天津來的學生，他們在旅館裏打着地鋪，都已經睡覺了。王保春將他們叫起來，一問對上了號，是被打回天津的學生。他們提起在北京被打的事，一個個都哭起來了。王保春一看有十多個孩子，有男有女，最小的12歲，最大的16歲。王保春將帶去的糧票和錢交給了他們，供路上使用。

找到後，王保春趕緊給王文耀打電話說天津的學生找到了。還不等王文耀接完電話，在我們辦公室坐等消息的陳伯達，急切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找到了好，不要走開，約好在甚麼地方等着，然後你（指王文耀）告訴謝富治，請他們派人去把這些孩子護送回去。」

王保春與王文耀約定，在八里橋快到通縣路旁的檢查站等着。隨後，王文耀電話告訴了謝富治，說是陳伯達交辦的，請他派人送這些孩子回天津。謝富治同意馬上派人去。

過不多時，王保春看到一輛警車開來，下來三位民警，一問接上了頭，王保春向來人交代了任務，請他們步行把這些學生護送到天津甚麼學校。這算是王保春完成了任務。

幾天以後，三位民警將學生送到了，學校還開了一個「收條」，說孩子們都安全地送到了。當時，謝富治在參加一個會議時，會前將這個收條當面交給了陳伯達，說：「伯達同志，你交給的任務完成了，你看，這不，收條交給你吧！」

這件事，對陳伯達觸動很大，他都哭出聲了，覺得「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成了這個樣子，到處打人。

江青對周榮鑫發怒

1966年12月16日，北京中學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了大會，江青在會上講話很厲害地批評了紅衛兵糾察隊，說他們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憲兵」，要對那些殺人、打人的糾察隊員實行專政。江青還大罵西城區糾察隊「血統高貴，精神貴族，甚麼東西！」還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幹是有人在後面支持他們的。江青說到這裏時，突然莫名其妙地大聲地喊：「周榮鑫來了沒有？給我站出來！」周榮鑫就坐在主席台上，正好在我們身後。周站了起來，臉色都變白了，他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呀！我們倆也都嚇壞了。江青好像也點了許明的名字。

從此，周榮鑫就被打倒了，許明同志也倒霉了。實際上江青是把矛頭指向了國務院。記得周總理作過一次解釋說，當時車站很亂，他們提出要維持秩序，同時也都是些孩子。由於江青攻擊得很厲害，後來總理也就不再提這件事了。主觀上想利用他們來維護一下秩序，改變混亂的情況，由於紅衛兵「西糾」的唯成份論的特權思想作祟，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打人、殺人，做了不少壞事、傻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後來抓了他們的一些人，他們就鬧得更兇了。當時宣佈「西糾」是反動組織，這些人不服，他們又成立了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進行活動，胳膊上帶着比一般紅袖章要寬得多的紅袖章，



1967年12月3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及江青等中央負責人於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央文革小組等工作人員。

沒有印字，叫做紅透了，高於一般紅衛兵。他們的行動一個是去公安部禮堂靜坐要人，要釋放他們被抓起來的人；一個是在大街上幹壞事。

當時的《快報》反映，他們在北京的大街上見到外地來京的學生，問出身不好的就打，說在北海橋那裏把外地來京的學生，扔到河裏去了。陳伯達知道這消息，差不多每天晚上從大會堂散會後，就坐車在大街上到處找這些流動的紅衛兵。一天晚上約12點多鐘，陳伯達從大會堂散會出來，他說要到大街上看看。出大會堂往南再進前門大街往西，寬闊的大街上夜深人靜，只有刺眼的路燈照射着。不多時，看見遠遠地從胡同裏出來五、六個騎着自行車的學生，他們每人手裏



1967年，作者王保春（左五）在天安門後北平房前和林彪、江青等合影。

打着一面紅旗，嘴裏還吆喝着往西騎去。陳伯達向司機說，上去問他們在幹甚麼。這些人發覺後邊有汽車追來，便拐彎向南騎去。我們緊隨其後，車也南拐，超過他們後停車。這時他們也都停了下來，陳伯達下車問他們：你們是哪個學校的，這麼晚了還在做甚麼？這些學生也都滿不在乎地說，這個說是這個學校的，那個說是那個學校的，還都不是一個學校的。他們說睡不着覺出來玩玩。陳伯達和他們閒談了一會兒，才知道他們大部份都是幹部子弟，然後勸他們回家睡覺，不要在大街上閒逛。

後來《快報》上反映說，這些「聯動」在城內活動有人抓，他們又在郊外的頤和園活動打人。陳伯達一天下午專門坐車去頤和園轉了一圈，沿湖走到石舫，看沒有紅衛兵活動就回來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部份幹部子弟起初造反精神很強，如批走資派中的一些怪招剃陰陽頭之類就是他們出的。後來由於他們的父母受到了衝擊，自己也受到了歧視，思想就產生了彷徨，無望地發洩起來，打人，砸東西。如海淀區「八一中學」的幹部子弟，把自行車搬到五層樓頂上往下扔，說是聽聲、好玩。把學校圖書館的圖書

全部從書架上推下，撒落滿地足有一尺多厚，人在上邊用腳踩，說不讀書了，書全部毀了。

後來，毛主席知道了，讓把抓起來的「西糾」都放了，說他們都是些小孩子，多進行教育，不要關着。有一天，把他們送到人民大會堂南面的一個會議廳裏開會，我們看到前邊坐着一大片，大約有幾十人，都剃了光頭，有的在坐位上坐着，有的站着東張西望，在尋找自己數天未見的朋友，互相談論着分別被關的苦難。後邊坐着外來參加會議的人。

江青在會上講了些「語重心長的話」，感動得他們中的有些人都哭了，嘴上說着：「江媽媽呀，我們對不起您！……」江青也哭天抹淚地演了一場「十分動人」的鬧劇。

由批判會變成歡迎會

1967年6月份的一天，聶榮臻來釣魚台，找中央文革的人，說北京航空學院的部份師生要求他去參加一個批鬥他的大會。他要求中央文革成員能去說說，可是他們誰也不去。後來只有陳伯達陪同聶榮臻去了。

我們一到，「紅衛兵」的造反派頭頭韓愛晶已在大門口等着了，我們一進門就看見大禮堂內坐滿了人，他們看見聶榮臻和陳伯達一進來，就高聲呼喊「打倒聶榮臻！」陳伯達一聽不對，就擺手說：「錯了，不對！不對！應該說歡迎聶榮臻同志！」並且急忙拉着紅衛兵頭頭說：「叫他們喊歡迎聶榮臻同志」，邊說邊急沖沖地沿着禮堂的邊牆通道向主席台走去。這位紅衛兵頭頭當即振臂高呼：「歡迎聶榮臻同志！」其他的人也就隨即將「打倒聶榮臻」改喊為「歡迎聶榮臻同志」了。

陳、聶等匆忙走上主席台之後，陳伯達站在中間對台下講話說：「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第一顆氫彈爆炸嗎？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你們知道這是誰指揮的嗎？就是我們的聶老總，是聶榮臻同志指揮的！他是剛從前線回來的呀！我們應該歡迎他，他是我們的英雄！」

台上的紅衛兵頭頭帶頭喊起歡迎的口號，台下也很振奮，高喊「歡迎聶榮臻同志」！原來他們準備開的批判大會，一下子變成了歡迎大會。

陳伯達轟趕圍攻中南海的學生

1967年7月底8月初各學校在中南海周圍搞所謂「揪劉火線」，陳伯達是極不贊成這樣做的，他至少去過兩次，攆他們離開中南海。

一天晚上陳伯達從人大會堂開完會出來，說去中南海看看，從府右街南口向北去，看到馬路兩側都搭着棚子，掛着標語，畫着劉少奇的漫畫、掛着小人。陳一下車走到一個棚子裏，問他們是哪個學校的，說你們到這裏這麼搞可不好，棚子裏的學生都在下棋、打撲克，由於夜深了，男的女的擠在一起睡覺，這是陳最反感的，他對學生說：你們都在這裏幹甚麼？真是很不好呀！後來他派人從大會堂的會場上把韓愛晶、蒯大富叫來，讓他們倆和他一塊沿着府右街，從南到北地動員駐紮在馬路兩邊的學生撤走，陳伯達邊走邊說，不能包圍中南海，絕對不能這麼幹，叫他們馬上撤離現場，而且限時間馬上撤走。

當時有不少學生撤走了，陳伯達看着他們撤走，等他們幾個人走到中南海北門外時，已經是下半夜了，早就沒有公共汽車了，韓愛晶、蒯大富要回學校就只能步行了。陳伯達這時說：走，用我的車把你們送回去吧！於是，韓、蒯二人就上了陳伯達的汽車，直把他們送到清華大學門口。這時已經是凌晨4、5點鐘了，幾個人全都下車站成一排，望着泛白的東方，各人感嘆了幾句：曙光就在前方……韓



王保春、王文耀與蒯大富（中）合影。

愛晶說三十年以後將會是個甚麼樣子？！陳伯達說：將是屬年輕人的，更美好！

第二天晚上，陳伯達還不放心，又去府右街，看到中南海西門北邊還有一些學生沒有撤走，就動員他們走，這時中南海警衛局的同志，看到陳在轟學生走，他們也一起參加動員他們撤離。記得楊德中好像也參加了動員。

張際春請求工作

1966年5、6月以後，中共中央宣傳部被當作閻王殿給解散了，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的張際春，當然也受到了衝擊。而一些美術院校就他對使用模特兒問題說過的一些話進行批判。就此，他在1967年7月27日給毛澤東及黨中央寫了一封信，申訴了他的一貫看法，以及他對毛澤東過去有關批示的認識和理解。他說要畫人體不寫實，不用模特兒當然不行。但是使用模特兒，似乎不要從社會上專門僱用，可考慮用別的辦法代替。他在信中還說：「我沒有說『主席批了也不能執行』的話。我是主張要模特兒的，只是就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一些意見。」他的這封信，毛澤東看了以後，在1967年8月4日作了一個批示：「畫畫是科學，就畫人體這問題說，應走徐悲鴻素描的道路，而不應走齊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傳閱，存辦公廳秘書局。毛澤東8月4日。」從此以後他就沒再受批判。中宣部已被解散，人員都被集中到北京市委黨校辦學習班。中央有不少部門也都處於癱瘓狀態。張際春當然也因此無事可做。這時，王文耀接到張際春的電話：「王文耀同志嗎？我是張際春，我求你向伯達同志說一下，我現在無事做，你能不能向伯達同志說說，給我安排個工作做呀，請你幫幫忙吧！」王文耀原來是張際春的秘書，突然接到自己的老首長這樣的求助電話，心情十分不安地說：「哎喲張部長，您快不要這麼說……您的意思我一定向伯達同志報告……，您多注意

身體，我一定報告……」接完電話，我們就向陳伯達說張際春來電話，要求工作的請求。陳伯達一聽就心煩地說：「唉呀！你看現在這麼亂，還要甚麼工作，……我看還是好好先呆着，……你告訴他先不要急，等等再說……。」我們回答張際春之前，也議過一下，覺得陳伯達讓等等有他的道理，因為在這樣混亂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不少同志，新到一個部門，工作沒幾天就又被打倒了，既然如此還不如在家待着好。我按這個意思給張際春回了電話，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他也表示理解。

陳伯達為甚麼堅持不換秘書

陳伯達出院不久，由於中宣部當時被看作是「閻王殿」，首先被砸爛了，人員當然也都不可信任了，而我們倆又都是原中宣部的幹部，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便認為我們不能繼續做秘書工作；加之中宣部內部有人寫大字報說：王文耀原來是周閻王、文藝界的祖師爺周揚的秘書，現在又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裏面工作，我們不放心等。這樣中央文革裏有人向陳伯達建議另換秘書。

一天，王文耀在辦公室裏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的電話說：「戚本禹說伯達首長那裏不是要換兩位秘書嗎？我們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從廣州軍區（還有一個軍區，不記得了）調×××、×××同志去，這兩位同志各方面都表現不錯，是全軍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你看行嗎？……」王文耀聽後覺得詫異，因為沒有聽說過，又是關係到自己的事，不該自己知道，也不好再去請示答覆。因此，就隨口告訴對方說：誰交給你的任務，你就直接告訴誰好了，不必再去轉告。電話掛了以後，王文耀便告訴了王保春。兩人知道後，心裏都不安，在考慮自己以後的出路。當時機關裏很亂，回中宣部吧，部內兩派正在打架，自己參加哪一派都不樂意，心想反正回去哪一派都不參加。當然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大約一小時後，戚本禹匆匆來到十五樓，直入陳的臥室。我們知道戚本禹來了，沒有幾分鐘就聽到戚在裏邊對陳伯達高聲地說：「不

是你當時已經同意了嗎？！怎麼又不換了！」陳小聲說：「生人來，我不習慣。」戚很不高興地嘟囔着走了。

後來，陳伯達說，江青、戚本禹幾次要求他換掉我們，而且也讓關鋒找過兩個人，他都以怕生人，在自己身邊工作不習慣為理由拒絕了。因此，康生幾次對陳說，你那兩個寶貝秘書，不得了呀！

有一次康生來十五樓看陳伯達，我們得知後，王保春趕快下樓去迎接他上樓，並請他坐在客廳裏為其倒茶，然後說，「我就去請他，伯達同志在休息。」非常小心謹慎，唯恐怠慢。可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康生對陳伯達說：「見你一次不容易啊！你那個秘書王保春把我擋在門外邊，不讓我見。」陳伯達回來後就問王保春：「是你把康老擋在門外邊嗎？」王保春向陳作了解釋。陳伯達平時要求我們很嚴，也知道我們不敢怠慢他們。

劉叔晏那時有些作法不妥，我們對她有些意見，陳對我們作了解釋，並說：「劉叔晏對你們還是不錯的，戚本禹、關鋒他們認為你們不可靠，要換了你們，她就不同意。」

陳伯達為什麼不讓我們走，我們倆議論過，陳伯達在他們多次的壓力下，曾經讓汪東興派人分別到我們兩人的家鄉去調查，汪報告陳說二王家庭歷史沒問題（這是陳後來告訴我們的）。不同意換掉我們，這可能是劉叔晏的意見。那麼陳為什麼這樣做呢？我們覺得，第一陳伯達確實不習慣生人在他身邊工作，也就是說不了解他脾氣秉性的人，他不習慣。曾經有一個很好的同志調在他身邊工作，特別小心謹慎。陳常獨自一人在書房裏看書或思考，這位同志給他送文件、材料或找他說事，生怕驚動他，動作特別輕，陳沒有思想準備，往往一抬頭猛然看到面前站個人，嚇得他直叫，出一身冷汗；第二我們原是中宣部的幹部，這個時期中宣部當成「閻王殿」被砸爛了，沒有工作，人員全都集中去辦學習班。我們倆與他們斷了來往，成了孤零零

的兩個人，黨的關係是獨立的支部，只能以陳為依託；第三，江青他們找人在陳身邊工作，陳就有被控制的危險，這後兩條是主要原因。這是我們當時的分析。

儘管我們每天如履薄冰、小心謹慎的工作，還是逃脫不了江青1968年3月所謂傅崇碧衝擊釣魚台的指責，她說王保春批准北京衛戍司令進釣魚台是引狼入室，責令王寫「觸及靈魂」的檢討，在中央常委中傳閱，然後把他調離了工作。

陳伯達與汪東興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我們感覺陳伯達和汪東興的關係不錯，特別是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不讓陳伯達去主席那裏以後，不管大事小事，反正使他煩心的事，他都告訴汪東興，特別是對江青、張春橋一夥的不滿，他都告訴老汪。好像是他對老汪說就等於給主席說了似的，起碼老汪會將他的意思露給主席一些，而且在對江的看法上兩人的觀點都很相近。陳對葉群也是這樣，陳伯達極少和林彪見面，林彪很少參加中央的會議。陳認為給葉群談些問題，就等於給林彪談了。但對周恩來總理不同，他都是直接和總理談，總理也理解他。

由於陳去主席處受到江青的限制，因此他後來就和汪東興常有溝通，有甚麼事都告訴汪東興，不背着他，他以為給汪講了，主席也就知道了，起碼向主席通點氣，不至於有更深的誤解。

陳伯達有時去汪東興那兒，事先不說，上車後再告訴我們，並且不願讓秘書隨車跟去，說很近，進中南海東門就到船塢那兒（老汪住的地方）。保春有次隨陳去，到了汪東興家門口，剛下車，老汪出來迎接說：「哎呀！你以後不要往我這兒跑嘛！有事打個電話我就知道了嘛，你還自己跑一趟。」陳伯達不是不打電話，而是怕電話不保密。江青在「文革」期間專門提防別人搞竊聽，陳怕她竊聽自己的電話，所以願意當面找汪談。



2008年2月7日，王文耀與汪東興（右）會面。（王東升攝）

陳伯達對汪東興是很信任的，包括他和毛家灣的關係都不迴避汪東興，他認為毛主席選定了林彪為接班人，應該說陳對汪是無話不說的。如果迴避，我們是會有感覺的。

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

(一) 出發前的請示

1967年的下半年，全國形勢很亂，大部份機關處於癱瘓狀態，基本上是由當地的駐軍支撑。中央號召各地兩派聯合，建立新的機構即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出於關心河北地區的（屬陳分管的地區）問題，向毛主席請示，想去河北地區看看，促進他們的大聯合。主席聽了以後猶豫一下，對陳說：現在外邊那麼亂，是否一定要去呀？如果一定去，那時間不要太長。陳伯達回來對我們說：「主席是出於對我的安全考慮，其實沒關係，我又是管華北地區的。」

12月22日，汪東興就通知王保春和中央警衛局二處處長鄆吉成到他的辦公室當面交代：「伯達同志這次外出去河北，地方上情況複雜，你們要保證首長的絕對安全。如果發生甚麼問題，你（指鄆）和王秘書商量解決。你再帶上幾個人去，你們統一指揮，隨時與我聯繫。」這說明陳伯達向主席請示以後，主席是有所交代的。

陳伯達把他想去河北的請示也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考慮到河北省即將成立革命委員會，李雪峰已被內定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就主持中央開會，決定李雪峰隨陳伯達一起去河北地區先接觸群衆，進行工作。

12月25日，由康生通知北京軍區的領導同志，在京西賓館開會，

聽取彙報和部署陳伯達的行動路線和交通工具。

我們當時的工作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1967年12月25日（星期一）

下午2點到京西賓館參加華北軍隊領導同志會議，聽取彙報。參加會議的有康生、吳法憲、楊成武、李雪峰、鄭維山等。

原決定先去保定，後改變計劃先去唐山。安排坐飛機去，同去的有李雪峰、鄭維山同志。

這時已是1967年12月底，出發前我們做了些安排準備工作。決定王保春隨同陳伯達外出，王文耀在家看攤。至於其他隨行人員，陳伯達讓王保春通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堂去，並請他再帶一人同去。史敬堂告訴王保春說：「李淮同志年輕老實，人不錯，讓他去行不行？」王保春說：「行，就帶他去吧。」

（二）第一站唐山

12月25日晚上7點多鐘，我們乘專機出發。同去的有李雪峰、解學恭、鄭維山等。到達唐山後住在某軍軍部，聽取了陳軍長、廖政委的簡短彙報以後，當天夜裏就同當地駐軍的全體領導人進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座談，並作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唐山兩派鬥得一塌糊塗，一派叫做路東派，一派叫做路西派。陳伯達聽了彙報以後，向兩派說：甚麼路東派、路西派，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陳伯達走到工人中間做工作。走到哪兒就講到哪兒，講話很多，就是一個主題，講革命的大聯



1970年王文耀隨陳伯達華北之行時與李雪峰同志的秘書合影

合，就是要「抓革命，促生產」。王保春讓隨去的史敬堂、李准認真記錄，給他們的任務就是陳伯達每講一次話，整理出一份記錄稿。

陳伯達還到唐山礦區，下礦井，到生產第一線會見工人，做兩派大聯合的工作。分別給兩派開座談會，讓他們不要打派仗，要團結。

有一次，陳伯達正在開一個座談會，有人反映說，某派藏有武器，就放在開會的這座樓裏。頓時大家緊張起來，在知情人的指領下，慌慌張張地跑去搜，還真搜出武器來了，駁殼槍和步槍都有，都是民兵的槍支。陳伯達讓把這些武器都交給了軍管會——當地駐軍某軍保管。

按原計劃26日離開唐山，但是陳伯達對自己在礦井上的講話總感到有些不安，怕引起副作用。因此，決定再停留一天，繼續做兩派的工作，分別找他們談話。離開唐山前又將兩派的人召集到一起，開了個促使兩派大聯合的大會。會上，由於陳伯達的福建話別人聽不太

懂，他怕群衆聽不懂而引起誤會，就臨時請隨同去的鄖吉成當口頭翻譯。陳伯達在會上號召兩派團結起來「抓革命，促生產」，在場的人對他的這些講話，還是比較滿意的。

陳伯達在唐山停留了兩天，促進了大聯合，自己認為基本滿意。於是，在27日下午離開唐山去了保定。

我們當時的工作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1967年12月26日（星期二）

上午10點接見唐派（三代會）和礦院派的雙方代表，伯達、雪峰、維山先後講了話。12點去東山礦區，先到兵營吃年飯，下午接見支左部隊和各礦造反派頭頭，聽取了他們的彙報意見。下午4點下礦井（二礦），7點上來，8點接見了二礦革命委員會的同志和少數派的人，參加接見的有某軍陳軍長、廖政委，伯達同志接見時講了話。原計劃接見之後就去保定，但因為伯達同志對自己在礦井上的講話總感有些不安，怕引起甚麼副作用，臨時決定停留一天，再接見一次雙方代表，當天住在機場。

12月27日（星期三）

上午9點，吃過早飯到某軍軍部，再次接見雙方的代表，「三代會」、工人基層組織。總的感覺是，老年人的工作好做，老太太看到造反派打解放軍都非常氣憤；而大學生的工作不好做。總之，基層的群衆要求辦學習班的多，要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多，要求搞大聯合的多。伯達在會上向他們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學習。伯達說：你們是多數，向對方做工作，第一不要性急，第二要把困難估計得多

一些，要有充份的思想準備，要使群衆站到你們一邊，他們誰只要敢於下手，就等於自己打倒自己，這樣就是你們自己勝利了。但是，也有可能你們自己內部分裂，你們現在在礦總面前團結起來了，但是如果礦總一倒你們怎麼樣呢？有人是極右的，但他是用極左的面目出現的。……但是不管怎麼樣，你們要相信群衆，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澤東思想，你們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慮一下看對誰有利。你們不要用我的話去壓人，我因為年紀比你們大一點，只能提供一點情況供你們參考。凡事不能過急，大聯合好，但是要創造條件，如果你們搞得好，對全國都會有影響、有作用的，你們可以對家屬做工作，不要到礦山去。

伯達在接見了「三代會」的代表之後，又接見二礦的雙方，陳說：（摘抄）「你們對我昨天的講話有甚麼意見，可以提出批評，也可以上綱高一點。老工人最反對武鬥，反對分兩大派。我看要提一個口號叫做『向老工人學習』。保錯了人是可能的，你們雙方可能都有，對犯過錯誤的人，要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機會，一看二幫嘛！唐山煤礦對國家負有很大的責任，希望你們共同搞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出來。你們雙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評，避免批評對方，你們可以去請教你們的父母親。」

接見過礦總的學生之後，又去查看了礦院的雙方武鬥現場。陳、李、鄭三位分別講了話。

.....

一切以為妥當之後，下午4點15分乘專機離開唐山到定縣機場，然後轉乘汽車，下午6點到達保定，三十八軍軍長李光軍、政委王猛迎接，進駐三十八軍軍部。

(三) 第二站保定

保定也是分成兩派。由於支左部隊分別為野戰部隊和地方部隊，兩派群衆爭執不下。陳伯達到了以後，上午聽取三十八軍軍長李光軍、政委王猛的彙報；下午聽取河北省軍區司令員馬輝等的彙報。緊接着就去做群衆的工作，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促進大家聯合起來，不要打派仗，要團結。並且親自去查看群衆組織「敢死公社」、「飛虎隊」武鬥時佔據的現場，還走進工人宿舍進行說服教育工作。28日下午出席了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召開的群衆大會，他在會上講了話，號召他們大聯合，支持部隊的支左工作。

陳伯達在保定還去過好幾個工廠，促使他們大聯合。他到一個造紙廠，得知這個廠是專門生產高級銅版紙的，是供印製人民幣和毛主席像用的。陳伯達就對職工說：「你們的任務是非常光榮的，所以你們一定要保證質量，把生產促上去，這就是革命的具體體現。」保定膠片廠分成兩派，一派叫做「硬骨頭」的被趕到廠外，不事生產。他在職工大會上說不應該影響生產，提出「我們大家應該歡迎『硬骨頭』回廠參加生產」的口號。陳伯達還去了保定師範學校，接見全體師生，進行說服，促進他們大聯合。

12月29日下午，陳伯達在河北省軍區大院，接見了保定市各派組織的頭頭和軍區支左幹部，向他們講了五條意見，中心意思是要團結，求同存異，促進大聯合。

晚上又在三十八軍軍部大禮堂，接見了保定地區的22個縣的負責人和軍隊支左幹部，同樣號召他們要搞革命的大聯合，要團結。

12月30日上午剛吃完早飯，準備離開保定時，只聽見外邊敲鑼打鼓，口號聲響成一片，熱鬧非凡。一看原來是保定市兩派群衆抬着大聯合的牌子和報喜隊伍擁向三十八軍的駐地。陳伯達和軍隊的領導同

志高興地接見了他們，祝賀他們大聯合。

(四) 第三站石家莊

陳伯達匆匆由保定飛到了石家莊。石家莊較為平靜，兩派紛爭不那麼激烈。陳伯達的心情比較愉快，提出要到革命聖地西柏坡去舊地重遊。在某軍軍長徐信的陪同下坐車前往，路上幾次下車訪問農戶，向他們問長問短。

從西柏坡回到石家莊以後，參觀了幾個大型工廠，分別接見各廠職工，並且作了熱情的講話，讚揚他們「抓革命，促生產」做得好，



1967年12月，陳伯達往八達嶺長城。

應該向他們學習。緊接着，又去了石家莊市第一中學，接見了全體師生員工，講話中談到教育革命問題，向他們提出「向工人階級學習」等口號。

31日下午，出席了石家莊市、地委和專區革命委員會代表聯合召開的座談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共同座談、討論如何搞好「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

12月31日晚上，他們在市中心的「八一」大禮堂，組織了一個豐富多彩的聯歡晚會，陳伯達出席了晚會並在會上作了講話，觀看了群衆的文藝演出。

第二天是1968年的元旦，天氣晴朗，他們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有群衆遊行，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好不熱鬧。

上午10點半，陳伯達、李雪峰、解學恭、鄭維山等在石家莊市領導和當地駐軍的負責同志的陪同下，登上檢閱台，觀看群衆遊行。台上台下互相頻頻招手致意。遊行慶祝活動大約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

（五）第四站邯鄲

1月1日中午，到邯鄲。下午聽取軍分區和某炮兵師領導同志的彙報。了解到這裏的武鬥情況，知道他們分為「地總」和「市聯委」兩派。

第二天上午，陳伯達就去找「地總」的負責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並且到現場查看他們的工事和武器。接着又去「市聯委」，也發現有不少武器。

下午，將兩派的頭頭召在一起開會，和他們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要他們搞大聯合，不能搞分裂，並且讓他們一定把武器交出

來。他們雖然沒反對，但交出不那麼痛快。與這同時，陳伯達派王保春和鄒吉成帶人去「地總」、「市聯委」、「邯鋼」等群衆組織的駐地查看，在「地總」查出八支手槍來。這時，陳伯達讓當着群衆的面把武器交給「地總」的頭頭，請他們自己把這些武器交給有關部門。他還告訴所有群衆組織，有武器的都應該自己交給有關部門，不能私藏武器。

1月5日上午，王保春接到葉群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說中央有事讓陳伯達趕快回北京。

王保春接到葉群的電話後，感到很納悶，他想中央開會應該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通知，怎麼由葉群電話通知呢？葉群在電話裏沒有告訴王保春，只是找陳伯達。陳伯達接完電話以後，對王保春說：你安排一下，馬上回北京，家裏有事，要開會。當時陳伯達沒有具體說，其實就是解決戚本禹的事。陳伯達在外地興致正濃，根本就不願意回北京，但是葉群告訴他是主席的意思，他不得不回。陳伯達匆忙向李雪峰等同志交代了一下，說中央有事，就此分手，直飛北京。後來知道，林彪很少出席中央會議，多數是葉群代表他出席的。會上決定處理戚本禹，毛主席說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組長不在就處理不好吧！這樣讓葉群通知陳伯達速回北京的。

這就是陳伯達的所謂第一次華北之行。

戚本禹從中央文革消失

葉群電話急催陳伯達從邯鄲趕回北京的原因，是江青的秘書接到一封來信，反映說外地有一個女人也叫「江青」，到處招搖說她是江青。信中附有一張照片，戴副黑邊眼鏡，看上去確實像江青。閻秘書將信給江青看，這下壞了，江青非常生氣。說秘書閻長貴要陷害她，就將閻秘書給隔離起來了。跟着又推測閻長貴和關鋒、戚本禹關係密切（閻原在中央文革辦事組，是關鋒的學生），是戚本禹推薦到江青那兒去的，江就懷疑閻長貴是關、戚安插在她身邊的壞人。關鋒早已被隔離，戚本禹也就被隔離審查。

其實，這只是處理戚本禹的理由之一，更主要的是戚本禹在中央文革中得勢之後，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不但目中無人，生活上也不檢點。平時他對某人表現曖昧，發展到抄寫了不少《紅樓夢》裏的愛情詩，送給某人。沒有想到某人把這些詩交給了她的父親，其父看後大怒。認為戚和王、關一樣，都是一些形左實右的壞人。這樣就促使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這個決定。

本來戚本禹的問題和王力、關鋒是一起的，當時處理王、關問題時，就因為江青說情留下戚本禹自我反省，沒有隔離。可是戚本禹沒有引以為戒，嚴於自律，反而變本加厲，作風張狂。

陳伯達從河北邯鄲回到北京以後，葉群向他講述了詳細情況。

1968年1月的一天晚上，由周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在中

南海懷仁堂的西廳召開。會上傳達了主席的意見，最後決定將戚本禹隔離審查。並決定由陳伯達、楊成武去執行。隨後通知戚本禹來懷仁堂東廳開會。為了安全起見，當時警衛局將所有來開會的領導人的隨員，都集中在懷仁堂前邊的一個房間裏讀報紙學習。

早已在懷仁堂東廳旁邊的一個休息室裏等待開會的戚本禹，等來的卻是陳伯達、楊成武進來嚴肅地向他宣佈停職反省並且立即帶走。當時考慮到戚本禹身材高大，怕他不服，有所反抗，警衛局還在廳內屏風後面埋伏兩個彪形大漢，以防不測。還好，當陳伯達、楊成武向他簡短地宣佈中央決定之後，戚本禹全身鬆軟，無話可說。兩個警衛人員便給戚戴上了手銬，從懷仁堂的旁門押出去，坐上早在等候的汽車拉走了。戚本禹從此就從中央文革消失了。再也看不到那副耀武揚威的身影了。

懷仁堂的會已經散去，人走燈滅。而送戚本禹這位「首長」去「開會」的汽車司機，還在懷仁堂前門外的車裏坐等。到了深夜還不見戚出來，司機便打電話問中央文革辦事組。得到的答覆是：「他已經坐別人的車走了，別等了，你回來吧！」

陳伯達錯捕王廣宇

1968年3月3日晚，我們吃完夜餐回到辦公室，這時陳伯達也剛從中央碰頭會開完會回來，他說許廣平給主席、總理寫了封信，說魯迅先生的手稿被戚本禹從博物館拿走了。總理看了這封信，信上說，《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15頁，還有書信手稿1,000多封，1,500多頁，大部份都沒有出版過。總理說得趕快找回來，這事得馬上辦。開完會已經12點多了，陳伯達讓王保春給楊成武要了個電話。楊成武也是剛散會後到的家。陳和楊通話，王保春在旁聽着。陳說：魯迅先生的手稿被別人抄走了，現在找不到下落，許廣平給主席、總理寫信找這批稿子，你想辦法佈置一下，盡快把它追回來。

楊成武接過陳伯達的電話以後，就把這個任務交給衛戍區的傅崇碧辦。傅了解情況後從幾個方面動手找。中央文革小組也得查一查，由於王、關、戚出了問題，中央文革辦事組相關的人員都不可信任了，被抓的，被調回原單位的不少，新人業務互不銜接。查的結果有兩個人值得懷疑，一個是原辦事組副組長王廣宇被調回馬列主義研究院去辦學習班，另一個是原辦事組檔案室的一個人，也被調回四川。

一天晚上，天氣挺冷，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突然他來電話說讓我倆去十六號樓中央文革，他要去研究院，後來他又說讓王保春一個人去就行了。王保春急忙到了十六號樓，見到氣氛緊張，陳伯達只說去研究院，讓王保春在前邊帶路，去幹甚麼也沒告訴他。同

去的有楊成武、蕭力等，他們沒有去過研究院，王保春和警衛處長鄒吉成坐伏爾加小車在前邊帶路，有三、四輛車跟在後邊。很快就到了頤和園的拐彎路口，領路車停了下來，等後邊的車跟上後，王保春下車告訴他們說到了。陳說先找他們的負責人，我們進研究院的北門，然後到經常開會的二樓會議室。讓他們坐下等着。王保春先去找了研究院勤務組的負責人宋士堂來，向老宋介紹了一下來的幾位首長。這時他們對老宋說要找王廣宇談話。老宋很快就跑去把王廣宇從睡夢中叫醒，他迷迷糊糊從床上爬起來，穿上棉衣、棉鞋，在宋士堂的催促下，慌忙來到會議室

這個會議室一進門有個屏風，談話前鄒吉成從警衛角度出發，在屏風後邊還安排了兩個戰士，並交代他們：你們倆就站在這兒不動，首長和他談話，你們要注意首長安全。佈置好以後，王保春走出來，這時陳伯達、楊成武、蕭力和王廣宇談話。鄒吉成和王保春沒有離開會議室。王保春很警惕，因為他認識研究院的人，怕事後引起「走漏消息」的怪事，專案組會找他的麻煩。事後江青專門找鄒吉成打聽：「那天晚上你們去研究院找王廣宇談話，你是否一直和王保春在一起？」老鄒說：「是的，我們倆始終在一起。」陳伯達等對王廣宇怎麼談的，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問他魯迅手稿的事。當時王廣宇都懵了，他說他都不知道。談了沒多一會兒，約半個小時就出來了。出來以後就要走，這時衛戍區有個參謀，不知是誰帶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們去的，衛戍區還有兩輛吉普車在那兒等着。這個參謀就截着保春問：「咳，王秘書，對他採取甚麼規格？」這時王保春心想王廣宇反正走不了啦，便問那位參謀：「都有甚麼規格？」他說：「有監護、拘留、逮捕。」說了三、四種。他們都快下樓梯了，保春就追上去，在下樓梯處截住陳伯達說：「伯達同志，衛戍區的同志問對他採取甚麼規格？」陳伯達愣了一下後問：「都有甚麼規格？」王保春照

說了一遍：「有監護、拘留、逮捕。」陳聽了以後也拿不準，轉身和楊成武、蕭力嘀咕了幾句，便過來對王保春說：「逮捕！逮捕！」王保春當即對衛戍區那位參謀說，就按逮捕的規格吧。就這樣把王廣宇弄上吉普車給拉走了。

從研究院回來後，陳伯達有點犯愁，在琢磨自己是不是說了「逮捕」，便問王保春，王保春說是的，並且說這會不會重了些？！陳伯達有點不安，為了證明他的話，便立即給楊成武打電話，但他又不好直接問這事，就在電話裏再三關照楊成武，一定要把魯迅手稿找回來，這很重要，別讓人給毀了等。最後順便問楊：「我在研究院是說的將王廣宇『逮捕』吧？」楊肯定地說是「逮捕」。陳伯達掛上電話很不安的說：「是逮捕，這怎麼辦哪，能不能改一下？」後來在文革小組開會時，陳伯達又提到這事，說自己判重了。江青馬上站起來回他一句：「怎麼！抓你的人就不行嗎？！」由於事情還沒搞清，手稿還沒找到，陳不敢再說話了。

另一個原中央文革管檔案的同志，衛戍區說有事把他從四川用飛機接回北京，安排住在一個地方，不讓他和外人接觸，實際上實行軟禁，問他魯迅手稿在哪裏，此人說戚本禹交給他幾箱，沒有人動，就放在十六樓（中央文革）檔案室的一個房子裏。傅崇碧正在日找夜找，這下知道了確切的信息，急速坐車奔釣魚台，從此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所謂傅崇碧武裝衝釣魚台的鬧劇。

王廣宇被關起來之後，再也無人過問，到了6月底，身上還穿着棉衣、棉褲、棉鞋。公安機關寫報告問，這個人自送來之後，還沒有人來審問過，不知是甚麼案子，他身體不好，有病，至今還穿着冬天的衣服。陳伯達也不敢過問，只讓人給送了單衣，因為此案屬江青管着。

直到我們自己被關押五年之後的1975年，因為工作分配問題去上

訪中央中組部，在談完我們自己的事情之後，中組部的同志無意中問了我們一句說：「有個叫王廣宇的人，不知你們認識不認識，不知道因為甚麼事，被抓了起來一直關着，到現在也從來沒有人管，我們放了吧沒有根據，不知道是甚麼問題，只知道他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給關了起來，具體犯甚麼事就不知道了。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只知道問過他魯迅手稿在哪兒，他說他不知道。」我們告訴這位同志說，認識王廣宇。王保春就把王廣宇被抓的過程說了一遍。中組部的同志高興地說：「哎呀！可找到了，那你快把這個過程幫我們寫個材料。」王保春立即寫了個詳細過程，交給了中央中組部。

傅崇碧衝釣魚台的前後

1966年底到1968年初，全國大亂，許多幹部被打倒。而中央文革的成員也像剝筍似地倒台（就剩下上海的兩個，即張春橋、姚文元）。受一點牽連的工作人員也不受信任，關的關，趕走的趕走，又換了些新人，工作上互不銜接。陳伯達自己也早已搖搖欲墜成了個傀儡，一切都由江青說了算。江青腦子膨脹，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如證明是錯的，她從來不承認，而且全盤推給別人。

（一）許廣平的一封信引起重視

1968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總理向大家說，原來收藏在魯迅博物館裏的魯迅手稿不見了，主席讓我們迅速查找。會後周總理、陳伯達、江青還一起坐車去景山前街許廣平家看望並安慰她。之後，總理和陳伯達商量，將這個任務交給楊成武。

陳伯達到家之後，馬上讓王保春打電話給楊成武，迅速查清魯迅手稿的下落。楊成武接到這個任務感到茫然，不知從哪兒入手。陳伯達對此事也非常着急，當夜便和楊成武及新上任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蕭力，去找已被免職趕回原單位的前辦事組長王廣宇查問。王對此事一概不知。但他是可疑人之一，便將其送進了監獄。

(二) 騎驢找驢

最後總理給楊成武出了個主意，叫衛戍區傅崇碧去查，說你們可以去提審一下戚本禹，他應該知道些情況。

根據總理的建議，楊成武、傅崇碧連夜去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戚說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知道此事。戚本禹倒台後，韓書信等一批工作人員已不受信任，都被趕回原單位了。此時韓書信正回四川探親。傅崇碧讓韓連夜乘飛機回京，說有急事找他。韓到京後有人去接，讓他住在一個地方，在事情沒有搞清楚之前，不准與任何人接近。韓書信一聽說此事，便說何先倫知道。何也離開了中央文革。傅崇碧又設法找到了何先倫，何說承辦人是現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員卜信榮，他知道此事。

傅崇碧經過幾天幾夜的追查，轉來轉去，知情人都在釣魚台的中央文革裏面。

傅崇碧給中央文革打電話，讓報告江青。是辦事組組長蕭力接的電話，傅崇碧問蕭力：「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中有卜信榮這個人嗎？」蕭力說「有。」傅說：「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向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馬上就到。」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驅車前往釣魚台。

(三) 傅司令捅了馬蜂窩

傅崇碧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他曾多次出入釣魚台，警衛人員是他的部下，這很正常。可是這時，王保春接到文革辦事組長蕭力的電話說：「傅崇碧要進來，請報告組長！」（即指陳伯達）王說：「伯達同志不在，他出去了……」對方不等把話說完便立刻掛了電話。同

樣急切的語言，接連打來幾次。王保春感到異常，以為讓他通知門衛，便立即給東門警衛去電話，請傅司令進來。實際上他們已經進去了。

事後知道，傅司令走進中央文革辦公的十六號樓前，見到姚文元在散步。姚向傅禮節性地打了招呼後，便一起走進了樓裏的會議室。還未站定，江青推門進來了，見室內站立了四、五個軍人，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甚麼？！到這裏來抓人嗎？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進來的？」這時傅崇碧的秘書，由於經過幾天日夜緊張的勞累，加之身體本來就有病，看到這種場面，過於緊張，當場暈倒在地上。當時江青還讓人將他扶起，給水喝。傅崇碧向江青講了他的來意，並說是經過批准進來的。

據說傅崇碧走後，江青讓人從保密室抬出幾箱子魯迅手稿，邊打開翻看，邊自語道：「嗯，這樣重要的手稿，如給弄丢了，那簡直是犯罪吆！」可是，事後她在追查誰批准傅崇碧進釣魚台時，卻說傅帶的人腰裏別着槍對着她。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傅崇碧武裝「衝擊」釣魚台的謊言。

（四）厄運終於來臨

1968年3月7日下午，陳伯達心情煩悶，要去西山散步，劉叔晏也隨陳去了。這樣，陳、劉、王文耀一起，坐車出釣魚台北門向西，直開到香山腳下。

陳伯達常去香山，其原因除解放初期他隨黨中央駐在香山，去香山有舊地重遊的意味以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1936年陳伯達保釋出獄後住在香山養病，病養好了要出院時，沒錢支付住院費。出不了院，醫院裏的大夫對他也無可奈何，只好說：「你先出院吧，等你

以後發迹了再報答我吧。」所以，陳心裏一直感到內疚，想找到那個大夫或者他的家人。

這一次是因為有人對他那次出獄有所懷疑，陳一時說不清楚，其心情痛苦難言。陳四處尋找他養病時住的民房，並向我們講述他在國民黨的草嵐子監獄中生病時的情況，說他生了淋巴結核，脖子全部潰爛，人都快不行了，經黨組織同意才由他的福建同鄉、國民黨軍長張貞出錢把他擔保出了監獄。然後被接到西山養病。

其實，這些話，在辦公室裏閒談時他也都講過，現在是舊地重遊舊話重提，邊走邊說。

我們沿着南邊的山路上山，道路的兩旁都是深綠色的松柏樹林。已是下午四、五點鐘了，沒有一個遊人。顯得格外寂靜，微微的山風吹來，身上便感到有些涼意。走到半山腰時，看到腳下的土路面上，有紅衛兵用粉筆寫着斗大的標語口號：「打倒李先念！」沿坡以下至少有三、四米長。陳伯達走在前邊先看到，他急步走上前說：「李先念不能打倒。」說着便用腳在路面上擦，並順手從路旁撿起一塊白灰石，在地上以同樣大小的字，改寫為：「打倒陳伯達！」

我們勸他不能這樣寫，他笑着說：「怎麼不能呢？應該打倒陳伯達。」這實際上是陳難以言說的一種內心之苦。

他這樣做，跟隨去的兩三個警衛人員，就在後邊用腳抹去字迹。再往上走了一段，又出現此類的標語，陳伯達還是照舊改寫為「打倒陳伯達！」我們勸說他不要這樣做，這樣做會給公安部門帶來麻煩，陳說：「沒關係，打倒吧！」隨去的劉叔晏，若有所思地低頭不語。

當時，中央常委外出時，警衛隨車上都裝有步話機，隨時都可以與家中取得聯繫。當然江青的隨車上也有。後來據說江青怕人竊聽她的行動，所以下令統統取消。這樣，我們外出就與辦公室失去了聯繫。

來香山時家裏並不知道，王文耀怕出來太久，家裏有事找不到陳而着急。因此，走到半山坡時，王便提醒陳伯達說：「晚上7時中央文革有會，早點回去吧。」這樣，陳伯達一行人便回轉下山了。

回到釣魚台進北門，到十六號樓附近，陳伯達下車去十六號樓中央文革開會，王文耀同時下車回十五號樓辦公室，俞子雲開車送劉叔晏回新建胡同家中。

王文耀一人回到十五號樓辦公室，王保春就不安地對王文耀說：你們可回來了！

王文耀說：首長去十六號樓開會去了，出甚麼事了？

王保春說：小姐（指蕭力）和辦事員一連打來兩三次電話，說傅崇碧要進釣魚台，讓報告組長。我說伯達同志出去了。她不等說完說話就將電話掛了。奇怪，從來沒有叫過「組長」那麼急。

王保春把每次來電話的急促語氣向文耀學了一遍，然後說：「我不知你們去哪兒了，讓值班室（警衛值班室）找你們也找不到，她那麼急，我以為讓我通知東門，我只好打電話告訴東門的警衛室讓傅司令進來，也不知道這樣辦對不對。唉，真不知道又要出甚麼事！」

我們倆都在不安地猜想着蕭力是甚麼意思：她自己就有批准權，可以直接批准傅崇碧進來，為甚麼反覆告訴我們報告「組長」呢？而且已經告訴她「組長」不在，她又不聽，還是反覆說一句話「報告組長」？再說傅崇碧是衛戍區司令，過去不都是隨便進出釣魚台嗎？實在猜不出來這是為甚麼！

保春在辦公室裏忐忑不安，文耀如坐針毡，兩個人連文件也看不下去，等着要發生甚麼事情。

晚上9點多鐘，陳伯達沒有開完會便從十六號樓回來，他問王保春：「傅崇碧是你讓進釣魚台的？」保春說：「是呀。」陳說：「你為甚麼讓他進來呢？」保春不解地說：「你看，他是衛戍司令，來找

你，我怎麼能讓他等在門外邊？這在禮節上也說不過去呀！」陳伯達一臉不高興地說：「你要寫個檢查！」保春就把蕭力來電話的經過講了一遍。陳伯達也相信保春說的情況，但又嘆着氣說：「江青他們在會上說傅崇碧是我這裏批准進來的，傅帶着人闖進了十六號樓，說我是引狼入室，說要你寫檢查，現在就寫。」王保春說：「伯達同志，這個檢查怎麼寫呢？」

陳伯達說：「你就寫你為甚麼不經請示就同意傅崇碧進來。」

王保春十分委屈地說：「你不是出去了，找不到你嘛！」

陳伯達說：「你就寫吧，寫吧，我等着。」

王保春說：「那就寫吧！反正事情的經過就是這些，我也不會瞞着。」

王保春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寫檢查，陳伯達坐在沙發上，無可奈何地搖頭，輕聲嘆氣。

王保春寫完檢查後，交給陳伯達看。陳草草地看了一下後就從沙發上起身，拿着檢查急匆匆地去了十六號樓。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陳伯達又拿着檢查回來了。陳對我們說：「江青他們認為寫得不行，認識不深刻，上綱不夠高，沒有觸及靈魂，讓你重寫。」

王保春聽了非常懊喪，惱火地說：「傅司令經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這是他的工作。他到過釣魚台多少次，為甚麼這一次進釣魚台就不許進來？也沒有告訴過我傅崇碧不能進釣魚台，我的檢查怎麼寫深刻？反正也就是這麼個過程，還要怎麼上綱？」

王文耀在一旁對陳伯達說：「你也為我們說句話，你看總理，上次在一個會上，你問總理，主席批的文件已轉給您了，看到了沒有？總理說沒有呀！關鋒在一旁對總理說，那一定是你的秘書給壓下了！總理便嚴肅地對關鋒說：哎，同志，你怎麼能這樣說呢？！你看總理多

為工作人員說話！」

陳伯達說：「唉，沒有辦法，讓你寫你就重寫吧。」

王保春只好把事情的發生過程寫得更詳細一些，但是無論怎樣上綱還是上不去。這時陳伯達在一旁拿過筆來，在保春寫的檢查上親自給上綱，寫上甚麼「狂妄自大，不經請示任何人，便擅自同意」等話，把檢查裏提到蕭力的名字也劃去了，嘴裏還說着：「綱上得越高越沒有用！」寫完以後陳讓保春重抄了一遍。王保春很生氣，在抄寫時又加上了：由於本人水平低，不宜在中央首長身邊工作，要求調離。保春抄完後交給陳伯達時說：「我還是離開你這兒吧，不要給你惹麻煩。」

陳伯達接過王保春的檢討以後，便在上面批了：「我對自己工作人員教育不嚴，建議調離工作。陳伯達。」

這時空曠的辦公室裏一片寂靜，三個人都沉默不語。

過了一會兒，陳伯達用非常低沉的聲音說：「我無能，不能保護你們，很對不起你們，你們跟我吃苦了！」說完，他邁着沉重的步子走出辦公室去十六號樓交差去了。

屋子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王文耀坐在辦公桌前，王保春仰面躺在床上嘆着長氣說：「我還是走，離開這兒。」王文耀說：「不能走，現在這麼亂，兩派鬥爭，你跟哪一派？」王文耀雖然嘴裏這麼說，但心裏也開始考慮着兩人的去向問題了。

其實，王保春、王文耀早有預感，江青今天終於發難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在十七號樓吃飯時，碰到了康生的秘書黃宗漢。黃秘書神秘而小心地坐在王文耀的身邊小聲地說：「保春那個檢討我看了，這件事還在常委中傳閱呢！真不得了了！」江青在王保春那份檢討上寫了兩條批示：「檢討了就好，一，王保春同志應在組織生活會上作深刻檢查，以使其他同志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戒；二，

王保春同志的去留問題由伯達同志自己決定。……」

汪東興當天晚上夜餐之後，在釣魚台十七號樓內，召集釣魚台各樓秘書及有關工作人員，開緊急會議傳達，讓大家引以為戒。

過了幾天，一次在釣魚台四號樓開會，王保春也去了，沒有注意江青從他的身後走來，江用手拍着王保春的肩膀假惺惺地說：「王秘書，對不起，不要生我的氣啊！……」王保春回過頭看江青時，她已走過去了，保春也就作罷，走開了。

（五）哪兒來的回哪兒去

江青雖然在王保春的檢討上批了去留由陳伯達決定的話，但是王保春反覆考慮後，還是決定要走。就在這時，江青對陳伯達說：「怎麼王保春還沒有走呀！」

陳伯達為了不讓江青再找自己的麻煩，同意王保春離開。

王文耀不同意，認為留着自己一個人，工作量太大，忙不過來。

這時，陳伯達請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為他再調一位秘書來。汪東興很快送來兩份人事檔案，讓陳伯達任選一名。陳將檔案交給王文耀為他選。王認真地看過檔案後，選定了繆俊勝，陳伯達表示同意。告訴汪東興讓繆盡快來上班，熟悉業務。

王保春走，去哪裏呢？王文耀問陳伯達。陳伯達很平靜地說：「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就回中宣部吧，我也不是管幹部的。」

中宣部這時候已經被解散了。全部人員集中在北京市委黨校辦學習班，其內部也分成了幾派，在互相爭鬥着。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王保春怎麼能去，去了怎麼表態，站到那一邊呢？！他很為難，但又不好向陳伯達說。

王文耀感到不公平，便對陳伯達說：「保春不能回中宣部，你知



曾在陳伯達辦公室工作過的同袍。左起：王保春、繆俊勝、余子雲、王文耀、李玉元。（王東升攝）

道中宣部已經不存在了，又那麼亂，都在打派仗。保春在你這裏工作這麼多年了，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你不能不管。」陳伯達說：「那你说怎麼辦？」王說：「就派他到你管的單位去工作。《紅旗》因為是姚文元管的，去不了，馬列主義研究院要解散，人員不是在待分配工作嗎，保春可以同他們一起分配工作嘛！」陳伯達聽後想了一下，點點頭表示同意。

因為康生、江青老是盯着陳伯達管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幾次在中央文革開會時說研究院的革命不徹底，是因為陳伯達在護着。因此，陳伯達才向毛主席寫了個報告，說打算將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恢復延安時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毛主席看後圈閱同意，將文件退給陳伯達，陳便以此為據，解散研究院。

陳伯達決定先讓王保春去做解散研究院的善後工作，然後，暫時為他找個適當的工作單位過渡一段時間。這個決定，陳伯達再三交代

不能讓十一樓（江青）知道。王保春也同意這樣安排。

王保春去研究院，陳伯達交給他的任務是：從教職員工中挑選十個人留下來，恢復中央政治研究室，組建新的政研室人員的條件是：

（1）歷史清楚，有一定的寫作水平；（2）盡量不留文革前發表過文章的有名望的老同志（原因是怕康、江借此找岔子）。其他人不設職務，就由史敬棠為研究室秘書，主管其事即可。其餘人員全部分配下去。為此，陳伯達與李富春通了電話，說請他幫助將馬列主義研究院的人員安排下去，具體情況讓王保春當面向李富春作彙報。

陳伯達對馬列主義研究院這批人，還是非常關心的，因為他們是從全國各地選拔來的尖子，動哪一個他都捨不得。這是我們從他的表情言談中看出來的，現在這樣做確實是出於無奈。

王保春看出他的心思，就對陳伯達說：「你看是否給李雪峰同志聯繫一下，可不可以安排在河北省地區安排一些人去。這些同志我想把他們安排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待你要用時可隨時將他們調回來。」陳點頭認可。王保春向李富春報告分配方案時，將這些同志大部份安排在河北地區及北京的首鋼等地。

後來，到1969年進行所謂「鬥、批、改」時，需要大批這方面的人才。李先念、紀登奎等同志，多次口頭向陳伯達提出，要求給他們一些秀才。陳當時笑咪咪的，一副得意的樣子。這是我們親耳聽到和親眼看到的。

王保春在自身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順利地組建了中央政治研究室，比較妥善地分配、安排了馬列研究院的同志。陳伯達高興地給李富春去電話，表示感謝。

陳伯達與江青的恩怨

江青與陳伯達是在延安認識的，那時陳伯達是毛主席的政治秘書。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較少，她主要是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所以陳、江之間沒有矛盾。據陳伯達說，江青曾兩次向他表示想離開毛澤東，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陳對我們說，他向總理談過這件事，總理說後一次他知道。有一段時間江青因身體不好，毛澤東就送她去蘇聯治病。

(一) 陳伯達幫了江青的忙

20世紀50年代初，江青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但是從未見到她上班。後來她成為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

江青是個聰明而過於敏感的人。她是演員出身，對於藝術比較內行。中宣部是管理全國意識形態的，工作一直不錯，是有很大成績的。當然也會難免有些失誤等，加上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變化，這就使江青極為不滿。同時，她懷有個人野心，不斷向毛主席進讒言。她在1966年初，在上海和張春橋、姚文元秘密地籌劃《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送給在杭州的毛主席看。儘管他們曾幾易其稿，但是毛主席還是不滿意。讓他們去找陳伯達給改一改。陳伯達當時在上海正忙於工業調查，有毛主席的指示，只好為其修改，這才通過。

正在這時，周揚身體不好，剛在北京動完大手術，來上海休養。周、陳過去關係一直不錯。陳伯達本想去看望周揚，江青知道後，攔說：「這裏正準備批判周揚，而你去看他？不行，這讓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陳無奈，只好派秘書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揚以示關心。

（二）江青與陳伯達爭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為小組的副組長。江青為了權力，起初處處關心維護陳伯達。就在陳伯達因勞累過度生病住院時，江青向文革小組成員鄭重宣佈：「小組的大小事情，都要隨時請示組長。」由於江青對陳伯達大獻殷勤，陳便寫報告給毛澤東，說在他生病住院期間，由江青代理組長職務。這期間，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群衆，江青代表中央文



左起：江青、陳伯達、康生與張春橋。（網絡圖片）

革出席並講話，大出風頭。從此，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就隨風而轉向江青，漸漸遠離陳伯達。陳出院後，江青再也不放手中的權力。中央文革小組開會，還是江青說了算，她隨心所欲，陳得聽她的。從此，陳、江意見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中央文革後，權力慾不斷膨脹，到處發號施令。陳伯達為了約束江青的權力，便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報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下的辦事機構，一切言行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會還未開完，江青來了，她大發脾氣：「我還是不是代理組長，我還是不是第一副組長！」她看了報告的草稿後，立即加上自己的話，並且反覆強調說：「我加上的這句是最最重要的！」

（三）陳伯達抱怨：毛澤東痛斥江青的話沒能向下傳達

1967年2、3月間陳伯達對我們說，毛主席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江青的霸道行為。主席生氣地說：「有人說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話不對！她是一人之上，萬人之上！她根本就把我沒有放在眼裏！我多次批評過她，她聽了嗎?!」「她這個人呢，有武則天的心，而無武則天之才！」毛澤東說完後，誰都沒有說話。後來，還是周總理打破沉悶的氣氛說，「江青同志還是作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績的。」這時緊張的氣氛才緩和下來。可是散會後，沒有一個人傳達。而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還哭鬧着委屈地訴說：「正因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總是限制着我。這麼多年來，如果不是這樣，我早就放開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陳伯達不滿意地說：「別人作錯了事，主席有時生氣地批評別人

幾句，就馬上向下傳達，被批評的人，很快就倒台了。而主席這麼嚴厲地批評江青，就沒人傳達一句，總理也不傳達，反而還護着她。」陳說完直嘆氣。

我們聽完陳伯達的話後，心想，陳伯達自己不也挨了批評沒有向下傳達嘛。看他情緒不好，我們只能安慰說：「總理也很為難，江青和主席總還有夫妻關係這一層。而且批評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說過嗎，主席對沒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評的。再說假如沒有正式請示過主席就向下傳達，主席萬一不高興，說這是我的家事，怎麼你們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場了嘛。」陳伯達聽後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四）江青向陳伯達怒摔茶杯

1968年8、9月一天夜裏，陳伯達從十一樓（江青住處，也是江青的代號）開會回來，就直接回到自己的臥室。王文耀知道陳回來了，便拿着精選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了他的床前（陳伯達習慣回來就上床看書）請他審閱。

陳伯達斜靠在床頭，目視前方，臉色很不好，看樣子受了很大的委屈而又無法對別人說。陳伯達痛苦的樣子，令王文耀嚇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陳的日子一直不怎麼好過，便輕聲問陳怎麼了。陳伯達小聲地說：「沒甚麼，有點不舒服。」等了片刻，陳看屋外無人進來便小聲地對王說：「你不要告訴別人，剛才十一樓（江青）向我發了很大脾氣，還摔了杯子。」說着便從被窩裏拿出一個紙包給王文耀。

王文耀聽了後很吃驚，他雙手接過紙包時，還聽到裏邊咔咔作響。陳伯達小聲說：「這個我拿出來誰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樓』知道。可能她還會要回去的，你看怎麼處理一下。」王文耀說：

「交給我吧。」並問陳伯達：「她為甚麼對你發那麼大的火，都有誰在場？」陳伯達搖搖頭嘆了口氣說：「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們。說是研究工作，可打一開始她就扔了一封信讓我看，說我把寫信的人逼到絕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說『那不是信，那是絕命書呀！』」

王文耀問陳伯達寫信的人是誰，陳伯達不肯說，只說：「他是《人民日報》社的一個編輯，是搞文藝工作的。十一樓（江青）說我把他逼上絕路。你們知道，《人民日報》我就沒有怎麼管，怎麼就說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對我發了很大很大的脾氣呀！」陳伯達說着，形象地學着江青當時生氣摔茶杯的情況：「嘩地一下，水灑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邊服務員聽了進來，就把地上的碎片撿了起來，用紙包上了。」陳伯達還說，事後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後悔。

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邊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麼辦。不能丟，丢了江青要時拿不出來就壞了；可是不扔，她又會說你還留着幹甚麼。王文耀想來想去，還是留着好。當天晚上，他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樓門前小河邊的松樹牆下。

過了不久，據說李希凡授意《人民日報》社一位青年，拼湊了一張江青和毛澤東的合影照片。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忽然就這張照片說：「人家說我要當武則天、慈禧太后，我又沒有她們的本事。李希凡有甚麼歷史問題也不跟我說。」陳伯達插了一句：「你說我要逼死他，誰還敢給你說。」江青大聲說：「你造謠！……我瞧不起你！」陳伯達也頂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這時周恩來總理對江青說：「你是說過的呀。」江青和周總理就對頂起來。陳伯達生氣地走出會場，在走廊裏轉了一圈，又要返回會場，剛走到門口，周總理出來見到他說：「你還回來幹甚麼?!」陳伯達理解周總理的意思，便轉身出門，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五）江青說：陳伯達比毛澤東譜還大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於當時社會上較亂，組織上出於安全着想，為他配備了一輛蘇製防彈吉斯車和一輛國產紅旗車（這些車都屬中辦車隊管）。當然他原來坐的那輛灰色吉姆車還在。下面的工作人員有時因工作出去辦事，就臨時從《紅旗》雜誌社司機班，暫借一輛米色的伏爾加小車用一下。陳伯達為了出去調查情況方便，也坐過幾次伏爾加，他去工廠、學校、郊區農村時喜歡坐這輛車，不招搖顯眼，較為隨便。但就一樣不稱心，車身小他上下車時特別費勁。

在一次會議上，江青對陳伯達很不客氣地說：「哼，你比主席還譜大，主席才一輛車，一個廚師。你可好，用四輛車，四個廚師呀！」陳伯達當時就犯愣了說：「我有那麼多車和廚師我怎麼不知道？」他散會回來以後，就很不高興地問我們，他是不是有那麼多的車和廚師。我們當時聽了也很吃驚。後來仔細一想，情況也不完全對。陳伯達原來坐的是一輛吉姆車，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組織上給他配備了兩輛車，一輛防彈吉斯和一輛紅旗車。防彈吉斯車，他只坐過一兩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顯眼讓退回去了。紅旗車起初也說太大不願意坐，後來換了一輛小紅旗，開會時常坐；廚師，陳伯達原來住中南海迎春堂時，是不要廚師的，讓工作人員到甲區的西樓特灶食堂給打飯吃。1967年因劉叔晏（陳伯達夫人）懷疑有人爬她家的牆，自己讓公安部的人進去查腳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趕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住以後，組織上給陳伯達配備了一名廚師。文革開始以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地點設在釣魚台，陳伯達自己就住進了釣魚台十五號樓。同時住在十五號樓的還有文革小組成員尹達、關鋒以及其他工作人員。按照釣魚台原來接待外賓的規定，住在那個樓，吃飯也

就在那個樓裏。陳伯達住的樓裏有三名廚師，特級廚師宋師傅給陳伯達做飯（按規定是團長）。另外兩位給文革小組成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做飯（按規定是團員）。這是當時按接待外賓的做法，還未改變。江青可能將這三位廚師和陳伯達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廚師算在一起，陳伯達就有了四名廚師了。

陳伯達對此極為在意，他提出不要廚師，說我原來就沒有廚師。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飯，或者打飯回來吃。後來釣魚台改為各樓就給首長一人做飯，工作人員都集中到十七號樓去吃飯了，十五號樓就留下宋師傅給陳伯達做飯。陳伯達心裏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說飯菜不好吃，味道像飯館的菜飯，說是說還吃一些，其實並非對宋師傅本人有意見。宋師傅看到陳伯達常剩下飯菜，知道對飯菜有意見。有點着急，便當面徵求陳伯達的意見，以便改進自己的工作。陳一方面說你做的技術很好，很辛苦，肯定地表揚他。一方面又說我是一個普通人，吃不慣這樣好的飯菜，喜歡吃普通的飯菜。宋師傅也向我們工作人員徵求意見，很誠懇地想改進工作，使陳吃得滿意。其結果還是一樣，做好的飯菜，陳伯達只吃很少一點，大部份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發出一號戰備令時，陳伯達被分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陳伯達平時吃飯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宋師傅每次做好香噴噴的飯菜送上去，陳只喝湯吃飯，魚、蝦原封不動端下來。倒了浪費，別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熱一下再送上去。但陳伯達還是不動，照舊端下來。我們每次都勸說，陳伯達就是一句話——飯館子味，不想吃。急得這位釣魚台名師——宋師傅都要哭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工作沒做好，長此下去怕影響陳伯達的健康，這可是大事。可能宋師傅也向釣魚台的領導彙報過，覺得自己不好工作。其實，陳伯達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廚師，和江青鬥氣。

米糧庫胡同的房子裝修好後，戰備解除了，陳伯達搬進了新房，

他吃飯還是如此。並提出請宋師傅回釣魚台，我們說宋師傅走了你吃飯怎麼辦？陳伯達說：「你們隨便給我做點吃的就行了。你們忙不過來時，就讓李玉元（管理員）做。」我們也不好為難宋師傅，就請他回釣魚台了。

李玉元是農村來的，做城裏人吃的飯菜水平差了點，我們倆也就常抽空去做飯。三個人中就王保春還會做幾個像樣的菜，但偶爾為之還可以，長此以往可不行，其間鬧過幾次笑話。我們做的飯菜比較單調，也就是甚麼雞絲麵之類的。陳是福建人愛吃魚，就做紅燒魚呀甚麼的。一次李玉元去供應站買了一隻宰好的雞，拿回來洗洗就放鍋裏煮，熟了以後，老李把它切成絲，做雞絲麵。這時保春去廚房看看，發現老李切的雞肉絲怎麼有糙子一樣的黑色雜物。再一看未切完的整塊雞肉上，有個像桔子樣大小的黑糊糊的圓圈，仔細再看，發現老李煮熟的雞沒有取出雞嗉子。將雞嗉子裏雞吃的雜物當肉切了。幸好發現得早，沒有把它做到飯裏；還有一次，李玉元給陳伯達學做了一個紅燒魚。陳伯達開完會回來正餓，聽說老李做的是紅燒魚很高興，李玉元也非常高興地將自己的得意之作送了上去，這時王保春有事去向陳伯達彙報。一進門，只見陳伯達和平時一樣，邊看書邊吃飯。吃得正香，他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條紅燒魚身上捅來捅去，魚皮都剝得吃光了，可是魚肉和魚骨、魚刺怎麼也捅不開，魚肉還露出紅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問題，便對陳伯達說：「您別吃了，那魚好像不熟，再去燒一下吧。」陳伯達看不清楚，還固執地說：「嗯，沒關係。」王保春趕快將魚端回廚房，又回鍋燒了一遍送上去，陳伯達才算吃完了這頓飯。

在這段時間裏，陳伯達因為感冒，中央開會他請假沒去。周總理很關心他，同時也知道他讓宋師傅回釣魚台去了，沒有廚師做飯。便給陳伯達打電話，批評他說：「你讓廚師回釣魚台是不對的，怎麼能

讓秘書們給你做飯呢，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工作嘛！你這樣把身體搞壞了，讓我怎麼向主席交代呀?!」周總理同時也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有你們自己的工作，還是要找個廚師來給伯達同志做飯。要注意他的身體才是呀！」。當時陳伯達正患感冒，周總理介紹了自己對付感冒的辦法。他對陳伯達說：「感冒初起，我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靈的，不妨你也試試看，少喝一點。」陳伯達告訴我們，他也想試試總理這個辦法。我們就為他買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小半杯，就受不了了，發起燒來。其實他和總理不一樣，總理平時參加宴會多，還可以喝一點酒。而陳伯達平時滴酒不沾，所以他說：「總理好意向我介紹他的經驗，可到我這兒怎麼就不靈了呢。」

陳伯達以後一直沒有要廚師，一直到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都是李玉元給他兼管做飯。

（六）江青對陳伯達說：我要摘掉你的領章帽徽

大約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報》社報送了一份有關日本問題的材料，毛澤東閱後有一個較長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看文藝演出，節目沒看完，陳伯達便叫王文耀告訴在他辦公室值班的繆俊勝，通知《人民日報》盡快把這個文件給其他領導同志傳閱。這件事小繆當時就辦了。

節目演完之後，陳伯達說去一樓大廳參加一個在京宣傳口的會，他事先並不知道。出席中央碰頭會的人大都出席了，會議由江青主持。會一開始江青便說：「讓陳伯達作檢討，他管的《紅旗》雜誌，半年不出版。他還封鎖最高指示！」陳伯達聽了一愣說：「我沒有封鎖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說：「還說沒有，主席最近有關日本問題的指示，你問問別人都知道嗎？」康生在一旁拉長聲說：「我反正

沒有看到。」陳伯達說：「我看了以後，當時就傳送出去了……」。陳伯達還沒有說完，江青就把話筒從他面前搶了過去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我來揭發。你還穿着軍裝、戴着軍帽。」陳伯達說：「大家都穿軍裝，也不是我一個人穿軍裝。」江青緊接着說：「我要摘你的領章帽徽！你知道紅五星的來歷嗎？」陳伯達看到江青這種架勢知道會議是要批自己，便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使勁往桌面上一甩，大聲地說：「大字報上街！」意思是說可以貼大字報打倒我。葉群接着舉手呼喊口號似的說：「擁護江青同志！」場內無人響應，氣氛十分緊張。這時江青好像想起甚麼似的，馬上對到會的全體人員宣佈：「在場的人不許出會場，今天的會議不許傳出去，作為一條紀律，誰傳出去，拿誰是問。不許記錄，記了的必須放下筆記再走。」說完江青繼續說「紅五星的來歷」。

散會以後，陳伯達回到家裏，心情不好，情緒極為低落。第二天他到《紅旗》雜誌社，在全體人員參加的大會上說了不少喪氣話。他說：「……你們對我有甚麼意見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錯誤，可以對我提出嚴厲的批評。雜誌半年不出版不怪你們，責任都在我，我沒有抓緊，由我承擔這個責任。你們也可以給我寫大字報，大字報上街都可以……」大家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說笑話。

離開會場之後，我們對陳伯達說：「你不該向大家說這些話，搞得他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有氣無力地說：「唉，昨天的會議，他們一定有人去參加了，他會回去說的，不可能不說，他們會知道的。沒有關係，隨他們的便吧……。」

兩天以後，我們將那次會議上的錄音帶從中央辦公廳借來，王保春、王文耀、繆俊勝三人，重新聽了一遍。我們對江青的這種無理霸道行為也感到很不平。這盤錄音帶我們沒有馬上還回去，而是存放在我們的辦公室裏。

1970年8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天才論」，受到批判後，這盤錄音帶讓我們緊張起來了。當時覺得將帶子退回辦公廳吧，怕江青知道，會引火燒身的。不退放在辦公室吧，也是條罪狀。將它洗掉也不忍心。猶豫很久，最後將它放在辦公室不易發現的地方。

（七）江青與中央碰頭會對抗

隨着國內形勢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員發生了變化，中央文革小組人員銳減，陳伯達與江青的矛盾不斷，而江青不斷向毛澤東告陳伯達的黑狀。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為着工作能順利進行，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召集人，中央其他黨政軍領導人都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來研究重大決策。從此，陳伯達積極參加這個碰頭會議，而不主動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但是，江青不滿周恩來總理召開的碰頭會議。她多次催促陳伯達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就一些問題作出決定，與周總理的碰頭會議相對抗。而陳伯達總以各種藉口推脫，拒絕召開文革小組會議。江青對此非常生氣，但陳伯達是組長，他不參加江青就不好單獨召開小組會議。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住在釣魚台，她事先和張春橋、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經常每天晚上請文革小組成員看電影的機會來開會。有一天晚上，陳伯達在他的臥室床上躺着看書。釣魚台值班室來電話說，江青請陳伯達去十七樓看電影，陳伯達一聽馬上對我們說：「你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睡覺了。」我們照此轉告了值班室。過了不到兩分鐘，江青讓值班室又來電話說：「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達同志」。陳伯達聽後急了，他毫不掩飾地對我們說：「你告訴他們說，我已經吃了安眠藥睡了。哼！甚麼看電影，她是又要開小組會，強迫我表態，我不去。你們就說我安眠藥已

經發作，起不來了。」說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提，埋頭不說話了。

（八）江青批判新啓蒙運動

1968年，陳伯達實在不想在釣魚台住下去，想離開江青他們遠一點。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經被他的愛人劉叔晏鬧得不像樣子了（劉叔晏正和陳伯達鬧離婚），街坊四鄰都知道那是陳伯達的家。中辦管理局給陳伯達另安的新家——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房子破舊正在修繕。管理局只好臨時將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區，一個很深的四合院。這裏前後幾個院子很長時間無人居住和辦公，非常安靜。在那人心慌亂的年代，這裏真像個世外桃源。陳伯達很滿意，再三對我們說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讓十一樓（江青）他們知道了，怕她來找他。我們當時覺得很好笑，對陳伯達說：「十一樓要找你，去問警衛局你住在哪兒，他們敢不告訴她？」

當時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地找陳伯達的茬。他們寫了一篇批判20世紀30年代新啓蒙運動的文章，呈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對江青說他不看，讓她去找陳伯達看去。一天，江青真的來這兒找陳伯達談這件事，江青一進院子見到陳伯達便說：「哎呀，這個地方可真不錯，趕明兒我也來這住。」江青把準備好的批判文章交給了陳伯達。江青走後，陳伯達既生氣，又着急。因為1936至1937年間，中國文化界掀起的新啓蒙運動，陳伯達是主要發起人之一，這不是直接對着他來的嗎？

陳伯達很氣憤地對我們說：「他們這是衝我來的，你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就是30年代我在〈關於新啓蒙運動的建議〉中提出的『反對異族奴役、反對復古、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的抗敵和民主的覺醒』是反日反蔣的，這有甚麼錯？由於

當時國民黨政府禁止提『反對日本侵略』，禁止報刊上出現『抗日』這個詞，所以只能用『反對異族奴役』的提法來代替，我這裏的『異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啓蒙運動的建議提出以後，上海的《讀書生活》、《新世紀》，北平的《現實月刊》、《時代文化》、《北平新報》、《華北呼聲》等等好多報刊都發表文章響應，抗日民主的思潮得到蓬勃發展。當時的親日派鄭孝胥、守舊派楊立奎等對此很恐慌，通電宣稱要『鏟除』新啓蒙運動。但是進步思潮總是阻擋不住的。」他很生氣地講了一陣。

於是陳伯達就翻閱了些書籍，找出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肯定啓蒙運動的言論。讓王文耀把它們都抄錄下來，經他仔細看後，送給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看。他們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啓蒙運動。這才把那篇批判的文章頂了回去，沒有讓它出籠。

但是，陳伯達並沒有忘記江青說要來這個地方住的那句話。為了躲開她，急得他不知往哪兒鑽，他對我們說：「這個地方不能住了，她還會來的。」他將這件事打電話告訴了葉群。葉群給他出了個主意，說暫時到養蜂夾道幹部俱樂部的游泳池邊上去住。說是林彪在那兒剛住過，較為安靜。

就這樣，陳伯達在中南海丙區的大四合院裏，住了沒兩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了中南海外邊的養蜂夾道去住了。

（九）陳伯達撕碎了與江青的合照

中共「九大」以後，陳伯達住在米糧庫胡同，可是他在釣魚台十五樓辦公室還留着，由繆俊勝秘書留守。陳伯達好久沒有去了，想去看一看。一天，他去釣魚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裏，拿着照像器材設備，許多工作人員陪着，興致正濃地拍攝風景、人物。見到陳伯達

來了，江青為陳伯達拍了好幾張，同時，還讓別人為她和陳伯達拍了幾張合照。之後，陳回到自己的十五樓辦公室裏坐了一會兒，他總覺得有些不安，便離開了釣魚台。

對於與江青拍合照之事，陳伯達總是放心不下。猶豫許久，最後他將與江青照像的事告訴了葉群。葉群聽了以後，對陳伯達說：這可不好，這讓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是甚麼目的？陳伯達聽了葉群這麼一說，心裏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華社，陳伯達馬上就讓身邊的繆俊勝坐車去新華社攝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還未取走。繆俊勝向攝影部的人打過招呼，就取走了陳伯達的照片。

繆俊勝將照片交到陳伯達手中，他當場就將照片撕成碎片。繆俊勝當時吃驚地說：「唉呀！你怎麼給撕了！新華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麼交代呀？」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就說給我了。」從表情上看出，陳伯達的心情一下放鬆了許多。

後來，聽說江青嚴厲訓斥了新華社，而且提出沒有她的指示，以後任何人不許拿她的東西。

（十）陳伯達家來了「不速之客」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定了文章的篇數，排印有清樣。「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中斷，1968年底，陳伯達因無事可做，便決定再編。於是就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幾個人，編起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印出清樣以後，報送給毛澤東審閱。過了幾天，陳伯達給汪東興打了個電話，講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況，並且問汪東興主席看了沒有，汪東興告訴陳伯達毛澤東一夜未睡看完了。陳伯達聽了非常高興。

1969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廣場有一個大型的群衆活動。晚上

看煙火之後，在城樓上休息時，陳伯達和毛澤東談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問題時說，裏邊有幾篇文章對當前情況是很有指導意義的，應該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說，你先選幾篇送我看看。

晚會散了之後，人們都下了城樓，剩下陳伯達、姚文元和新華社國內部的記者在城樓的西側廳，審改當天的新聞稿。定稿之後已經很晚，在下城樓時，陳伯達和姚文元並肩走着。陳伯達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心情，將他和毛澤東在城樓上的談話告訴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陳伯達正考慮給毛澤東呈送那幾篇文章時，來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來陳伯達這個家，她下車後邊進陳家的門，嘴裏邊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兒呀？」進來後，她對陳伯達說，她剛從毛澤東那兒來的，毛澤東同意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我們大家來分頭搞吧，文章由你來分配。寒暄了一陣，江青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放下走了。

江青走後，陳伯達很喪氣，他很不願意江青插手。陳伯達估計在城樓上告訴姚文元之後，當天晚上姚文元便將這一信息告訴了江青。而江青馬上就到毛澤東那去搶了這個差事。

不管怎麼樣，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總是件好事，陳伯達也有事可做了。在碰頭會上，有人說可以以《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的名義進行工作。陳伯達反對說：毛主席自己寫的東西，每一篇都經過他本人審改，不能叫編輯委員會，我們只作了些具體的出版工作，要說只能是一個出版委員會。會上按文章內容分了幾部份，陳伯達一部份，周總理一部份，康生一部份。我們記得總理那部份是有關經濟建設和財政方面的文章。

陳伯達這邊的人，還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原來的人。康生那邊是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參加。當時說康生那邊的人手不夠，要從政研室調

幾個過去。在未調去之前，陳伯達給政研室的同志們開了個會。會上研究如何進行工作時，大家認為，為了全書文章體例的銜接，調到康生那邊去的人，應該經常回來說說情況。但又覺得不太好，怕會引起康生等人誤解。怎麼溝通，想不出辦法來。在大家作難時，王保春建議調過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過黨組織生活，這樣可以順便談一下情況，不就解決了嗎。陳伯達對這一建議非常贊同，大家也都說這樣好。後來，在陳伯達倒台後，中央專案組審查王保春時，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點子多得很，陳伯達都很賞識你。」

不管陳伯達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擾、破壞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出版工作沒有完成，最後還是被康生總攬過去了。

（十一）江青對陳伯達落井下石

在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已被批判。會議結束前，陳伯達去求見毛澤東。毛澤東接見了他，很平和地對陳伯達說：「你看你把個會議搞成這個樣子，下一步怎麼辦？」陳伯達說：「我下農村去。」毛澤東說：「你去找和你一塊工作過的同志好好談一談。……」陳伯達離開毛澤東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見陳伯達便說：「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陳伯達談，而是驅車帶陳伯達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裏，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坐在康生的會客廳裏等着。這似乎是早已約好的。

陳伯達坐下還沒說上兩句話，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就同時開火，對陳伯達連諷刺帶挖苦，把他羞辱得抬不起頭來。一個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幾乎暈倒在會場。他們讓陳伯達準備下次在大會上向大家檢討。陳伯達說：「我現在腦子很亂，

無法動筆寫。」康生說：「你無法動筆，我代你寫。」康生代替陳伯達寫的檢討，用詞相當刻薄，陳伯達都難以啓齒。沒有辦法，為了過關，只好忍辱在會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後，他本想回家歸田當農民，過個平民的晚年。他沒有想到被關進監獄度過了一十八年，期滿一年後就去世了。

陳伯達被審查

1968年間，在群衆審查草嵐子監獄的61位受難者時，說61人中最後一名叫王通的人即陳伯達，所以「中央文革」就讓陳寫寫自己的歷史。陳伯達幾天都沒有出門，寫完這段經歷之後，他對我們說：「我這個人的經歷你們不知道吧？我寫了個材料，你們看看，也可以給劉叔晏、曉農（陳伯達的二兒子）他們看看。」

我們倆傳看了一遍以後，覺得第一個印象正常平淡，因為參加革命早的人都有一段類似經歷，陳在國民黨張貞的軍隊裏工作過，聽他過去也說過毛主席曾經對他說，張貞這個人在國民黨的將領中，還算是比較能打仗的。這說明陳伯達的這段歷史主席是知道的。而且給我們印象較深的是陳伯達是在革命低潮時期的1927年參加共產黨的，應該說是革命意志還是較堅定的。

當時，劉叔晏住在中南海西門外的新建胡同，是我們通知她來釣魚台十五樓我們辦公室來的。看完之後，她從沙發上站起來將材料往桌上一放，臉色不悅地自語道：「真複雜。」說完轉身就下樓走了。我們感到詫異！

陳曉農也是通知他來我們辦公室的，他看完以後說：「我看沒甚麼，年紀大的人過去都經歷多一些，我覺得總的來說他還是革命的。」我們當時覺得他對父親是理解的。

陳伯達也問過我們，他的家屬看了他寫的歷史材料以後，都有甚

麼反映？我們告訴他說：他們看後，都能理解你。陳也不時給我們講他在獄中的鬥爭情況。

當時，劉寧一寫了一個有關草嵐子監獄中的材料。材料中沒有提陳伯達的名字，陳很不高興，曾生氣地說：「劉寧一是甚麼意思?!」我們向他說，可能是考慮到你現在的地位，怕連累你。他說：那也應該如實說嘛！

我們那時的感覺是，中央文革在審查他。所有「審幹」方面的材料，都是送到江青和康生那裏去的。這時陳伯達基本上沒有工作，夜裏常坐車去城西邊馬路上散步。文革小組開會時，江青就批評他：「你又到哪兒去了？」康生便陰陽怪氣說：「是不是到『西山』去了？」陳對我們說：「康生他們的意思，說我去西山去找部隊裏那幾個老帥去了（葉劍英、徐向前等），你們是知道的，我只是在外邊走走嘛！」陳伯達的情緒也很不好，常對我們說他想去農村，不想幹了。

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的經過

馬列主義研究院是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基礎上組建而成的。院長陳伯達，副院長周揚、胡繩等，秘書長柴沫，副秘書長史敬棠，黨委書記趙易亞。據說是由四方面的人員組成：一、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員，絕大部份是些參加革命較早、富有經驗的業務骨幹；二、從各單位調來的幹部；三、由全國各地大專院校選拔而來，在各學科都表現優秀的應屆畢業生和研究生；四、從部隊轉業來，多數為黨、團員的年輕人，他們都是作研究院的行政管理工作。

研究院成立不久，絕大部份學員在教職員的帶領下，經過兩次社會調查工作的鍛煉。（1964年到北京市通縣參加農村的「四清」工作；1965年回到北京，又參加了城市的工業「四清」工作）。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便從各廠、礦回院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院領導在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會議，陳伯達在會上講了話，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動員會。

1968年6月間，陳伯達對我們說：「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康生先後多次提到：『中央各部委都在辦五七幹校，而《紅旗》雜誌社、馬列主義研究院為甚麼不見動靜，是不是你陳伯達管的單位都是好的，不需要下去鍛煉、改造和接受再教育呢？』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運動開始後，陳伯達就去《紅旗》雜誌社批評范若愚「神氣」；去馬列主義研究院，批評柴沫和田家英搞到一起去了，官做大

了不聽他的話了等。還有些話說重了，已被人利用。當時我們倆還議論過他的這種批評，認為他這是「自己的孩子先打」，他這一「打」別人就不好再打了，自己打心中有數，別人打是會往死裏打的。儘管如此，江青、康生還是死盯着不放，他們把姚文元安插進《紅旗》雜誌社，讓姚也過問雜誌社的事。但是陳伯達還是不放手自己直接管的這兩個單位，抽空就去。他知道胡繩、鄧力群被關在單位的小房子裏，他讓我們通知駐《紅旗》的宣傳隊和勤務組：讓他們和大家一起下幹校勞動，到大食堂去吃飯，別讓他們那麼舒服，還讓人給他們打飯吃。陳伯達怕江青、康生他們再派人插進研究院，就自己寫報告給毛主席，建議撤銷研究院，重新恢復延安時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留少數幾個人下去搞調查研究工作。主席圈閱表示同意。至於人員怎麼分流解散、重組政治研究室，還沒有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 重組中央政治研究室

陳伯達解散研究院重組政研室的報告剛經主席批准，正在這時，江青向陳伯達發難，說傅崇碧進釣魚台是經過王保春同意的，他是引狼入室，要讓王保春寫檢查，逼王保春調離工作，離開釣魚台。陳伯達無奈，只好讓王保春去馬列主義研究院處理善後工作。

陳伯達在王保春去馬列主義研究院之前，專門和我們談了一次話，陳對王保春說：你就按照我給毛主席寫的報告中的精神先去了解情況，然後提出具體方案，史敬棠可以留下來，他人還老實。陳伯達還特別提出，留人時一定要選兩名學自然科學的。

1968年7月10日上午，王保春去馬列主義研究院報到。當天晚上陳伯達又親自去研究院作佈置，他原設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研究院一起搞一個生產基地，後來《人民日報》社單獨搞了。

幾天之後，王保春向陳伯達作了一次彙報，為了適應當時的情況和順利地進行工作，陳伯達告訴王保春，馬列主義研究院也要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不幾天，從部隊派去張生華等共三個人，由北京人民機械廠等工廠派去了七、八個人組成了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研究院本身教職員工有一個勤務組，共同主持研究院的工作，王保春在內，研究院內的運動情況就直接向陳伯達彙報。

王保春經過一段時間了解情況後，首先組建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為了不讓江青、康生抓他的把柄，給王保春交代了幾個原則：一、新的政研室人員不要多，只能限制在20人以內；二、盡量不留住在文革前發表過文章的有名望的老同志。王保春當時也老實，陳讓留20人，他就留了20人。可是，新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央機構，業務面那麼寬，緊扣慢扣怎麼也不行。除業務部門外，搞行政的人總得有吧，過去行政是靠中宣部機關代管，現在是自立門戶，得有人管行政。可是陳伯達就是不同意超過20人。王保春只好首先留夠業務部門的20人。就按陳伯達的意思，先選了兩名業務較為突出的學自然科學的，一個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李秀國，一個是天津南開大學畢業的趙紅洲。王保春翻閱了其他人的檔案，反覆篩選，很難捨棄，真可謂人才濟濟，哪一個都想留下。但是只能按陳伯達的要求限人數、選年輕的。經過反覆考慮，王保春還是留了三位老同志：史敬棠、張作耀和馮元朔。馮元朔雖然年紀大一點，但他馬列的書讀得比較多，查東西很方便。同時，在選留人員的過程中，既要考慮到各專業學科的平衡，還要考慮到當時各個造反組織之間的平衡，不能引起新的矛盾。

經過反覆考慮之後，王保春提出了新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業務人員和管理人員名單。其中有史敬棠、宋士堂、馮元朔、張作耀、冷泉清、李淮、劉洪、朱元石、余原、曹勇進、徐兵、黃劍、常溪、徐景安、李秀國、趙紅洲、江賢琛、高興國、鄭偉、賈力、林德茂、王

××等22人。

陳伯達在審閱組成人員名單時，提出：徐景安和上海的徐景賢是甚麼關係？王保春一時答不上來，以後經過了解徐景安和徐景賢雖然都是上海人，但互不認識，沒有任何關係，陳伯達也就沒有再說甚麼。王保春問，政研室恢復以後，都設立些甚麼職務呀？陳伯達聽了極其反感地說：不要甚麼「官」，史敬棠就當個秘書，政研室就設一個秘書，其他都是工作人員就行了。同時，陳伯達對擬留行政管理人員很不同意。經過王保春多次解釋說服，算是同意留四個人。這些同志都很忠厚老實，對工作、學習非常認真負責、有創意。陳伯達對他們要求也非常嚴格，要求他們出去調查時，甘當小學生，不許擺架子，不能說自己是中央機關下來的，以此唬人。首先要向農民學習，向工人學習，要謙虛些，他最討厭張牙舞爪的（他自己本身就不願出頭露面）。陳伯達向王保春說：你去對留下的同志說清楚，他們留下了，不是說他們就不得了，而不留的同志就要不得。

新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建立之後，就從中央黨校南院搬到東城區沙灘北街進行正常工作。陳伯達首先佈置他們到北京市的田村進行農業調查；到九仙橋的電子城進行電子工業調查；到地安門鼓樓等地的中、小學校進行教育改革調查等工作。同時還出了一個內部不定期的刊物——《教育革命探索》。

（二）馬列主義研究院人員的安排

新的政治研究室的人員確定下來之後，其餘人員如何安排，陳伯達是很費了一番腦筋的，他對沒能留下的同志一個也不撒手，他認為這些同志都是難得的人才，現在散去是出於無奈。對這批人是集中一起辦幹校，還是分散下去？不知如何安排較為穩妥。他明確表示，這

些人將來還要用，請王保春多加考慮。王保春對陳伯達說：我把這些同志都安排在幾個地方，等你用時，馬上就可調回來。陳伯達當即表示贊成王保春的辦法。為此，王保春自己寫了一份詳細的名錄，以備將來隨時調用。

陳伯達經過思考之後，就親自給當時中央常委中抓業務工作的李富春聯繫，請他幫助給予安排解決。並說具體情況讓秘書王保春當面向富春同志彙報。同時他也向河北省的李雪峰聯繫，請他也給予幫助。

1969年初，王保春和研究院的宋士堂，到中南海李富春辦公室，當面向富春彙報了陳伯達的意見和馬列主義研究院人員情況。經過研究，李富春提出以下建議：一、把大學生和研究生重新列入68屆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重新分配，這樣都可以分配到中央各部委；二、轉業軍人可以調到「三線」去參加「三線」建設；三、餘下的幹部可分別下放到「幹校」學習鍛煉。

李富春對王保春說：「這三條請你回去向伯達同志報告，如果同意，你可以打電話給我的秘書，再着手安排。」王保春向陳伯達作了詳細彙報，陳聽了以後，原則同意。同時，他對王保春說：「你再去到李雪峰同志那裏，向他談談我的意見，是否在河北地區找個合適的地方安排些人去」。

接着王保春到石家莊找李雪峰，向李雪峰談了馬列主義研究院人員的情況和陳伯達的想法。李雪峰經過和有關同志研究，初步確定將大部份人放在河北省的漢沽地區。餘下少數人員，可分別分到山西省晉南地區和黑龍江的嫩江地區。

王保春和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宣傳隊、勤務組的宋士堂，先後又到了江西省南昌市的鄱陽湖地區、河北省石家莊地區等地了解情況。經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直接向陳伯達彙報。

總的方案確定以後，最後經陳伯達批准，開始以馬列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名義出面具體實施。實際上是王保春具體與李富春、李雪峰的辦公室聯繫落實的，直到方案基本完成。李富春為此，向陳伯達通了電話，對王保春的工作表示滿意。

王保春在研究院工作八個月之後，又重新回到陳伯達身邊工作。

附：陳伯達對馬列主義研究院幹部下放前的指示

由王保春記錄傳達：

一、大學生、研究生分配工作就是了。工作就是生命，先不要計較甚麼轉正、定級這些事。所謂「定級」本來就是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同志們下去，有普通的衣、食、住，便可以滿足了。

二、大家下去，還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學習，調查研究。有好的調查研究，可以送給政研室或《紅旗》雜誌社，精彩的、新鮮的事物，可以發表。

三、大家下去，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普通勞動者，誠懇地工作，把工作做好。不要特殊化，要同工人、農民以及其他群衆合得來，讓工、農群衆把你當成自己人。此事非常重要，人人可以做到，但知識分子要做到並不容易。幾年來，我很少同你們接觸，非常抱歉，希望大家引以為戒。

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一段精彩爭執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開幕式上宣佈會議議程：（1）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2）修改黨章；（3）國內外形勢；（4）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毛澤東主席在開幕式上發表了講話，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講了這些肯定的話之後，主席又說：當然了，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陳伯達聽了主席這幾句話之後，便急切地插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全部由我負責，主席講的結論，我擁護，我首先擁護這個結論。」主席馬上頂了陳伯達一句，說：「甚麼結論，會剛開始談甚麼結論吶，我只是提出問題嘛。」陳伯達接着說：「是呀，是呀，錯誤的責任在我。」他話還沒有說完，江青就插上話了說：「那也不能讓你來承擔呀！要承擔還有總理哪！還有我們碰頭會哪！也輪不到你嘛！由我們碰頭會共同承擔嘛！」

陳伯達當時的意思是因為主席要承擔文革搞過頭的責任，而自己作為組長主動承擔這個責任。主席後來補充說了一句：「當然了，你是文革組長嘛。」

從這裏看出，陳伯達當時那樣着急，是因為不能讓主席來承擔責任，而由自己來承擔，但他沒有想到這裏邊有潛在的爭功的問題。江

青是很敏感的，她是要爭文化大革命這個「功勞」的。

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得很秘密，時間約二十天左右。會上「四人幫」等人對一些革命老同志，進行了無端的指責攻擊，特別是對參加過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志的圍攻。10月31日，會議閉幕時，毛主席說：「所謂『二月逆流』，幾個人在一起議議，沒有甚麼了不起，地球照樣轉，不逆一下也不得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甚麼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不參加，我看就是缺點。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嘛。」

會議結束後，如何向下傳達要求很嚴，按着傳達文件的規定，只能傳達到省、市縣兩級的革命委員會，黨員核心小組只進行口頭傳達，不讓記錄。中央機關的傳達在北京首都體育館進行。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根據中央通知不許記錄的規定，佈置了幾個同志去聽傳達，他們注意用心記，回來之後，大家馬上追記整理出一份記錄。這份記錄我們倆看了以後和後來中央印發的文件相差無幾。對政研室這些才子們，心裏真是讚嘆不已！

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

大約是在1969年1月底一天夜裏，陳伯達開會回來和往常不同，一進大門不進自己的辦公室，而是興沖沖地直入我們的辦公室。

進來之後便沒頭沒腦地對我們說：「快給我準備準備！」

我們看他興奮而又嚴肅的樣子，便問道：「準備甚麼？」

他說：「嗯，準備材料、紙和筆。中央、主席決定讓我起草九大報告。」

我們知道，毛主席好久沒有派給他事做了，這回讓他承擔這麼重要的工作，他很興奮，我們也高興。

我們一邊幫他脫大衣，一邊急問他還有誰參加。陳隨口說：「主要是我。」

我們說當然主要是你自己寫了，不過總還有別人參加吧？

陳不耐煩地說：「還有上海那兩個（指張春橋、姚文元——作者註），主要是我自己寫。」

我們說：「那他們來問怎麼辦？」

陳說：「不管他，他們自己願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

我們看他一提到「那兩個」就情緒激動，也就不再多說別的了。

陳伯達坐在我們辦公室的沙發上，靜靜地沉思了一會兒，向我們談了一下中央碰頭會決定召開黨的九大和起草政治報告的情況，說時間只限一個月，寫甚麼內容沒有講，由陳伯達自己考慮（因為以前中

央已有過關於召開九大的徵詢通報）。

接着，陳向我們講了他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主題設想，他說：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你們倆幫助我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地方有關在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

陳說，可問問謝富治同志，要些北京市的材料。

這時，王保春向陳提出，是不是再找幾個別的同志一起幫忙，如《紅旗》雜誌、政治研究室的同志？

陳說：「不要。《紅旗》雜誌姚文元在管；政研室嘛，可以找幾個。你去組織一下，人員你去選，不要出了名的名人。我這裏就你們倆幫我找找材料就行了。」

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裏（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

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着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主席很快圈閱退回，就這樣，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王保春從政研室選了幾位同志，組成了一個班子，集中在沙灘的辦公樓裏。陳伯達去看過他們兩次，先給他們講了主題思想，怎麼寫、寫甚麼，由他們自己研究決定，並說：你們覺得應該寫甚麼就寫甚麼。

回來後，陳自己動筆寫。沙灘這個寫作班子主要由王保春聯繫，王文耀主要給陳打下手。

工作是開始了，但我們感到最不好辦的是中央決定由三人起草報告，而陳伯達甩開張、姚自己幹。我們也向陳提出，張、姚他們來問

怎麼辦，怎麼答覆？陳固執地說：「不管他，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

我們覺得這不是個辦法。果然，這時姚文元來電話，問陳起草報告怎麼進行。陳不接電話，讓我們答覆他說：「告訴他們：你們覺得應該寫甚麼就先寫吧，我有些身體不舒服。」

可是後來，張春橋又來電話問陳怎麼辦，是否談一談。陳也是用同樣的辦法讓我們答覆：「不是有個提綱嗎？讓他倆自己覺得應該寫甚麼，就先寫着吧。」

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以後再也不來電話了。

我們對陳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是不會閒着的，他們是會向上報告的。

陳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是要我來寫，他們就是想要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

陳的態度很堅決，我們也不是反對他的想法，但是，擔心的是怕他這樣硬頂，張、姚會找岔來破壞，使陳搞不成功。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他這個報告能夠寫成功，便努力按照陳伯達的思路四處搜集資料。在這之前，汪東興送來過一批北京「六廠二校」的材料。除此之外，我們首先是找北京市要資料，陳伯達對北京市抱很大希望，認為謝富治會支持他。可是我們打電話向謝要有關生產方面的資料時，謝說：「寫九大報告，要北京市的資料，是『中央文革』要可以給，其他人要不能給。」

我們碰了釘子，陳還不完全相信。就在這時，在人民大會堂118（北京廳）——毛主席那裏開會，散會後出來，陳伯達有意和謝富治並肩而走，向謝提出要北京市的資料。王文耀緊隨其後，聽到謝對陳說：「伯達同志，你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

陳自己碰了釘子，在回家的車上沉思不語，可以看出他那時心情很不好。到家一進門陳對我們說，北京市不給資料不要了。你們可向河北省委要，向李雪峰同志要些材料，河北省有不少好的典型。我們向李雪峰那裏要了些，但主要的資料還是從新華社和中辦要來的。

在這期間，新聞口是由陳伯達、姚文元兩人共管的，而實際上是姚文元一人抓住不放，輿論界都在不斷地宣傳「旗手」。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姚文元寫了個關於宣傳江青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樣板戲的報告。而主席看後把江青的名字和「紀要」全給刪掉了，批示（大意）：我以為不妥，送伯達同志，由碰頭會商議。

陳看了毛主席的批示非常興奮，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他說，主席早就批評她說：就是幾個樣板戲；要江青管文藝就沒有文藝了！主席的批評他們就是不聽，他們就是在吹噓她，說甚麼30年代的旗手是魯迅，60年代的「旗手」是江青；為她造輿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她的所謂「紀要」開始的。我的這個報告裏就是不吹捧她，就是不從她的所謂「紀要」開始，而是提前到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貶低她的影響。就是要把報告寫得非常嚴謹，使得在討論它時，無法加進她的「紀要」！

陳伯達這個報告寫得很艱苦，長時間的思考、推敲。他的寫作習慣是臥床寫作，寫累了，他口述我們幫助他記錄，他有時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口述；寫不下去時就再思考，去大書房裏翻閱書籍，我們跟隨着，表面看他在翻閱，實際在思考，翻着翻着又從迴廊到辦公室，接着記錄他的口述。

王保春與沙灘的寫作班子常聯繫，拿回來的稿子，有些參考用了些，有些陳翻閱一下便笑笑放到一邊了，很少用。因為那些同志的思路與陳不完全一致，原因是陳不好把針對江青等人的想法告訴他們。我們當初組織這個班子的目的，也就是為了給陳擴展思路提供一些參

考而已。

時間在不斷地向前推移，我們心裏非常焦急，生怕中間出了問題。我們向陳建議是否把已寫出的第一部份稿子報送主席，寫完第二部份時再送，陳同意先送第一部份。但他又說，主席習慣一次一口氣看完。就這樣，陳伯達親筆寫了一封簡信，附上第一部份稿子，裝在一個大信封裏呈送主席後，便接着寫。

可是送出的稿子沒有回音。我們心裏很不踏實，但又不能對陳說，怕干擾陳的寫作思路。

第二部份寫完後，我們實在憋不住了，在陳休息時提出是否將第二批稿子送主席。

陳說不用，寫完後一起送一個完整的稿子，主席就會一口氣看完的，這是他的習慣。不能一段一段給主席看。

他講的有他的道理。但是，規定完稿的時間臨近，稿子進展緩慢，我們很是替他着急。

看得出陳也同樣着急，但他不讓江青主張的一套插進報告的強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當他苦心孤詣的稿子寫到只剩下最後一點時，中央開會了，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九大政治報告寫得如何。參加開會的人員到齊後，主席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總理沒有把握地說，看來恐怕不行吧！主席對陳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可能延誤九大的召開表示不滿，便接着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

就這樣，陳伯達一句話未說，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

陳非常痛苦，在散會時，問周總理：「我那個稿子只剩下一點了，怎麼辦？」

總理安慰他說：「那你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

這是陳伯達回來後向我們說的。他略帶埋怨地說：「唉！總理也沒有看我寫的稿子就說不行，他問問我也好嘛。」他有氣無力地坐在沙發上，像癱了一樣。

我們勸他不必埋怨別人：「當初你不讓他們來參加，他們能不對總理施加壓力嗎？總理處境也很難，所以他就只能這樣說了。」

陳聽了後也只好說：「是呀，總理也難呀。就按總理說的，把它寫完吧。」

當天晚上，總理讓陳先拿出寫完的報告稿交「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一下。後來，在會上還是被張、姚攻擊為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而否定了。而我們卻還在為這份已被否定了的稿子跑印刷廠，雖然印刷廠的同志並不知道，但我們已很不好意思去了。因為張、姚的稿子，也在這個廠子排印。我們心裏想，在張、姚的稿子發稿前一定搞完，不再去印刷廠。

陳伯達就是在這樣難受的心情中寫完了這個稿子。當我們從印刷廠取回完整的清樣稿交給他時，陳用手輕輕地拍打着文稿，若有所思地輕聲自語道：「留作紀念吧！」緩緩地從沙發上起身，慢步回到自己的房間。

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之後，葉群給陳伯達來過電話。電話裏她安慰陳說，「不用你的稿子沒關係，他們要搞就讓他們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由中央辦公廳送來之後，陳伯達在他房間裏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地來我們辦公室，很激動地對我們說，「他們這個稿子你們看了沒有？」

我們說沒有，先給你看嘛。

他說，那你們看看，他們這個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說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你們看看是不是

這樣的！

他說完將稿子給了我們，他走出房門在迴廊裏（四合院的迴廊）煩躁地轉，當轉到我們辦公室門前時，又對我們說：「你們可以和我那個稿子對照着看，看哪個好！」

他在迴廊裏不停地轉着，等我們瀏覽完。看到陳的情緒很激動，而且現在已經是這樣，我們為了穩定他的情緒，在他想聽意見時，便沒有多說話。我們說：「他們這個稿子講現在的問題多，看後覺得一般；你這個稿子目的明確，談生產多些，邏輯性強，結構確實嚴謹。」

他聽後還是說，他們就是搞運動沒有甚麼目的。

中央開會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了張、姚的稿子，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陳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

.....

會上爭論很激烈。

後來毛主席說，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

會上大家都表了態。最後，陳伯達說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說：「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九大開幕了。陳伯達作為主席團成員雖然依次坐在主席台的顯要位置，但心情是不好受的，因為他一事無成。他早有下台的思想準備，但如何下，他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而這時的張春橋、姚文元、葉群都在積極活動進政治局，並且積極擁戴江青進常委。此時的江青風頭正盛，也自認為她是當然的常委。

聽說江青為了自己進常委又提出鄧穎超也應該進政治局，遭到周總理的反對。聽陳說，江青揚言，黃永勝如果進常委，我也應該進常委！

九大以後新班子的人選，都是由周總理負責安排、協調的，他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圖為大會主席台。（網絡圖片）

工作非常困難。

一天，周總理來到陳伯達的住所向他通報人事安排方案，對陳說：「這下好了，主席的意見江青不能進常委，原來的常委不動，這個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

陳對總理想說常委他就不再當了，話未出口，總理很嚴肅地對陳說：「不要說了，主席已經定了的，不要再提了。」

總理在離開陳宅時，由於走廊太窄，陳伯達的管理員——李玉元給總理穿大衣，由於總理的右臂受過傷，抬不起來，怎麼也穿不上，站在走廊另一頭的總理衛士長直着急，幫不上忙，還受到總理的批評。

九大在進行大會選舉時，在預選中江青得了全票，她很得意，滿心以為她會全票當選，可是正式投票選舉時，她沒有得全票。對此，她極不愉快。陳伯達回來說：「我就沒有投她的票。」在各小組開會時，上海小組就有人為江青鳴不平，非常氣憤地說，有人竟然不投江

青同志的票，而且在江青同志名字上打×，這是甚麼階級感情！上海小組會一片激憤，有的人竟提出要追查這些在「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名字上打×的人，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聽說要追查，陳非常不安地給汪東興打電話，問他們會不會查驗筆迹。

按照九大會議規定，除代表在大會上發言外，新當選的中央常委都要發個言。陳伯達沒有積極性，對我們說，他就不講了。

我們建議他講：「其他常委都講，你不講不好。」

他說，「沒有甚麼好講，你們說講甚麼呢？」

根據當時的情況，我們說，「你就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了，主席不是說『一種傾向掩蓋着另一種傾向』嗎？結合目前情況，你就講這個嘛。」

陳想了一下說：「那好吧。」

就這樣，在他的辦公室裏，他口述，我們倆幫他記錄，每寫一段，我們向他複讀一遍，他指出哪裏如何改，我們照改。發言稿不是很長，總覺得他膽子很小，非常慎重，通篇幾乎都是引主席的話。

抄清後，送給了主席。主席很快批退回來了，在稿子上批着：「第二頁說得太過份，宜刪去。你可以另外寫一些你自己的見解。」主席刪去了頌揚的話。

見到主席的批示，陳伯達的心情好了許多，他自己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我們抄清後，又報送主席審閱，主席也就很快圈閱退回。這就是陳伯達在黨的九大上的發言。

九大開完之後，我們收到毛主席處退回的一件文件。我們仔細查看了一下，原來是陳伯達呈送毛主席的九大報告稿的第一部份，原封未動。主席用粗粗的鉛筆大大地寫着「退陳伯達同志 毛澤東」，後面署着日期。毛主席的字迹幾乎佔滿了封面。我們和陳看了都愣了，原來主席從未拆封看過。我們倆一聲未吭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只剩下陳一人在他的屋子裏呆坐着。

陳伯達的職務有多少

陳伯達在「文革」期間，主席說：「我給你那麼多職務，你都給丟了。」他還挺得意地對我們說：「你看我也不奪權，我也不和別人爭，更不去爭利。」文革前他擔任過多少職務，一下說不全，除黨內職務外，國家、政府職務也不少，有些都是隨着主席的注意力而增加的職務。據我們記得的職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紅旗》雜誌社總編輯，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中央理論小組副組長，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國家小計委成員，馬列學院副院長。後來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我們覺得主席要抓哪方面的時候，就把他派到哪個部門了解情況，就在哪方面掛個名，也不承擔甚麼責任，願意抓哪個項目就找這個部門的幾個搞業務研究的人來，一起搞，也是合理合法。所以他不願意出頭露面，只當副職，而且這個副職不同於其他人的副職。還有一個職務就是在寫反修文章時，中央決定陳伯達、康生負責這個寫作班子，辦公地點設在釣魚台八號樓，康生動作比他快，中央一決定，康生就去釣魚台八號樓住了，佔了主要房子（規定是團長住房），陳去得晚，就住副團長的房子裏，他只住了一天半就離開回家住了，從此不再去了，所以他也很少寫反修文章，就自己寫過兩三篇，如〈再論陶里亞

蒂與我們的分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即25條）等。他和我們說起他那些職務都給丟了，他也美滋滋的。

過去在工作中聽到他嘴上常提到的人就是谷牧、余秋里、張震寰、楊波的名字。總之，凡是國家重點工作都有他參與。至於說他把職務都弄丢了，看不住，看怎麼說，他的工作重點不在那兒，不整天坐在那兒，只是抓這項工作時，這方面就接觸多些，如抓農業就和農業部、中央農村工作部接觸接觸，抓工業就和電子、科研部門接觸接觸，但是國家計委他是常接觸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老這麼搞他真煩了。「九大」以後，他似乎覺得主席在轉向，進行「鬥批改」，實行「三結合」，他很高興，常和一些抓業務的領導同志接觸。那時李先念、紀登奎等都向陳伯達要人。我們聽到他們對陳伯達說：「老夫子，得支持一下啦，給我們幾個秀才呀！」余秋里也常往陳伯達那兒跑，談抓生產的業務。秋里同志用手拍着王文耀的肩膀說：「小王呀，伯達同志有事你常打電話給我啊。」保春見秋里同志抽煙時一隻手點火不方便，就去幫他，秋里同志說：「哎，不用不用。」說着他便用嘴含着那火柴盒，這隻手『啪！』的一聲就劃着了。

陳伯達看出主席要抓國際問題了，他問王保春原研究院那些同志都在哪兒啊。而王保春在幫助解散研究院時，知道陳伯達捨不得這些人才失散，就將他們安排在自己認為可以隨時找回來的地方。現在抓業務的人都向陳要人，這時才能看出陳高興而得意的樣子。

也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身邊沒有更親近他的人，只有我們倆。他這個人情緒不穩定，在不同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情緒。他工作順利時，得意洋洋，搖頭晃腦，工作不順利碰了釘子，不好過時，受到委屈、苦惱時，很容易看出來，想找人說說，可也沒人敢同情他，只能回來和我們說說。有時回來講的多了，一談就

是半夜，老陪他聊天。他知道我們不會給他往外傳，也不會給他向上級打小報告，同時也不能給他幫太大的忙，只是發洩發洩，說說心裏好受些而已。我們也只能勸他兩句。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不多，據我們親身感覺，「文革」期間，也就是1966年5月底到8月底，這一段算是陳伯達政治生涯的興盛期，那時候，大家都圍着他轉，整夜整夜的開會，大事小事都來問他，白天黑夜忙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

陳伯達與劉叔晏

(一) 師生結合

劉叔晏1922年生於四川灌縣，1938年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做過地下工作，長期從事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工作。她曾在著名的社會學家鄧初民教授處做統戰工作，教授給過她許多幫助，並且被鄧初民認作乾女兒（鄧初民解放後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叔晏曾經結過婚，前夫叫劉光，在白區長期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5月生下一女兒。劉光去世後，劉叔晏帶着幼小的女兒來到延安。

解放初期，劉叔晏是馬列學院的學員。陳伯達當時擔任馬列學院的副院長，陳每次講課完畢，都有不少學員圍攏着請他寫毛筆字，劉叔晏也是如此，日子久了兩人相愛，結成伉儷。

劉叔晏將在學習期間讓陳為她寫的字，裝裱了厚厚的一大本。直到60年代，劉興奮起來還翻出給我們看看。

五、六十年代，劉叔晏年輕能幹，她在北京通縣的雙橋農場當副場長。由於工作忙路又遠，一個星期只回家一次。到60年代生了孩子，身體又不算太好，就在家照顧陳的生活和看護孩子。同時也擔任陳的秘書工作。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

(二) 從沒有興趣到想出頭露面

「文革」前劉叔晏很少出頭露面，她對外面的事很少關心。當時報刊上在進行學術批判，她對此沒有興趣，但是其中有一篇文章，批判翦伯贊的「讓步政策論」牽連到了陳伯達。正在天津進行工業調查的陳伯達，看到後心情極為不安，日夜睡不着覺。劉叔晏也正好在天津治病，看到此景非常着急和不安，生氣地口出粗言：「他媽的，北京在搞甚麼名堂！搞得他（陳）不能安生！」她本來應該給康生打個電話問問情況，但她對康生很反感（因家事康批評過她），不願意和康通話，而親自給彭真打了電話，說北京的批判影響了陳伯達的工作。彭真將此事轉告給康生，為此康生來電話解釋說，報紙批判的問題與陳無關，並派專人來津向陳說明。

到1966年上半年的5、6月「文革」初期，中央宣傳部等部門都亂了起來，這時劉叔晏回到北京也待不住了，到處去看大字報。這時她覺得自己待着不工作不行，便向我們提出說她也是陳伯達的秘書，而且是第一秘書，要求開始送文件給她看。她住在中南海迎春堂家中，我們和陳伯達住在釣魚台賓館。為了表示對她的尊重和重視，每天整理出一部份文件，我們坐車給她送到中南海家中。可是送了幾次劉叔晏並不滿意，她說：「你們以後不要再這樣給我送了，你們可以用信封寫上我的名字，通過中央辦公廳機要室送給我，不然別人還以為我沒事幹呢！」「我也要向江青同志學習，要出來工作嘛，我不能讓他（陳伯達）管那麼死，人家不是說他是『金屋藏嬌』嘛！哼！」「他這個人呀，就是甚麼都捂着！」

回到釣魚台十五號樓後，我們倆還笑着議論說：「叔晏同志也要像江青同志一樣，要出頭露面了，婦女要翻身了，那可是金屋裏要飛出金鳳凰了呀！哈哈……。」說是說，我們還是按她的意思去辦，每

天選些文件送給她。劉收到後表示滿意。

這段時間，劉叔晏對江青很稱讚，其目的是想出頭露面，出來工作。我們本來工作很忙，但她讓我們陪她去天橋劇場看革命樣板戲，在去的路上對我們講江青如何抓革命樣板戲，如何了不起。到劇場以後，在看演出的過程中，看到她喜歡的地方時就叫好。看得非常認真，像個新聞記者似的，她一邊看，一邊用小手電筒照亮，在一個小本子上作記錄，嘴裏還不停地小聲稱讚。

(三) 聽說鄧穎超要來拜訪受寵若驚

劉叔晏解放前在重慶，由於種種原因，她和周恩來總理、鄧穎超大姐很熟。劉把兩位老人當成自己的長輩，一直非常尊重。「文革」初期，不知何故周恩來受到毛主席的批評，而且言詞很重。總理心情不好。一天鄧穎超給劉叔晏寫了一封信，隨後並且打電話給劉叔晏，很客氣地說她要前來拜訪。鄧穎超前來登門「拜訪」劉！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劉叔晏接到電話後，深感吃驚和不安。事後她對我們說：「唉呀，鄧大姐剛來電話說她要來看我，把我嚇得直哆嗦，她來看我！那我怎麼擔待得起呀！我怎麼能讓她來呢?!」實際上鄧是在通過劉向陳求援。那時候陳伯達和以前一樣，去毛主席那兒也較隨便，劉也將此情況向陳伯達談了，陳在主席那兒從中斡旋過。

當時，周恩來心情不好，日常工作都受到了影響。許多應由國務院處理的，各部委有關生產業務方面的報告等文件，都經中辦轉到陳伯達這裏來了。我們收到後也感到奇怪，陳伯達從不過問具體的生產業務的事。既然送來了，就只能急送陳伯達，而陳閱後就放在一邊。我們着急地催促他：「這些文件都是當即要辦的，他們都在等着您批呢……」陳伯達心煩而不快地說：「我知道，我都看過了，我不能亂

批呀！這些都應當由總理來處理。這類文件以後不要再接了。」陳伯達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從此以後，恢復了正常運行。這其中劉叔晏也算是起了些作用吧，所以她顯得有些得意。

（四）向自己老同學出擊

中宣部和《紅旗》雜誌社同在一個樓裏辦公，同進一個大門。兩個單位的大字報也都貼在樓道裏，這時劉叔晏常來看大字報。有一張大字報引起了劉叔晏的注意，那就是《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某某的司機，揭發某某的大字報。

某某是劉叔晏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時的同班同學。也是在下課後爭讓陳伯達寫字的學員之一，她現在只是陳的一個秘書，而某某卻當上了《紅旗》雜誌社的副總編輯，她心裏有些不平。這時《紅旗》雜誌有人給某某寫大字報說，有個女人經常坐某某的車；再就是某某經常去釣魚台東邊一個居民小區，每次都在路邊下車就讓司機回去，說他在那兒作按摩，等過幾個小時以後，再去接他。這就引起劉叔晏的懷疑。她便找《紅旗》雜誌社的幾個人，讓這位寫大字報的司機帶路，到釣魚台東邊那座樓裏了解調查。那裏人說，這沒有醫院和醫生呀！這使劉叔晏更加疑心，每天坐車在那路口等候。這個行動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他們經查車號知道是中央黨校的車，就作罷了。

劉叔晏終於查到了這個女人的踪迹，是某大學的，就住在這個小區，她的丈夫在日本留過學。劉懷疑此人是日本特務，她便很神秘地將這一情況給江青寫了封信，不讓任何人知道，而讓自己的女兒親自交到江青手中。這樣就成立了所謂某某專案組，辦公地點設在西城區新建胡同，繼續查這個女人行踪。查到釣魚台時，李鑫也寫了證明材料，說寫「九評」的時候，他有次去某某的房裏，裏間拉着帷幕，聽

到衛生間裏有人在嘩啦嘩啦地洗澡，懷疑是那個女人。根據這個情況到來客登記處一查，確實那一天登記簿上記有一女人來送資料，時間在亞非記協主席查禾多來訪時。劉叔晏越查越來勁，似乎在充份地表現她過人的敏銳。

專案組的業務在不斷發展，人員也在增加，《紅旗》雜誌的，公安部的，還不夠，劉叔晏還拉王保春參加進去。說某某在這期間去過太原，讓王保春和專案組的一個年輕人，人稱「小石頭」的同志去太原調查。他們倆到了太原，在某某住過的晉祠賓館，工作人員給他抱出一大捆住客登記簿來。他倆翻看很久，終於查出這個女人，是從北京來給某某送資料的。證明確實某某讓這個女人來過太原。劉叔晏知道這一情況後，一下就火了：「哼！那個某某（某某的愛人）是個多麼老實的人啊！這個某某實在對不起她！」「這個某某官做了大了，我幾次在辦公大樓見到他上樓時，彎着個腰，背着手，嘴裏還哼着山西小曲。哼，你看他那個神氣！」就這件事，整得某某無臉見人，氣得他有一天抹脖子自殺。幸好發現及時，送到頤和園後邊一個部隊醫院搶救過來了。王保春和公安部的劉凱還去醫院看過一次。

那位女士就被整得更慘了，就因為她和某某的關係及丈夫留學日本，就被關押受審。王保春感到這個案子沒有甚麼意思，便託辭說王文耀一個人工作忙不過來。以後就不再參與他們的事了。陳伯達對此也不積極。而劉叔晏後來也感到興趣不大，但她還是想做更多的事。1967年初，她給江青秘書閻長貴打電話，請求江青能給她安排個工作做，而江沒有理睬，這可算是第二次碰江青的釘子了。

（五）對江青從崇拜到反感

劉叔晏此人很聰明，但過於神經質，敏感得誰都不信任。她住中

南海，說她的後院發現生人腳印（可能是電工甚麼人走過），即便是吧，也不報告警衛局，家裏誰都不告訴，就讓自己管的某某某專案組的劉凱（公安部的）找公安部的攝影師來，到她家的前後院裏拍照。如果是自己家裏人拍照沒事，而讓外人來中南海當作案件拍照，就違反規定了。這件事後來被汪東興、江青知道了。江青大發脾氣，將她趕出中南海，搬到中南海外邊的新建胡同去住了。

陳伯達和江青之間的矛盾，陳給劉叔晏也說過，而劉對江青也早有反感。她對陳伯達更反感，認為他無能。曾多次吵架，憑她的敏感預測：「你不是江青的對手，你早晚也得倒霉。」她說：「你這個組長幹不了，你是個窩囊廢，幹不了！」後來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被審查，寫了個自傳，給我們看後，陳讓我們通知劉叔晏來看。劉來到我們辦公室看完之後，將稿子往桌子上一放，扳起面孔站起身來，小聲自語道：「哼，真複雜！」馬上就出門走了。

「文革」之後陳伯達很少回家，有段時間心情不好，回新建胡同一次，從家回到釣魚台情緒就更不好。護士小徐給他用藥時，發現陳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吃驚地問陳怎麼搞的。陳趕緊掩蓋不好意思地說：「噢噢，是我洗澡時不小心摔的，沒關係……」小徐驚訝地對我們說：「呀，首長胳膊怎麼都受傷了呀！」我們說：「是嗎？」隨後我們單獨找陳問了一下。起初他迴避，後來我們發現他不止胳膊上，身上好多處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我們對陳說：「是不是昨夜回家和叔晏同志吵架啦？」陳仰躺在床上目視前方，嘆着長氣不說話。我們也就沒有再問了。為此，我們對劉叔晏很有意見，兩人衝動之下，向江青寫了告狀信。江青對此沒有理會，只是將我倆寫信的事告訴了陳伯達。陳伯達對我們向別人說出他的家醜，雖然不快，但在那時社會混亂而他自己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也別無他法，我們總還是為他好嘛。陳伯達對我們說：「你們對我好，我知道。劉叔晏這個人有

毛病，不好。但她對你們還不錯，在他們（指康生、關鋒、戚本禹）要換掉你們時，劉叔晏還是為你們說好話，要留你們在我這繼續工作的。」

儘管劉叔晏對陳伯達有些不滿，恨他成不了大器，但陳伯達也還希望劉能心情愉快，工作滿意。陸定一專案組設立之後，江青對陳伯達說：「你的老婆要我給她安排工作，我給她怎麼安排呢！要不，你動員動員她，讓她管陸定一專案好了！」陳伯達對專案沒有興趣，但江青說是劉叔晏讓她安排工作的，也就答應了。陳伯達回來就告訴了劉叔晏。可是劉這時對江青已從崇拜到反感，幾次碰江青的釘子，又被趕出中南海，對專案失去了興趣，所以她對陳說她不幹。陳伯達說：「我已經答應江青了。」這下劉叔晏火了，便大聲對陳說：「我的事，你事先也不和我商量，你就答應了，我不幹！你答應你去幹！」說完甩手就走。陳伯達心想，不幹也好，就去告訴江青說劉叔晏不願意幹專案。誰知江青一聽也火了：「你老婆死命向我要工作，給了又不幹！她不幹你幹！」一下子給陳伯達捂上了。陳也不幹，但又沒辦法，推不掉，只好就拉了個謝富治，讓謝去組織班子，自己只掛了個名，具體的事很少過問。

（六）精神徹底崩潰

劉叔晏知道她拒絕了江青，日後沒有好結果，自己的丈夫如此「無能」，從此之後，她和陳伯達的矛盾與日俱增。就在這時，劉叔晏要陳伯達寫了一份離婚書，待他倒霉時聲明自己與她無關，這份離婚書陳給周總理看過。本來她這個人就神經過敏，現在簡直精神崩潰。她在新建胡同家中，經常惹事。深更半夜，把一台留聲機放在二樓的陽台上，打開窗戶，大放革命歌曲，吵得四鄰不安。陳伯達多次

派《紅旗》雜誌社等單位和劉叔晏較為熟悉的人去做工作。這些同志客客氣氣地進了陳宅大院，但是進不了劉住的樓門，而且被站在陽台上的劉叔晏臭罵一通，掃興而歸。劉還大罵讓這些人進來的門衛戰士是甚麼「羅瑞卿的兵」（當時羅瑞卿已被打倒，劉的用意不在羅）。鬧的結果，這些情況被江青、葉群知道後，他們以不要干擾陳伯達的工作為由，將劉叔晏用飛機送到山東青島市，交給楊得志。名義上是「休養」去了，實際上是監禁，不許與外人接觸。待了一段時間，劉叔晏想回北京，被勸說不許。劉感到失去了自由，起初她對中宣部派去陪同她的工作人員，言談還比較客氣。後來感到對他們說了自己的心情、要求，都實現不了，等於白說。從此就對這些同志出言不遜，罵他們是在監視她。後來又對一個工作人員發神經，說他要強姦她，趕他走開。她不光在屋裏鬧騰，還出門上街惹事。當地為了減少影響，將一條街道暫時封住，不許行人通行。這樣折騰，陪同她的人不能再幹下去了，只好換人。這位同志回北京後，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向周總理、陳伯達彙報情況時，總理滿懷歉意地對這位同志說：「你受委屈了。劉叔晏同志她這個人哪，腦子不是少根弦，而是多根弦。她身體不好，你就多擔待些吧。」總理是借用當時流行的一個叫《南京路上好八連》的話劇裏的一句話來安慰這位同志。

（七）悲慘的結局

1970年廬山會議後，陳伯達出了問題，倒台了。劉叔晏也隨之受到影響，在山東被開除黨籍，下放到一個工廠去勞動。

1981年陳伯達被公開判刑後，為了不株連劉叔晏，陳伯達上書一封，將劉在「文革」初期整某某專案的錯誤責任，全由自己負責，以解脫劉叔晏的責任。這樣中紀委網開一面，經過重新審理，劉叔晏得

到了平反，恢復了黨籍和行政待遇，被安排到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離休。劉叔晏能夠得到這一正確處理，恐怕和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的鄧穎超大姐不無關係。

1981年7月，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不久劉叔晏也回到了北京。在這期間，劉叔晏曾企圖想與陳伯達破鏡重圓，但被陳拒絕了。子女都已各得其所，劉一人獨居，生活十分寂寞無聊，想找一個伴侶。她也曾企圖與在外地的一位幾十年前的舊友和好，兩人相約只見了一面，對方再也不與她聯繫了，劉只好作罷。

1993年4月24日晚上，劉叔晏突然得了重病，去北大醫院，經醫生診斷為左腦梗塞，需要住院治療。但是沒有床位，只好在急診室等候。25日下午4點被轉到德勝門外醫院。王文耀、郝志敏去看望，見劉住在病房的三層一個四人間裏，情況還好，劉說話也較為清楚。

第二天即4月26日上午，王保春、史鳳岐等去德外醫院看望時，情況發生了變化。見到醫院將劉叔晏的病床推放在樓梯口的走廊裏，說是因為她精神不正常，吵鬧得厲害，同房病人不願與她在同住一個病房。王、史商量決定給東直門醫院的老熟人（時任該醫院黨委書記）聯繫請他幫忙，那裏條件好些，可以住單間。可是，劉只住了一天就不住了，要回家。回家後病重無人照看，又去住在305醫院。住了沒有多久，又給轉到西霸河的中國傳統醫學研究所附屬醫院（一個小醫院）。

6月13日上午王保春、高秀霞、王文耀一起騎車去西霸河看望劉叔晏。從表面看劉還好，說話還算清楚，就是人沒有精神，也不鬧騰了，可能是給服用了一種甚麼藥物，使其安靜下去。

1993年9月份王保春、王文耀又去看望過劉叔晏，她的病情沒有好轉，看來恢復有困難，精神狀態不好，很可憐。

到了11月底的一天，劉叔晏的兒子打電話說，西霸河醫院已經搬

遷。由於劉的單位沒有支付劉的住院費，全樓已空，就他母親一人住着，沒有暖氣，停水、停電，凍得她每天抱着被子坐在床上。我們知道後，郝志敏將這一情況，告訴了已離休的原中宣部辦公室主任姚黎民。老姚生氣地說：「怎麼這樣對待一個老同志呢？小郝，我給你個電話號碼，你給他們打個電話！」有關單位這才給辦了個手續，並決定給劉轉院。當我們到西霸河醫院劉叔晏住的病房，看到生着一個小蜂窩煤爐子，地上一大堆爐灰，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蠟燭，桌面上一層灰土，劉在床上凍得直哆嗦。我們和有關單位的同志一起將劉轉送到回龍觀醫院。到那已是快12點鐘了，確定床位後，醫院給她送來半杯涼牛奶、兩個小花卷、半碗炒油菜，這就是劉的中午飯。

1993年年底，王保春、王文耀又去回龍觀醫院看望劉叔晏。這時的劉叔晏，已經大變樣了，雙眼呆滯，已經不怎麼認識人了。我們為她帶去的糕點，她接過去就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她於1996年6月16日在這個醫院裏去世了。我們和她的子女，將其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

陳伯達與軍隊人員的交往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知道陳伯達很少和軍隊裏的人員來往。據我們所知，只見過國防科委的張震寰、羅舜初、韓光和他有些來往，因為那時陳伯達抓科技工作，張震寰又是他在馬列學院時的學生，所以張見到陳伯達時還叫他陳教員。還有就是1966年春節期間，陳伯達在上海，舊曆大年初二，他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陳丕顯、曹荻秋等一大幫領導，出動了好幾輛小汽車，浩浩蕩蕩地去蘇州看望林彪。再就是中央在上海召開有關羅瑞卿問題的會議時，有次在散會以後別人都離開了會場，葉群把陳伯達留在會議室裏長談一次。除此之外，再未見過陳和部隊的同志有接觸。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以後，陳伯達住進了釣魚台，葉群常到「中央文革」開會和去江青那裏，她有時就順便到陳伯達住的十五號樓來看看、閒談一陣，陳也對我們說葉群和他是老鄉，都是福建人，鄉親情嘛。去了兩次以後，葉群發現陳伯達以前給別人寫的字畫，被紅衛兵抄出來後送回來堆在陳的辦公室裏，葉群便對陳說：「呀！伯達同志，這麼好的字，送我吧！」陳笑笑說：「這是以前給別人寫的，喜歡你就拿去吧！」就這樣，葉群把收回來的「天馬行空」的橫幅等字畫，去掉原寫的別人的名字，換寫上林彪的名字給拿走了。

有次葉群對陳伯達說：「伯達同志呀，林彪同志可喜歡您的字

啦，上回拿去的那些字，他一看就讚不絕口，特別是那幅『天馬行空』，掛在他的房間裏天天看幾遍。」經葉群這麼一說，陳伯達的心裏美滋滋的。葉群要陳伯達給她現寫，陳拒絕了，他說，寫字也要有環境和激情、靈感，現在不行。但他把紅衛兵收回來的字，都給葉群看了，葉群也真不客氣，所有收回來的字畫她都要。因此，陳伯達就讓工作人員把題在字畫上別人的名字都給去掉了。這樣，葉群常來要陳的字畫。「文化大革命」中收回來的陳伯達在「文革」前給別人寫的字，多數都被葉群拿去了。

這是「文革」初期陳伯達與葉群之間的往來，大體上到了1967年、1968年間，陳伯達與江青的矛盾不斷，陳伯達經常受到江青的攻擊，同時，陳伯達也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工作極不順利。這期間，葉群除在會議上和陳見面外，從不到陳伯達的十五號樓來了，有時江青在會議上攻擊陳伯達，葉群也附和江青幾句，可能是投機，也可能是避嫌吧！

1968年10月以後，大約是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要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葉群又開始與陳伯達來往了。在中央決定要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時，陳伯達給林彪、葉群送過他自己過去寫的一些反修小冊子，以示他寫作時的速度和文字水平。同時在寫作過程中，陳伯達和葉群常電話往來。陳伯達向葉群說：寫文章是很苦的事，比打仗還難呀，打一個戰役都沒有這樣苦。葉群聽陳伯達叫苦，便問他喜歡吃甚麼，陳伯達說：「我喜歡吃海味。」於是，葉群就多次讓人捎帶給陳伯達海魚、陽澄湖的活蟹等，還送了一隻東北的熊掌。

「九大」報告稿被否定後，葉群來電話安慰陳伯達要注意身體，別太生氣，葉群說：「林彪同志講，他們寫的那個也就是個一般應景性的文章。」隨後，還給陳送過一兩次海魚。

陳伯達請客吃飯

1970年5月間，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陳伯達的新居基本上修繕完畢了，我們倆在緊張地為其佈局設施和整理大量書籍上架（陳伯達的房裏約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存放圖書的），由繆俊勝秘書陪陳在中南海北門外邊的養蜂夾道幹部俱樂部游泳池暫住、辦公。

5月底一天中午，繆俊勝電話告訴我們說：「首長晚上要請客吃飯，讓你們過來一個人值班，我好作作籌備工作。」

下午，王文耀就去養蜂夾道見陳伯達，陳對文耀說：「我每次到『京西』開會都在軍委辦事組他們那兒吃飯，今天我請他們來吃頓便飯吧，已告訴小繆在準備。」文耀說：「那好哇，我還從沒見過你請別人吃過飯呢。」陳笑笑說：「嗨，他們來隨便坐一坐……」於是文耀在辦公室裏值班聽電話、收發文件，繆俊勝和護士小丁他們借餐具、排菜單、選調電影片子，忙個不亦樂乎。

大約晚上6點多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他們一起來了，都到陳伯達的房裏，和陳伯達一起有說有笑。文耀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沒有和他們見面，但聽到好像葉群是最後來的。坐了一會兒，他們就去餐廳吃飯了。

吃完飯以後，一大群又回到陳伯達的辦公室裏。他們談笑風生，使得平時安靜的辦公室顯得熱鬧非凡。陳伯達特別高興，在送他們甚麼禮品。文耀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聽見邱會作高聲地說：「伯達同

志，你要一視同仁呀，給我也要寫個字嘛！」陳伯達說：「好好好，都一樣。」不知是誰通知說電影準備好了，他們便都到會議室看電影去了。

辦公室恢復了寧靜。這時，王文耀好奇地到陳伯達的辦公室看了一看，原來是陳伯達送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每人一本線裝書，放在陳伯達自己的辦公桌上。封裏由陳伯達當場用毛筆寫着：「送給永勝同志 陳伯達。」其他幾個人也都是一樣的題字。

那天，繆俊勝為他們安排了兩部國產舊片子，一部是《林海雪原》，一部是《自有後來人》。看完電影大約已是夜裏12點多鐘了，他們走時，沒有忘記讓秘書將陳伯達贈送他們的禮品取走。

紀念列寧誕辰一百週年的文稿被槍斃

陳伯達幾年來一直做不成事很是苦悶，如寫的國際時事論評，江青當着大家的面說你寫那個不「精彩」傷了他的自尊，沒有拿出來討論，被扔到一邊了；「九大」政治報告稿被張春橋說成是「唯生產力論」被否定了；搞教育改革，讓政研室出了個不定期「教育探索」刊物，提倡啟發式教學，出了幾期送中央參考，後來被上海的張春橋搞教改所代替；自己到天津去搞工廠調查，主張在打破舊的章程後，重新建立新的規章制度，以發展生產，又被江青、張春橋說成是「不在北京卻偷偷地到天津去復舊」；想參加憲法的修改工作吧，由於大家「照顧」未能入組（憲法修改小組）。整天無事可做，苦不堪言。

1970年初，正逢列寧誕辰一百週年，陳伯達想借此機會做些事，便向黨報、黨刊佈置了寫紀念文章。同時他自己也準備用心寫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我們看他確實是經過精心構思後，認真地寫了，題目叫〈列寧主義的歷史使命〉。

大家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人民日報》的那篇先脫稿呈送毛主席審閱。主席4月3日看後，刪去了「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毛澤東同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等頌揚他的話。主席並且在這篇稿子上批着很嚴厲的話：「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

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同志研究一下。」

陳伯達因為自己名義上是管宣傳口的，就把這些責任都攬了下來，4月4日他向周總理、康生說毛主席提出的批評，主要由他負責，他建議在中央範圍內開一次會，學習研究主席的指示。總理考慮得比較周全，說先將主席的批示在小範圍內傳閱以後再說。

最後中央決定，發表了《人民日報》起草的那篇題目叫作〈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而陳伯達起草的那篇題為〈列寧主義的歷史使命〉討論時卻被認為不合時宜，而被否定了。緊張地忙乎了一陣沒有弄成，又失敗了。

我們在他身邊，看到他一次次的不成功，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他低聲說：「主席現在不大喜歡我的文章了。」陳伯達無奈，只好在我們面前自己安慰自己地說：「沒有發表就沒有發表吧。列寧也曾經有一些文章（他講了文章的題目，我們記不得了）當時也因種種原因而沒有發表，但是多少年之後，那些文章成了他的經典著作了。」言下之意，也就是若干年以後，他的這篇文章也許成為他的經典之作。

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

黨的「九大」以後，毛主席提出進入鬥批改階段，陳伯達覺得經過了一場運動，就應該大抓生產了。他對運動毫無興趣，中央也沒有給他甚麼新的工作任務，每天無事可做，他也不願意呆在北京。在一次會議之後，他鼓起勇氣向主席請示，說他想去外地走走，看看運動之後改革的情況，特別是生產情況。主席同意了他出去的請求。陳伯達很高興，便立即又請示了周恩來總理，並且和總理兩人一起研究了自己外出的路線等。當時計劃先到天津，然後到河北的石家莊，這些地方都是文革期間屬陳伯達分管的地方。

陳伯達只要一被批准去外地，心情就顯得特別高興愉快。他似乎一下子就恢復了「文革」前他做工業調查時那股勁頭上去了。他對我們說，他要外出做一些工業、教改方面的調查研究。所以讓通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堂，並讓他再帶兩個人即張作耀、徐兵同去。他身邊隨行的是王文耀和保健護士小丁。

出行的第一站是天津，這是他常來的地方。市領導這次很熱情地安排陳伯達住到天津市郊新建的招待所裏為主席準備的一號樓。這新房子環境好，居室高大明亮寬敞。陳伯達不習慣，住了幾天，他從山海關調查返回之後，又搬到他過去來天津常住的市區——常德道去了。

(一) 第一個興奮點——找造大船的碼頭

到天津的第二天，在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及革委會副主任、66軍軍長劉政等人的陪同下，陳伯達參觀了不少的工廠、學校，重點是了解工業生產方面的情況。他對造船業也很感興趣，去塘沽港參觀了解造船工業的生產情況時，他向工人提出，我們能不能發展得更快些，造更大些的船？工人說有困難，由於這裏港小、水淺，停船舶位小，不能進港停泊更大的油輪，也不能建造幾10萬噸的大船，這樣就在根本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這時有個工人向陳伯達講：「有可以停大泊位船的地方，造幾10萬噸大船都可以。那就是山海關的老龍頭。那裏的水很深，是可以建造停泊大船的港口。」陳聽了這話很高興，他興致勃勃地問那位工人：「能停5萬噸？」工人說：「能。」陳說：「停10萬噸呢？」工人很輕鬆地說：「能。」陳便緊接着問：「那20萬噸呢？」工人師傅稍加思索地回答：「30萬噸都沒有問題。」陳伯達又緊跟着問那個工人說：「那你說50萬噸呢？」工人回答說：「我看可以，那裏水很深呀！」陳伯達很高興地說：「那好，咱一起去看看去。」就這樣我們一同坐車去了山海關的老龍頭。

我們坐汽車到了山海關，在距老龍頭不遠的地方下了車。那天天氣不太好，陰天，風很大，陳伯達和隨同去的幾個人，沿着大海邊的沙灘，迎着呼嘯的海風，走到老龍頭。大風捲起飛濺的浪花，把我們的全身都打濕了。陳伯達專心致志，似乎沒有感覺。他的耳朵幾乎貼到那位向他解說的同志嘴邊了。邊走邊聽解說，那位同志則不斷地用手指向大海的某個位置。王文耀緊隨其後，想聽幾句，但怎麼也聽不清楚他在說些甚麼。總之，知道他在說哪個位置水有多麼深，能飄浮起多少噸的大船，陳伯達是越聽越起勁。海風吹着，海浪像開了鍋似的翻滾着。看完之後，我們又返回到天津。獲悉這個意外的消息之後，

陳伯達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心情，馬上給葉群打電話，說了這件事。回京後，陳伯達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給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寫了報告，說我們有了這樣的深水碼頭，就可以停泊大船，也可以建造大船了。

可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在江西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就「翻船」了。這時，林彪為了洗刷自己，劃清界限，首先批判說：陳伯達盡是胡說八道，沒有科學根據，世界上就根本沒有那麼大的船。從此，陳伯達這個想找造大船碼頭的想法，就成了被批判的材料和笑話。

其實我們當時也從報紙上注意到，日本也只有30萬噸的油輪。

（二）調劑一下生活

陳伯達平時生活單調無聊，沒有甚麼文娛愛好。誰隨他出差都感到枯燥無味。他除去工廠、農村調查外，整天在屋裏思考，或去古舊書店看書，偶爾出去散散步。晚上有時一個人在屋裏，大聲用別人聽不懂的福建閩南口音，拉着長音，忽高忽低地背誦古文，不了解的人聽了，還以為他有甚麼不順心的事，想不開在哭呢！有次在一個招待所裏，深夜一個人在屋裏背起了古文，一位不了解陳伯達習慣的女服務員，突然聽見陳伯達在屋裏朗讀的聲音，便急忙跑去找隨陳出差的老馬：「馬處長馬處長，快去看，首長怎麼在房裏哭了？」兩人跑到陳的房門口一聽，老馬笑了，小聲對服務員說：「沒事，首長在讀書哪。」

陳伯達在天津期間，保春想藉給陳送文件的機會調劑一下陳的這種枯燥的生活，便將陳伯達平時最喜愛的，孤單一人（由保姆看着）在家的小兒子帶去天津，為了使他在路上有個伴，又叫上了兩個其他同志的孩子。三個孩子年齡也就在10歲左右。事先沒有給陳伯達說，到了天津市委招待所之後，保春先讓陳的兒子走近陳的辦公室。陳伯

達正在思考問題，一抬頭看見自己的兒子站在眼前，愣了一下，便驚訝地說：「咦！你怎麼來了？！」說着看見保春也進門了，便知道是保春帶來的。他高興地拉着孩子的手到沙發前，摟着孩子坐下來，親熱了一陣。保春彙報工作之後，也解釋了順便帶孩子來看看他，讓他放鬆放鬆的想法。陳聽了非常高興地反覆對保春說：「你這樣做很好很好，帶他們來在這玩玩很好……。」

父子相見，一起吃飯、說話，陳非常愉快地度過了一天。孩子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保春就帶孩子們回京了。

（三）為天津鋼鐵廠找礦源

陳伯達在天津還視察了天津鋼鐵廠，參觀了廠裏的生產情況，召開了幾次座談會。得知這裏最大的問題是原材料不足，鐵礦石十分緊張，這時他就一直想着礦源問題，覺得這是關係到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便找來天津有關同志座談研究如何盡快解決。幾天之後，陳伯達決定帶天津的同志到河北去。為了快，他說坐飛機去。王文耀打電話告訴了在北京的王保春。

王保春知道之後，作了安排，便於7月3日要了飛機，當天就從北京的西郊機場起飛，到天津接陳伯達以及解學恭、劉政等領導同志，帶着在天津研究而未解決的問題，一起去河北繼續調查研究。

陳伯達一行到了河北省的石家莊市，由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等同志到機場迎接，並安排了住宿。

（四）首先到滹沱河灘看舊友

陳伯達到石家莊的當天，首先到駐石家莊市郊滹沱河灘上的《紅

旗》雜誌社幹校，去看望那裏的學員。看看他們的食堂、生活住地和勞動場所並參加了勞動。在那裏陳和學員們席地而坐，開會講話，這些人都是他熟悉的，和自己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陳說，他們當了官，有些脫離群衆、脫離勞動，現在到了第一線要注意學習，改造世界觀等等。本來他想見見在幹校接受監督勞動的鄧力群、胡繩，軍宣隊、勤務組的負責人說不大方便，婉言勸阻了，陳也沒有堅持。陳伯達在單獨和負責幹校工作的軍宣隊的張政委等詳細了解詢問學員們的生活情況時說：他們這些人都是些讀書人，晚上就不要給他們安排甚麼活動了，由他們自己安排就行了，願意讀書就讓他們去讀書。他還說：他們大部份人都是南方人，愛吃大米，可以適當增加些大米，以後自己也可以安排種一些嘛！說了許多對學員們生活十分關心的話。



1970年初，陳伯達第二次華北之行去《紅旗》五七幹校。

（五）打算建立華北經濟協作區

7月3日陳伯達到石家莊之後，他對李雪峰、劉子厚同志說：「我和天津的兩位同志是來你們這裏學習的，是向你們求援的，也是想和你們研究些經濟發展問題。聽說石家莊68、69這兩年經濟等各方面都還不錯。你們這個城市不算小了，在鄉下人看起來是大城市了。南京是大城市，城牆都拆了嘛，其實拆了幹甚麼？！石家莊現在有80萬人了吧，算是一個標準城市。城市人口就是要控制在80萬人左右，着重發展中、小城鎮和鄉村。最主要是搞技術革新。」陳伯達還說：我建議從天津到保定或者從天津到石家莊修條鐵路，以便減輕東北入關的客流和貨運繞道北京，這給北京造成不小壓力。另外他還問：你們這裏最早的化工廠還在不在？還有鐵路工廠嗎？工人階級的創造性是無限的，要為他們創造條件，條件不成熟是提不出問題的，能提出問題就能解決問題。對新生事物要支持，幫助，像小孩生長一樣，起初自己不會拉屎，要人幫忙，逐步成長，逐步成熟。

陳伯達到石家莊來起初是為天津鋼廠找礦源的。經過幾天到工廠、學校、農村調查，連同在天津的調查就形成了一種新想法。他和河北省的領導李雪峰以及部隊的領導同志（革命委員會裏都有當地的駐軍參加）商談了整個華北地區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協作發展的問題。

7月4日陳伯達在自己的住地向李雪峰、劉子厚等同志談話時再次提出：「我想津、石鐵路的建設你們可以考慮一下，這對經濟發展很重要。同時還可以研究一下津、唐、石的經濟協作問題。」陳伯達說：「1947年我來過石家莊，參觀了幾個工廠，德國辦的焦化廠，鐵路大廠。當時那裏有個工程師（搞化學冶煉的），現在還在不在？（答：62年高血壓已經死了。）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產品品種很多、很

好。但是我們不能走他們走過的老路，在人家的後面趕人家四、五、六十年代的水平。我們一定要借鑒他們最新的技術。我們要趕超世界上科學技術最先進水平，辦法那就是多、快、好、省四個字。」

這天下午參觀國棉廠時，廠負責人向陳介紹說產量提高了。陳說：還要提高質量，數量和質量是相對的，在追求質量的基礎上追求數量。他看到廠裏正在用蒸氣機試驗新技術時，說，能不能試驗用電子技術呢？電子的前途是很廣闊的。

陳伯達對一起參觀的李雪峰等同志說：「我看要搞津、唐協作，天津離不開河北，河北也離不開天津。1958年主席提出建立各有特點的經濟體系，後來受到干擾。現在要恢復這個革命的口號，革命的方針。」

陳伯達原計劃只到天津和石家莊，可是一談生產和經濟協作，便擴大到整個華北地區。他提出去「太鋼」參觀調查，隨即決定坐火車去太原。這樣一來隨着同行的領導同志也就多了起來。

我們向鐵道部專運局要了公務車。這輛專列車，只有三、四節車廂，同行的連同管理人員約有二、三十人。離開石家莊時，由於李雪峰有事，就沒有同行，約定10號在大同會面。

7月6日，我們到了太原車站，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等山西省領導同志到車站迎接，並且安排了陳伯達等住在市郊的晉祠賓館。謝振華與陳伯達較熟，過去似有過師生之誼。

在太原，陳一行與山西省革委會、駐地部隊領導同志一起參觀了太原鋼鐵廠、太原重型機器工廠等工廠及幾所學校，然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研究工業生產和經濟發展問題。由於當時地方的工作都有駐地部隊參與，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統管華北地區駐軍，但他沒有參加座談會。陳伯達決定到大同煤礦時，讓我們電話通知鄭維山，請他也去大同。這樣鄭維山便臨時從北京坐伊爾14飛機先到大同等候我們。

我們從太原坐公務專列車去大同。途經金沙灘時，隨車同行的軍隊同志向陳伯達介紹說，著名的古代戰場——金沙灘到了，要不要下去看看？提起「古董」，陳伯達興致很濃，說沒有車站怎麼能下？部隊同志說，咱們是公務車可以隨時隨地停車。現在車前車後都沒有車來。陳同意下車去看看。這時已近黃昏，太陽即將落山，我們車停人下。外邊光線雖然較暗，但能看到這壯觀的茫茫荒野。陳伯達站在金沙灘上，興致勃勃地欣賞和談論着古代在此打仗的情景。隨即王文耀給拍了幾張照片。有幾位部隊的領導同志指着一座不遠的山說：「那就是平型關呐，是抗戰時林副主席指揮打仗的地方，看就在那！離得很近。」問陳去不去看，陳伯達說太晚了，不去了。在金沙灘的荒野裏，談論、欣賞了約十幾分鐘後，就上車繼續前行了。

7月10日上午，李雪峰從石家莊乘飛機到大同和陳伯達會合。在大同，陳伯達、李雪峰和鄭維山等談了情況，和當地的領導開了座談會，然後到了礦區視察，並和大家一起下到採煤的深井，參觀調查工人的生產情況。我們坐着狹窄的豎井電梯，直下到幾百米深處，然後又彎腰步行幾十米滿是支架的狹窄坑道，頂上還不停地滴嗒着水，陳伯達在前邊領頭走，中途坐下休息時，陳笑着對李雪峰說：「對不起呀，把你給拖垮了吧？」雪峰說：「不要緊，不要緊，我沒事。」接着，直走到採煤的掌子面上，看工人生產並和他們交談。

王文耀是第一次下這樣深的礦井。他走到掌子面裏往回一看，儘管有星星點點的燈光，但總是一個低矮的黑洞洞，給人一種壓抑的恐怖感覺。他想把這情景留下來，便拿起手中的相機對着陳伯達、李雪峰等人一按快門，「啪」一道閃光，隨同去的軍區同志嚇了一跳，立即告訴文耀不能再照，怕引起瓦斯爆炸。

在大同又順便去了雲崗石窟，在那裏看到來往的拉煤車輛很多，簡直是煙塵滿天。那些在道路一旁的大小精雕細刻的佛像，都落了厚

厚的一層細土和煤灰。陳伯達看到這種情景，心痛地對陪同者說：「文物都撲成這個樣子了，能不能想辦法保護一下呢？這樣時間長了會毀壞的呀！」他走進石窟看了一圈，出來時還對當地的領導講了要保護這些文物的話。

在沿途的調查研究中，得知包頭的鐵礦最為豐富，隨後陳伯達從大同又到了包頭。主要是去考察包頭鋼鐵廠和包鋼的礦石基地。在那裏他們進行了座談，看到包鋼的生產不錯。陳伯達很興奮，覺得自己經過幾處的調查，建立華北生產經濟聯合體的想法已經形成。這時他打電話給在北京的余秋里，請他到包頭來一起商量工業生產方面的問題。余秋里在電話裏表示同意來包頭，並且說：「那我得向總理請個假，馬上就來。」余秋里很快在當天中午就到了包頭。陳伯達知道余秋里已經到了很高興，馬上就讓王保春去看望余秋里。

保春去了余秋里的住所，看到他和鄭維山兩個人在吃午飯。他們戰友相見特別高興，軍人的豪放氣概，他們一見面就喝上了。保春見他倆喝的紅頭漲腦，便高興地告訴余秋里陳讓他代表他歡迎秋里的到來，並說，伯達請秋里同志先休息一下，洗洗塵，下午和他一起座談有關華北經濟協作等問題。

陳伯達為甚麼請余秋里來，我們想余秋里是中央小計委主任，陳伯達是副主任，他只提出建議、方案和余秋里商定以後，由余秋里和陳一起，報告總理定下以後去實施。

（六）小型經濟協作研討會

1970年7月14日在包頭，開了個小型的經濟協作研討會。因為在參觀調查過程中，大家已交換了意見，所以會上幾位領導同志，只是擺了一下情況，沒作甚麼結論。我們則做了些簡單的記錄。

陳伯達：毛主席選石家莊作為省會，是很有道理的，它不僅僅是河北的中心，而且是個戰略中心，是軍事重地，也是交通樞紐，位置很重要。石家莊要搞好，要搞協作，要同山西、內蒙古協作。搞經濟協作，是否可由雪峰同志牽頭搞，我徵求過解學恭同志的意見，他也說雪峰同志是華北局書記嘛。

李雪峰：中央直接抓，首都牽頭搞，我們積極協助。

陳伯達：大家都應有首都觀點，你們人傑地靈。要打破條條（特別是冶金、煤炭），這都是歷史的概念了。由鄭維山同志作後台，你們輪流坐莊。石家莊經濟情況一直是很好，科學技術搞得也不錯，無梭織布，道理上也是說得通的。

李雪峰：石家莊發電廠搞得好了。

陳伯達：那我們還沒有看看嘛。

李雪峰：回去再看呀。

余秋里：科學的東西在沒有識破時，很是奧妙，一識破後，很簡單。

陳伯達：有兩大發明，東北的高壓作業；石家莊的電廠改革。

徐信：包頭仍處於落後狀態。前些年亂得很，鬧賠款，砸銀行，所謂停工為了備戰，備戰必須停工。所以不得不於1969年12月決定全面實行軍管，才穩定了。

包頭1966年最高工業產值12億多元。現在四個平爐一塊生產，只有七天，經常是開一個兩個平爐。還沒有把隊伍帶出來。包鋼的老工人都靠邊站了。

目前綜合利用有三個單位：試驗廠、704、8861。如果要把1,200萬噸礦石綜合利用起來，就能提煉七種產品，產

值可以達到1,000億元，比美國全國的稀有金屬都多。

包鋼有4,000多名合同工，都到期了，人們都叫他「老合同」。

鼓風機是最高的難點。

無縫鋼管廠要上，設備丟了一部份。

10,000製氧機，缺透瓶。

銅、鋁管子等材料少。

要上化工、有機玻璃，塑料少，設備可以自己做。

鐵路要擴建，鋪雙軌，軌沒有問題。

包頭1969年產值9億元。

鄭維山：內蒙古工業是個配套問題。整個內蒙古沒有化肥廠。小卓子山水泥廠，建廠12年，2,000人吃飯，人無廁所，豬無圈。

去年調進糧食7億斤。今年爭取自給，計劃45億，可能達到47-48億。

巴盟水利只灌不排。去年90%的地沒翻，包頭郊區水澆地佔30%，大水漫灌每畝地400立方米水。

耕地2,500萬畝，水澆地1,200畝，人均2畝水澆地。

余秋里：（談了全國工業的資源品種之後）

華北只要略加扶植，不次於東北。

大東西在山西，天津本事大。

河北的經驗值得總結，去年裝備4萬多眼井。

華北地處反修、防修前沿。

要組織，經濟協作區一定要組織。協作得好，可以發揮質的變化。但是要解決幾個問題：必須破除條條專政。不破除條條，地方的作用就不能發揮。

不可能萬能。一個部，一個地區都不能萬能。

工業沒有一定的界限。綜合利用，主業就會變成副業。

北京酒廠生產農藥，一斤可用20畝地。從酒糟、麩子裏提煉的。這樣一廠就變多廠，利用氫氣還可以搞出高科技用的多晶硅，產值9,000萬元（汾酒廠綜合利用一年交利潤1億多元）。

農業河西的地澆一茬水一畝可以多產100斤，二茬可多產200斤，三茬可多產300斤，五茬每畝就可以多產500斤。

在包頭大家談得很愉快，陳伯達也很高興，他不但看了包鋼的生產，還到包鋼的鐵礦基地——白雲鄂博的露天鐵礦區參觀調查。白雲鄂博在蒙古語裏是「寶山」的意思。這個礦確實是個寶地，礦的儲量是很大、很富，而且是個富含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屬的大礦，陳伯達對於能製造發展尖端工業的金屬格外關心，他反覆關照工業部門要精心冶煉不得浪費。這裏遍地都可以看到鐵鏽色的礦點。地上星星點點地長着有一兩尺高的白色「鐵花」草，這是我們以前沒有見過的。聽別人介紹說，哪裏長出這種草，就說明哪裏有鐵礦。這種花確實很特別，不見有葉子，但開着滿枝條的小白花，而且這種花永不凋謝。我們採了些帶回北京，在家裏放了一年多也不凋謝脫落。

(七) 一個小小的軍事演習

這次跟隨陳伯達調查、參觀的同志，除了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以外，還有北京軍區和省、市軍區及駐軍的負責人。那時的口號叫做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我們看了許多地方工業生產的情況，研討了經濟協作，但是這些都是地方上的工作。部隊同志也想讓陳伯

達知道部隊的成績，便向陳提出是否也看看他們的戰備情況。陳伯達同意接見了駐地部隊的幹部，根據當時中蘇兩國關係緊張的情況，陳向他們講要高度警惕，防備蘇軍入侵。當部隊同志提出請陳伯達觀看軍事演習時，我們看出陳有些猶豫，但最後還是表示可以看一番小規模的表演。

駐地部隊已經做好了準備，陳伯達就驅車到大青山腳下的中蒙邊境地區，觀看了很小規模的軍事演習。

這一天天氣很好，萬里無雲空氣清新。幾輛軍用小車顛簸在大青山腳下崎嶇不平的茫茫草原上，行駛了好久來到一個高地上。這是觀看軍事演習的小山頂，從這裏可以俯視整個草原全貌。陳伯達和大家一起，站在山頂觀看。部隊的領導同志向部隊一聲令下軍事演習開始了。司令員也邊指揮部隊，邊向陳伯達解說。

我們看了一場精彩的軍事演習。表演結束後，大家都很興奮。陳伯達也很高興，當場向駐地官兵說了些讚美的話。鼓勵他們再接再厲，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主席的戰略戰術，不斷提高軍事技術。

山下不遠處，就是著名的百靈廟。當地領導問陳伯達是否下山去百靈廟看看？已經有些疲憊的陳伯達說不去了。就此下山回到駐地。

到包頭兩天以後，陳伯達就和周總理通了電話，簡單彙報了他外出的情況，同時，總理也通知陳伯達說中央準備近期開會，望他盡快回京。因此，陳伯達等在內蒙古做了短期調查之後，於7月16日返回了北京。

大約回北京後不久，陳伯達向毛主席及中央常委寫了簡要的彙報，還沒有作詳細彙報，接着就上了廬山。在廬山中央的會議開幕的第三天，會沒開完，陳伯達就「翻車」了。

這就是陳伯達從1970年6月底至7月中旬近半個月的所謂第二次華北之行。

(八) 陳伯達的活動日程〔部份〕

1970年7月3日

上午：同李雪峰、劉子厚談話。

陳：石家莊不錯，人口有80萬了。城市人口就要控制在80萬人左右。主要是搞技術革新。將來不管怎樣改革，要實行工人、知識分子、幹部的三結合。

下午：去《紅旗》雜誌社幹校看望學員。

7月4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雪峰等談話。

陳：建議省革委會增加一名38軍的副主任（答：已有一名）我知道。再增加一個嘛。借鑒德國技術，趕超世界科技水平。



1970年陳伯達到石家莊《紅旗》雜誌五七幹校視察。

下午：參觀第六中學，邊走邊談。參觀國棉廠談話。

陳：數量和質量是相對的，在追求質量的基礎上求數量。要搞津、唐協作。要搞各有特色的經濟體系。

7月10日

下午：參觀煤礦下礦井。（峪口32礦，從5時至9時）參觀割煤機（遙控）。

7月11日

1時左右：到包頭，下午接見63軍負責人，參觀造船廠；在黃河坐船片刻。

7月12日

上午：參觀202廠，1、2、4、12、13車間。

下午：參觀包鋼高爐（1513）、煉鋼、初軋、軋樑、試驗廠。

7月13日

上午：聽包鋼彙報，看樣品。下午參觀一中，陳談話：石家莊有的學校不錯，北京一中教學不錯，你們可以搞對口教學競賽嘛，你們都是小孩子，重勞動不行，北京一中搞了電子學，勞動雖輕，但提高智慧。中學生腦子很靈活，敏感，領會得很快。但不要驕傲。

下午：參觀精膠廠；大廟大隊。

7月14日

上午：談經濟協作問題。

下午：接見包頭全體幹部。

我們來是學習的，到包頭來了幾天，形勢大好。你們做了不少工作很辛苦，希望你們取得更大勝利。

7月15日

去百靈廟的14號高地，參觀工事，看演習，接見563團，去白雲鄂博看礦。

7月16日

晨：乘火車到畢克齊機場。2點15分起飛，3點5分到北京西苑機場。

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也是我們國家元首

1970年8月13日晚上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康生主持召開了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議。會上就憲法草案中的文字修改，張春橋和吳法憲發生爭執。張春橋以毛主席會見外賓時說「天才地、創造性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諷刺」為根據，提議將憲法草案中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以及「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等文字統統刪去。吳法憲聽了以後，起來激烈反駁，說到激動時，吳法憲拍着桌子高聲地說：「我們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

張、吳激烈爭論時，可巧陳伯達上了廁所，等他回到會議室時，已經休戰無聲。不久，康生宣佈散會了。陳伯達不知道剛才發生了甚麼事情，大家都走了，他還犯愣。吳法憲正好也想將剛才發生的一幕告訴陳伯達，兩人很自然的留在最後，因為時間太晚了，不便在會議室裏長談，兩人就小聲相約到陳宅去細談。

那天夜裏大約12點鐘以後，散會後的懷仁堂大門外已沒有幾輛汽車，顯得特別安靜。王文耀隨陳伯達坐車回家，汽車沿海邊馬路直向北駛去，出中南海北門過了北海大橋。坐在車上的陳伯達不時地向後車窗看，文耀覺得陳有點怪，便問他看甚麼，陳說：看後邊有汽車沒有。文耀說：有隨車（警衛車），陳伯達說：「不，還有個車。」文耀再一看說：「是的，還有輛車。」但沒有好再問陳是誰的車。

車到景山後街，快到米糧庫胡同時，陳又向後看，急切地問：「那輛車來了嗎？」文耀說來了，跟上來了。一進陳家大門，那輛車隨後也進來了，一下車原來是吳法憲。文耀在前面開門開燈，他倆陳前吳後地走進了陳的房間，文耀往外走時，聽見吳法憲一進門就急不可耐地說：「我今天放了一炮吧？」陳伯達高興地咯咯笑了。

文耀出來之後再沒有進陳的房間，但知道他們談得很開心。這次他們談得很晚，大約有一個小時。隨吳來的警衛員小劉給吳的秘書打電話告訴吳在陳家，秘書告訴小劉說，黃永勝有個會等吳去開，讓小劉注意提醒吳。

第二天一上班，陳伯達便讓我們給他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找出給他，而且還自言自語說：「奇怪，說毛主席是天才，怎麼是諷刺呢？這是否定十一中全會嗎！」

我們不知道他在說誰，看他不高興的樣子，也沒有敢問，書找出之後就放在陳伯達的床頭桌子上了。

後來，陳伯達又讓我們找蘇聯早期的報刊，他說：「雖然新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但是毛主席還是我們國家的元首，列寧當時不是蘇維埃國家主席，但還是稱列寧是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你找找蘇聯早期的報刊、斯大林的講話等，我記得是有這樣的提法的。」

我們打電話給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軍代表，請他們幫助找蘇聯早期的報刊，從裏邊找出有關這一提法的原文，並請他們標出後速送陳伯達辦公室。

時間不長，編譯局的同志們很快就把材料送來了。共送來兩批，都是早期的《真理報》和俄文雜誌。我們給陳伯達抱去看。陳伯達看了以後，非常高興地說：「你看，我記得不錯吧，是有嘛！金日成他是首長，還稱他是國家元首呢！」

「天才」語錄的結果

1970年廬山會議，林彪在會上大講毛主席是「天才」，引起大家的關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很重要，要求討論兩天，這樣就改變了會議原來的議程了。在華北組討論中，陳伯達作了發言。他突出重點的說毛主席是天才，反對者的意見會讓反革命分子聽了高興得手舞足蹈；汪東興也在會上作了言詞更為尖銳的發言：「誰反對毛主席是天才，把他揪出來！」散會後，吳法憲對陳伯達說：「我們有些馬列論『天才』的語錄，但不全，你是大秀才，幫我們再找一些吧。」

陳伯達聽了這個請求，在1970年8月23日（或24日）的晚上，從廬山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告訴政治研究室，找一些馬、恩、列、斯有關「天才」的論述，在電話裏先是繆俊勝跟我們講，然後陳伯達接過電話繼續講。陳伯達怕我們搞錯，又讓同他一起去工作的史敬堂、徐兵各講了一遍。

我們看見他如此重視，要得又那麼急，馬上就打電話找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宋士堂，請他當夜裏組織人，加班查閱馬、恩、列、斯著作中有關「天才」方面的論述，找出後標記出來並將原著一起送來。

大約在當天晚上的後半夜，宋士堂來電話說找好了。我們為了趕第二天中央辦公廳機要通訊的班機，就告訴宋士堂把書包好，寫上「陳伯達同志收」的字樣，然後直接送到中南海西門收發科。之後，我馬上打電話給中南海西門收發科，告之一會兒政研室送來一包材料

給首長，收到後，請當日班機送去，首長急需。這樣，我們就算圓滿地完成此事。

「九二」會議後，陳伯達倒霉而歸，他對我們說：「吳法憲他們急急火火地向我要馬、恩、列、斯論『天才』的語錄，說他們找得不全，我就讓你們找了並送去，但晚了，他們沒用上。我將你們寄去的語錄交給汪東興，請他打印五份（註：老汪說五份不行，政治局都給，印二十份），還沒發出去就出問題了。他們用的是自己找的語錄，而我託人找的語錄卻被主席用上了。」

陳伯達繼續說：「江青帶張春橋到主席那裏告狀以後，我受到了批評，我找主席談話，主席還對我說，『你看你把個會議搞成甚麼樣子了，怎麼辦?!』那時主席還比較和氣，可後來不知誰（註：可能是老汪）把我託老汪打印而未發出的語錄送給了毛主席，主席就生氣地在那份語錄上批了『我的一點意見』，從那以後，我多次想見毛主席，都被拒絕了。」

1978年我們被釋放後，去拜訪過李雪峰同志，談起廬山會議時「天才」語錄一事，告訴他，大家所用的「天才」語錄不是陳找的，李雪峰聽了，有些詫異並若有所思的小聲說：「噢，是這樣的？」

陳伯達權力最後的行使

1970年9月初，繆俊勝從廬山來電話，傳達陳伯達交辦了幾件事，這也可以說是陳在位期間最後交給工作人員去辦的幾件公事了。當時是王保春接的電話，接完電話後，王保春對王文耀說：「聽小繆講話，他的情緒不高，說話都沒有力氣了，他說首長犯了錯誤，不知犯了甚麼錯誤，他也沒有講。」接着王保春講了記下來的陳伯達交辦的事：

1、告訴《紅旗》幹校的宣傳隊，找胡繩談一次話，他沒有甚麼問題，可以解放他，讓他和大家一起勞動，對鄧力群先不着急，放一放。

2、告訴《人民日報》宣傳隊，找吳冷西談一次話，解放了他，叫吳冷西到報社幹校去和大家一塊勞動。

3、告訴政研室的宣傳隊，請他們研究一下，將政研室的人全部下放到農村、工廠去勞動。史敬堂回京以後，叫他帶着老婆回老家或下鄉勞動算了。

4、將陳伯達辦公室裏的軍委一號台的電話機拆除，沒有用、不要了。

另外，小繆還說，隨陳伯達上山工作的史敬堂、徐兵兩同志提前回京。並說陳特別交代，叫我們倆在家好好學習，不要亂跑惹禍。

接到這個電話後，我們都非常奇怪，心情也很沉重，不知出了甚

麼事。

對陳伯達交辦的幾件事，保春都一一落實了，他首先給《人民日報》的軍宣隊打了電話，將陳伯達說解放吳冷西的事說了一遍。然後他又去東城區沙灘，找《紅旗》雜誌社宣傳隊的張政委，談了解放胡繩的事。接着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找宋士堂談了陳伯達對政研室人員下一步安排的意見。

至於陳伯達交辦的第四件事，即拆除辦公室的軍委一號台的電話事，保春生氣的說：「電話礙甚麼事了，不拆！」文耀也同意不拆。

下了廬山的陳伯達

從60年代起，我們一直擔任陳伯達的秘書。1970年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倆未參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繆俊勝（當時也任陳伯達秘書）陪陳伯達去的。1970年9月7、8日，繆俊勝從廬山來電話，通知我們說陳伯達幾時幾分乘飛機回京，讓我們準備去接。

9月初的北京天氣不好。那天我們坐着老俞開的車，冒着瓢潑大雨去西郊機場接他們。

飛機降落之後，接的人都興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們也一樣，看到朱老總、董老他們先下飛機。陳伯達是最後下來的，他穿着灰色的夾大衣，表情灰溜溜的。他給同時下機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愛理不理的樣子。我們倆迎上前去引陳上了汽車，小繆坐在司機老俞旁邊，我們倆和陳坐在車的後排座上。

一上車，陳伯達就對我們說：「這下完了！」

小繆怕老俞聽到，便說：「哎呀！別說了，回家再說嘛！」

陳還是毫無顧忌地說：「政治上徹底完了！」

小繆又阻止說：「不要說了嘛，回家再說，回家再說吧！」

回到家後，陳伯達簡單說了山上發生的情況。然後，我們看了他帶回的文件中主席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也感到問題確實嚴重。

陳伯達對我們說，在主席寫〈我的一點意見〉之前，他找主席談過一次話（這也是他和主席最後一次談話），談得很好。

主席對陳伯達說：「你看你把個會議攬和成甚麼樣子了，怎麼辦？」陳說：「我下去，下基層去，當農民。」主席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過的幾個人談談，團結起來。」

陳伯達說：「這次談話，主席還談到吳冷西、胡繩，當時主席還一下子想不起胡繩的名字來了。主席說：『那個《人民日報》的吳冷西，還有那個……那個……就是《紅旗》雜誌社那個副總編輯……。』『我說是胡繩吧！』主席說：『對知識分子應該寬容一些嘛！』我告訴主席，他們現在都在幹校勞動。主席說：『對文人應該寬容一些，還可以讓他們工作嘛。』」陳對我們說：「我不是當時就讓小繆打電話告訴你們，通知他們回來嗎！」

陳伯達說：「這次談話，主席還講到他自己的煩惱事，說他的女兒（蕭力）身體不好。我說：那我去找她談一談。主席說，你就不用管了。」

陳伯達說：「所以，我覺得這次和主席談話還好，我犯了錯誤下去就行了，可他們（指江青等）把你們給寄去的語錄給了主席，其實吳法憲他們早有了語錄，這個語錄他們實際上沒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後對我非常生氣，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評了我。」

陳伯達這時坐在沙發上，他微微搖着頭嘆息着，然後，又極為懊悔地說：「我讓主席太生氣了，太生氣了……」

稍微平靜了一會兒，他又似有信心地說：「嗯，主席還是很喜歡知識分子的，過一段時間，他會對我說些公道話的，會寬容些的。」

我們說主席年紀大了，來不及了。他聽後點點頭說：「可也是呀！」

陳伯達說：「原來主席讓我找他們談，我去找了江青，她一見到我便說：『啊！稀客！稀客！』我說和她談談，她不談，說要談就一塊談。於是江青把我帶到康生那兒，我以為是和康生談，結果進門一

看，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早就坐在那裏了。江青說：『你不是找我們談嗎？你說吧！』我還沒有說上幾句，他們就罵上了，康生說：『你自稱是甚麼小小老百姓，其實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說：『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你是推脫責任！』他們都罵我，無中生有地罵，哎呀，甚麼都罵了呀！叫人難以啓齒！……我真是無地自容呀！』

陳伯達說：「我覺得就總理還好，我從會議簡報上看到，他說主席說我三十年來在一些大的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是說在一些問題上，不是說在所有的問題上沒有配合。這是總理在極為困難的時候說的公道話呀，我心裏很感激他！反正這次我令主席太生氣了。」

陳伯達說：「在會上、在回來的飛機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邊，這是可以理解的。」

陳伯達從廬山回來沒兩天，就要把自己的頭髮剃掉，剃成光頭。我們勸說也不聽，他堅持一定剃光，說要去當農民就要剃光。我們請他到理髮室或請人來為他理髮，他不同意，說讓王保春為他剃就是了。可保春說我也沒有剃過頭，不會呀！陳說，不會就學嘛！保春只好去警衛連借來了理髮工具，就這樣在陳伯達的頭上練起了剃頭。這時候，陳伯達的精神狀態很不好，他已經預感到一切都完了。我們知道了情況，心情也很不好。起初中辦還給陳伯達照送文件，後來文件也逐漸不送了，只給報紙、參考資料。我們整天等待着，可一點信息也沒有。陳伯達起初一味要下鄉當農民，他問我們願不願意和他下鄉當農民，我們心煩不願表態。他說在山上問過小繆，小繆好，他願意和他下農村。他經常說這樣的話，我們都煩了，就對他說：「你將來怎麼樣，中央還沒有說，這得中央決定，不是你說下農村就下農村了，也許你想下去還不讓你下去呢！」我們這樣說，他也不說話了。其實，他也是心情煩悶，不知所措，看書看不進去，坐立不安。

陳伯達想給主席打電話約個時間去談談自己心裏的想法，讓保春

打，保春讓文耀打，文耀也不願意打，說咱們研究一下看誰打較好。後來還是讓小繆打，繆俊勝給主席的秘書高碧岑打電話，說陳伯達想去看看主席，高碧岑在電話裏說主席休息了。那當然不能見面了。到第二天，陳伯達又讓我們問問主席那裏能不能去，保春用電話問了高碧岑，高說主席有客人。自然也不能去。但陳不死心，過了一段時間，陳又向我們說：「你們問問主席那怎麼樣？」我們都沒有信心了，對陳說可能不行，不會見了。陳還堅持讓問，保春、小繆都說自己問過了，陳看我們互相推諉不想問，有些不高興地說：「我求你們幫幫忙嘛！」文耀說那只好輪到我問了，便給高碧岑打電話，高碧岑說：「主席剛開完會，等甚麼時候主席有時間，我通知你就是了。」這個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再問了。

這下死心了。陳伯達當時對我們說：「這不就行了，問一下就好了嘛，謝謝你們。」說罷便回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陳伯達看到給主席打電話約談無望，主席不會再見他，只好硬着頭皮自己給康生打電話。秘書告訴康生，康生不接電話，陳又給康生愛人曹軼歐打電話，曹也不接他的電話。陳又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打電話，問給他送文件的事情。

後來，陳伯達給總理打電話，是秘書接的又轉總理，總理接了電話，對陳伯達說：「你現在不要到處找人談，你要靜下來考慮一些問題，學習學習，現在大家都需要學習。」周總理後來又讓王良恩等人來陳伯達家裏通知他說，快過國慶節了，不要到處去跑，北京外國人多，叫他們看見了也不好。陳伯達當時對國慶上天安門城樓還抱幻想。王良恩對陳說：「你上不上天安門還沒有定。」陳伯達向王良恩提出說是不是還給他文件看。王良恩說：機密文件暫時就不送了，內部和公開文件還繼續送。其實，內部、公開的文件就剩下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和《人民日報》等報紙了。

陳伯達聽了王良恩的談話之後，還對我們自我安慰地說：「看我還是挺守紀律的吧，從山上回來以後，我哪兒也沒有去。」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心情外出遛彎了。

過了國慶節，陳伯達的心情極不穩定，他可能考慮多了，思想壓力很大。回京後就飯量減少，這時更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人明顯消瘦。陳伯達知道江青、康生心狠手辣，會將他抄家批鬥的，包括他要剃成光頭，都是有所準備的。幾天來他有些鬼鬼祟祟，拿着東西東藏西藏。保春對文耀小聲說：「你看老夫子要給我們惹禍了……」我們看到陳把一些舊書、字畫揉成團，正在尋找隱藏的地方。保春走過去從陳的手中搶了過來，同時對他說：「你別到處亂塞了。」拿來扔到我們辦公室的廢紙簍裏。過了沒多久，陳又偷偷摸摸地從廢紙簍裏撿了回去，文耀發現後隨即去找，在臥室衛生間的抽水馬桶裏找到了，由於紙團太大，水沖不下去，文耀把它撈了上來，打開一看沒有甚麼，都是些古舊書，其內容與他的家庭有關，是家譜之類，怕人給他亂傳。還有一張彩色畫像，好像是清朝人，一幅身着戲裝的全身像，還佩着一把寶劍，過去在陳的書房裏掛過。那時我們知道是他的祖宗畫像，裝不知問陳：「怎麼這個人像唱戲的一樣，還帶把寶劍。」陳伯達笑着說：嗨，那時的文人都是那樣，帶劍是防身自衛用的。我們當時估計他的老祖宗可能是個朝廷命官，但不知是幾品官，身上的寶劍也可能分等級，是哪一級就帶哪一種寶劍。這本來是他的家史，他很看重，可是現在為了避嫌，將它摘下來東藏西藏。在那個時期，我們也怕引起麻煩，搞不好會說我們劃不清界限，和陳一起銷毀證據等等。因此，我們對陳伯達的這種行動總是勸止。

三六

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

陳伯達年輕時就喜愛文學，在30年代他就與周揚有交往。後來他們又先後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依舊有接觸。全國解放後，又都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雖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還是互相關照。

60年代那時，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工作很不滿意，認為文藝沒有很好做到為工農兵服務。毛主席要陳伯達轉告周揚，讓他下去到農村接觸實際。毛當時還說了一句很嚴厲的話，說：「如果他不願意下去，可以派解放軍一個連送他下去。」這雖然是一句氣話，但是表明毛主席的態度很嚴厲。陳伯達很快就和周揚談了。周揚下農村較少，不太習慣，當時國家經濟又比較困難，陳伯達便主動和天津的同志談，要天津市給周揚安排一個離市區較近的地方，這樣他可以有時到城裏住兩天。天津市的同志給周揚同志安排在小站鎮的西右營。周揚去了以後，陳伯達也常去看他關心他。後來，天津市委也抽調了一些幹部去和周揚一起組織了工作組，進行工作。經過了一段時間，天津市委寫了關於小站鎮「四清」的報告給中央。對這個報告劉少奇寫了贊同的批語，同時，陳伯達拿着這個報告向毛澤東當面作了彙報，主席表示稱讚，並說可以轉發下去。這時，陳便請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方紀、市公安局長江楓和市委研究室主任、工業部副部長李樹夫等來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裏，共同對報告進行了補充修改。並且代中央草擬批示，然後經中央批准下發了文件。

(一) 周揚被公開點名批判的前後

1966年6月的一天，王文耀接到江青的電話，她是找陳伯達的。王文耀急速請陳接電話。在電話裏江青提出要發表一篇甚麼人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周揚，這時陳有些擔心，猶豫地說：「唉呀，他剛作完肺癌手術，現正在外地休養，這樣他的身體怕是受不了吧?!」江青很果斷地說：「這是大事，要從大局出發，沒有關係的……」王文耀曾在周揚處工作，聽到這一消息心情非常緊張，擔心周揚夫婦身體頂不住，但自己又無能為力。當時他把這一情況告訴了王保春，保春聽到此訊也驚訝地小聲說：「唉呀，周部長和蘇靈揚他倆都是先後作了大手術不久的呀，這能受得了嗎?!」他也直搖頭。對江青他們以何名義在報上點名，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擔心地等待着。

過了幾天，1966年7月4日，《人民日報》的第二版、第三版以整版的篇幅，標題為所謂〈周揚顛倒歷史的第一支暗箭——《評魯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條註釋〉的長篇批判文章出籠了。這是江青精心策劃的。從此以後，《人民日報》接

連多篇刊登批判周揚的長篇文章。

接着，7月28日中宣部又召開大會批判周揚。7月29日，《人民日報》用第一版大字橫幅標題，〈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會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憤怒聲討文藝界黑幫頭子周揚〉，一片喧鬧聲。有造反派到處尋找揪鬥周揚。

年初在北京剛作完手術，去上海休養，又剛從上海轉到天津休養



周揚

的周揚夫婦，這下大禍臨頭。看到外邊一片喊打聲，兩人拖着病弱的身體，無處藏身，無處求援。好心善良的天津市交際處的李松茂，打電話給我們說，周揚同志在天津交際處已不能住了，整天都有人要揪鬥。說他已經將周揚夫婦藏在了一個地方，問下一步怎麼辦。王保春馬上將這一情況報告給陳伯達，陳伯達表現出同情和無奈的樣子說：「他們倆身體不好，那就讓小李照顧他們一下，先藏起來吧……」可是後來李松茂又來過幾次電話告急說，他實在頂不住了。同時說他為周揚夫婦買的糧食已經吃完了，他們吃飯也成了問題。李松茂說，周揚同志他們自己也要求回北京。這樣，陳伯達就同意讓他們回北京。一回到北京周揚夫婦就被造反派給揪走了，受盡了苦難和折磨，幸好保住了性命。

（二）周揚還關心着陳伯達

1975年6、7月間，周揚被釋放。恰好這時被關壓五年之後的王保春、王文耀，經毛澤東批准也被無罪釋放。

被關在團和農場的王文耀，在釋放前開完所謂總結會將要被送走時，學習班的負責人對他說：「你要汲取這回的教訓哪，出去以後，如果見到你熟悉的甚麼人，接觸時可要謹慎喲。」這句話說得比較含蓄，王文耀當時不大理解，也就沒有在意，心想只要你放了我就好，並問他下一步怎麼辦，他說送你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等待分配。當天上午他們就用車送王文耀到了萬壽路招待所報到。在招待所的接待室裏，王文耀偶然看到牆上的小黑板，用粉筆寫着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宋任窮，一個是蘇靈揚，名字前邊註有房間號碼。蘇靈揚是周揚同志夫人，這時，王文耀忽然想起那位負責人的話來，原來我的老首長也被釋放住在這裏呀！他們是怕我和他接觸吧。王文耀心情很激動，

不管那麼多，他辦完登記手續，沒有去指定給自己住的三層房間，而是直奔蘇靈揚住的二層房間號去了。他一敲門，裏邊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在問：「誰呀！」不等回答門就開了，兩人一見面都愣了。周揚說：「啊，文耀，你怎麼來了？」王文耀說：「我剛被釋放出來。」周說：「是嗎？你怎麼也被關起來了！」王說：「是的，被關了五年。我剛來這，知道您也住這，就來看您。周部長您吃苦啦！」兩人進門緊拉着手，然後緊抱在一起，都哭了。待平靜下來以後，周揚拉着王文耀的手，兩人坐下來。這個屋子很大，是裏外間，沒有甚麼擺設，顯得空蕩蕩的。屋裏就周揚一個人。王文耀問：「怎麼就您一人，蘇校長呢？」周老說：「她剛上街去買菜了，還沒回來。」看樣子兩位老人是自己做飯吃。

兩人見面後，周揚就談起陳伯達。老人皺起眉頭遺憾地對王文耀說：「他（指陳伯達）後來職位那麼高，怎麼就那麼不謹慎呢。他出事後我也很難過呀！」王文耀感嘆地說：「唉，一言難盡啊，實際上他自己也作不了主，不由自己呀。這個以後我對您說吧。」兩人坐了一會兒，沒有多談。王文耀心還是有些害怕，沒等蘇靈揚回來，他就和老首長告辭了。但他沒回指定給自己的房間，而是下樓告訴接待室的同志說，他要回自己在北京的家去住。他們同意了，這樣招待所的同志就派車送王文耀回家了。

（三）周揚與陳伯達晤談

1982年4月22日傍晚，我們倆去探望陳伯達。在談話中，王文耀談到他最近去探望周揚同志，說周揚很關心陳伯達，說如果可能的話，他願意與陳見見面。但是，周揚本人不便提出這個問題。陳伯達聽了以後很高興，因為他出獄以後，沒有一個有點地位的人見過他。

第二天他就向公安部門的負責人提出請求，希望見一見周揚同志。公安部門很快同意他們相見的請求。當天晚上7時許，陳伯達去了周揚家中，與周揚夫婦晤談。在座的還有周揚的秘書譚小邢，他們四位已有十六年沒有見面了。這次見面真是悲喜交集。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晤談，解除了他們之間的恩怨誤解。陳伯達後來向我們講了他們談話的基本內容，他說周揚說，「你後來若不是擔任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就不會那樣了。《紅樓夢》裏說：『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沒能及時退身，地位到了那麼高，打倒陶鑄後，又位居第四。」陳伯達對周揚說：實際上由不得自己，周總理三次找我談話，要我當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後總理嚴肅地對我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了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了，只好當。至於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名單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邊，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那麼靠前。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後一位的陶鑄同志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說：『你看這樣



1984年王文耀與周揚親切交談（胡武功攝）



1985年王文耀與兒子王東升與周揚及夫人蘇靈揚同志合影（胡武功攝）

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後來的事。周揚說：「我被關起來後，在監獄裏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後來再也聽不到了，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文革中你戴的帽子是最多的，是首屈一指的。」他們四人晤談時，除談文革中這段不幸的歷史外，更多是對一些學術問題的探討，由於時間太晚，餘言未盡。臨別時周揚表示以後還可以另約時間見面。

陳伯達倒台之後，對他全盤否定，各種文件、報刊媒體對他鋪天蓋地進行批判達十年之久，陳伯達已是垂暮之年，又被判重刑，可謂處於幾乎無重見天日之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周揚能置個人利害於不顧，避開牆倒衆人推的舊俗，不記前嫌（文革中陳批判過周），毅然請陳伯達到他家面談，並以客人相待，這是需要多麼高尚的氣度和膽識啊！

在這期間，陳伯達把他自己在保外就醫時，寫的有關文藝方面的作品如〈求知難〉等，推薦給周揚看。周揚看後覺得這些文章確有獨到見解，就以秘書譚小邢的名義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

輯黎澍等人看。黎澍認為寫得不錯，就在1982年《讀書》第10期上以陳伯達原署的筆名『紀訓』發表了。當陳伯達看到自己的文章發表後，非常激動和欣慰。他手拿雜誌反覆翻閱，不肯放下。

(四) 三人在同一年離世

1983年4月15日下午5時至7時，王文耀去探望陳伯達，兩人在談到周揚時，陳伯達講：「異化不能說錯，馬克思說過，那是年輕時說過，後來《共產黨宣言》之後，就不講了，所以不能說錯。他為甚麼要寫這個呢，應該寫的東西很多嘛！我本想看看他去，怕這時去不方便。」在談到文藝時，陳伯達說：「延安整風以後的魯藝，在中國文藝史上起着劃時代的作用，應該發揚延安魯藝精神。周揚可用他自己的影響，再掀起『魯藝精神』。我對魯藝印象是很深刻的，如《兄妹开荒》、《小放牛》、《白毛女》、《把眼光放遠一些》等等，我常說『把眼光放遠一些』就是由此而來的。」

9月陳伯達感到身體日衰，想與周揚再次晤談，即請求公安部門給予聯繫安排。幾天以後，公安部門答覆周揚同意再次見面。可是，這時陳伯達因腿疼不能行走，無奈住進了醫院。到了10月下旬，報紙開始因為一個學術的問題，公開點名批評周揚。陳伯達感到突然，他想到周揚的為難處境，甚至懷疑是否因為自己與他來往而受到連累。於是託人捎口信給周揚：「為避免給周揚同志帶來困難，建議將再次見面時間推移。」周揚表示同意。王文耀在看望周揚時，看到周揚心情極為不好，時常嘆氣。王文耀勸解說，「這不就是個學術問題，在探討嘛，一般老百姓也不懂。」周揚說：「是啊，是個學術問題，可現在搞成這樣子?!」蘇靈揚諷刺地說：「可不是嗎，老百姓說，大家都講『四化』，只有你周揚講『一化』（異化），可見是你不對

嘛！」半個月以後周揚病倒了。

1984年秋，有人在一張地方報紙上，又公開點名重複批判陳伯達了。陳伯達受到突如其來的衝擊，健康變壞，又住進了醫院。從此，陳、周兩人，雖然性質、程度並不相同，但都處在新困境之中。

陳伯達得知周揚已處於長期昏迷狀態時，很難過，特地讓王文耀向蘇靈揚轉達他的關切心情。蘇靈揚很不平靜地說：「他自己也很困難，還來關心我們。前幾年他的處境不是好一些嗎？怎麼現在又變成這樣？」王文耀和在場的人，誰也說不清楚為甚麼。

陳伯達在服刑期間，一直想能早點服滿刑期出來，作點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比如中國工人階級歷史、中國文學史等等，留給後人。好容易到了1988年10月17日，即他服刑18年期滿的日子。可是不巧，這一天也正是他因前列腺肥大、急性瀦留住院要作手術的日子。就在這時公安部要在醫院，為他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這本來應該說是他高興的日子，可是這位領導人，在當眾宣佈他刑滿的同時，又強調說「還有個附加刑五年」，這就嚴重地刺激了這位已經85歲的老人。他氣憤地對這位負責人說：「你剛才說甚麼，還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了！」

1989年7月31日，周揚與世長辭了。8月，陳伯達懷着悲痛的心情，親筆為他寫了輓聯：「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悼周揚同志，仲晦1989年8月。」周揚的親屬收到輓詞後，把它放在家中周揚同志靈堂前。

一個月以後的9月20日，陳伯達溘然離世。

有關部門通知他的家屬，陳伯達的「後事悄悄處理」，不必聲張。

又過了一個月，蘇靈揚逝世。從此，結束了陳伯達與周揚夫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盡風雨與曲折的交往。

三七

毛澤東和陳伯達

1937年8月，陳伯達到延安，起初中央組織部分配他到陝北公學教書。幾個月之後，調他到中央黨校當教員。後來張聞天又把他調到中央宣傳部負責出版工作（他倆早在莫斯科時已經很熟）。

1938年5月，馬列學院成立，張聞天當院長，陳伯達，王學文當副院長，同時兼任教員。王學文教經濟，陳伯達教中國革命問題，後來又兼管編譯部。當時在延安發行量很大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主要是由陳伯達負責編出的。

那時他的學生很多，如李先念、張震寰、宋平、安平生、謝振華、江青、鄧力群（時任劉少奇秘書），馬洪（時任高崗秘書），廖蓋隆（時任朱德秘書）、周太和（時任陳雲秘書）、田家英、浦安修（彭德懷夫人）等，都是馬列學院的學生。稱陳伯達為「老夫子」最早是由浦安修叫起的。

1941年以後，中共中央決定，由陳伯達負責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從馬列學院挑選了鄧力群、張仲實、周太和、田家英到研究室。陳伯達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問題組組長，鄧力群是經濟問題組組長，張仲實是國際問題組組長。中共七大以後，政治研究室改由張聞天負責。

(一) 陳伯達作毛主席的助手

陳伯達認識毛主席，是在一次討論孫中山思想的會上。那次會上，出現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資產階級思想，一種意見認為應屬小資產階級思想。陳伯達的發言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也有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毛主席在做總結發言時表示，陳伯達的意見是對的。散會後，毛主席請陳伯達到機關合作食堂吃飯，就座的還有一位英國記者，一共三個人，後來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講中國古代哲學，毛主席每次都去聽，會後兩人經常留下來隨便交流點哲學方面的問題，這樣，兩人就逐漸熟悉起來了。

1939年春，張聞天找陳伯達談話，說中央決定調他到毛主席那裏工作，陳伯達當時沒有思想準備，有些猶豫，張聞天說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於是，陳伯達就被調入到毛主席那裏，擔任軍委的副秘書長，秘書長是李六如。起初處理一些軍事方面的文電等，時間不長，毛主席要他擺脫事務性工作，着手編幾部資料書籍。延安整風之後，李六如離開了主席辦公室。陳伯達自此在毛主席身邊作助手至1970年。三十多年來，他做了不少工作，寫了不少有影響的書籍和文章，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

(二) 建國初期做的幾件大事

起草「共同綱領」

建國初期，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是毛主席讓陳伯達、李維漢、李立三起草的。李維漢是負責統戰工作的，原來就準備參加起草工作。而李立三碰巧在主席那裏，主席讓他參加，這樣就成

了三人起草。最初的草稿主要由陳伯達起草，後經多次修改而成。

編輯毛澤東選集

1949年初，陳伯達建議由中央出版一部經毛主席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同意了這個建議。毛主席訪問蘇聯時和斯大林談過出版選集的事，並提出請蘇聯派一位專家協助出版工作。不久，蘇聯派哲學家尤金來華協助。在中央會議上，彭真提議由陳伯達負責與尤金聯繫。在工作時陳伯達下了很大功夫，當然整個編輯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那時毛主席精力充沛。從1951年到1953年陸續出版了《毛澤東選集》1~3卷，主要由陳伯達負責編輯，胡喬木、田家英也參加編輯工作。以後陳的工作重點又有了轉移，1960年出版的「毛選」第四卷，主要是由胡喬木負責。

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央準備195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需要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主席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陳伯達，所以「毛選」的編輯工作就暫時停頓了。

1953年下半年，毛主席讓陳伯達負責起草〔憲法草案〕的初稿，完成以後，他又隨毛主席到杭州，對草案進行修改，其他同志也參加了討論和修改。

195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以陳伯達，胡喬木，董必武，彭真，鄧小平，李維漢，張際春，田家英等八位同志組成憲法小組，負責對憲法草案初稿的條文做最後的修改後，提交中央討論。3月23日受毛主席委託，陳伯達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作關於憲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說明，3月24日《人民日報》作了報道。

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

從1952年開始，毛主席就讓陳伯達準備制定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5年才完全定稿。其間，經過很多同志準備資料，對經濟情況進行統計並參加討論「計劃」的細節。但主要文件即「五年計劃綱要」是陳伯達一手寫下來的，然後經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討論修改而成。

（三）整理毛主席的〈論十大關係〉

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幾次講話，陳伯達覺得內容很重要，但不是一天講的，次序比較散亂，應當將其加以整理，使其成為一篇完整的文章才好。他把這個想法向彭真講了，彭真當時幫他從辦公廳借來一份較完全的講話記錄。陳伯達找了一兩個助手，就在他的住所新建胡同開始整理，他反覆閱讀了主席的講話，也翻閱了不少圖書資料。經常是躺在會客室的地毯上，一手扶着頭，雙目緊閉，口述文章，助手們坐在沙發上記錄，記錄一兩段之後，他會讓助手複讀一遍，他聽着，如無修改，他就繼續口述。看似隨便實則集中精力。

王文耀當時初到陳伯達處工作，看到此情景心裏非常吃驚，主席的著作他怎麼能背出來？！其實，陳伯達是將主席的幾次講話在自己的腦子裏系統化後，用主席的原話口述出來，歸結為十個內容，定名為〈論十大關係〉。這篇文章整理好以後，他呈送給毛主席，主席審閱修改之後，中央曾發給黨內的高級幹部閱讀。

(四) 八大決議的起草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主要由陳伯達起草。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則是在會議期間由陳伯達起草經毛主席及中央領導幾次修改，由陳伯達作了最後修改，由於時間匆忙，未能送毛主席審閱，就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宣讀了。

在宣讀中，毛主席聽得很仔細，當聽到決議中後加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時，表現出有些不快，但時間倉促，來不及細想如何修改，就舉手同意了。

在決議中做了這樣重要的修改，因時間緊迫未能送毛主席審閱，責任在陳伯達。

後來毛主席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1957年10月7日，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八大決議這句話，馬、恩、列沒講過，但是也沒有害處，意思是要趕快發展生產，充實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是沒有講清楚，帶語病的性質，沒有認真的講清楚矛盾，是比外國，比將來，這句話現在也不必改，現在可不談這個問題。列寧講過蘇維埃政權和落後的技術有矛盾。現在不講，以後解釋清楚就行了。嚴格的講，說社會主義制度與生產力不適合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恰好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生產力，許多經濟學家說我們的制度與生產力有矛盾，說社會主義制度落後於生產力，這種說法不好。」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又講：「八大決議沒有否定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主要矛盾的階級鬥爭，八大的分析是指生產力講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得不夠完善，但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

現在看來，陳伯達當時的那種說法還是比較正確的。

（五）「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提出

1956年10月，陳伯達回鄉下農村蹲點，主要目的是了解實行合作化後農村各方面的情況。在調查中他發現基層幹部與群衆的矛盾很大，特別是部份幹部享受種種特權，嚴重脫離群衆。他覺得這種不良現象的發展，會給黨造成很大的危害。

為此，1957年1月7日，他給黨中央、毛主席呈送的報告中，提到「調整幹部和群衆的關係，正確處理這種人民內部的問題，是在鞏固合作社制度和發展農村生產問題上具有第一位的意義」。他提出的這個意見，毛主席很重視。他從福建回來之後，主席對他說，他提出的「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嘛」。在當年的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毛主席的這個提法就更加明確和更加理論化。主席這個講話後來也主要是由陳伯達整理經主席審閱後正式出版的。

1957年7月17日，毛主席在青島的會議上說：「……甚麼叫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群衆路線四個字，總是不要脫離群衆，要傾聽群衆意見，加以分析，好像游泳一樣，要順水性，或者是魚水關係。幹部脫離群衆，就不能活嘛！……對於幹部一個是撐腰，一個是幫助，毛病要改，又不要傷害幹部，大家批評一下，一篇檢討就可以過關，要教會基層幹部過關。農村，工廠不能採取城市機關，學校的辦法，而採取三級幹部會，社員代表會，支部大會，職工代表大會等，就是用陳伯達同志的辦法，陳伯達在福建的辦法，開始區鄉幹部都不贊成，後來大部份幹部選上了，選舉不要黨團員保證，而是充份醞釀，群衆提名。各省可搞點經驗。」

(六) 陳伯達同意辦黨的理論刊物

毛主席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理論刊物），現在轉了180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嚮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定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出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份根據本省情況說話，但也可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系的話……不要『自慚形穢』，伯恩施坦、考茨基，後期的普列漢諾夫，馬列主義比我們讀得多，但他們並不行，把第二國際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僕從。」

主席說：「現在這種情況已有改變，標誌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信），一個通知（指準備下達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有破竹之勢，陳作風很好，勤勤懇懇為黨工作，但對要統治宇宙沒有信心，膽子小。」

1958年5月25日，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主持討論並通過關於主辦黨刊的決定，其全文是：

1、五中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6月初創刊。

2、決定由陳伯達同志擔任《紅旗》雜誌的總編輯。

3、全黨應當積極支持這個雜誌，各級黨委應當經常供給稿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當分別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

此決定在全會上一致通過，贏得全場掌聲。

(七) 陳伯達發展電子工業的報告被否定

陳伯達1961年起草了《人民公社條例60條》以後，接着1962年上半年又制定了《商業40條》。到1962年下半年他就投入到工業調查上了。彭真為了讓他集中精力工作，給他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讓他住進了中南海西門外的新建胡同，一個寬敞的小院裏辦公。陳伯達帶着國家計委的楊波，天津市委的李樹夫等幾個同志，在北京、天津、上海、東北、西南工業區進行調查。在調查中他表現出對新技術的高度興趣，甚麼半導體、激光、單晶硅等等，他在北京常去前門那裏新建的一些小的半導體廠和東郊的電子城以及首鋼、唐山鋼鐵公司等去調查。他到天津、上海調查的時間最長，又到大慶及東北工業基地和西南的攀枝花等調查，「攀枝花」的地名就是他給認定的。

為了快速發展工業，陳伯達心急如焚，經過了約三年的調研，找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探討後，提出了以發展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的意見。他覺得找到了快速發展中國工業的鑰匙，反覆思考後，便向中央寫了一個約一萬字的報告，印發給中央領導。毛主席看後，很高興，還特意單獨請陳伯達一起吃飯，席間主席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了。」

幾天後，中央常委開會討論。會上一開始他的報告便被否定了。陳伯達非常痛苦，但他沒有放棄。他還是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的。羅瑞卿提議讓陳伯達參加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的領導班子。這時，他找當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張震寰（張曾是馬列學院學員，他見到陳常稱呼陳教員）說：「你們可以向中央打個報告，請求試驗發射衛星，我們搞天上的目的是為了地上的。衛星對電子技術要求很高，一定要把電子技術搞上去。」張震寰他們的報告送上去以後，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國防科委當時的幾位領導都知道這件事。

1970年4月衛星發射成功，「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陳伯達遇見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說：「祝賀你們發射衛星成功。」羅高興地說：「這也是你的功勞呀，我們都知道是你建議的。」

（八）《紅旗》雜誌發表—尹達文章

1966年初，陳伯達的工業問題調查，已進行到關鍵時刻，他在天津、上海經常往來不斷，加之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開始緊張，他外出往來更加頻繁。2月初，陳伯達帶我們，和楊波、李樹夫、劉義立等到了武漢，毛主席正在武漢視察。後來，李樹夫回了天津，而我們正好乘坐毛主席的專列火車去長沙。

尹達有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光明日報》社的一個內部刊物上，被毛主席看到了。到了長沙後，主席對陳伯達說，這篇文章可以公開發表。陳伯達離開長沙後到了上海，便讓王保春打電話通知《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范若愚和編委杜敬。很快他們到了上海，陳伯達向他們講了一下要公開發表尹達文章的意見。

2月26日夜，陳伯達讓王保春給杜敬打電話，告訴他：「尹達同志的文章不要改得過多，文字通順即可，不要勉強修改人家作品。能不改的盡量不改，力求保持文章本色。」杜敬回答說：「康老（康生）、王力同志已經看過，準備付印。不好再動了。」

這篇文章刊登在1966年《紅旗》雜誌的第三期上，題目為〈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

（九）起草「五一六」通知

1966年4月初，康生打電話讓陳伯達早點從天津回京，陳忙於工

業調查不想馬上回來，康生就告訴陳伯達說：「讓你回來是中央的決定，要顧全大局，還是盡早回來吧。」

陳伯達回京以後，參加了中央召開的會議，會上決定由陳伯達主持起草一個撤銷已經發出的「二月提綱」的通知。陳伯達因手頭沒有「二月提綱」的原文，就借用中央原發給康生的「二月提綱」的文件（這個文件用後存放在當時陳的文件櫃中），和吳冷西、王力一起邊看邊修改。這個草稿後來在杭州會議期間經過討論，毛主席又作了補充修改，這才算完稿。

5月中旬，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毛主席不在北京，沒有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主要議題一個是關於彭、羅、陸、楊幾個同志的問題；一個是討論通過中央的「通知」，這個文件在杭州會議上已經討論過了，在這次會議上沒有提出甚麼意見，於5月16日的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會議。

從4、5月份以來，中央在南北兩地不斷開會，陳伯達的工業調查不得不停止了，投入到瘋狂的文革運動中。

（十）與江青的矛盾開始

1966年「文革」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與群衆的矛盾不斷激化。陳伯達在工作組問題上與中央其他同志意見不一致，陳曾多次提出暫時撤出工作組以緩解矛盾，但都未經會議討論即遭拒絕，心情非常沉重。後來主席回到北京，經過約一個星期的調查後，明確表示支持陳伯達的意見，撤銷各校的工作組，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才使陳消除了沉重的思想壓力，使他別無選擇地站在毛主席一邊，維護毛主席的主張。

陳伯達曾經無意中對江青說，劉少奇有次對他說，想請他當秘書，這是老早的事，而這時，江青當着主席的面說：「他（指陳）喜歡給劉少奇當秘書，不喜歡給主席當秘書。」弄得陳伯達很突然，說：「我哪兒這樣想過？！」江青說：「你是這樣想過！」陳伯達非常生氣，但不好當主席的面與她爭辯。

陳伯達覺得，江青搞得中央文革小組權力過大，便找文革小組幾個成員，起草一個限制文革小組權力的規定，但中途被江青制止。

（十一）安亭事件處理方法上的分歧

1966年11月，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王洪文等人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召開大會宣佈工總司成立。成立宣言中指出，「我們要奪權」，會後舉行遊行示威，並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認他們為革命群衆組織。遭到市委拒絕後，他們便以赴北京上告為由，強行登上火車北上，被阻在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他們不服就臥軌攔車，阻斷滬寧鐵路交通達三十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後，中共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央做了彙報。當時陳伯達打電話給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要他們堅持中央關於不允許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的規定，不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群衆組織。要求工人們在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停產。張春橋當時在電話裏也同意陳伯達的意見。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承認工總司的要求，一方面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派人做思想工作，動員工人回廠抓革命，促生產。

這時，大部份群衆都回去了，還有部份群衆堅決臥軌不走。陳伯達隨即親筆給群衆寫了一封信，要他們不要到北京來，要顧全大局，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就地鬧革命，要抓革命，促生產，希望工人同

志們應當立即回到工廠去把生產搞好，有甚麼問題可以給中央寫信，中央一定重視，等等。這封信原準備發電報過去，後來因為張春橋已來到北京，周恩來、陶鑄決定派張春橋坐飛機去處理此事，讓張春橋帶着陳伯達給造反派的信稿當衆宣讀。而張春橋到達安亭後，改變了主意，根本就沒有按陳伯達說的去辦，而是按照自己的主張，答應了造反派群衆的條件簽了字。他撇開上海市委，支持工總司成立，後來，毛主席同意了張春橋的意見和作法。

從此，繼紅衛兵以後，上海出現了各種群衆組織，大搞揪鬥、抄家、遊行集會、武鬥。上海大亂，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普遍受到衝擊迫害，上海市委處於癱瘓狀態，造反派要自下而上地奪權。這時，張春橋心中沒底，要回北京，沒有得到同意。當時中央正在開會，陳伯達反對自下而上的奪權，他主張建立群衆監督領導的機構。他的這個主張受到毛主席的批評，陳只好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中央的決定，同意張春橋回京商談奪權事宜。這時，張春橋鬆了一口氣，十分神氣的回到北京。

（十二）1966年主席的生日宴

1966年12月26日晚上，江青通知陳伯達到主席那裏去，同時她也通知了中央文革的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從釣魚台到中南海乙區的游泳池，向毛主席彙報工作。這天正是主席的生日，談完工作後，主席很高興地請大家和他一起吃飯，共慶自己的生日。我們隨同去的工作人員，也在食堂吃了主席的生日飯——肉絲麵條。主席很少過生日，好像從來沒有這麼多人一起吃生日飯。

陳伯達說主席還講了很重要的談話，主席說：蘇聯資本主義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這個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

後，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問題就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嘛。所以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

（十三）「你們可以給主席寫信說我不幹了」

陳伯達最留戀他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種自由清靜的工作環境，過去，除了主席那裏必須隨叫隨到，絕對不能耽誤以外，其他人再大再急的事情，到了他這裏都成了不大不急的事情。而現在他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自覺責任重大，做事謹慎。可是自他生病住院將權力交給江青之後，去毛主席那裏也受到了限制，不能與主席交流只能聽江青擺佈。陳伯達的書生習氣，優柔寡斷忍讓屈從的個性，使他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這時全國大亂，江青拉着他日夜不停的開會、接見，催他發表演講，批張三，罵李四，忙得他暈頭轉向。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和中央領導人連續接見了幾批群衆之後，又在大會堂東大廳接見群衆。隨去的王文耀實在疲勞，就抽空在會議室最後排的沙發上休息一下，不知不覺就睡着了。待醒來時，會議廳已散會，室內已經空無一人，他不知所措地問服務人員，陳伯達等人去哪裏了，服務人員告訴他，首長們到大會堂南端接見群衆去了。

王文耀迷迷糊糊急忙跑到南端的會議廳，會議已經開始過半。王問身邊同志現在接見的是甚麼人，對方告訴說，接見的是甚麼「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人。會上說是揪王任重，可又點了陶鑄的名字，王聽見江青要陳伯達講話，陳在會上結結巴巴地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係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後來變本加厲。如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了解了很多情況，的確是有後台的，這個後台老闆就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他獨……獨……（江青一旁提示說：獨斷專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組，而且背着中央。你們揭發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接着江青講：「你們回去鬥爭要注意兩條，一是核實材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二是要作艱苦細緻的工作，爭取多數，使自己由少變成多數。不要把敵人看成鐵板一塊，多數派同學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作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做細緻的工作，這是個策略問題。希望大家注意這幾點。」最後康生講了幾句：「同志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再見！」在場的周恩來總理沒有講話。時間不長會議就散了。

陳伯達隨江青胡亂說了一通，然後回到釣魚台。陳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天紅衛兵就把中央文革打倒陶鑄的消息傳遍了全國。1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表示同意打倒陶鑄。

2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會上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陳回到釣魚台住所後，他苦笑着對我們說，主席批評了他：「你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江青還在旁邊幫腔！」陳伯達很懊悔地說：「唉，我也不知道怎麼了，十一樓（指江青）讓我说，我就毫無準備的把內部會議上的話在群衆中亂說一氣，這樣一說，被紅衛兵捅出去了，這下，陶鑄同志再也不能出來工作了，這都怨我，我闖了大禍！」

陳伯達自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中央常委以後，和江青等人的矛盾逐步加大，工作中不斷受到主席的批評，有些話他又不能向主席直說，由於江青的阻撓，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地去主席那兒，

感到很委屈。他實在不願意繼續聽從江青的利用和擺佈，由於他身邊沒有別人發洩，也就不自覺地把這種情緒向我們流露出來。這次主席又批評了他，他對我們說了這番心裏話。

陳伯達在我們的辦公室低頭漫步了一會兒，然後坐在沙發上嘆了口氣，煩躁地說：「唉！每天這麼多事，一天幾批開會接見，走馬燈似的，還都得講話，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講那麼多的話，能不犯錯誤嗎？」

他坐了一會兒，突然對我們說：「你們是不是給主席寫信，就說我幹不了這個工作了好不好？」

我們當時覺得奇怪，就說：「看您說的，我們怎敢向主席寫這種信呢！您知道您是中央常委呀！」

陳說完這些，沉默了一會兒，又微微地搖頭說：「現在看來，我還是幹不了！」我們說，那我們也不能給主席寫這種信。

1968年5月，當時陳伯達負責解決福建的問題，福州軍區的韓先楚長期住在京西賓館，他來北京後，也經常給陳伯達打電話，多半是我們接他的電話，所以我們當時有個感覺，韓先楚一來北京，福建那裏准又亂了，陳伯達對韓先楚也不太滿意。

一天上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大軍區的負責同志，那時候被毛主席接見就意味着站得住倒不下了。和韓先楚住在京西賓館的老紅軍、福州軍區副政委劉培善，不知道甚麼原因沒有通知到，大家都去了大會堂，只剩下劉培善留在賓館，他也知道今天主席接見，但無人通知他，可能感到無望，就走到絕路上去了。

主席接見後，大家都高興地回到了賓館，有人覺得怎麼不見劉培善了呢，大家就到處尋找，沒有找到，還以為他外出了。後來賓館的服務員發現劉培善在樓梯下邊的小儲藏室裏上吊自殺了。

毛主席知道這件事後非常生氣。中央開會時嚴厲地批評陳伯達

說：「你不見棺材不落淚，你不要管福建的事了！」陳又一次受到了主席的批評。

陳伯達回來後情緒非常低落，談起這件事，他抱怨韓先楚「太自私光顧自己，也不知道通知劉培善，使劉培善以為自己要被打倒，造成了這樣的惡果。」

在解決福建的問題上，多半是韓先楚同志找陳伯達談，劉培善很少和陳伯達接觸，我們和劉培善也不熟悉。

這件事情發生後，陳伯達又提起給主席寫信的事情來了，他說：「你們可以給主席寫信，說我不幹了。」我們還是說，「我們不能向主席談這樣的大事，我們這樣做就等於干涉中央的工作，我們不是太狂妄了嗎?!」陳伯達說：「你們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反映說我不幹了嘛，這是可以的。」我們說我們沒有這個膽量寫這樣的信。

以後，他還多次說過讓我們寫信，我們沒有依從。

（十四）「文革」初期陳提出反對打倒一大片

1967年初「文革」開始以後，全國形勢大亂，所有領導幹部都惶惶不安，心中沒底隨時都有被打倒的可能。開會時，陳伯達對當前的形勢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是個路線問題，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資產階級路線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鬥爭問題。」毛主席當時聽了很高興地說：「對，這樣提好，這樣就把所有幹部都解脫了，他們沒有責任，他們只是執行了錯誤路線罷了，改了就好嘛。」接着主席在會議上正式講了，大家的情緒就好多了。待了沒多久，毛主席說：「這個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的問題。」從此，就不再提陶鑄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在起草「九大」報告時，毛主席對陳伯達

說：「鄧小平和劉少奇不一樣，鄧小平打過仗，報告上不要提他了。」

（十五）陳伯達躲避江青「誰找我就說我回家住了」

陳伯達多年的習慣，常親自給主席身邊秘書打電話問主席起床沒有，如果說剛起來，他誰也不告訴，就自己走着去主席那裏。而現在去一次回來就受到江青審問，而且警告他說：「跟你說了多少次了，主席年紀大了，你沒事不要老去主席那裏浪費他的時間，你這個人談起來就沒完！」陳伯達對我們說，他每去一次回來，江青都審問似的問他說主席都說了些甚麼。

「文革」中的一些情況，他想給主席講，可是由於江青的干涉（因為江青經常詢問主席辦公室人員，誰去主席那裏了，都要過問），所以，他每去一次主席那裏都感到非常緊張。1967年2月8日，陳伯達與毛主席身邊秘書通了電話，知道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陳伯達起初瞞着我們，對我們講他晚上要去中南海家中去住，後來說：「『中央文革』找我就說我回家去住了。」並沒有說他要去見主席，也沒想到那天正好是個星期六，但我們知道陳的習慣，他家住「迎春堂」，就在游泳池隔壁，主席一起床他就步行去了。

這次他向主席談了不少「文革」中的問題，還提到當時在北京影響比較大的署名「撒仁興」的文章，陳提出異議，主席聽了笑笑說：「嗨，三人行嘛！」並說出了三個人的真實姓名（學部的吳傳啓，林聿時和關鋒），陳伯達回來對我們說：「是誰，我都不知道是他們幾個人，看，主席都知道。主席知道不少情況，他都是從小報上知道的，他看了不少紅衛兵小報呀。」那時候主席對王力、關鋒就有了看法，覺得這些人是在故意搗亂。

陳伯達和主席談得很愉快，臨走時，走到門口聽到外邊不遠處有

高音喇叭聲，陳向主席說外邊的喇叭太吵了，主席就問陳：「那是甚麼地方的聲音，在喊甚麼呀？」陳說：「噢，是三座門。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鬧了幾天了，我是否去處理一下，讓他們回去？」主席說：「好，你去吧。」

陳伯達回來後，知道是部隊的人，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等在三座門靜坐了好多天了，在故宮的北牆上貼大標語「打倒徐向前」等。陳伯達的家裏人告訴陳，他的女兒陳海梅也在那裏面。陳伯達一聽急了，說：「把她給我叫回來！」王保春馬上坐老俞開的車去三座門。當時那裏人很多，不好找。王保春高聲詢問：總後護校在哪裏？他們問他找誰，得知找陳海梅後，他們幫忙找到了她。陳海梅說：「王叔叔幹甚麼？」保春說：「你媽媽叫你回去一下，有點事。」她聽了後一開始不想回去，經保春再三勸解後，她才答應回去。走前跟他們隊伍中的一個甚麼人打了招呼並說自己會馬上回來。就這樣，陳海梅被叫回家了。她回來之後，按照陳的意思把她扣住，不讓她再出去，海梅很生氣在家鬧了半天，劉叔晏說：「你造反，你知道甚麼？你還造反？」罵了她一通。

陳伯達從主席那裏回來之後，讓我們給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徐向前元帥打電話，請他一起去三座門接見靜坐的二醫大學生，把他們趕走。徐帥秘書經請示說徐帥正在京西賓館開會，沒有時間，不去。因為是解決部隊的問題，必須有部隊領導人陪同去才行，陳伯達只好又給林彪辦公室打電話，請葉群陪同一起去，葉群表示同意。這樣，陳伯達和葉群來到三座門後，先把群衆中的頭頭找來，說了一頓。說有問題可以反映，可以商量解決，不應該在這裏坐着鬧，不要用高音喇叭日夜叫喊，影響周圍老百姓休息，你們這樣鬧，離中南海這麼近，吵得毛主席都不能工作和休息，請你們馬上離開這裏。然後在三座門的禮堂接見了靜坐的全體人員並講了話，這樣，在當天晚上，靜坐的

群衆就撤走了。

陳伯達這次見到主席又處理了這件事，心情較好。可是好景不長，中央文革開會，江青問陳伯達昨天夜裏去了哪裏？陳說回家住了，康生假笑着說：「老夫子還過禮拜六喲！」江青接着問他是不是又去了主席那裏？陳伯達吞呑吐吐的說：「是我回家順便到主席那裏坐了一會兒。」江青嚴厲的說：「你去了主席那裏，為甚麼不向我們傳達？你封鎖主席最高指示！你說，主席講了些甚麼？」陳伯達當着文革小組成員無可奈何，只好講了幾句，而江青不幹，說：「不對！你去了那麼長時間，一個多小時，主席就講了這麼點?!」陳伯達說：「沒有說甚麼，就是和主席隨便談談。」江青氣紅了臉命令式地說：「跟你說了多少次了，你以後沒有事不要去主席那裏，說些沒用的廢話，浪費主席時間！」陳伯達在自己領導的中央文革中挨了江青的一頓批，他回來後垂頭喪氣地對我們說：「主席也沒有交代我有傳達的任務，而且是和過去一樣，互相談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和想法，我怎麼能隨便說呢？！說了主席也會怪我的呀！唉，真是……」

處理三座門靜坐的群衆效果又怎麼樣呢？後來陳伯達對我們講，軍委文革對他處理三座門靜坐群衆的方法也很不滿意。說陳伯達當時打電話給徐帥時，軍委文革正在研究如何採取強硬措施處理三座門靜坐事件，而陳伯達把人都給攆走了，打亂了軍委文革原來的部署。

附：陳伯達給中央的一封信

主席、林副主席、總理、康生、江青、姚文元、楊成武、吳法憲、葉群、汪東興：

在21日晚我同文元同志到廣播局，軍管小組的同志說，因我們廣播電台的技術差，功率小，沿海和邊疆一帶用的收音機，一開就是聽到敵人的和台灣、美國、蘇修等廣播的聲

音，聽不到我們中央台的聲音。我和文元同志都覺得必須很好地抓一下關於電台器材生產的工作。同時我覺得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力發展電子工業，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技術。電子器材的工業，發展現代化的電子工業設備，不僅是電台設備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業、交通部門的需要。大量的事實說明，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的工業大躍進，將是在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採用現代化電子技術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產品質量，而且能夠大大節約原材料，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增產節約的要求，同時是實現主席歷來提出的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項具體措施。對國防工業來說，無論海、陸、空都必須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電子裝備。國防工業，在這方面可能而且必須作為先導，對整個工業，對整個國民經濟起帶頭作用。現代化的電子技術，在世界上一些國家的發展，時間不算長，發展程度也很不一樣。但一般來說，他們都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制定）所局限，生產力和現有生產關係存在着對抗的激烈衝突。在他們那裏，要在各部門實行電子化的廣泛改革，有着自己不能解決的困難。在我國的條件下情況完全不同。我國有突破前人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武裝，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及其他巨大的優越性。關於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全國人民群衆意氣風發，奮發圖強，完全有可能後來居上，使電子技術迅速普及，使我國成為第一流電子化、第一個新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最強國，把美國、蘇聯都拋在後頭。

這個問題是在1963年根據主席的啟發和教導，根據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而提出來的。但是當時被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反對，以致擋下來。經過將近兩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在各個方面都徹底破產了。我想，按主席的指示辦事，再提起這個問題是必要的，請主席考慮。

這個問題是否可由科學部門、國防科委、計劃部門和工業部門召集一個專門會議，考慮一個方案，統一部署，做出計劃。可由國防科委及國防工業部門，先開會，後提問題和方案。

請主席批示。並轉給聶榮臻、李富春兩同志參考。

陳伯達1968年1月29日

此信錄自王年一《文革漫談》十六

(十六) 毛澤東批評陳伯達不寫文章

1968年陳伯達苦於無事可做，但又不願意跟隨江青他們到處亂跑胡說。一天，他從主席那裏回來，有些委屈不快地對我們說：「主席批評我『你現在的官做大了，也不到我這裏來了，自己也不寫文章了，《紅旗》半年都不出版了。』」我們對他說：「那你怎麼不說是江青不讓你去主席那裏呢？」陳伯達低頭輕輕嘆口氣說：「唉，我怎麼能告她的狀呢！」

我們聽了以後也為他着急，當時的幹部一個一個地往下倒，現在主席既已批評了，還不趕緊動作。陳伯達同樣着急，他表示這回要自己親自寫文章，但是寫甚麼，他不願意再寫有關運動方面的事，他思索了半天，說就寫國際問題吧！他準備寫一篇國際述評文章。我們都非常積極地尋找有關資料。他動筆沒兩天，這時陳伯達夫人劉叔晏不想讓自己的女兒跟着其他紅衛兵在外邊亂跑、胡鬧，想給她找個工

作。星期日的晚上，王保春出去辦事，王文耀值班，劉叔晏來釣魚台十五號樓找陳伯達，很神秘地商量多時，然後讓陳伯達給甚麼人打了電話請人家幫忙。

陳伯達平時要求我們較嚴，所以劉叔晏要他辦這種事，他也知道不好，不願意讓我們知道。談完之後，劉叔晏下樓回去了。王文耀拿着一些新資料送給陳，這時陳伯達正為女兒的事急匆匆的從裏屋出來到外屋給誰打電話。王文耀由於着急，毫無深淺不加思索地對陳說：「你是公家事重要，還是你私人的事重要？」陳伯達沒有思想準備，聽了以後，愣了幾秒種，然後狠狠地對王說：「我就不知道公事私事怎麼擺！」說完，電話也不打了，轉身氣沖沖的回到自己的臥室去了。

王文耀這時突然覺得自己說錯了話，忘了自己的身份，拿着資料默默的到裏屋，陳伯達斜躺在床上，目視前方，一言不發。王文耀走到床前放下手中的文件，低頭很靦腆地對陳說：「我錯了，不該對您這樣說話。」陳伯達一句話沒有說。

王文耀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雖然知道自己不應該用這樣口氣說話，但覺得還是為了工作，為了陳伯達他自己，也就沒有再去多想它，繼續處理手頭的大批文件、資料。大約到了夜裏12點鐘以後，十五樓一層值班的張素華，打電話告訴王文耀說，首長要出去，已經下樓來了。王文耀急忙跑步下樓，這時司機俞子雲已將車開到門口，警衛開了車門，王文耀緊隨陳伯達身後上車，坐在他身旁，便問陳去哪裏。陳向俞子雲說：「老俞，上西邊去走走。」沒理王文耀，王知道陳還在生氣，也就不再說話了。

陳心情煩悶時，經常夜裏出去散步。車出釣魚台北門往西拐，那時的北京除了城區有路燈外，郊區是一片漆黑，車上無人說話，外邊一片寂靜，偌大的蘇聯吉斯車聽不到馬達聲。在老俞的操縱下，我們

像坐船一樣飄然而去。

不多時到了八里莊附近的大斜坡的橋下，陳伯達小聲對老俞說停下。他開門下車，王文耀也隨之下車，兩人並肩往前走，誰也不說話。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裏，我們順着斜坡往上走，三、四個警衛人員距離我們三、四米遠漫步着，老俞的車和警衛車尾隨着。大家都不說話，一點聲音也沒有。走了大約十幾分鐘，陳轉身往回走，看出他要上車。於是大家就都上了車。陳對俞子雲說：「回去。」

一路上還是無話，到家以後陳伯達到自己的臥室，王文耀想再向他解釋，陳伯達小聲說：「好了，你去休息吧。」本來王文耀想請陳抓緊時間寫文章，結果適得其反，一晚上沒動筆。

第二天，陳伯達對王保春很激動地說：「王文耀可不得了了，昨天晚上向我發了很大的脾氣，催我寫文章，寫文章那麼容易呀！要經過思考嘛！竟然教訓我呀，說我公事私事哪個重要？我還不知道公事私事怎麼擺？！你給他好好談談！」王保春安慰陳說：「他還年輕，說話沒有分寸，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主席批評了，我們也都很着急，趕快寫一篇東西出來，表示已有了行動。」陳說：「這個我還不懂，還要他來教訓我？」王保春說：「是的，他着急也不能那麼對你說話，太不對了。我好好批評批評他，你別生氣，咱們還繼續寫咱們的文章。」

從陳伯達房間回到我們辦公室，王保春問王文耀昨晚是不是你說了陳？王文耀承認自己當時太着急，對陳有些失禮。王保春說：「你的话對陳的刺激很大，以後對首長說話可要注意，知識分子好面子，別傷了他的自尊心。」

後來，王文耀主動和陳伯達進行了溝通，兩人的關係恢復如前。陳伯達經過幾天專心的努力，寫出了一篇國際時事述評的長文，我們三個人都非常高興，陳伯達親筆工整地寫了個大信封，裝上文稿，呈

送給毛主席。主席很快就把稿件退了回來，並在稿子上批示着：「我看可用，在中央碰頭會上一議」。雖然沒有得到「很好」之類的讚揚的話，但也算是基本上肯定了吧，總算沒有白辛苦。

第二天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之前，我們為陳準備好了所用的文件，特別讓陳帶上這份文稿，送陳愉快地去開會了。三個人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等待結果。幾個鐘頭以後，陳伯達散會回到辦公室，我們急切地問他：「怎麼樣，大家對稿子有些甚麼意見？」陳伯達坐下來，很不高興地說：「沒有談。」我們說：「主席不是說在會上一議嗎？」陳伯達氣憤地說：「嗨，會一開始，江青就說她剛從主席那兒來，主席說你那篇文章根本不精彩！」我們便急忙問陳：「那其他人的意見呢？總理的意見呢？他們對主席批示也沒說甚麼？」

陳伯達說：「唉，江青當着大家的面這麼一說，主席批示的稿子我也就沒有拿出來。」我們聽了以後，有些埋怨地說：「其實你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看看，江青說聽主席說的不精彩，可是你這裏有主席批的『可用』的文字呀，看大家怎麼說。」

陳伯達嘆氣不語，辛苦了半天，就江青一句話給槍斃了！我們每每想到這件事就為陳感到痛心和不平。

記得後來在1970年廬山會議以後，陳伯達從山上回來，可能他向總理提過此事，周恩來總理將這份主席親自批示過的國際時事述評的稿子要了去，原因不得而知。

（十七）起草「九大」報告的糾紛

「九大」前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被否定後，在討論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時，陳伯達批評他們這個稿子裏只講運動不講生產，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的翻版」。

過了兩天中央開了一個會，張春橋他們對陳伯達的觀點進行了言詞極為激烈的斥責和批評，說他是「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的。」毛主席講話說：「有人在大船將要沉沒的時候，來個老鼠搬家。」陳伯達對我們很委屈地說：「在延安時，張聞天辦刊物，想留住我，我當時猶豫不決，主席也說過這話。他此時這樣說，是指我覺得搞運動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產的路，不能同他同舟共濟。毛主席還說我本性難改，總是看重經濟，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

(十八) 四屆人大籌備工作

1970年初，中央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兩個小組進行籌備工作，一個小組確定代表名額和選舉等問題，由周恩來等五人組成；另一個小組進行修訂憲法工作，由康生組成，沒有讓陳伯達參加。

1970年3、4月一次中央開會，毛主席以為陳伯達也參加了憲法修訂工作，就問陳：「憲法修改得怎樣？」陳伯達說：我沒有參加。主席詫異地說：「第一個憲法不就是你搞的嘛，怎麼這次你不參加了？」陳不知所措地胡亂答道：「嗯……大家照顧我。」主席不快的說：「你怎麼就喜歡讓人照顧呀！」陳支支吾吾無言以對。這是陳伯達當時回來告訴我們的。

經主席在會上這麼一問，陳伯達也就參與憲法修訂工作了。

一天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賴奎送來幾包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原始稿件來，包裝得非常精細，放在幾個用來包裝文物絹緞製成的盒子裏，陳打開翻閱時，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確係陳伯達的筆迹，修改的很多。

劉少奇和陳伯達

（一）陳伯達調解毛、劉之間的關係

陳伯達過去和劉少奇的關係不錯，他在主席身邊工作，有時看到主席與少奇之間意見不一致，他在中間就給予溝通化解一下，我們在陳身邊工作，也能感覺到這一點。

60年代以後，陳有時工作得不順利，在閒談中，也向我們流露出這一點，他對我們說：「少奇同志過去做過許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寫得很出色。他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在和王明路線鬥爭中，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風以後，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黨內第二位，這與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開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時變化很大，很突然，令人難以理解。他做事有時也挺武斷，別人不容易和他商量問題。可以說，他和毛主席的脾氣有些類似，在工作上和他接觸不多的人覺得他很溫和，實際不然。」

陳伯達說：「從少奇同志的思想來說，他和主席最早的分歧大概從抗日戰爭時期就有了。抗戰結束後，在與國民黨的和戰問題上，意見也不相同，但是知道的人不多，1949年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講話，1951年他對山西農業合作社的批語，毛主席都有過批評意見，但那時候的不一致，都是黨內同志之間的正常現象，毛主席並沒有當成大問題。總的來說，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仍然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後，高崗拿少奇的天津講話攻擊少奇，說少奇同志不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

議，當時毛主席是保護少奇，反對高崗的。後來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繼續發生矛盾時，毛主席就把過去的分歧聯繫起來了。」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報告。這個報告是陳伯達起草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都看過，毛主席也修改過多次。但是少奇同志在作報告以後，大家討論的時候，他又另作了一個內容不同的講話，對此毛主席有不同看法。

「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少奇同志又召開了西樓會議，對經濟困難做了比較嚴重的估計。而毛主席經過一些調查，認為情況已經在好轉，不應該悲觀，當時財政和工業方面問題多些，但是農業在落實60條以後，已經逐漸好轉。這時劉少奇主張農業要實行包產到戶。而主席知道以後，不同意，便立即要陳伯達起草一個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為了緩解他們之間的矛盾，陳伯達在「決定」中還汲取了部份劉的意見，寫上了在經濟落後地區和偏遠地區也可以搞包產到戶等內容。

陳伯達覺得，搞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搞集體經濟也可以增產。1962年全國大部份地區堅持集體經濟，包產到戶只是少數。在落實了60條以後，當年農業總產值增加到6%以上，1963至1965年全國基本上不再搞包產到戶了，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產11%。

陳伯達說過少奇同志對四清是積極的，他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他與毛主席的差別在於，他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基層，在下面；而毛主席認為問題主要是出在黨內，在當權派。少奇同志與毛主席歷史上就有過一些分歧，這時他們的矛盾又發展了。

鑑於團結的重要性，陳伯達曾努力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時，陳伯達向毛主席建議，說是否可以由少奇同志去總管四清運動。毛主席同意說：「好，一會兒就找他談談。」談得如何，陳不知道，沒想到，在討論制定二十三條時候，他們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1965年1月，中央開會討論二十三條時，會上，毛主席發言，剛講了幾句，少奇同志就插話，沒有讓毛主席把話說完，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繼續講話。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出了黨章，往桌上一放，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了，他是在說劉少奇不讓他把話說完。

這次會議以後的一天晚上，毛主席連夜把陳伯達找去，要陳起草一個文件，可是陳已經服了安眠藥，去了以後，主席口述，陳伯達暈暈乎乎記了下來，回來後起草了個稿子，經過中央會議討論，又再次修改後通過。這個文件就是後來稱作的「二十三條」。

毛主席找陳伯達談話時，表示了對劉少奇同志的很大不滿。這使陳伯達感到很不安，他覺得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團結極其重要，必須想個辦法避免事情發展。陳伯達便與當時列席會議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去找陶鑄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談，請他向毛主席作個檢討，以緩和關係。

陳伯達說為了調和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關係，他曾作過多次努力，這一點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都是清楚的。

（二）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

1966年5、6月，那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在家主持工作的是劉少奇、鄧小平。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許多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出現了反對校黨委或黨支部的大字報。北京大學的大字報震動很大。一些學校的領導工作發生了困難。這時，劉少奇經中央會議討論，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領導運動。起初學生普遍歡迎工作組到來，但不久，許多工作組把工作重點放在對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批判上，而對學校黨委或黨支部基本上採取保護的作法。結

果，一些學校對工作組有意見，甚至一些學校發生學生驅趕工作組的現象。

這時，陳伯達也到北大清華等幾所學校去調查了解，看大字報。有一天，陳伯達帶着中央文革成員穆欣等去了清華大學，王文耀也隨同前往。陳伯達下基層的習慣是不讓聲張，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現，他老遠下車步入清華大門，不引人注意，誰也不認識他。

一進清華大學校門，便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我們幾個人和學生們一起看大字報。由於學生們都不認識陳伯達，無人打擾和圍觀，所以他看得自由和隨便，時間也較長，相當一部份大字報他都看了。最突出的是不少大字報是針對一個叫蒯大富的人的，斗大的字的標題說他是反革命。

在看的過程中，有一個幹部模樣的同志隨着一起看，並似乎認出了陳伯達，便小聲對隨陳去的人員說：「我是駐校工作組的，那人是伯達同志吧？是否去屋裏休息一下，我們工作組向伯達同志彙報一下？」這位同志的話被身邊的陳伯達聽見了，他謝絕了。陳對這位同志說：「不用了，我就在這隨便看看。」

可能是這位同志回去報告了王光美，不多時，這位同志又回來了，他對陳伯達說：「光美同志本來要來請伯達同志，但因學生們都認識她，不方便，所以請伯達同志還是先去休息休息，聽一聽工作組的彙報。光美同志在那裏等着您呢。」就這樣，陳不好再次拒絕，就同意去聽工作組的彙報。

陳伯達等人在工作組成員的帶領下，走進一個很安靜的小院裏，會議室不大，王光美在那裏迎接。等大家都坐好之後，王光美環顧四周，本來想開口說話，但由於她不認識王文耀，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年輕人在場，以為他是一位混進來的學生，就沒有說話，並小聲地問坐在身旁的穆欣。穆欣告訴她那人是伯達同志的秘書之後，光美才放下

心來開始彙報。

王光美向陳伯達彙報了清華的運動情況，她講得生動有力，特別是當陳伯達問到蒯大富這個人怎麼回事的時候，她做了簡單的情況介紹後，說：「這個人呐，他的反黨情緒很厲害，反革命的氣焰相當高，幾天來，我們組織人輪流上台和他辯論，都辯不過他，他每次講話中都引用馬列的經典和毛主席著作，一段一段的。起初，我們以為有人為他寫稿，我們組織人監視他，沒發現有人和他聯繫。我們又懷疑校外是否有人支持幫助他，我們就組織人加強了校園的保衛工作，看是否有人翻牆過來。但也沒有發現校外有人與他聯繫。這傢伙的反革命氣焰可真大呐！」「蒯大富是江蘇濱海縣人，我們還派人到他的老家去調查，查他的出身，結果他家是中農，好像沒有甚麼問題。但是這個人很厲害，很頑固的。」「我們還準備組織人對他進行批判……」

陳伯達當時多是提問和聽取彙報，沒有明確表態就回來了。

此後，王光美曾坐着伏爾加牌小轎車到釣魚台十五樓陳伯達住地兩次。每次去都是在一樓會客室裏和陳伯達單獨談話，我們沒有參加。

陳伯達還多次到北京大學等學校去看大字報了解情況，我們也收到不少群衆來信，向陳伯達和中央反映工作組的問題。

面對這種局面，中央的工作會議上產生了不同意見。劉少奇認為工作組不能反對，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要把那些造工作組反的學生作為牛鬼蛇神揪出來組織批判。6月13日，劉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報告中批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畢業

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摘自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鄧小平支持劉少奇的意見，而陳伯達提出異議，認為工作組不應當對學生採取對立態度，在目前工作組與群衆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可以先撤銷工作組，避免衝突激化。這個建議未被接受。

大約是6月初，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等專程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毛澤東曾說過一句「可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但並未明確說明撤掉工作組。

回到北京後，根據當時的情況，陳伯達又兩次向中央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沒有經過討論均被劉少奇等否定。

這時候陳伯達的心情很不好，當我們給他看一大堆群衆來信，反映對工作組的意見時，他無奈地說：「我已在中央幾次講現在學生對工作組很有意見，我建議中央暫時撤銷工作組，可就是不同意，陶鑄同志在會議上說『你陳伯達不也是進駐《人民日報》的工作組嘛！』小平同志還對我不滿地說：『撤銷工作組，吃飯怎麼辦，誰管啊？！』你們看，工作組也不管學生吃飯呀！」

陳伯達在幾次撤銷工作組的建議被否定後，他在中央的處境是很困難的。這時一些學校的工作組的負責人和支持他們的某些中央幹部，私下把陳伯達稱為「右派的後台」，聲稱「北京有個大右派」。這使陳伯達在精神上受到巨大壓力，感覺隨時都有被打倒的可能，當時我們思想上也是作好了準備的。

就在這時，河北省有個皮影戲團來京演出，首先在中南海懷仁堂為劉少奇彙報演出一場（可能因為王光美在河北搞四清有關）。中南海警衛局值班室電話通知說：「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請伯達同志去懷仁堂看皮影戲（也許因為陳伯達在天津蹲過點的關係）。」

陳伯達接到這個電話以後很不安。因為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分歧

很大，心情不好，不願意去。他告訴我們說：「你回電話告訴少奇同志，我現在有些事，離不開，請他先看，不要等我。」我們如實回了電話。可過了不一會兒，又來電說：「劉主席說，不急，等伯達同志來了以後再開始。」

我們轉告給陳伯達，他聽了以後表現得更加為難，但少奇同志如此熱情等候，不能謝絕。陳伯達考慮再三，最後就匆忙地去了。

陳伯達去後和劉少奇、王光美寒暄了幾句，少奇便吩咐開戲。陳伯達雖然身在看戲，但心裏卻在琢磨如何脫身。戲看了一會兒，陳便向劉主席小聲說了點甚麼，就告辭而去了。

（三）陳伯達的意見終於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陳伯達過去和劉少奇關係一直比較好，從未發生過矛盾，還曾經為劉少奇起草「八大」政治報告，和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有時發生些矛盾，陳還設法調和化解。可這次，陳伯達與少奇同志算是第一次發生意見衝突，陳心裏很矛盾，但當時覺得派到學校的工作組與群衆發生對立，這是個很大的原則問題，只有撤出工作組才能緩解，覺得自己的建議並沒有錯。他堅持黨的領導機構再也不能和學生繼續對立下去了，他認為，青年人氣盛，對領導有些偏激意見可以理解，工作組不要和學生對立，應當引導教育，不應戴帽子強壓，我們應該汲取1957年的教訓。此時，陳伯達處於孤立中，他似乎已準備好因保護受壓制的群衆而倒台。我們看到他每次開會回到辦公室都是愁眉不展，苦悶嘆氣。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對工作組撤與不撤明確表態。只是讓中央文革小組給他送去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文革運動的簡報，並分別聽取了各方面

的不同意見，同時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第二天聽取了劉少奇等同志的彙報。

經過約一個星期，毛澤東才對工作組表示不滿。他認為前一段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他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北京一片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到7月24日上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搞。」7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各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6-67頁）

最後，陳伯達的意見終於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解脫了他較長時間的巨大壓力。這無疑促使陳伯達在毛、劉意見對立的情況下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執行毛澤東的決定。同時，也不由自主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許多不應該犯的錯誤。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陳伯達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建議最終被採納，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長時期那種認為領導者是絕對正確的，反對領導者是絕對錯誤的，反對某個黨組織的領導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為僵化的思維模式。

（四）運動的發展超出了陳伯達的想像

工作組撤銷以後，紅衛兵就起來了，毛澤東幾次的接見，全國大串聯，大家都起來造反，各級幹部都受到了衝擊。8月初各地幹部到北京來開會都惶惶不安。陳伯達看到這種情況，便向毛澤東建議說，

這應該主要是劉、鄧的錯誤路線問題。毛澤東馬上肯定地說：「對，是個錯誤路線問題，主要是劉、鄧的錯誤，其他人只是執行了這個錯誤路線，改了就好了嘛。」毛澤東把這個意思明確地在大會上向大家講了。他這樣一說，大家都被解脫了，感到輕鬆了許多。

陳伯達認為解放後，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也有不少幹部脫離群衆，經過這次運動，使大家改掉了脫離群衆的毛病，這就可以了。但是隨着運動的急劇發展，失去了控制，這完全出乎陳伯達原來的預料。

「文革」初期，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說話還算數，自從他生病住院後，就失去了權力，而且他過去有隨時去毛澤東那兒商談的習慣，也被江青嚴令禁止，說：「你以後不要沒事就去主席那裏閒聊！主席年紀大了，你不要去浪費他的時間！」她經常向主席進讒言，陳伯達就逐漸失去了主席的信任。當時成立的劉少奇專案組都是由江青一手操縱的，情況陳伯達一點不知道。當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聽到決定開除劉少奇黨籍，定性為叛徒等當作敵我矛盾處理時，陳伯達聽了大吃一驚。

三九

林彪、葉群與陳伯達

(一) 葉與陳的第一次單獨接觸

1965年12月，中央辦公廳通知陳伯達去上海參加會議，住在錦江飯店南樓。這次會議特別機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各首長的秘書、參謀等隨行人員：第一，不許外出；第二，不許向外打電話；第三，不許私自向外發信件等。如果有急事向外聯繫，必須向首長請示，經過批准後，才能辦理。這次會議和往常不同，沒有發任何文件和會議日程。參加會議的人以軍隊的居多，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主要首長都來了。隨行工作人員私下議論說，可能有重大軍事行動。會議文件是在會場上由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負責發放，會議一散當場收回，不許帶出會場。會後才知道這次會議是批判羅瑞卿。

第二天在錦江飯店北樓開會，下午散會後，很久陳伯達沒有出來，王保春怕他從別的門出去，就向會場的服務員打聽，服務員告訴說：你們的首長正在和葉主任談話呢。當時王保春並不知道葉主任是誰，服務員告訴他，是林總的夫人。才明白是林辦主任葉群在散會後，把陳伯達留下，在會議室裏長談一次。這算是建國以來，我們第一次看到陳伯達與葉群的接觸，他和林彪從沒單獨見過面。

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為接班人之後，陳伯達與林彪也沒有單獨來往過。由於林彪身體不好，中央的會議不是都參加，中央的日常工作會議都是由葉群代表林彪參加的。所以葉群常去釣魚台參加中央

文革會議。同時也常到釣魚台十一號樓去看江青。

這期間，有一天葉群拜訪完十一號樓的江青之後，又來到十五號樓，她來陳伯達這裏總比去江青那兒隨便些。去江青那兒只能在會客室坐坐談談話，而到陳伯達這兒就隨便多了，可以到別的房間隨便看看。釣魚台是國家一級賓館，接待各國元首，按當時的規定，每座樓內的房間分為團長、副團長、團員住房，十五樓的團長房間，東、南兩邊都是大窗戶，光線很好。但是陳伯達嫌光線太強，睡不好覺，就去住靠西邊副團長的房裏。我們倆由於文件櫃太多，靠北邊工作人員住的房子太小放不下。陳伯達就讓我們倆搬到團長房裏辦公。葉群到我們的辦公室視察，因為正是初夏，她發現這房裏的窗式空調器不錯，便問我們這是從哪兒買的。我們告訴她是外交部從香港買的，當時國內還沒有生產。葉群高興地說：「這個不錯，我回去讓他們也給林副主席買幾個去。」她還得意地說：「林副主席的汽車，我也讓他



2003年春節，王保春、王文耀與汪東興（中）合影。（王東升攝）

們從外邊（國外）買的。」當然，現在林是接班人嘛，她要甚麼都是很容易的。

（二）敏感的葉群不再登陳家的門

1966年下半年，陳伯達生病住院將近半月，待出院以後，他與江青在工作中不時發生矛盾。敏感機靈的葉群，從此就不再來陳伯達的家了，有時只是在電話裏問問好。在公開場合陳、江矛盾激烈時，江青在會議上攻擊陳伯達，葉群便出來明確表示支持江青。待散會回家以後，她用軍用電話機給陳說幾句安慰的話。這也可能是投機，也許是為了避嫌吧！

隨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陳伯達和文革小組內部的矛盾越來越激化。陳伯達受到一些老幹部的抨擊，同時也受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家中的妻子被送到山東交給了楊得志看管不許回京，名義上是休養，實為監禁。這時的陳伯達真可謂妻離子散，非常孤立無援。自己一人在辦公室，當時已有自殺念頭，經朋友勸說才沒有去做。

陳伯達實在不願意和中央文革小組那幫人在一起，不願在釣魚台住，就臨時悄悄地搬到中南海丙區一個四合院住了。但是住了沒兩天被江青知道以後，他住不下去了。這時葉群幫他臨時轉到養蜂夾道的中辦俱樂部游泳池邊去住。

這個時期，除了中央開會陳伯達見到葉群外，平時葉群不去陳家了。而且有些中央的會議也不通知陳伯達出席，陳自己也蒙在鼓裏。

（三）陳因工作受挫，而沉迷字畫

「九大」以後，陳伯達厭煩搞運動，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帶領中央

政治研究室，進行中、小學如何提高教學質量的調查上。還出了一本《教育探索》的不定期內部刊物，送中央領導同志參閱。而張春橋看後，馬上在上海也搞教學改革；陳伯達帶領政研室的同志，去天津到工廠調查研究如何恢復生產，建立工廠新的規章制度等等問題，又遭到江青、康生的攻擊，說陳伯達背著他們私自到天津名為搞工業調查，實為復舊。陳伯達無奈，一事無成，就去古舊書店翻閱古舊圖書，看字畫、古玩。

陳伯達這段時間，常跑古、舊書店，購買古、舊書籍很多，他的工資、稿費大都用在這方面，這也是他過去的一個習慣。購買一些舊字畫，在他的書房裏、臥室裏經常輪換懸掛。他很欣賞用美術的方式來概括文學作品。他這時較為欣賞的一幅舊畫《黃粱夢》，其內容是根據唐人沈既濟《枕中記》的故事而來的。故事是說有個盧生，在河北邯鄲一個旅店中，遇見一個道士，道士給他一個枕頭，他枕在上面睡着了。這時候店主剛要煮一鍋黃米飯，盧生夢見自己做了大官，娶妻生子，享盡榮華富貴，一覺醒來，黃米飯還沒有熟。後人用「黃粱一夢」比喻虛幻夢想一場空。

葉群除了常從陳伯達這裏拿字畫外，後來也學起寫毛筆字來了，而且拜陳伯達為師。她常把自己寫的習作用大信封加密，送陳伯達親收批改。

有一次，陳伯達笑着對王保春說：「葉群在學寫毛筆字，送來讓我看看指點，怕別人看見，她也不讓你們看見，怕你們笑話她。我給她改了些，你給她送去吧。」說罷將他用信袋密封好的「習作」交給王保春，讓去送給葉群。

王保春到了毛家灣，葉群對他特別熱情客氣，迎到客廳說話，問東問西，然後一定要留保春吃飯。保春再三推辭不過，只好留下。在一個小餐廳和葉群兩人就餐，菜餚一般。

陶淵明仙臥龍亭
采菊東籬陽松萬古平淡
二弟渠甫一念猶

伯達

陳伯達的書法

葉群也許猜想王保春看到了她寫的字，便在席間試探保春說：「伯達同志的字寫得很好呀！」保春回應說，是呀。葉群說：「王秘書，你的字寫得一定很不錯吧？」保春趕緊說：「不、不，我不會寫毛筆字。」保春心想，這裏可不能久留，便囫圇吃些飯菜，趕緊告辭了。

關於陳購買的字畫，陳曾說過：「凡是值得保存的東西，都請公家文物保管機構收存。」據悉，陳的大多數東西已按此辦理。

(四) 避嫌

1970年8、9月間，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原先議程上沒有林彪講話，可林講了。事後葉群將林彪的講話稿交給陳伯達看，陳看後覺得講稿條理不清，邏輯不順，想為其修改後印發。還未動筆，陳伯達就受到了批判而倒台。這時葉群看到陳伯達已經鐵定倒台，怕牽連到他們，便讓參加會議的軍委辦事組成員，把自己的言行責任，全部推給陳伯達。

周恩來與陳伯達

周恩來自建國以後和陳伯達關係一直不錯。雖然周、陳工作中接觸不算多，陳主要是協助毛主席制定黨的方針政策的，周是負責國家的行政實施工作的，但是，他們是互相尊重互相關照的。就我們所知道文革中的一些具體事實，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關係了。

（一）陳伯達任小組長和見報前後

1966年5月，中央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時，會前周恩來找陳伯達談話，讓陳當這個小組的組長，陳再三推辭。周說：我們黨就你的文化高，你當吧。

1966年7月，亞非作協在北京召開了緊急會議，聲討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7月9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熱烈慶祝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勝利閉幕。周恩來總理、康生、陳伯達、陶鑄等同志出席了宴會，總理和曼努維拉秘書長在會上講了話。

宴會之後，新華社送來第二天見報的新聞稿，讓陳伯達審閱。新聞稿中領導人的職務除周恩來總理外，康生的職務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伯達的職務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陶鑄的職務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陳伯達看了以後，將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

職刪掉了，然後呈送給周恩來總理審批。

總理接到稿件後，給陳伯達來電話，表示不同意刪去陳的文革小組組長職務。陳在電話裏向總理解釋他不願意用這個職務，說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就行了，不用那麼多頭銜。總理說不行。陳說那換上《紅旗》雜誌社總編輯，總理不同意。陳接着說，那改用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總理還是說不行，陳又說那用別的……。總理說你不用說了，都不行，就是要借此機會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名字打出去。

就為了這個新聞稿內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問題，陳伯達與周總理多次通話，陳糾纏了很長時間，大約一直到夜裏兩、三點鐘。總理堅持要用，陳伯達才無可奈何地同意。陳伯達掛上電話，離開辦公桌坐到沙發上，垂頭嘆氣地說：「唉！總理就是不同意呀，沒辦法，這下我完了！人怕出名豬怕壯呀！」

可也是，自從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職見報之後，全國各地給陳伯達的來信像雪片、潮水般地湧來，每天都一大堆信件。記得最多時，收發室一天背來三大麻袋，真是讓人開了眼界，甚麼形式的都有，甚麼急信、特急信、將雞毛貼在信封上的雞毛信、在信封上貼着紅布條的信、親啟信、血書等等，還夾雜着陳伯達親戚給他的信……。我們兩個人就是光拆信，都拆不過來，就別說看信了。我們向陳伯達彙報說，這麼多的信看不過來，建議另成立一個處理群衆來信的機構。陳在我們辦公室親眼看到此種情況，表示同意，同時也說：「我的私人信你們可別給當公事信拆了呀！」說罷，搖頭苦笑着說：「我對你們也沒有辦法，都是你們先看，然後才給我看，甚麼事也瞞不住你們呀，隨你們便吧。」

(二) 周遇困難陳盡力幫助

「文革」初期，毛主席不知何故對周批評過重，當時周處於困境之中，工作受到影響。這時陳和以前一樣，他可以隨時去主席那兒，陳就在毛、周之間進行斡旋，使其得以緩解，周繼續正常進行工作。

1967年8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一連接見了幾批群衆組織，特別是一批外事口的造反派群衆，他們在一些所謂「批判」陳毅的問題上無理糾纏。周總理連續工作了廿多個小時，由於時間過長，勞累過度，致使身體不支，心臟病發作。被人攙扶着離開會場，這時造反派群衆才離去。

不久，另一派外事口的造反派群衆，也集結在人民大會堂裏靜坐不走，要求總理接見。揚言「總理不見，我們就不散」！

起初，總理派辦公室的秘書前往對他們講，總理身體不好，不能前來，待總理身體恢復健康以後，再接見大家。他們不聽。總理又派李富春同志親自去見，富春同志對他們說：「我受周總理的委託，前來接見你們，聽取你們的意見，待總理病好之後再來接見你們。」

這些人還是不聽，起哄。富春同志嚴肅而誠懇地說：「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代表周總理來接見你們，請你們理解、體諒總理的身體狀況。」這些人還是不肯散去。

這天下午，陳伯達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在王保春的陪同下，親自去中南海西花廳（「文革」期間改為「向陽廳」）看望總理。約半小時之後，陳伯達返回釣魚台十六號樓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找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和他們商量去人民大會堂接見靜坐的群衆組織。王力他們認為這些組織是保守派組織，表示不肯去見，並且向陳伯達說：「你去找江青同志，和她商量去。」

陳伯達驅車到十一號樓找江青，江青推辭說：「身體不舒服，我

不去。」陳伯達無奈，又返回西花廳，向總理報告了情況，並勸慰總理好好休息，保重身體。然後，急匆匆出來，上車對王保春說：「我自己去吧。」

這樣他從西花廳就直接去了人民大會堂。

進大會堂的西北門，見到了李富春同志，他們一起走向主席台時，看到陳毅在主席台正中的麥克風前站立。台下的群衆見到陳伯達等來了，全體鼓掌、呼口號。陳伯達走向主席台，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趕快給陳老總搬一把椅子來，快請陳老總坐下來。」

待會場平靜下來以後，陳伯達說：「有問題你們可以提出來，陳毅同志是個老同志，他為黨作了很多工作，如果說他有甚麼缺點、錯誤，可以批評、批判。但是絕不能長時間地讓他站着聽你們的發言。更不能對他進行人身攻擊。陳毅同志能這樣虛心聽取你們的意見，已經很不容易了……」

緊接着，他批評會場大廳裏的人說：「聽說你們一定要求總理來接見你們，而且還說不見就不散！總理的秘書已經告訴你們說總理有病，你們都不理解。總理又派了李富春同志來見你們，還都不行？！你們知道富春同志他也是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嘛，他的話你們都不聽是很不對的！人民大會堂是國家開會議事的地方，你們長時間地霸佔着怎麼能行？！現在就請你們散會，請你們馬上離開人民大會堂！」

陳伯達說罷便轉身向富春同志、陳毅同志示意，請他們到主席台旁邊的休息室。這時，台下的群衆也開始向外轉移。

陳伯達回到釣魚台之後，讓王保春給大會堂打電話，問大廳裏的群衆走了沒有，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告訴說，領導同志走了以後，禮堂裏的群衆也都陸陸續續地離開了會場。

「文革」中期，中央研究重大問題，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來定。而江青想與周恩來對抗，她曾多次要求陳伯達召

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而陳只參加周主持召開的碰頭會，就是不召開文革小組會，氣得江青不斷到毛主席那裏告陳伯達的黑狀。

「文革」中期，周恩來總理負責成立中國科學院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工作。1967年7月30日上午，總理辦公室電話通知：今天下午2時，中國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請中央文革小組出席會議，並且說已經通知了中央文革辦事組。

陳伯達自認為總理費盡心機組織成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中央文革小組當然參加支持。便在下午1時半準備動身，讓王文耀去叫住在自己樓下一層的關鋒，陳自己在一樓大廳的休息室等候。王去找關鋒，關躺在床上未起，說他不去。理由是昨夜睡得晚，太累了，讓去找戚本禹，看他去不去。王出來告訴了陳伯達，陳說那就去找戚本禹。

兩人驅車到了十六樓，戚本禹住二樓，陳依然在一樓中央文革辦事組的辦公室坐等。王文耀上二樓找戚，王敲門無人應聲，便推門而入。進去一看辦公桌前無人，床前的帷幕拉着，王猜想一定在床上睡覺，先小聲叫：「戚本禹同志！」無人答應。王便輕輕拉開帷幕，看戚本禹蒙着頭在床上躺着。王大聲叫：「戚本禹同志！」戚猛地一手掀開被子，呼地坐了起來說：「我不去！」看來他是知道王的來意。儘管如此，王文耀還是說：「總理通知下午科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請中央文革去出席會議，伯達同志在樓下等着呢。」戚本禹還是堅決地說：「你告訴他我不去。我去就等於中央文革承認了。我經辦的單位成立革委會，都是有把握的，沒有把握的我不去。江青同志不去，你去找關鋒，他也不會去。伯達要去他自己去好了，但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可以以科學院副院長的名義參加嘛。」口氣非常傲慢無理。王一聽，知道他們互通了電話，便說：「那你就不再去了？」戚說：「嗯，我們不去。」王文耀說：「那我就告訴他了。」說罷便下樓到

辦事組。

坐等的陳伯達見王文耀來便忙站起來，急促地問：「怎麼樣？」因為辦事組有工作人員在場，王為照顧陳的面子，沒有立即回答。待一同走出辦事組之後，王文耀將戚本禹的話全告訴了陳伯達，並說，看來他們都是商量好的。陳說：「他們不去我去，不能讓總理在那兒等呀！」隨即兩人出門上車。

陳在去大會堂的路上，思索着，他對王文耀說：「他們（指江青等人）不承認這個革委會，我一個人也不好參加，我得去和總理商量一下。」到了大會堂，我們進的是西南門，先到北京廳（即118廳，在大禮堂主席台的南側），陳伯達單獨向總理講了情況，總理表示理解，並對陳說：你不便參加大會，可以見見大會主席團成員嗎？陳伯達表示同意。這時總理讓人從主席台上將大家請到118廳，總理向大家說了些陳有事不參加大會的原因，陳伯達向大家表示歉意並祝賀大會成功，然後便匆匆離去。

（三）陳處於絕境時周對其不拒之門外

1969年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被否定後，陳處於困境，在大會期間提名中央常委候選人名單時，周去陳家徵求他的意見。陳很想就此退出常委，沒有等陳說完，周就給攔回去說：「不要再說了，這是主席提名的，不許再推辭了！」周鼓勵陳不要洩氣，堅持下去。

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由於與「四人幫」的矛盾激化，陳伯達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而倒台。毛主席生氣地批評「三十多年來，我和陳伯達在一些大的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要說很好的配合了。」而周恩來向大家解釋說：「主席是說在一些問題上，而不是說在所有的重大問題上沒有配合過。」而在那種情況下，能出來為陳說這種

話，是非常不容易的。

陳伯達從廬山回京之後，孤獨一人在家，所有的文件停發，外邊一點信息全無。他多次打電話請求見主席，回答不是說主席有事，就是說主席已經休息不好打擾。給康生去電話，被其夫人拒絕不接。唯獨周恩來親自接了陳伯達的電話，並且安慰他：「國慶臨近，不要外出。藉此機會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對一些問題，好好想一想總結總結教訓。」這讓陳感到有些欣慰。

陶鑄與陳伯達

陶鑄與陳伯達，他們在30年代作地下工作時就有交往。全國解放後也是聯繫不斷。1961年初，陳伯達根據主席的指示，到廣東農村進行調查工作，陶鑄親自去農村對陳的生活多方關照。

陳伯達在農村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後，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兩人的觀點有較大的分歧。他們都比較直率，當時在農村討論時，爭論很激烈，如陳主張公社規模不要過大，社員收入不要平均等，而陶不同意。記得在農村一個小會議上（調查組）吵得厲害。在回到廣州小島招待所駐地時，我們一起去的隨同工作人員在院子閒談時，聽到同志們說陳伯達：「他提出這種問題，別人是不敢提的呀……」

陳伯達、陶鑄兩人在工作上有合作也有爭議，這也是正常的。他們在生活上互相關照。據我們所知，陳伯達在廣東農村進行調查時，陶鑄多次去看他，讓下屬安排好陳的生活。陶鑄出差北京常給陳伯達帶些廣東特產，如廣東荔枝等。有時送很多，陳怕吃多上火，就讓工作人員只留少許，其餘全部送到中南海的供應站去，分送給其他中央同志吃。

陶鑄知道陳伯達夜裏有時睡不着覺，躺在床上構思文章，但起床後就忘光了。文革初期，1966年春，陶鑄發現境外市場上有一種新的小型半導體錄音機出售，這種錄音機當時國內還沒有，他就請人從香港買了一台，在上海時陶將錄音機交給了陳伯達，陳很高興。當時大

家都覺得對這台機器很稀奇，陶的秘書將使用說明書和發票給了劉叔晏，劉當時付了由港幣折合成人民幣約800多元錢。回到北京以後，在釣魚台陳很高興，有時夜裏打開錄音機口述，第二天交給我們筆錄下來，然後交給他修改或作資料存放。由於夜間陳口述時聲音過小，聽不太清楚，我們就向中央廣播局借來一台大錄音機播放。後來我們工作忙不過來，就請解放軍301醫院在陳身邊工作的護士小徐，抽空幫助筆錄。

陶鑄和陳伯達在個人關係上，我們覺得還是很好的，但在工作中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有時不那麼一致。如「文革」初期，各學校都派了工作組，起初工作組進駐學校，學生普遍是歡迎的。但是不久就出現了問題，許多工作組把重點放在組織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上，而對原來的學校黨委，基本採取維護的作法。結果一部份學生反對工作組，還有的學校發生驅趕工作組的現象。這時陳伯達曾多次到清華、北大等學校去了解情況，覺得群衆對工作組意見很大，阻礙運動的發展。就幾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撤出工作組的建議，受到中央領導的反對。陶鑄也不贊成說：「你陳伯達不也是人民日報工作組的組長嗎？！你管的馬列主義研究院不也是進駐教育部的工作組嗎？」（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學員，都是從全國各地大學畢業生中選來的，先是陳讓下基層搞「四清」，文革後都撤了回來，在院裏無事，又是運動初起，陳說借此機會讓學員下去到各單位看看學習學習。而研究院作具體管理的領導，理解有誤，就讓學員們以工作組的名義到教育部去了。）陶鑄這麼一說，陳伯達回來很生氣，讓我們馬上給研究院領導打電話問是怎麼回事，並讓「馬上撤回來，自己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就去管人家的事去了」！陳當時在中央是很孤立的，有一段時間他很苦惱。後來中央領導同志和陳伯達去杭州向毛主席作彙報，當時毛主席基本上同意陳的意見。1966年7月底，毛主席回北京

之後，中央決定撤銷進駐各學校的工作組，由各學校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一如前說，1966年下半年，陳伯達因病住院。出院後，他在中央文革小組說話就不怎麼算數了，特別是年底以後基本上都是江青說了算，陳只是聽江青的招呼。1967年1月初一天夜裏，事先未通知，陳伯達已經睡了，這時江青說是去大會堂接見群衆，王文耀陪同陳去了。先是在大會堂東邊一個廳裏接見，接見的是甚麼人已記不清楚，當時王文耀由於過於疲勞，想休息一下，就坐在會議室的最後一排。沒想到一下子睡着了，會議散了，服務員清場時將他叫醒，並告訴他說首長們又去南樓接見去了。王趕緊跑到南樓的一個會場，見到陳伯達、江青等正坐在主席台上聽取造反派的發言。王坐下問身旁的人，這是接見甚麼人，有人告訴他是甚麼「武漢專揪王任重戰鬥團」。發言人說他們來京遭到陶鑄的反對，他們要造陶鑄的反……聽完這些發言之後，江青便嚴肅地宣佈陳伯達講話。王看到陳伯達愣了一下，看樣子是沒有思想準備，然後他似乎把在中央文革內部會議上批評陶鑄的話，給捅了出來。結結巴巴地講不上來時，江青在一旁還幫腔插話提詞。

這裏接見完，江青又急匆匆地帶陳到新華社禮堂參加另一個會議。在會上江說陶鑄搞甚麼「換頭術」，說將一張合影像片，在發稿前，讓人將陳毅像換成鄧小平。陳伯達借此機會，想洗清陶鑄說他在文革初期也派了工作組到新華社、教育部等單位的事。便讓王文耀在會上向大家說明，他當時讓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學員到各單位去是學習，而不是工作組。王文耀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只好在會上講了陳當時讓他給研究院黨委書記趙易亞打電話，請趙組織學員去向社會學習的過程，說明派去的是學習組，而不是工作組。

第二天，紅衛兵就將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衆組織時，所

謂揭發批評陶鑄問題的講話油印散發出來，一下傳遍全國。陳知道這一情況後，心情不好，他對我們說：「關於陶鑄同志，我都胡亂講了些甚麼呀，暈暈沉沉地亂講一氣。現在傳得到處都是，毛主席都看到了，說江青還在一旁幫腔……」他嘆氣說：「你看，這樣一來陶鑄同志再也不能出來工作了，……」又悔恨地說：「唉！像現在這樣，到處講話，讓人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看得出，他對公開批評陶鑄，有些內疚。從此他再也不主動召開會議。因此，常受到江青的攻擊，她也常到毛主席那兒告陳的狀。大約到1967年的2月以後，毛主席就確定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參加的人員也擴大了。

康生與陳伯達

康生、陳伯達雖然都是文化人，但是康生過去長期做地下工作，所以他疑心很重，對誰都要懷疑三分。而陳伯達被人稱為陳老夫子，確實是個懦弱書生。

康生在延安時，特別是在延安整風審幹時，曾風頭一時。全國解放後，初期任山東省委書記，因身體不好休息了一段長時間。直到60年代「反修」時，他想在宣傳理論界展示自己。但是當時陸定一主持中央宣傳部的工作，陸了解康的為人，沒有讓他插手，只是在中央成立的一個不屬黨和國家正式機構的中央理論小組任職。後來中蘇爭論明朗化，中央為寫理論文章，決定由陳伯達、康生為主要成員，成立了一個寫作班子，地點決定在釣魚台國賓館8號樓，工作人員由中辦和中聯部調去，有矯玉山、張西江等人。而這時康生捷足先登，住進了8號樓的主要房間（團長住的房間、副團長的房間田家英住，聽說陳伯達來了，田才讓出，待陳伯達去時，人都住好了），看到這樣，陳嘴上沒說，心裏有些不悅，加之康生住進以後，指揮這個，佈置那個。陳在那兒住了兩天託詞再也不去了。

1966年底，這時紅衛兵已經起來，鬧得很厲害。很多人都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來，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他們，幾個大廳都塞滿了紅衛兵。他們都對領導幹部表示不滿意，群情激奮，嚷嚷着要揪這個，要揪那個。在接見一批群衆（絕大部份都是學生）之後，又去

南樓接見另一批群衆的路上，這些領導人邊走邊議論。陳伯達苦笑著說：「甚麼『揪』『揪』的，又發明了個『揪』字，字典就沒這個字呀。」康生說：「有這個字，怎麼沒有呢？」陳伯達說：「唉，哪有呀。」康生說：「《康熙字典》裏就有呀。」後來康生回到釣魚台後，真的拿出字典給陳伯達看。其實陳並不是真的不知道有這個字，而是對用這種方式表示對批鬥幹部的不滿。在當時那種氣氛下他不好直說。實際上康生也不以為陳伯達真的不知道有這個字，兩人各有想法而已。

「文革」開始後，陳伯達和江青在一些作法、看法上逐步產生分歧，而康生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是和江青站在一起的，這是熟知內情的人都知道的。毛主席批示了一個關於日本問題的文件，陳伯達閱後當天我們就傳送出去了。而江青在一次會上攻擊「陳伯達封鎖最高指示！」康生在一旁怪聲怪氣地附和說：「反正我還沒有見到主席的批件。」「文革」中期江青在會上質問陳伯達：「《紅旗》雜誌社的幹部為甚麼不下放？」康生在一旁陰陽怪氣地說：「你陳伯達管的單位都是沒有問題的嘛?!」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稿被否定後，在討論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時，陳伯達批評這個稿子的觀點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這下就激怒了康生、江青、張春橋，過了兩天，在中央一次會上，康生他們就對陳進行了言辭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說他提出發展生產是主要任務的觀點，是「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陳倒台後，他們在報紙上反過來又說陳是伯恩斯坦的；1970年陳伯達在廬山倒了台，陳伯達去找江青談，沒想到江青沒說幾句話就帶陳去找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談。這時康生、江青他們，把陳伯達痛罵了一通。陳回來對我們說：「康生他們用盡了污辱、尖刻、謾罵之詞，真使人難於啓齒，我當時都羞得抬不起頭來。他們要我在大會上作檢討，我說

我現在腦子很亂，無法寫。康生主動說：『我替你寫』，我當時只好說，『謝謝你了。』」所以陳伯達在大會上的檢討，是照本宣科讀康生的文字。

鄧小平與陳伯達

(一) 高崗倒台陳建議鄧接替

陳伯達和鄧小平解放前雖然沒有接觸，但鄧小平50年代初，被調到中央是與陳伯達有些關係的。

陳伯達說：「高崗倒了以後，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見的。如何團結西北的同志是一個問題。我在一次和毛主席談話時說：『我曾看到鄧小平同志講群衆路線的一篇文章，寫得不錯。講功勞麼，大家都有一些，高崗有，鄧小平也有。鄧小平過去也在西北工作過，可以團結西北的同志。』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做過政治工作，西北有些幹部是從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出來的。我和毛主席談話以後不久，中央就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只是那時還沒有用這個名稱。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與我和毛主席的談話是有關係的。但是小平同志到中央以後，經過一段接觸，我又有些後悔，覺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問題。」

(二) 毛選第四卷註釋是鄧口述的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是胡喬木負責編輯的。有些重要註釋是鄧小平同志口授、田家英記錄的，鄧小平對第四卷的工作起了較大的作用。1960年第四卷出版時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是陳伯達和鄧小

平在北戴河商議後擬定的。

(三) 1957年反右鄧積極陳不積極

陳伯達說：「1957年當時北京大學校園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新華社和北大黨委向中央反映，認為問題嚴重，說北京大學已成了海德公園了。毛主席叫我看一看，我就去了。其實學生的大字報，就是給學校黨委和校領導提了些意見，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回來以後，我向主席說了我的看法。」

1959年2月2日，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曾這樣談到「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行，如1957年報道北京大學問題，說是右派猖狂進攻，鬧得很厲害，陳伯達去看，不是那麼了不起。」中央當時做出反右的決定，與那時的國際形勢是有關係的。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印象是很深的，擔心中國有可能發生同類事件。同時，各地整風中出現反蘇言論等，這些情況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決策都是有影響的。所以，黨的決策發生錯誤，是有歷史背景的。

陳伯達說：「我參加過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他在那次會議上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後來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責任的。」（據原中辦知情人士說，當時規定的5%就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1957年9月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中首次將知識分子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陳伯達出於對反右持保留看法，1957年沒有專門寫反右的文章。

(四) 陳家出事鄧安慰陳

60年代初，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黨中央、毛主席讓陳伯達寫幾篇紀念文章。正在他工作繁忙的時候，家中出了問題，他的大兒子由於工作和生活上的事，一時想不開臥軌身亡，當時沒有告訴陳。一天陳外出和鄧小平同坐一架飛機，在機艙裏鄧對陳講了一個古人突然失去兒子的故事。陳感到很奇怪。其實，這是毛主席要鄧提前給陳做些思想工作，防止陳知道後出甚麼意外。後來知道真實情況後，陳對鄧那次的安慰、關心，還是很感激的。

(五) 鄧重視休閒

1960年的一天，陳伯達和廖魯言，去中南海北門外的養蜂夾道幹部俱樂部找鄧小平彙報關於農業方面的問題。這時鄧小平正在那兒打橋牌，讓工作人員告訴他倆在會客室等着。他們在那兒等了將近一個小時，鄧才出來會見他們。會見時只談了幾分鐘就讓他們倆離開了，陳對此心裏很是不快。

(六) 農業問題上的意見不一致

1961年3月15日，陳伯達就農村問題，提出反對平均主義，建議全部實行按勞分配，分糧到戶的意見。4月14日胡喬木報送了主張群衆要求解散食堂就應該同意的材料；5月7日周恩來、5月9日朱德等提出了相似的取消食堂的意見。但是，5月13日鄧小平和彭真仍然給毛主席寫信，提出食堂問題比較複雜，不能一刀切，可辦小型食堂或自願結合等，他們的意見出現了不一致。這也可以說是正常的。

直到1962年對六十條進行較大的修改後，才作出完全取消公共食堂的規定。

（七）鄧主持起草的一篇文章被陳否定

60年代初，蘇聯和中國黨發生了分歧，兩黨進行爭論，中國黨成立了寫作班子，已經發表多篇文章。在1963年鄧小平主持起草了一封給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分送給中央各領導人審閱。陳伯達看後有些意見，並對鄧說：主席那恐怕也通不過，鄧不相信。大家都到了杭州，準備就此開會討論，會前毛主席問陳伯達：「你看這篇文章怎麼樣？」陳說：「我看不行。」主席很快說：「不行，你準備重搞！」實際上主席也認為不行。這樣開會討論時文章被否定了，決定由陳伯達重新起草。鄧不快地將秀才班子帶回北京，只留下兩個人，一個王力，一個姚溱。姚溱性格外向，陳有些不習慣，他不久也就回京了。不多久，陳伯達寫成了一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長文，發表以後反應不錯，又被印成小冊子廣為發行。

（八）鄧否定了陳關於工業問題的文件

從1963年開始，陳伯達經過了兩年多、近三年的精心細緻的調查研究，起草了一個關於我國經濟發展走向的文件。這個文件他考慮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反覆修改，約有一萬多字。1965年夏定稿後，呈送給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看。陳伯達說當時毛主席看後很興奮，還留他一起吃了頓飯，對他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了！」陳也很高興。可是過了幾天，中央常委開會討論這個文件時，陳也參加了，會上鄧小平說：「這個文件沒有提以

鋼為綱的方針。搞電子等新技術，大家都沒有經驗，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術恐怕不合適。還是一切照舊，穩當一些好。」毛主席聽了沒有說話，因為「以鋼為綱」是他1958年採納了別人（薄一波）的意見，已經正式講過，現在不好自己再否定。在場的其他常委也沒說話。陳說他看到這種場面，心裏非常難過。散會之後，他好多天精神不振，痛苦之極。

（九）對學校工作組的意見

1966年初陳伯達不死心，還專心致志在天津繼續搞工業調查。當時國內情況在變化，中央調他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各學校領導工作發生困難。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開會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去實地調查，看校園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聽取了一些人的彙報。認為群衆只是給領導提些意見，工作組不應該壓制群衆。為了緩解與群衆的矛盾，他認為工作組應當暫時撤出學校。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提出自己的建議，都被拒絕了。劉少奇認為工作組不能反對。鄧小平支持劉的意見，而反對陳伯達的意見說：「工作組撤了，誰管他們飯吃哪?!」陳伯達在會上很孤立，很苦惱。他無奈地回來對我們說：「小平同志說的話，我不理解，工作組也不管學生們吃飯呀！」7月19、22日陳伯達又兩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仍被拒絕。

7月25日，毛主席接見各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組時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算是最後支持了陳伯達的意見，這才使他從困境中解脫出來。

彭真與陳伯達

彭真和陳伯達，在30年代就相識，都是在華北地區作地下工作。解放後，又都在中央工作。

60年代陳伯達和一些人一起整理毛主席的講話稿，想有一個較為寬敞的地方，彭真把陳伯達安排在西城區的新建胡同一號安心寫文章。

60年代初，陳伯達搞工業調查，彭真主動讓陳伯達在北京市調查。陳到北京城南大柵欄的街道辦的半導體、多晶硅等小廠子參觀調查，彭真都給了很大的支持。

1966年初，陳伯達從上海到天津繼續進行工業調查，他找了天津市的胡昭衡、李樹夫等研究工業電子化和試辦托拉斯等問題。試辦托拉斯是陳伯達最先提出來的，後來劉少奇也講搞托拉斯，但是劉主張是要從上到下辦大型的國家托拉斯，而陳主張從下到上由民間集體辦，逐步發展擴大，自然形成，兩種辦法各不相同。這時陳想的就是專心致志地搞工業。正在這時，1966年的4月初，彭真打電話到天津要陳伯達回京。陳正搞工業調查入迷，不大想馬上回京，回答說考慮一下，但又有些不安，便給康生去電話講了彭真來電話的事。康生告訴陳：叫你回來是中央的決定，還是要顧全大局，你還是回來吧。

1966年4月中旬，中央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嚴厲地批評了彭真，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彭真幾次打電話給陳伯達，想

和他談談，而陳這時也心情緊張，他對彭真的秘書說，現在談話不太方便，回北京後再談。回北京以後，問題更加明朗，彭真幾次來電話，陳都以忙開會為由拒之門外。彭無奈，便自己坐車來到釣魚台十五號樓陳的住處，和陳單獨談話約半小時就離開了。這算是陳、彭的最後一次談話。我們想彭找陳的目的，可能是想讓陳在主席那裏從中斡旋，扭轉僵局，可是陳感到自己已無能為力了。

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我們見到彭真從北大門進來，看到他步履艱難地走來，這也是他在「文革」中最後一次參加中央會議。

第三章：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

接到一個意外通知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時15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室的尚同志來電話告訴王文耀說，鄧力群同志（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約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時去他家，有事要談。並囑託王文耀一定告訴王保春一起去。



王保春、王文耀與鄧力群（中）合影。（王東升攝）

二

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王保春、 王文耀下達一個特殊任務

7月13日傍晚，是一個陰天並開始下起了小雨。7時許我們倆騎着自行車冒雨到了鄧家。是鄧力群的女兒羅小韵開的門，進去後穿過餐廳，鄧力群和夫人羅凌韻正在用餐。互相打了招呼，老羅離開餐桌，帶我們先到客廳等候。客廳裏有位年輕男同志，他對我們客氣讓座，然後他自己去裏屋的沙發上坐着看書。

我倆由於天氣悶熱，就離開了客廳，去院子裏吹吹風。待了約一刻鐘，鄧力群從餐廳裏走出來叫我們：「來吧！」我倆便從院子回來，和他一起進入裏屋他的辦公室裏。互相寒暄幾句後就轉入正題。

鄧：我受中央委託，轉達對陳伯達的幾點意見，建議由你們兩人去看看他，作些工作，你們不要怕受牽連。你們去對他說：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陳犯有很多嚴重罪行，中央考慮到他在文革前為黨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時並沒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舉了那麼幾條。

2、他自己應該看到他與別人是有所區別的，他雖然是組長，但大量的壞事是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幹的，有些壞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壞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們也不聽他的，他也管不了，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這幾年給中央寫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數是為自己辯解的，這不好，應該正確對待自己。

4、這次在六中全會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寫上去。中央考慮到要和以前銜接起來，對這些同志作了說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應該集中精力治病，把身體搞好。精力好時，可以看點書。那裏沒有的書，可以提出書名，幫助他借閱。也可以寫點東西，研究點問題，如哲學方面的，這方面他比較熟悉。

6、你們幫助他把情緒轉過來，也可以對他有所批評，讓他不要再為自己開脫了。

7、把身體搞好了，情緒轉過來了，適當的時候，可以保外就醫或者特赦。請通知他的家屬，看望他的次數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甚麼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來，他自己也可以寫個條子轉給我，報告中央。

9、你們把這個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黨委報告一下，只說我代表中央交代這件事，今後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紅旗》雜誌社的黨委，可不必細說。

在這個星期之內去看他。可找我的秘書劉中海，請他聯繫時間、地點。你們去談後，再來談談情況。今天就是這麼件事，請你們兩位來。

和陳伯達談話後向中央的彙報（1981年7月16日）

根據鄧力群同志7月13日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們去醫院向陳伯達傳達中央的指示精神，陳聽了以後，他表示感謝黨感謝鄧力群同志。他對我們說：「在你們來之前，我在想，見了你們怎麼稱呼，過去都稱同志，現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見到你們怎麼稱呼，想了很

久，過去我們在一起都是老朋友，還是稱老朋友吧。」在談話中，起初陳情緒激動，後來平靜下來精神狀態較好，對自己的罪行不再辯解。現將談話情況報告如下：

和陳伯達談話的情況

7月15日上午，我們兩人去復興醫院向陳伯達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1、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多嚴重罪行的。但中央考慮到你過去為黨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時，文化大革命中你雖然是文革小組組長，但是，大量的壞事是江青、康生、姚文元、張春橋他們幹的。有些壞事你是知道的，有些你不一定知道，就是你知道了，他們也不聽你的，你 also 管不了他們。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訴書中只列舉了幾件主要的罪行，判決時也只是根據這幾件判的，是與其他幾個人有所區別的。這一點你也是看得出來的。

2、你過去給中央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數是為自己的罪行辯解和開脫的。這次六中全會上許多同志要求在決議中點你的名。中央為此作了說服工作，才沒有點你的名。所以，你要端正思想，正確對待中央的寬大，不要再在一些細節問題上為自己辯解了。

3、你現在主要任務是要養好身體，治好病。等病好後，可以給你創造一個條件，住下來看看書，研究些問題，寫寫東西，為人民再做些工作。

4、以後孩子看你的次數可以增多些，我們以後有機會也可以常來看你。你有些甚麼要求也可以提出來。我們替你向中央反映。

我們講了上述情況之後，陳聽了情緒很激動，他流淚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謝黨對我的寬大，我對不起許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責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點準備也沒有，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紀要」，但她給我看以後，裏面有些觀點是我提的（那時我正在學習《共產黨宣言》），後來毛主席批了。批的甚麼，我到天津才看到鉛印稿。歷史問題我不想多談了，你犯了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讓大家批判，批過了頭也沒有關係。可是當我看到報紙上對我有的批過頭了的，也忍不住總想辯解幾句。他說：我看到社論中點我的名時，我也想過是不是決議中沒有點我的名，有人有意見，說對我太寬大了，所以再點一下，這也沒有甚麼。

除此表態性質以外，他還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對社會的就業問題

他說：最近我從報上看到社會上搶劫、強姦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份是青年人。這使我想到一個問題，這種案子太多了，說明了是個就業問題。中國人口多，現在提倡計劃生育，我贊成。恩格斯也說過計劃生育。但人已經生出來了，就要解決就業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過：資本主義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量，把工人當牛馬，而社會主義是逐步減少勞動時間，剩下的時間搞學習和其他。馬克思這些話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蘇聯學習時期，那時蘇聯剛打完內戰，人民生活並不好，是很苦的。社會上甚麼東西都買不到，當時斯大林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社會秩序也還不錯。那樣艱苦大家都堅持下來了，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我相信我們的生活比他們那時好得多，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

實行七小時工作制？我看可以試試。以後還可以減到六小時工作制，有計劃地搞，這樣年輕人有了職業，有工作、有學習，也就有了奔頭了。不然，年輕人沒事做，晃晃蕩蕩，犯了罪光殺不行。我不是不主張殺人，殺少數可以，殺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調查，除調查工業外，還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調查，我問過很多家屬，他們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業，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雖然低，但全家合起來就多了。因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業多了，薪水不一定多。這樣大家都有工作，社會也會安定。我覺得這點很重要，所以特別給你們講。搞街道集體所有制，我不反對，但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就業問題。縮短工作時間，馬克思是在《資本論》第一卷裏講過。我覺得社會主義有兩種必要勞動，一種是生活必須，再就是留下來的資金不叫剩餘價值，也叫必要勞動。這個對工人說是可以說得通的。

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說：你們告訴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點事，寫一些東西。五幾年我先後在上海、天津、常州做過一些經濟調查。常州那裏有不少先進的東西，報紙上怎麼沒有見報道。對這些工作我很有興趣，想繼續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國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為了教育後代，我想寫一本解放前的中國工人狀況，對教育後代有好處。不能「數典忘祖」呀！當然就我一個人不行，得要有幾個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階級的遭遇記錄下來。這個工作我是很願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國史問題，中國文藝問題。這個問題是我看了魯迅的小說史對我的啟發，想寫一兩本小說的歷

史。想到這些我就着急，我已經被關了十一年了，不能總是關着，不能做事呀！

還有一個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話，給我100塊錢，我想吃點水果。因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難受。

以上紀要如有差錯，我們負責。

王保春、王文耀

1981年7月16日

除以上書面文字外，我們主要是口頭彙報。

當我們彙報完以後，鄧力群同志說：

下次你們去時，可以明確告訴他，治好病以後，不一定再回監獄，將來考慮一個適當的地方加以特赦。

讓他注意報紙上的一些理論文章，有甚麼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個短信。

他以前寫《中國工人階級概況》時，陳貞、姚洛參加過，不知姚還願不願意搞，可以問一下姚洛。原稿在甚麼地方？以後可以給陳看看。

鄧力群說，你告訴馬仲揚，問一下陳伯達的錢是否存放在《紅旗》，如不在，可以先暫借三至五百元錢，交給你們（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陳的最小兒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後你們可以輪班去，兩個星期一次，時間不一定很長，半小時至一小時。回來後我們通通氣。

我讓劉秘書（鄧的秘書），通知公安部，還給陳烤電治療。

你們下次去，可以問問他還有甚麼親屬，能夠照顧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劉忠海電話：

1、你們和陳伯達的談話記錄已經看到，裏邊談到鄧（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議再整理一個簡要的記錄，便於向中央反映。

2、領款問題，力群同志已與高登榜同志聯繫過，你們可到管理局計財處，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聯繫，電話：397265。

第二次看望陳伯達（1981年8月5日，下午3時）

我們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於8月5日下午3時去友誼醫院看望陳伯達一次（他4日下午被從復興醫院接至友誼醫院的）。住在醫院的三樓西頭，條件不錯。病房內有着兩張床位，有沙發、有衛生間。由市局一位同志暫時陪住。醫院規定病員不能聽無線電廣播，報紙由於剛去還沒有訂上。我們從中辦財務處代他取的壹仟元錢，讓陳辦了手續——寫了取款條子，從中取出100元交給陳零用，其餘我們代為保存。當時我們為他上街買了鋼筆、墨水、手紙、肥皂、布鞋等等日用品。

我們向他傳達了上次見他後向上彙報時，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

- (1) 陳現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監內。有甚麼要求可以提出來；
- (2) 讓他注意報紙上有關理論方面的問題，有甚麼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個條子也可以。他聽後再次表示非常感謝黨。

他談了以下幾點事：

一、關於劉叔晏：

1、劉叔晏搞某某同志的專案是打着我的名義搞的，所以這個錯誤第一應由我負責，第二才是她。

2、她為甚麼被江青送到山東去？是由於劉叔晏從專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為抓到了康生的把柄。我把這件事無意中告訴了江青，誰知江青與康生關係那麼好。江青要這個材料，劉死命不給，江青就報復把她趕出北京。

1968年劉叔晏逼我給她寫了離婚書，我寫了以後，她又不走，我向她要離婚書她也不給，說她留着有用，她預計到我是要倒台的。儘管這樣，她的錯誤我應該承擔的，還是要承擔的。現在我覺得把這兩件事說清楚，為她開脫一下。

二、十幾年了沒有上街，我從復興醫院來到友誼醫院時，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覺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報紙上也講了要發展小城鎮，這很好，很科學。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也是反對大城市的。他以蒸氣機為例，說自從蒸汽機出現以後，就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發展。

三、我從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講電子工業的，這篇文章對我很有啟發。但這篇文章只是講工業管理問題，而沒有講電子工業的發展對整個工業發展的作用。6月8日我寫了一篇，給那裏常和我接觸的那個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樣，看完後又還給了我。我給你們看看，是否可以這樣寫，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

我們讓他現抄出來，也算是對發展工業的一種看法吧。

我們勸他好好治病，他說：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

1981年8月6日

附：發表電子工業的作品（略）

力群同志：

8月11日陳伯達通過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經過市局同意）通知我們去拿他已寫好的兩篇材料，並讓我們轉呈給組織上參考。

陳現在醫院裏，改名叫陳健相。暫時由李玉元同志陪

住。

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兒子來《紅旗》雜誌頂替工作。陳在住院期間無人照應，市局和《紅旗》雜誌社黨委共同商定，從河北完縣將原在陳處工作過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來，暫時照顧一段時間。

陳曉農從石家莊來京，去醫院看過陳兩次，現已回去。

致

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1年8月12日

附：陳寫的材料三件

1、試說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問題

2、恩格斯論述「工業發展和城鄉融合」的問題

3、馬克思對生產資料的提法雜抄

其中〈馬克思對生產資料的提法雜抄〉據陳講，他看到報紙上的文章，在談生產資料問題上有些混亂，因此而查抄，供年輕人參考的。

此文送上後，鄧力群同志批示：

複印幾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喬木同志，幾份分送潤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1981年8月14日

力群同志：

8月27日我們去醫院看陳一次，將他孩子考上南開大學的事告訴他了。

這次去看，我們的感覺，他的精神狀態，身體情況比以前大有好轉，走路也略有見好，氣色很好。他對生活、治療都較滿意。再三表示感謝黨對他的寬大。

他摘抄了三份馬列書中的材料，讓我們轉呈。

從我們看到和他提出的要求，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1、他要從100元的生活費中買書（絕大部份都是馬列的書），看來這樣生活費就不夠了。我們覺得是否可以從毛選編委會借書給他看。如您同意，是否通知有關單位，辦理一個借書手續——證件之類。

2、他提出想看一些公開出版的雜誌（經濟的和哲學的書等等），我們覺得可以給他買一些這方面的書刊。這樣可以使他了解目前發展着的社會，因為從談話中看，他對社會太生疏了。

他的小兒子就要上大學了，需要100元錢，這個錢是從《紅旗》雜誌支付（因為他以後每月需增加部份開支），還是從我們代存的1,000元中出？望指示。如需要我們當面彙報，請劉中海同志通知我們。

另外，根據市局的王申同志講，他自己最近到南京去過一次，找到陳的二女兒陳嶺梅，她的情況較好，但她暫時不願意來京照顧陳的生活。已將此情況告訴了陳伯達，他很高興，同意他們單獨生活，一切暫時不動過半年以後再說。

致

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1年8月28日

附：陳摘抄材料三份（略）

1、《資本論》第二卷引述湯普遜的兩段文字

2、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的普遍化

3、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作日都是必要勞動

力群同志看後的批示：

複製幾份，分送耀邦、喬木、玉青、潤青、梅行、經濟組、理論組和我各一份

力群

1981年9月16日

力群同志：

9月15日下午，我們把陳伯達所要的書馬恩選集等，給他送去了。

李玉元同志已暫時回老家去收秋，是否還來，暫時未定。現在是市局的丘福澤同志陪住。陳的身體情況良好，可以下樓在院裏散步。這次去他談了以下問題：

1、他說：去年他們問我的財產如何處理。說我有一萬多元錢，還有我三次出國穿的皮大衣等衣物如何處理。我當時說，錢交給《紅旗》雜誌，衣物誰愛拿誰拿走。同時，我提出說，我那些書，有些好的舊版書（如二十四史，《文選》抄本等）可送給博物館，印色、印章是我低價買來的，我也不要錢了，送博物館，其他的書誰想拿誰拿走。他們說書他們不管，只管衣物和其他財產。不知那些書現在怎麼處理了。

2、他說，喬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會科學院的領導，

如果可能，我很想聽他們的講課，學習學習。

以上談話摘要，特此彙報。

致

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1年9月19日

1981年10月1日會見鄧力群同志

晚7時半，我們去鄧力群同志處，他問了陳的病情治療情況怎麼樣。我們向他彙報了陳的情況後，力群同志談了幾點指示：

1、可以找醫生談談，聽聽醫生的意見。同時可以告訴醫生對他的病能治療的，應採取積極的態度，盡快治好。現在醫院的條件總比復興醫院要好嘛，不要採取應付的辦法。治好了不光他度個好晚年，還可以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對醫院說這是中央的意思。

2、他那幾份材料，都印製了，已送給耀邦同志，紫陽、先念和有關同志了。

3、他要研究「中國工人狀況」的事，過去那些材料在姚洛（註：姚洛曾任陳伯達的秘書，後調到《紅旗》雜誌國際部任部主任）那兒，你們也可以告訴姚洛陳有這個意思，讓姚洛同志去看看陳，就說是我說的，他可以將稿子送去對陳談談。那些材料可以給他先看看，看後有所啓示，需要甚麼材料，可以到《紅旗》圖書館和中宣部圖書館找。姚洛如果他不同意去，可將稿子交給我。這種材料還是不少的，工商管理編過一些，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編寫的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還有一本《中國工人狀況》是吳成民寫的，這個人現在在人大，陳可能認識他。他過去是北大的一個頭頭，他一直搞工人運動，解放後到人大工作。陳將來編這本書，可能還需要他參

加。如果這本書編好了，也是一個貢獻。

4、我們說：陳伯達說他有兩件事他對不起主席：（1）是不應該推薦田家英去他那兒；（2）是田的哥哥在台灣的事兒，事先不知道，事後未報告。鄧力群同志說：主席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5、（保春說：我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您要隨時提出來，不要做錯了，又要……）那不會的，有我替你們說話，這是中央交辦的。

另外，力群同志說：馬洪同志問我，王學文同志問，他的有關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整理出來之後，社科出版社能否給他出版。我說只要你整理出來，是可以出版的。這本書估計印數不會太多，因為青年人不熟悉他，5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學生，他在延安講過課。他是我們最早講政治經濟學的，是第一個。所以借他還健在給出版好了。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材料 請收閱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1.10.5

附：勞動時間問題和蘇修帝國主義（隨筆）／陳健相（略）

1981年10月11日，下午

去醫院看陳伯達，將鄧力群同志10月1日的意見轉告陳伯達。同時將陳曉農給陳的信轉交給陳。並問陳還缺少甚麼東西，有甚麼要求。

力群同志：

11月24日我去醫院看陳伯達，陳說他看了《人民日報》10月20日張大簡同志的文章，其中有的說法不太慎重，如說：「馬克思沒提出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問題，只有列寧才明確地提出過。」陳說，不能這麼說，列寧也是根據馬克思的公式提出的。他說，作為《人民日報》，這樣說要謹慎才好。同時他覺得報刊的文章不宜過長，希望有機會向領導同志反映一下。

另外，我給陳買了些雜誌，他看了《外國經濟管理》很有興趣。其中有一篇文章，他讓我給您看看，先寄上請閱。

致

禮！

王文耀

1981年11月6日

1981年11月6日

下午王文耀去醫院看陳，送去幾本書並了解了一下他的腰部治療情況，談到他想出院的問題，情緒較好。

1981年11月13日

陳曉農從石家莊回到北京。電話告訴了公安局看護陳伯達的王申同志。

1981年11月16日

和市公安局的老蕭同志，公安局十三局的王玉惠同志，九局的孟處長一起，到中南海接收陳伯達家裏的東西。要陳曉農辦理接收手

續。取現金400多元，存款3,105.12元，糧票500多斤。

1981年11月23日

上午陳伯達從醫院出來，遷到團結湖居住。

下午我們去看望陳，他寫了個材料交給我們，希望轉呈上去。

1981年11月25日

將11月19日從地安門銀行改名存入沙灘銀行的原3100多元加利息為3900多元的存款，在建國門內大街29號，當面交給陳曉農如數收下。

劉中海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材料兩件，請轉呈力群同志閱示。

陳已於11月23日出院，現在遷到團結湖居民區居住。請報告鄧力群同志，有甚麼指示望告。

此致

敬禮！

王保春

1981年11月30日

電話：550064

附：1、馬克思論機器體系

2、馬克思列寧論勞動生產率

力群同志批示：

複印幾份送耀邦、喬木、潤青、梅行等同志

會見鄧力群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時許去探望鄧力群同志，他談了兩件事，同時提出讓調曉農來照顧其父親。

一、有關陳伯達的指示

鄧：陳現在搬到團結湖去住了？在甚麼地方？（我們告訴了他。）

鄧：告訴他（陳）寫的材料都複製了，除送耀邦同志外，還分送給主管的同志。

陳除了談到想整理中國工人階級概況，還有甚麼打算？下次你們見他時轉告他，我建議他集中力量先辦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請姚洛同志將稿子送給陳伯達，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給你們帶給陳。

他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應該計劃一下，先做甚麼，一件一件完成。現在不像過去有人幫助，都要自己去幹。

力群同志談到陳的生活時說：

凌雲同志給我談的只是調曉農一個人，未說曉農愛人和孩子。我告訴趙楓同志，安排曉農工作時，考慮他要拿出一點時間來，幫助他父親做點事情。

陳在南京的女兒，如果來了，可以從他那筆錢中解決點路費。

他們買電視機，就不一定買彩色的，買個黑白就行了。告訴曉農，要明智一點，注意影響。

二、鄧力群同志對出版社的意見

力群同志在問及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情況時說：出版社現在是誰在主持工作？

我們說：郭敬同志主要負責，陳伯林同志主持編輯工作，李克公

同志主持日常事務和出版發行工作。

力群同志說：你（保春）是黨委委員，我作為黨員、副院長告訴你，請你轉告李克公同志，並且在黨委會上轉達我的意見，出版社不能只考慮賺錢，把賺錢放在第一位，出一本書就要賺多少錢，否則不出。我最近經手處理兩件事，就反映出這方面的問題。有的研究所對出版社很有意見，其他的一些出版社也為了賺錢，出一些《七俠五義》等亂七八糟的書，發行幾百萬。該出的書出不了，有些老歷史學家寫了書，沒有地方出。為此喬木同志在幾百人的會上大聲疾呼，沒有地方出，可找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我也說過幾次，就是不聽。當初院黨組決定成立出版社，就是為了解決院各所出書的問題。這是出版社的宗旨，違背原來成立出版社的宗旨是錯誤的。如果只把賺錢放在第一位，以賺錢為目的，要是這樣就失去成立出版社的意義了。現在院長、副院長、黨委書記、常委的意見全當耳邊風，這是個甚麼問題？出版社屬院領導，作為一個黨員還有個下級服從上級的問題嘛！請他嚴肅地考慮這是一個甚麼問題。當然，他賺錢也不是為他個人，也是為國家、為職工多發點獎金。但不能把賺錢當成目的。我不是說不要成本核算，賺錢，而是總的算下來，有賠有賺就行了。院部補貼還不是用你們上交院裏的利潤，或者用科研費補貼？！

你先給他單獨談，然後在黨委會上傳達我的意見。

另外，類似「孔子研究」這些問題，你們編輯部門沒有把握，可以找那些專家們看看嘛，聽聽他們的意見，是出那本有價值，還是兩本各有特色都出？給人家一點審稿費。這些問題並不難解決。

1982年3月3日

鄧力群同志：

呈送陳伯達寫的學習筆記（節抄自馬克思的著作）〈工

業技術基礎的發展過程〉一份。

王保春、王文耀

1982年3月3日

同志：

送上陳伯達最近新寫的〈學習筆記〉一篇，他說是向黨的彙報。這個材料內容主要是摘抄馬克思著作的片段，說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和發展科學教育事業的重大意義。印少數幾份，供參考。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1982年3月20日

力群同志：

昨天我們去看陳，他為自己安排了學習計劃。這是他的學習筆記，他說，他現在重讀馬列，將此筆記，作為向黨的彙報。

特此送上。

致

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6年3月4日

附：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的和兩國「精神危機」（略）
(閱讀書報雜抄)

1982年4月23日，晚

陳伯達去西絨線胡同周揚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揚同志，由市公

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後據說兩人（由蘇靈揚、露菲陪同）談了約四個小時。

1982年5月14日

我們倆去陳伯達住地取回三個材料：

- 1、《談儒林外史》雜記
- 2、《讀三國演義》雜記
- 3、《西遊記》（未抄寫出來）

陳說：前次送的讀《紅樓夢》筆記，建議周揚同志看，能否用筆名發表。

力群同志：

上星期我們去陳伯達那一次。他現在的身體情況還好。陳告訴我們，他4月份去周揚同志那裏一次，談了數小時，回去後他覺得儘管受到些批評，但心裏很高興。他現在寫了幾篇文學方面的文章，現送上〈《談儒林外史》雜記〉和〈曹操與「青州兵」〉兩篇，現在他正在寫《西遊記》讀後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這兩篇連同前次送上的〈《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筆名發表，同時在發表之前，送周揚同志去看看，因為他在訪周揚同志時，曾談過此事。不知可否，請酌定。

王保春、王文耀

1982年5月21日

附：《儒林外史》雜記（略）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一篇文章〈求知難〉——記讀《西遊記》。他說這篇連目前幾篇，都是他在學習文學評論而寫的練習作。建議是否能分送喬木、周揚、胡繩同志閱，請力群同志酌定。

王保春、王文耀

1982年5月28日

附：〈求知難〉——記讀《西遊記》／紀訓（略）

1982年6月23日，晚

接蕭清河電話，讓我們去一下，陳最近又寫了個材料待抄出望轉送上去。我們去取回。（作者按：取回的是陳伯達一篇舊雜感）

1982年7月12日

陳曉農送來他父親近期寫的一份材料〈認識的漸變與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的頓、漸兩派〉。

看望陳伯達（1982年8月17日）

1982年8月17日下午5時陳讓蕭清河同志來電話通知去取陳伯達交給一篇文章——〈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雜記。

文耀去取時向陳說了周揚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覺得很好，但是總歸多年不接觸外界了。

然後陳談了以下一些意見：

1、我是看到報紙上對報考大學的反映等，我才寫了《儒林外史》等評論。這不是新的科舉制度嗎？這個比舊的更厲害，年齡只能

限到25歲就不能報考了。

2、對包產到戶，這是大事，劉少奇過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現在可以搞。小農經濟是可以搞起來的，美國就是，現在美國農業居世界首位。其實蘇聯也可以搞起來的，只是他們政策錯誤。農業到戶這是大事，發展是無情的！

3、發射衛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張震寰和科學家建議的，向中央寫了報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時我剛正式調到他們那裏（國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為了地上的，是把電子工業組搞上去。後來周恩來總理在中央會議上說過，我是關心衛星發射的（除總理外，別人不知道）。

4、1958年和張春橋、李友久向主席彙報時，會前我隨便說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機器換農產品，我說，這不是產品交換嘛。後來主席鄭州會議上批評我取消商品、貨幣等，我哪是這樣說了，這是誤會。但主席還是用我。

我寫了這篇〈黑格爾反對絕對〉，你們看看提提意見，我每一個字都仔細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們看了提出意見後再上報。

陳對我們還說：他住樓房（六層樓最上層）感到不方便，不能下樓，建議能到個平房住為好。

1982年9月30日

我們倆去看望陳伯達，他寫了兩份材料，託我們轉報中央。
即〈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科學、假設、實踐〉。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讀書雜記（〈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

弟」〉、〈科學、假設、實踐〉）兩篇，請閱。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2年10月13日

附：以上兩篇〈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科學、假設、實踐〉（略）

會見鄧力群同志（1982年10月30日星期一，晚8時至8時45分）

10月30日晚上我們倆去拜訪鄧力群同志，談了約一個小時，其要點：

力群：陳伯達現在怎麼樣？

王：情緒時好，時壞，有些着急。

鄧：他兒子陳曉農現在哪兒？

王：在院刊（《社會科學》）雜誌社圖書館。

鄧：他愛人（指曉農愛人）安排工作了嗎？

王：還沒有，在院（社科院）裏拿工資。

鄧：曉農的文化怎麼樣，這個人還踏實吧？

王：還可以，高中畢業，人老實，不怎麼說話。

鄧：那好嘛，他可以跟陳伯達學點文化，幫助抄抄寫寫嘛。

王：可以，但是曉農常愁請假不方便。

鄧：你們可以告訴杜敬（社科出版社社長）一下，就說我說的，曉農就是為照顧陳伯達調來的，可以請假在家照顧他父親，不要記考勤。

余文菲（陳前妻——陳曉農媽媽）還在石家莊？身體還好吧！這個陳……陳伯達的生活還好吧！公安局每月給多少錢？

王：陳的生活費每月100元，他常要買書，感到不夠。他看書習慣用筆劃，借公家的書他不好劃。

鄧：那1,000元還有吧？

王：可能還有一些，不多了。

鄧：不夠了，還可以從他的稿費裏再取一些。書是可以買一些的，讀書人是要有些書的，沒有書不行。

他寫的那些東西，都給中央的同志看了，有三篇文藝方面的（有關《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遊記》的）我交給了周揚同志處理，不知道怎麼處理的，他沒有告訴我。其他的都是我經手處理的。有的打字，有的鉛印，都分送給中央有關部份同志看了。其中有一篇（想不起是哪一篇了，較長，是佛教……題目想不起來了）大家較注意，覺得寫得好。這些文章的底稿，將來原稿退給他保存。我讓他們清理一下，有原稿退給他原稿，沒有原稿可退他一份清樣稿，留做自己保存。他這個人就是私心太重，情緒時好時壞，也就是私心的關係。過去就是因為這個栽了這樣大的跟頭，現在還是這樣想就沒有人管他了。他寫的東西有人看就不錯了，他現在要想到自己是個犯人和過去不同，那時是第四位，寫的東西不管怎樣，還登在主要位子上。

看望陳伯達（1982年11月2日）

陳伯達住院體檢兩天後出院，我們去看望陳，將鄧力群同志的指示向他傳達，並將帶來的幾種雜誌交給他看，他很高興，特別是他寫的文章〈求知難〉在《讀書》雜誌第10期上發表了，他非常興奮！表示要多寫點東西。

他讓我們作為私人關係，向鄧力群同志提出：《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有關「合作」的提法是說：「列寧沒有說過」不妥，請注意；關於「競賽」、「競爭」的提法，還是「競賽」為好，列寧也提過。

另外，他要求將他的書（馬、恩、列、斯著作）還給他，因為現在買，配不齊。如果不方便，借給他也可以。關於他的書稿，他請求還他，以作為自我批判參考。

看望陳伯達（1982年12月2日）

1982年12月2日晚上七、八點鐘，去看陳伯達，說他準備寫一篇「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的文章。另外他談了：

過去他寫過一個決議案（大約是經過63、64、65年調查寫成的，具體日期記不清了）其大概內容是：

1、技術革命（以電子為中心的工業革命，應該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2、「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要抓些突出的新技術

3、中央地方的工作的合理佈局等等（記不清）

此議案在常委會討論過，參加者有：主席、少奇、周總理、鄧小平、陳伯達。討論前主席看後很高興的對陳說：「這下我們搞工業就有個明確的路子了。」興奮之中還請他一起吃了飯。但在開會討論時，主席問大家怎樣？首先鄧小平說，「不行，還不成熟，不是以鋼為綱」。經他這樣一講，主席沒再說話，就被否決了。

另外他深有委屈地講：八大決議中提「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我提的，這沒錯呀，列寧講過的呀，是在列寧選集3卷811頁，第四卷，你們查查看。

註：此文，即《工業問題》（1963年開始起草。修改稿寫畢於1965年8月1日）

申請生活補貼

負責同志：

今年春天曾領取1,000元，用以為父親購買書籍及貼補



陳伯達在寫作中思考（王東升攝）



陳伯達大聲讀書（王東升攝）

伙食（父親生活費每月100元，除去房、水電、煤氣等費用，用以生活只80多元，而他因年老患病，在營養上需要加強，所以常要貼補些），現在已到年底，訂明年報刊又用去100多元，目前還剩100多元，已用不多時。希望領導酌情再批一些錢，作為繼續購書及貼補生活之用。

順致敬禮！

陳曉農

1982年12月27日

力群同志：

轉送陳伯達小孩曉農申請生活補貼的報告，請批示！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2年12月28日

請登榜同志批，可再支壹仟元。

1982年12月30日

力群同志已批，請持批示條找申辦高登榜同志，請他批示之後，才能到特會室取款。陳的存款還有多少？要報告登榜同志知道。

此致

敬禮！

劉忠海

1982年12月30日

看望陳伯達（1982年12月31日，晚6時至8時30分）

1982年12月31日，我們事先電話告訴他在他那裏吃飯。6點到陳家後，由保春親自做燜麵，這是過去根據陳的建議做過的飯，現在又照做了。大家都很高興，陳也吃了不少。

他的〈論一分為二、一分為三……〉已經完稿，待抄清以後再呈送。

我們沒有談話主題，只是隨便閒聊了一晚上。

陳得知周揚同志不慎跌傷，表示慰問，希望他以後別服用安眠藥了。

力群同志：

送上陳〈讀書筆記三則〉請閱。

王保春、王文耀

1983、1、31

附：讀書筆記三則

- 1、馬克思論工業革命的開端——鐘錶是第一個應用於實際目的的自動機
- 2、馬克思論工人多方面的發展和工藝教育
- 3、馬克思、恩格斯論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

探望陳伯達（1983年2月4日）

1983年2月4日（星期五），陳曉農來社科出版社講他父親生病發燒住進了公安醫院，讓我們去醫院看看。當時王保春已去人民大會堂開會，王文耀即隨陳曉農去醫院看望。陳住在公安醫院的五病室16號床位，陪住的同志介紹說，經大夫初步診斷是上感，支氣管炎，他昨天在家發燒38度多，今天早上試表體溫38度多，到下午降到37度，不太要緊。

曉農講可能前幾天他寫〈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的文章，有些緊張，晚上睡得太晚，夜裏起來小便有些着涼。

公安局陪住的同志講，如果再不好，就轉到友誼醫院去治。不過從現在情況看問題不大，在好轉。

陳伯達對文耀講了他寫〈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文章的情況，他說：「呈送時可說，我寫完就病了，沒有再看，如有錯誤，請批評指正」，將文章交給了王文耀，並再三交代：「你和保春仔細閱讀一下，逐句推敲。向我提出意見和建議。」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等〉文章，請閱讀，他講：寫完後生病了，沒有再看，如有錯誤，請批評指正。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3年2月6日

附：〈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等〉

1983年2月12日，下午

陳伯達住公安醫院5病室16號床，我們倆去看望。

1983年3月4日，下午

去團結湖陳伯達家去看望陳，並將陳曾寫的部份（八批）報送中央的文字材料原稿，經中央負責人看過後，現退回，讓陳自己保存

(都有中央領導親筆批語)。

市公安局通知，從今年2月份開始將給陳每月100元生活費，提高到每月200元，他自己負擔一切開支。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和秘密戰〉材料一份及以前報送過的〈工業技術基礎的發展過程〉一文中的更正一頁。請您閱處。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3年3月30日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讀一篇農村調查〉，請閱處。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3年4月5日

1983年4月25日，下午

我們去看望陳伯達，談話中他提出想找他過去的幾篇作品：

1、〈中國工業和中國資產階級〉，此文約在1939-1945年之間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

2、〈論譚嗣同〉、〈大石塔的變遷〉、〈真理的追求〉（1937年新知識書店出版）、〈文化戰線上〉（1939年生活書店出版）、

〈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艾思奇主編的《知識》月刊上登的）。

劉忠海同志傳達中央領導指示

劉中海同志1983年4月26日上午電話（保春接）：

1、陳伯達寫的材料，中央領導看了，建議他多寫一點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東西。尤其是近代史當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這方面他比較熟悉，有些是他參加寫作的。這樣的材料對後人很有用處。可長可短。

2、不要總寫讀書筆記。

3、寫現在有一定的困難，因為他對外邊的情況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太少。又看不到文件、材料。

4、研究一點歷史的重大問題。

文耀、保春同志：

你們給力群同志的信轉給我了。因為資料較散，找了許久也沒找全，最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到一套完整的資料，於是將有關材料借來了，現送去，請閱後歸還。

有事還是與老鄧聯繫，該我辦的事當盡力而為。

致

敬禮

邱得新

1983年6月17日

看望陳伯達（1983年7月21日，17時）

1983年7月21日（星期六）下午5時，我們倆去團結湖看望陳伯達。主要是中央有關部門讓他寫有關《「九大」前後》和《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情況》。還有關於延安「魯藝」和中國文學當中

的問題。他讓我們去看看他寫的這些材料，我們看了以後，幫助他回憶了幾件事，作了補充。

然後，交給我們一篇他已完稿的〈文藝的魅力〉的稿子。

看望陳伯達（1983年8月16日，下午5時至9時）

1983年8月16日（星期二）下午陳伯達通知我們去他那裏，主要是談前妻劉叔晏送給他的幾本書如何處理的問題。他決定將書退回，（只留下幾張小悌、嶺梅的照片）並讓我們向劉申明關係已經明確，以後不要再來往。談完此事後，接着說他對目前農村政策很犯愁，他說：農村個人勞動目前好，將來不好辦。中國以農為基礎，基礎壞了，其他不好辦呐，黨風不正主要在基礎，都為自己，如何糾正。馬克思說英國是小農經濟發展起來的，我說美國也是。農業的情況我了解一些，看了不少材料（報刊），這裏（指工作人員）有人家就在農村的，關鍵是個體勞動，將會兩極分化的。

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沒有看到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經過艱苦的勞動，找出了社會發展這條科學的規律，預見到將來，這沒有錯。

談完之後，他交給我們一篇寫好的稿子〈關於新陳代謝〉。

附：關於新陳代謝（略）

保春、文耀同志：

關於陳曉農同志寫信要求批給500元錢事。力群同志已批，請你們照過去的辦法到特會室去領。另外，你們到中南海來一下，我這裏同時給你捌拾元錢，請你一並轉給他。

其次，前次我已打電話給你們兩位，轉告陳：中央同志

希望他寫一些有意義的回憶材料、文章，少寫些評論感想的材料，還是請同他談談。

敬禮！

中海

1983年9月23日

劉忠海同志（鄧力群秘書）交辦的兩件事

1983年9月底的一天，劉忠海同志通知王文耀去他辦公室一趟，有事。接電話之後，當天下午3時文耀去中南海書記處院內，劉忠海同志的辦公室。我們與劉忠海打過三年多的交道。過去是只見其文、聽其聲、未見其人，今天算是第一次見到他。他頭髮略有花白，高高的個兒，長得很精神，態度嚴肅、莊重。我們互相握手自我介紹之後，劉讓文耀坐下來，這時他說：請你來，有兩件事告訴你，第一件是，1983年9月26日陳曉農向中央負責同志寫信，要求從他父親的存款中取出壹仟元錢來，以購置父親的一些衣物、被褥等。老鄧已批同意了，請你拿去辦理。

第二是，陳伯達有一篇文章，在內部刊物上給登載了，稿費交給你。（說着他從辦公桌的抽屜裏取出一個信封，裏邊裝着人民幣，交到文耀手中）。這是80元錢，不要告訴他是甚麼錢，這些錢和申請要的那些錢放在一起，不說是甚麼錢就是了，免得他知道了對別人亂說，引起別人的意見。

另外他說：前些天送來的那兩件材料，也已送去排印了。並說，中央很重視他的東西。他說我上次給你們打電話，說讓他今後多寫一些有用的東西，不要寫甚麼雜記呀，感想呀甚麼的。因為他也不了解中央和地方的情況，寫那些都是些不趕趟的東西，沒有用，白浪費時間。他應寫一些過去中央的重大事件等回憶錄。這些對中央對後代有

用處，因為有些是他經手和參加了的，別人不知道，不寫就完了。這是耀邦同志看了他寫的東西以後說的。這樣老鄧就叫我告訴你們倆，給陳好好談談。讓他不要再寫這些了，應寫寫我上邊所說那些。

去醫院看望陳伯達（1983年11月3日）

1983年11月3日晚農來社科出版社找王文耀，說他父親生病住262醫院，主要是胳膊疼，住院檢查一下身體。說他父親的情緒有些不好，希望我們能去看看。王保春因公出差，王文耀去了262醫院，先向大夫了解了一下情況，大夫說經過檢查，問題不大，就是精神狀態不太好。文耀見到陳和他說了一會閒話，他的情緒好多了。文耀告訴他盛柳從東北來京，給他帶了一瓶藥「刺五加」，他接過後表示感謝，並說下次再帶來時，就說是你們送我的。

1983年9月25日王文耀回家在院門口與邱得新（曾是鄧的秘書）攀談了一會兒，提到陳想要他過去寫的文章（「四人幫」印出來作批判用的）。邱說他也不好找，還是要通過鄧力群好，邱說他不好直接與我聯繫。他說到外邊有人說老鄧與陳聯繫犯了錯，後來知道是鄧小平讓老鄧做這件事的，這才好些，平靜下來了。

去醫院看望陳伯達（1983年11月18日，4時）

1983年11月18日下午（星期五）王保春、王文耀兩人去262醫院看望陳伯達（他保外就醫後改名叫陳健相）。曉農不在（他今天去石家莊探望母親去了），有個新來的小張在照顧。陳的身體還好，精神狀態比上次好。他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1、局裏同志（市公安局）問我開始整黨了你有甚麼看法，我說：很好，鑒於過去的教訓，步驟要以自我批評為主。當然自我批評也會有假（如1942年時有的說自己參加了紅旗黨，結果都是假的），

不過以後都是可以慢慢落實改正的，總比亂批好。

2、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感謝你們。我被關了十四年了，我這麼想，如果上邊不找你們，你們不要為我去找上邊了，不要連累你們，因為你們約了這麼長時間都不見，不知有何變化，今後如不方便，可以少來看我，因為現在開始整黨，以免影響你們。

3、想看看我的「反動言論集」的第一冊。我過去寫的這些文章自己都想不起來了，而這個集子收得這樣全，這是江青一大功勞，我要感謝她。但第一集是些甚麼，我想看看，後邊幾集也想看看。五頂帽子的根據，想看看，不方便就算了。第一集可能是我入黨前寫的，那時還是小孩子，不過我想也是比較進步的。將來再印還可以用這個名字，「叛徒、特務、托派、國民黨反共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還應加上「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或者標題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副題為「叛徒、特務、托派、國民黨反共分子、修正主義分子」。

「說實在的，我年輕時（入黨前），想的就是兩件事。一是想搞文學，當文學家。二是想談戀愛，我在中學教書時偷偷地愛上了一個姑娘，搞得我暈頭轉向，當她知道（我給她寫了個條子）後，她也喜歡，可是她說這怎麼能呢（我雖然不是教她那個班，可是也是他們的老師）。後來由她父母做主，嫁給一個門當戶對的僑商的兒子了。以後那個男的把她甩了，她帶個小孩很苦。所以說，我青年時沒有野心想當官。

4、最近我寫了一個〈社會主義農業問題〉比較長，有機會請你們看看，甚麼時候往上送，送不送，再說。工業我已經寫了，送的那個《黑格爾反對絕對》就是。我有話不寫出來也不好，不好受呀！

5、周揚他講那個幹甚麼？太不慎重了，隨便講，那麼多的大問題不講，如生產關係、生產價值等等。所以說科學的東西千萬不可隨

便講、亂講。」

會見鄧力群同志（1983年11月20日）

1983年11月20日（星期四）晚上7時我們去鄧力群同志家拜訪他。一進門，羅凌韵同志告訴我們現在有個客人，請我們客廳外稍等。後來老鄧知道是我們，就讓進了客廳。一看原來那客人，是前馬列學院的王正萍同志（現在上海市委黨校），多年不見，我們也握了握手。寒暄了幾句，然後力群同志與我們談話：

鄧（力群同志）：陳伯達怎麼樣，他主要是甚麼病？

王（保春、文耀）：前天我們去看過一次，主要是骨刺，胳膊有些疼，頸部不能自由轉動。

鄧：沒有甚麼別的病？

王：大夫沒有講有別的病。

鄧：精神還好吧。

王：時好、時壞，住在六層樓，見不着太陽很着急，樓太高，陽台上不敢去，害怕。

鄧：可以靠窗戶坐着曬嘛！

王：有人和他說說話就好些，可我們沒有時間，只能一個多月去一次。

鄧：他現在看書多嗎？

王：看書多，沒有別的事，幾乎整天看書。

鄧：我看他寫字還有力氣，寫得挺好。

王：現在他瘦了，比上次去有明顯消瘦，可能心情不好有關。

鄧：瘦些好，年歲大的人瘦點好，你們可給他買本《按摩與健康》的書，一本小冊子，看着自己做。我做了很有效，早、晚、白天做，做多少次都可以。自己做不行，可讓那裏的醫生幫助做。

王：他對這次整黨，表示很贊成，說主要應以自我批評為主。

鄧：我看到他的反映了，決不像他們那樣整人。這個人讓他多活些時候好，讓他看看這幫人幹得比他們那幫怎麼樣？他對鄧小平同志意見很大，我是知道的。是怎麼回事呢，1963年不是有個關於工業問題的決定嗎，送主席以後，還當着他的面，主席問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講，還不成熟。呵，後來他很有意見。他這個人呐，在順利的時候，他不找我，在他不順利的時候，他就找我談，想得到我的支持。他給我說這件事，我講，這是黨內常有的事，起草一個文件有的同志贊成，有的同志認為不成熟，不成熟再搞一搞不就成熟了嘛。可怎麼說也不行。

王：在萬壽路六所時那篇（一篇國際方面的文章，題目記不清了），他不就生氣了。

鄧：那是他對康生很有意見，他和康生是好朋友，我對他一直是好心，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我要是他早不理他了。

王：這個我們去看他時，多次他表示對不起你，對不起大家。有時情緒激動得流淚。

鄧：他罵我罵得很多，有些事簡直莫名其妙，我都不去記他。

王正萍：他在研究院說，你是秘書長專政。

鄧：我到《紅旗》雜誌社，是他多次提出要我，後來搞到劉少奇同志那兒，少奇同志說話我才來的。少奇同志倒台後，他說我是劉少奇安插到《紅旗》來，是奪《紅旗》的權的。哈哈，真是莫名其妙！

他罵我是很多了，罵我不學無術，但整理個記錄還可以。這對我刺激很大。他有一件事是我不會忘記的，當然也不光是我了，就是到幹校後，他對軍宣隊說：（1）這些人都是讀書人，當然勞動是不可少的，但要給他們讀書的時間；（2）晚上不要安排甚麼會議，由他

們自己支配；（3）生活上安排好，他們大部份人是南方人，搞一些大米甚麼的。

這樣我就是很感謝了，每天晚上看兩小時書。人家不是說不學無術嗎，自己就學一點嘛！這一點還是很感謝他的嘛。也希望這個人能多活幾年，看看我們這一班人比他們那班人幹得怎麼樣。

他的生活還好吧？現在每月200塊錢，不少了。

王：是200塊錢，現在廚師沒有了，做飯的是他兒媳和曉農。

鄧：當然，調曉農和他媳婦，就是來照顧他的。還有困難？有困難還是解決了。不少了，最近不是又批了1,000元嗎，不少了，已給他置了一套家具，沒有甚麼好買的了。曉農和他愛人都有工資，兩人也有100塊錢吧？

王：是的，曉農是三級工，有50多塊錢。

鄧：是呀，曉農夫婦倆100多加上200，每月300多元三個人每月80多元，加上一個小孩，夠花的了。他的生活比你們好，可以了。這一點要告訴曉農，注意影響，鄰居的影響。他是個犯人，太特殊了不好，說他兒子沾光，對曉農不好，反過來對陳伯達也不好，要注意。

王：我們也告訴過他，少買些書，他還買一些補藥甚麼的，花了些錢。

鄧：不要亂買藥。吃藥一定要經過醫生開方，能報賬的報賬，報不了賬的自己買一點。不能自己亂買藥吃，安子文同志就是自己亂買藥吃壞了。在這個醫院治不好，在那個醫院治不好，他的一個兒子，在這兒聽說吃這個藥好，在那兒聽說吃那個藥好，結果吃壞了。

你們還是給他買一本按摩的小冊子，《按摩與健康》，做做按摩，對老人很有幫助。

我們談了一會兒，這時工作人員請力群同志吃晚飯了，我們就告辭了。他送我們到門口時，便問：杜敬同志怎麼樣，他還在休息？他

現在住在甚麼地方？我們告訴他：杜敬同志還在家休息，他現在搬到皂君廟去住了。

力群同志：

送上陳曉農向中央寫的報告一份，請閱處

此致

敬禮

報告：（略）

王保春、王文耀

1983年12月2日

看望陳伯達（1984年1月4日）

1984年1月4日（陰曆元月初三）我們去向陳伯達拜年。我們告訴他〈試談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已於11月20日送上，還無反映。接着我們閒談了一陣，多為學問方面的。他目前在研究但丁的問題，但是買不到但丁寫的《神曲》，讓我們給他設法借一本看。為此，他事先給我們寫了個條子，現在親自將條子交給我們：

保春、文耀二位老朋友（原寫同志，後想自己已不是共產黨員，因改之）：

我很想借看朱維基譯的《神曲》，那是按詩歌形式譯的。現在買不到。我這裏有一本是用散文體譯的，同原文有差錯。請你們代向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借朱譯的，看完後即退還無誤，不知方便否？謹託。

幾年來蒙你們多方的照顧，當然，你們謹守紀律，是在黨的紀律範圍內照顧的。借此書事，如不方便，只好做罷！

祝你們大家新春如意。

知名

1983年12月21日

臨別時，他將寫完的〈試說但丁〉稿交給我們看，但不上報，看後即還。

(這是陳看《神曲》散文體譯本後寫的，他認為朱維基譯的詩歌體的本子好，讓我借，我向中央宣傳部圖書館為其借了一套(三本)他看得較詳細。)

附：試說但丁〔筆記〕(略)

力群同志：

送上陳伯達寫的文字兩篇，一，〈人類兒童時代閃耀的科學微光〉；二，〈過海的故事〉。據他說第二篇是他的親身經歷，內含自我批評之意。

陳說，由於整日坐屋裏，長期脫離外界社會，情況不大了解，今後政治方面的東西基本上不寫了，如果精力可達，寫一些偏重於學術方面的東西。不妥之處，望指正。

此致

敬禮！

王保春、王文耀

1984年3月24日

劉忠海同志的電話

1984年3月30日下午，劉忠海同志給王文耀來電話談到以下情況：

你們轉來的兩件材料收到了。耀邦同志看了有些生氣。你去告訴陳伯達，讓他不要寫那些現實的事情，他不了解情況，觀點都不對頭，是錯的。不要像「四人幫」那樣引用那麼多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話，白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他寫的東西送來，這裏要打字、排印等等花很多時間，文件、事情又那麼多，看完之後，又沒有甚麼啓發。他那麼大年紀了，沒有多少時間了，費那麼大的勁力寫出來，大家又花時間去看，又沒有甚麼啓發。因此，請你去告訴他寫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回憶。他在主席身邊，比如，在西柏坡開了一個甚麼會，研究一個重大問題，都是誰參加的，主席是怎麼說的；如在延安對一個重大問題，主席是怎麼說的，都是誰參加的，等等。這對他來說是很多的，別人是不知道的。他寫出來對後人很有用處。不是要他寫甚麼交代材料，也不是要他寫分析意見，而是請寫出那些事實就行了。為的是對中央對後人留些有用的東西。

簡言之：

所轉東西收到了，胡不甚滿意，請轉告他：

1、不要寫現實，不了解外界情況，觀點不對。

2、不要引那麼多經典，太費時間。

3、寫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留給後人，這對陳是不難的。（如西柏坡、在延安等研究重大問題，都誰參加、主席是怎麼說的等等）

4、不是寫交代材料，是寫出歷史真實，不加分析意見。

5、要珍惜他的時間，年紀大了，時間不多了，要寫些有用的东西留給後人。

（4月17日文耀到一位同志家作客，聽說：陳寫了一個農業方面的材料，鄧小平同志看後，很生氣，和當前形勢不符。不知是否是真的。看來和上面所接電話在生氣的人的姓名上有出入，也許兩人同時生氣了，也很難說。）

註：由於陳伯達是一個被判刑的犯人，在服刑期間無言論自由。所以除一些學術性文字以外，大部份引用馬、恩、列以示觀點無誤，因此，使一些領導人感到不滿。

1984年5月25日接到有關領導通知，讓我們與陳伯達的政治聯繫到此為止，陳有甚麼可上報的材料由看護他的公安人員傳遞。從此，我們歷時三年與陳的公事交往就此結束了。以上是我們收集整理的部份材料。

附：2005年我們看到鄧力群《十二春秋》有一段話

為陳伯達寫的材料胡耀邦對我責難

我到杭州以後，在下一個星期一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陳伯達寫的材料，說：陳伯達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引用列寧的話來教訓我們，這樣的事情是鄧力群幹的，鄧力群不能這樣幹，今天他不在，等他回來以後，要和他談這個事。喬石出來說：王力出來以後，表現瘋狂啊！

為什麼會出現陳伯達寫材料的事呢？這裏需要回溯一下。處理「四人幫」問題的時候，王力、關鋒免於刑事處分，從拘留所放出來後回家了。陳伯達是保外就醫，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幾個人出來了。他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做研究工作和寫理論文章的，出來以後，還可讓他們繼續做點研究工作，寫點文章。你去和他們聯繫一下。胡耀邦這樣安排是好意，我當時就問胡，以甚麼名義去和這幾個人聯繫？胡耀邦說，代表中央。這樣，我就找王力談了。王力這個人不安分，給我惹了一些麻煩，先不去說它了。至於陳伯達，我就想到「文革」中他這

個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最使我討厭的是，他那時每次去《紅旗》機關，都要問鄧力群死了沒有。因此我對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來的兩個秘書王保春、王文耀，讓他們去與陳聯繫，轉達中央對他的這個意見，說明他出來後還可以做研究工作，為黨做點事。後來，陳伯達陸陸續續地寫了些東西，有些東西屬小品，有些東西還有些看法。其中幾份，我還交給了周揚，讓周想辦法處理一下。有一份講對佛教的一種理解，我覺得有點意思，後來化名送給遼寧出版了。大約是1984年春天，陳伯達送來一份根據報紙材料寫的東西。那個時候，對重點戶、專業戶進行貸款資助，陳把這些材料彙集起來，然後說：根據列寧的主張，對合作化將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而我們現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個體戶。陳伯達認為這違背了列寧的教導。以往陳伯達送來的東西，都在小範圍裏給幾位同志看看，都沒說話；而這份東西我沒看，當時我正幫鄧小平同志準備二中全會的材料，也照樣送給有關人看，胡耀邦看了後就發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陳伯達寫的材料時，認為與自己的意見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氣了，就忘記了這原本是他佈置的工作。

那次會議，書記處研究室蘇沛列席旁聽。我那時在杭州，他就來電話說：胡耀邦發了脾氣。喬木也為這事為我抱不平，他說：看來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喬木好像要為這事寫信，那時陳雲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這時正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關於富民政策的文章。喬木對這個富民政策也不滿意，想就這個問題給胡耀邦寫個意見。原來喬木想三個聯名（他、我和陳雲）寫，陳雲同志在黨內有經驗，說：這個形式不好，好像我們三個在外

地的人，聯合起來給中央提意見。這樣就沒有聯名寫信。喬木是想為我說話，我說，你不必這樣做，我自己會寫信的。

我從杭州回來後，就寫了封信給常委，其中把這些事的原委都講了。我還把胡耀邦當時委託我去做事的原話都附在信後面，使常委都知道這事。胡耀邦看了信後說：是不是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議論一下這個事情。陳雲看了信後，作了如下批示：鄧力群在這件事上沒有責任，以後對像江青、王力這樣一些人，再也不要工作了。

註：引自《十二春秋》511頁

去陳伯達家作客（1984年4月29日，下午5時許至8時）

本來想早去陳家傳達3月30日的電話指示，但一直工作很忙，抽不出時間。我們自從1月4日以來，約有四個月沒有去看陳了。今天下午約2點許，我們去勁松范中同志家中，然後繞道去陳家的，到那已是5點半了。我們走上樓敲對門公安人員的門，老蕭同志在，先向他們了解一下情況，然後去到陳家，叫開門，曉農和他愛人、孩子都在家，還有一個30來歲的小保姆，聽說是原炊事員走後，新請來的約兩個月了。我們到陳的工作室——同時也是他的客廳，見到陳，看來他的氣色很好，比上次精神好多了，也胖些了。他見到我們很高興，緊握着我們的手，不停地說：好久不見了，很想你們，很想你們吶！寒暄之後，我們把3月30日接的電話內容向他傳達了。並且表示了我們的意見：「你對工業、農業方面的意見也都講了，並且寫了很長的材料，已經提供給中央參考，現在應該寫寫你所知道的重大問題的回憶了，這對後代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都有好處。有些因為別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也都去世了，所以很有必要寫一寫。」陳伯達聽了，沉默許久，表示很有困難，他說：「因為我是主席的秘書，在交換意

見中，我不願意把自己牽連進去。一個人批判自己很不容易，你們看我還有些需要批判的？」

我們提到《歷史研究》雜誌在紀念創刊三十週年的會上，劉大年同志講話中解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主席1956年提出來的，為甚麼說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的思想就是按「雙百方針」辦的呢？劉老對陳還是說了公道話。陳聽了以後說：「那是我給主席彙報工作時說的，主席接受了。1956年有次在懷仁堂開會，康生在會上說『陳伯達講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我聽了馬上說：『那是主席講的』，我當時不明白，主席已經公開講了，他為甚麼這樣說呢，再說，主席講的和我講的內涵也大不一樣呀！」

陳伯達還接着談到別的。他說：「大約是1954年，我去福建作了調查，給主席寫了個報告中說『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關係』。後來我到了上海見到主席，主席對我說：『你說的內部關係，就是內部矛盾嘛，關係就是矛盾嘛。』」

1984年5月25日，下午

鄧力群同志秘書劉忠海同志，給王保春來電話說：「力群同志讓我通知你們兩人，從今天起不要再與陳伯達聯繫了，也不用對陳作甚麼工作了，到此為止。」他客氣地問我們好，有無甚麼困難？我們只是客氣回應一下，但心裏想不出甚麼事了。

接此電話以後，我們與陳的政治聯繫到此為止。他所寫的材料，如要上報，也只能通過看護他的公安人員傳遞。

1985年9月22日，晚上7時至8時40分

我們倆去探望陳伯達閒談。

看望陳伯達（1985年12月25日，晚6時）

1985年12月25日晚6時許我們倆去陳伯達家，算是拜個早年吧，同時也準備和他一塊共進晚餐。我們去時給老人帶了兩瓶人參酒、香蕉、蜂王漿等補品。閒聊了一會兒後，就共進晚餐。

飯後我們一起閒談他近期都讀了那些書，寫了些甚麼文章。他說寫了兩篇文章，已送上去了，他隨手取出複印本給我們看。由於文章太長，我們沒有帶花鏡，因此，提出要求暫借帶回，細心拜讀後即可退還，他許可了。約晚上10時許，我們告別而歸。

作者按：兩篇文章是〈評美國人的兩本書〉、〈讀書四記〉（周金學記）。

1986年9月18日，晚8時至9時30分

我們到陳伯達家中。今天是中秋節，我們陪他一起過。閒談。

探望陳伯達（1987年1月25日，下午）

元月24日上午曉農告訴保春，說他父親病了，住院已經三天了。據醫生說是老年性血管硬化，供血不足，有些頭暈，打了點滴。希望我們去看一下。

元月25日（星期日）下午4時，我們去朝陽醫院高幹病房108房間，看望陳伯達。我們一進門，見到陳的女兒嶺梅正在他父親身邊坐着說話。他們很高興地招呼我們，握手讓坐。

接着他談到：「黃克誠同志去世，我心裏很難過，我哭了。我問這裏的大夫他是甚麼病，大夫說是腦血栓。我說他過去可能就有這種病。我對大夫說，黃克誠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後，受了很大委屈，但對毛主席還說了那麼多好話，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主席功勞很大。他是從大局出發，不記個人的恩怨，這是實事求是的。毛主席後期可能也患腦血栓這種病，所以對我這樣，這都是

江青這個人弄的，這個人壞極了！我跟隨毛主席幾十年，最後那麼多罪名。我當文革組長，我推過多次不當，你們是知道的吧，周總理說這是中央決定，你都不服從嗎？可我當了，坐了廿年的監獄，最後可能死在監獄！」

陳伯達問我們：周揚同志的情況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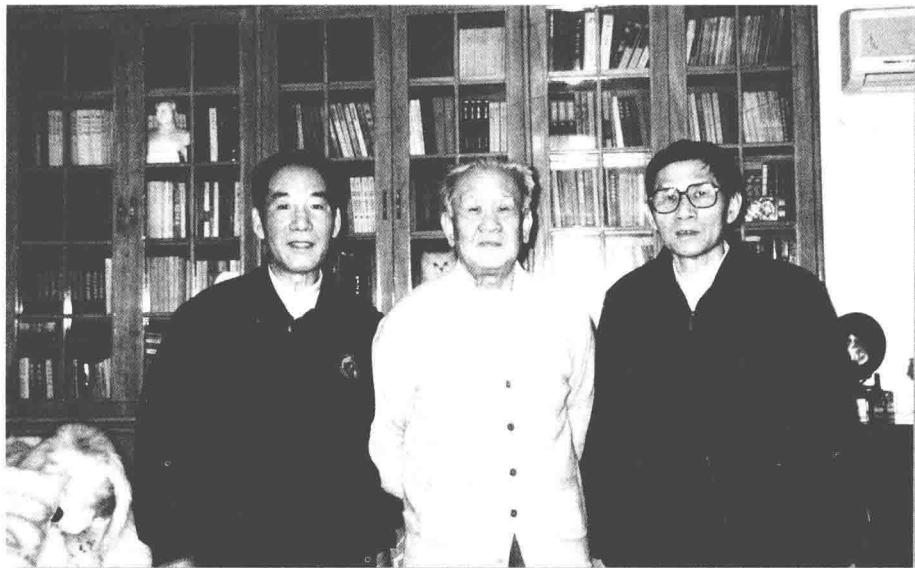
我們說：你對周揚同志生病的關懷，已經轉告給蘇靈揚同志了。

陳說：他的情況比我好些吧？

我們說：不，比你差多了。

陳驚訝地說：哦！

陳伯達接着說：「有些人對我羅列了那麼多的罪名，莫名其妙，跑遍了半個中國去調查，有些也不問問我本人，就那麼正式立案定性了，也太不嚴肅慎重了吧！我是在革命低潮時期的白色恐怖下，每天報紙上都登有退黨、叛變的消息，南京政府又下令通緝要將我就地處



王文耀、王保春與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

理，在這種情況下，我逃到上海入的黨。這些都不算數？！

「我一生沒有做多少事情，那幾本書不知能否再出版，如《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十年內戰》、《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地租概論》、《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發表以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再也不出來了。我那本書是在延安寫的，花了三天三夜一氣呵成的，一個人在屋裏，邊哭邊寫，一口氣寫完。張聞天同志在我隔壁住着，早上給了毛主席，主席睡覺起來吃完飯後，很快就看完了。我當時的題目《評『中國之命運』》，主席大筆一揮改為《駁『中國之命運』》，文裏也加了不少話。我寫的「蔣介石先生」，主席把「先生」劃掉。開會討論時，張聞天同志說，還是「評」和加上「先生」，這樣緩和一些。主席同意了，又改回來，主席那時還是民主的。我那時的文章還是很激烈的。我希望在出版時，這篇放在第一篇。《竊國大盜袁世凱》那篇發表後，當時喬冠華同志從白區回來說，蔣介石也在會議上提出反對袁世凱了，他知道我指的就是蔣介石本人，我開頭就說「如聞其言，如見其人」。這篇文章不知主席看過沒有，發表以後，博古告訴我說，楊度（書裏提到的人）參加了共產黨，可是文章已發表了，沒有辦法了。我在宣武醫院從報上看到周恩來同志臨終時，說楊度是共產黨員。楊度有篇文章給我的印象很深，有幾句話我還記得，大約是《新民叢報》上有一篇〈湖南少年歌〉裏：

若道中華國果亡，
除非湖南人盡死。
中國將為德意志，
湖南當作普魯士。

看來楊度還是愛國的。

「我在這監獄裏請你們轉了那麼些文章，發表了兩篇，將來有可能的話，希望也能出個集子。後來聽說我寫了工業、農業兩篇，有人不高興，也許因為這，就不讓你們轉寄文章了。從此，我就寫別的了。我請他們（市局）又轉交了兩篇，你們沒有看到吧？我現在也很少寫了。唉，不能寫東西了真是完了，快死了！」

陳老說：「我想見見小悌（小兒子，說時眼圈發紅），他也不願意來，他怕我是罪大惡極吧？」

我們（和嶺梅）向他作了解釋說：小悌的性格就是這樣，對別人也是一樣，不愛見人，過於覲覦。陳說這樣可不好。我們說在家的大院裏，一些中學同學都願意找他，互相幫助複習功課，因為他的學習好。陳說：「這樣好，不過告訴他，願意來看我就來，不願意就算了，因為年輕人有他自己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看法不同，不要勉強。」

他還說：「你們都在這，我女兒（嶺梅）也在，就算是我的遺囑吧，我死了，將我的骨灰倒到茅坑裏，（我們說，倒到大海裏）那太乾淨了，不行。恩格斯說倒到大海裏。康有為說死了骨灰倒到茅坑裏，我就佩服這個意見，但他沒有這樣做。這樣做有幾樣好處，一可以當肥料，二可以不佔地。」

我們勉勵他注意保重身體，早日恢復健康，過些日子再來看他，祝他春節愉快！7時許告別離開醫院。

探望陳伯達（1987年8月24日）

晚飯後約8時許，我們倆去看望陳伯達。路上我們想給他買些他喜歡吃的水果、食品甚麼的。但是因為太晚了些，商店都上了門，只能沿街尋找個體戶小攤買點甚麼。挑來挑去，直到朝陽劇場附近，再

也無可挑選，只好買了一個大哈密瓜和一大串香蕉帶去。

一進門，他們祖孫三代正在電視機前吃西瓜，見到我們老人很高興，領我們回到他的書房。我們談了些別後話和過去提過的重複話，看來老人的精神狀態還好。他談到前些日子，公安局的同志帶他去了一趟十三陵水庫，很高興。他說與過去不同的是為他拍了不少彩照，公安局同志洗出照片後，拿來給他看，也沒有說拿走，他便取出給我們看了。照片上老人穿着整齊，坐着輪椅，由一群西服革履的人簇擁着，似乎很親切。

另外，看到老人書房裏的案頭，清除了以往堆積的圖書，而擺上了筆硯。原來他又寫起大字了，我們很高興。談起寫字，他便取出寫好的一大張宣紙，上面工工整整抄錄着馬克思的一段話，給我們看。我們看了真有點吃驚，辨不出是當年寫的，還是現在寫的。不像是80多歲高齡人寫的字，剛勁有力，沒有一點手顫。他說是寫給朝陽醫院



陳伯達晚年寫作處（王東升攝）

大夫的。因為大夫常來為他針灸，看老人的毛筆字寫得好，就請他為自己寫了一張。大夫拿回去以後，就被她的主任要去了，她又讓陳老為她寫了一張。這樣醫院裏的院長、黨委書記等都要。從此，他就寫了不少的字。他說，大夫們裱不起，就買了個鏡框鑲起來。我們請他也為我們寫幾張，留作紀念和學習，他答應過些日子有激情時寫。我們聊了約兩個小時，正要起身，窗外下起了暴雨，只好多呆了一會兒，約11時，離開。離別時，互相勉勵，希望他保重，期滿出去會見更多在等待着的朋友！

1988年10月28日

陳伯達住院，我們倆下午去朝陽醫院高幹病房208號看望。

看望陳伯達（1988年11月）

陳伯達因為發燒，小便受阻住進了朝陽醫院。經醫生診斷為前列腺肥大等症。

1988年11月一天下午3時半，王文耀帶外甥胡武功及兒子王東升去朝陽醫院，看望陳伯達，主要是為陳拍照，在座的有陳曉農。我們座談了約三個多小時。主要是談論生活問題和學術問題。

兩家人去看望陳伯達（1988年12月18日）

1988年12月18日下午6時許，王保春、高秀露、王文耀、郝志敏和王東升去團結湖看望出院不久的陳伯達，以示關懷。東升給陳和大家照了幾張像，閒聊了一晚，9時離去。

為好友題悼詞

陳伯達得知周揚同志去世，心裏很難過，寫了以下悼詞：

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

悼周揚同志

1989年8月仲晦

最後一次探望（1989年9月14日）

1989年9月14日，我一直想着去陳老那兒，但找不到甚麼機會，今天是中秋節，下午不等下班文耀就回家，去找保春，可是他不在，便給他辦公室裏打電話，告訴他今天是中秋節，我們去陳老那兒看看，叫他馬上過來。二十分鐘後，我倆騎車沿路尋找着，尋思着老人喜歡吃的和能夠吃的東西。到了東大橋，文耀給老人買了一把香蕉和葡萄（十多元），保春買了四、五斤蘋果（約十多元）。大約4點多到了那兒，見到老人，他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曉農和他愛人、孩子都在。閒談中他談到葉永烈最近還去採訪了他一次，約一兩小時。還錄了音。老人對談的某些詞句有些推敲，老人剛一開口，我們還不知談些甚麼，曉農接過話題：「你放心吧，他不會都按你說的去寫，他的書寫出來要送中宣部審，不過是對內的一些事核對一下而已，這些情況我沒有告訴你就是了。」就這樣把老人頂回去了，他就沒有再說甚麼，大部份時間都是曉農講。文耀又把話題提到周揚同志逝世，說：「您給周揚題的輓聯，我和保春已送去了，周揚同志的愛人蘇靈揚同志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他的女兒、兒子對您表示感謝。另外周揚同志的前秘書露菲向您問好，同時想來看您。」老人說：「好，請她來吧。」文耀又提及中國文聯副秘書長夏義奎同志上次託我請您給他寫幾個字，您寫了沒有？他說最近寫了幾個字。曉農從內室拿出了幾卷字，我倆挑了幾副對子和條幅。我們對老人說，有空時再給我們兩人寫幾個字，簽上您的大名。他答應了。文耀提議國慶節前後我們找個麵包車，帶上我們的家屬和老人一起到郊外去郊遊一次。他聽

了很高興。六、七點鐘，我們握手告別了老人，萬萬沒有想到此別竟成了永別！

第四章：陳伯達後事處理

陳伯達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陰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憊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剛拿起碗吃飯，突然電話鈴響了，他放下碗去接電話，聽對方說完，他放下電話自語道：「怎麼會呢？」老伴忙問怎麼回事，他說了幾句。老伴說：「那你和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飯。保春一進門就急匆匆地說：「告訴你，陳老頭去世了……」文耀一怔，忙問是何時去世的。保春說：「是公安局的老蕭剛來電話說的。不巧的是曉農今天上午去石家莊看他母親去了，只有蘭華在家。怎麼這樣突然，上個星期咱們去看他時，他身體、精神還挺好的。你快吃飯，完了咱們去一下。」文耀說：「不吃了，咱們走吧。」

我們倆7時半到了陳的住處，見到了陳的兒媳婦蘭華和孩子。蘭華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說了老人去世的情況。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頭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曉農走前，去陳屋裏看過幾次，想告別一下，可每次見陳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剛找出的毛褲放在陳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門走了。陳起床後即連聲說冷，一邊問：「曉農走了嗎？」蘭華說：「他走了，他去您屋裏幾次，見您睡着，就沒叫醒您。」中午吃飯時，陳在過廳吃，蘭華和孩子在有電視



陳伯達去世前的書桌（王東升攝）

的屋裏吃，忽聽到過廳傳出盤子和碗的碰撞聲，接着咚的一聲，蘭華趕緊過去，只見陳坐在椅子上，頭歪在牆壁上，嘴裏吐出食物，臉和嘴唇都發紫，蘭華扶起陳的頭，大聲喊他，同時讓孩子叫對門老蕭。老蕭過來給老人嘴裏塞了救心丸，又趕緊找社區衛生站的大夫，打電話找朝陽醫院的大夫，並通知了陳現在的單位北京市文史館，隨後又打長途給去石家莊的曉農。

衛生站的大夫來後，看老人還有微弱的脈搏，正準備打葡萄糖針，朝陽醫院的陳大夫和徐大夫趕來了。陳大夫給老人量血壓，已經沒有血壓了，再翻開眼皮一看，瞳孔已經放大。陳大夫說沒有救了，準備後事吧。

蘭華說，她當時失聲痛哭，不知所措，在場的朝陽醫院的黨委書記、公安局的蕭鍵、住地派出所長等人，共同商量決定，先將老人送到朝陽醫院太平間，待曉農回來商量辦後事。隨後大家冒着淅淅瀝瀝

的秋雨，將陳的遺體抬下樓，送上了車。

我們聽了蘭華的講述之後，又去住在對門的公安局蕭鍵家中，聽他說了搶救陳的過程（他和蘭華講述相同）。當天晚上8點15分，我們離開了陳宅。

將陳伯達去世情況告知領導同志

因當初是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志代表中央讓我們與陳伯達聯繫的，現在陳已經去世了，我們認為應及時告訴有關領導，因此，我倆蹬車直奔領導同志家。

到了這位領導同志家，已是晚上9點鐘了，他正在看電視，見我們這樣晚才來，有些詫異。當我們將陳去世的事告訴他後，他半晌沒說話。待了片刻，他慢聲地問我們：「陳伯達今年多大歲數了？」

我們答：「85歲了。」

他說：「他甚麼時間出的院？」

我們說：「今年春天出的醫院。」

他說：「從1984年我不與你們聯繫之後，他還寫了些東西吧？」

我們說：「可能寫了些東西，都不是經過我們的手，而是從公安局那邊送過幾篇，不知寫了些甚麼。」

他轉了話題說：「告訴曉農，處理後事，不要提甚麼要求，應聽從組織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陳的家鄉是福建惠安）還是甚麼他方？家屬可斟酌一下。家屬都應通知到。劉叔晏和他正式離婚了吧？劉生了兩個孩子吧？」

我們說：「是陳伯達在劉叔晏提出離婚後自己寫的離婚書，當時曾給楊得志同志看過，還給周總理看過，不知算不算數。劉生了女兒嶺梅和兒子小悌。小悌在陳伯達倒台後，與保姆一起被關到衛戍區將

近三年，受了驚嚇，不敢再與陳聯繫。」

領導同志還問到陳的經濟狀況。

我們說：「陳刑滿後的月生活費是250元。陳1958年以後的稿費，過去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1958年以前的稿費除了買書用掉的，還有20,000多元。聽曉農說，這些稿費1985年已發還了。這些錢加累計的利息，分給了劉和陳及子女，但小悌沒要，讓給了曉農。曉農工資低，蘭華為照顧陳，又停薪留職幾年，經濟較拮据，發還稿費就好過些，只是陳仍不改買書的習慣，不停地讓曉農給他買書，用去一些錢。」

領導同志還問道：「陳伯達那裏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沒有？」

我們說：沒有幾篇，他原來的書，連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後一直沒有發還。

領導同志說：他在延安時寫的《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幾本書，不知道他那裏有沒有？他寫的《論譚嗣同》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們說：他一直想要這幾本書，可是原有的書未發還，這幾本書現在市場上又買不到，一般圖書館也不讓借閱。我們只好從中央書記處政研室的圖書館給他借了幾本，是批陳整風時編輯的，1974年印刷，書名叫《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反動言論集》，是從全國各地收集的，都是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約編了二十多個分冊，是供大批判用的。我們借出了很少幾冊。陳看了目錄以後很高興。他說自己都收集不了這麼全。

領導同志說：「在延安寫的怎麼能說是反動言論？就是在白區寫的也不能說成是反動言論呀！」

談了大約有一小時，我們就離開了。

籌辦喪事

自從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後，天氣一直很冷，陰雨不斷。陳曉農說文史館（陳伯達服刑期滿以後，人事關係由公安局轉到了北京市文史館）告訴他要在國慶節前火化，決定9月28日在八寶山殯儀館進行遺體告別，一切要從簡，現場不掛橫幅，用陳健相的名字舉辦，交通工具給提供一輛麵包車。文史館有一人兼管辦理此事，可是曉農去找此人商量如何辦理時，沒有找到。時間很緊，曉農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辦。在此情況下，我們倆約曉農一起研究辦理他父親的喪事。

25日在保春家中，幾個人按照文史館向曉農交代的精神，商量決定：

- 1、口頭通知過去在工作上接近過陳的幾位同志，自願參加；
- 2、準備一張遺像照片；
- 3、老人的外衣，可從舊衣中找件比較新一點的中山服；
- 4、送花圈、輓聯的署名按文史館的要求署陳年輕時用的名字陳健相。

大家商定之後，馬上分頭準備。

保春負責將陳的死訊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訴他們遺體告別的時間和集合地點。陳伯達平時不喜歡照像，舊的照片1971年抄家後沒有退還，新建的家裏又無照片，曉農就到我們倆家裏找，仍未找到一張能用的，只好讓王文耀懂攝影的兒子王東升採取技術措施，從現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張加以放大。文耀和愛人郝志敏在《求是》

雜誌社技工班老工人賀萬鈞、曹永和的幫助下，拼配修理了個舊像框，隨即趕到陳家幫曉農裝好遺像，並幫他準備了其他事項，夜裏10時許才返回家。



在陳伯達遺體告別式場中，擺放着他的前妻劉叔晏、兒子陳曉農一家、北京市文史研究館致送的花圈。（王東升攝）



在陳伯達的遺像旁的輓聯：「察臧究否自有故文在，積過銷骨何妨任人說。」（王東升攝）

遺體告別

9月28日早上，最先來到八寶山的文耀、志敏和露菲打聽到指定的告別室，是八寶山殯儀館西邊門內，編號第一的告別室，面積約有一間教室大小。前邊一位告別儀式正在舉行，待他們舉行完了之後，我們才開始整理場地，這時北京市文史館的人也來了。

陳的遺體由曉農一家和王東升護送到了之後，推到化妝室裏排隊。由於前邊排隊待化妝的遺體不少，中新社的耿軍和冰心老人的外孫陳鋼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妝師的耳邊小聲的說了陳的名字，那位化妝師沒有說話，馬上提前認真細心給陳面部作了修飾，在修飾時由於枕頭太低不好操作，在場的老幹部姚黎民同志當即將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脫下，讓墊在陳的頭下。

遺體修飾完後，耿軍和陳鋼幫着曉農到院子裏找了兩塊合適的磚頭，墊到陳的枕頭下，換下了姚老的棉背心。

陳穿着他過去常穿的駝色的舊中山服裝，平躺在鮮花叢中，身上蓋着白布單，四周擺放着他的二十多個生前好友送的花圈，還有北京市文史館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帶子上都寫着：「悼念陳健相先生」。劉叔晏因病沒有來，她委託曉農專送一個花圈，讓曉農寫上「健相安息」四個字。曉農一家和嶺梅送的花圈上寫着：「親愛的爸爸安息吧」。遺像上方的橫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與何人告別。

告別室內氣氛肅穆，人們都眼含淚水低聲啜泣，當長年照顧老人的兒媳蘭華節制不住，失聲痛哭時，全場一片慟哭聲。

白髮蒼蒼的史立德和拄着拐杖趕來的張楠、王拓等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同志緩慢地走在前面，向陳的遺體告別後，走到花圈跟前同陳的家屬曉農、嶺梅、蘭華及陳的孫子握手表示慰問。洪禹、姚黎民、馬關、史鳳岐等幾位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露菲同志和我們倆，以及李景如、郝志敏等十來位曾接近過陳的同志，還有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副館長、辦公室領導等，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同志和朝陽醫院的大夫，也都分別緩慢走過陳的遺體，向陳的家屬表示慰問。

參加遺體告別的人中，有的我們過去並不認識。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他不知從何處聽到消息，就自己來了，並在留名冊上簽了名。2000年他去世後，我們從當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呂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曾任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北平學聯主席，抗日戰爭中是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

洪禹原準備與愛人葉茵一起來，因葉茵病重，只能自己來。洪禹告訴曉農，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當特務受審查時，是陳伯達向毛澤東轉交了他的申訴信，並促毛親自寫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審查的人都得到解脫的。毛澤東的這封回信已被收進《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洪禹鄭重地代葉茵在留名冊上簽了名。洪禹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國改革報》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還有三位遠在外地的老同志，聽到陳伯達的死訊，打來長途電話，託他們認識的同志代他們在留名冊上簽名，並給陳曉農發了唁電。

告別後，陳的遺體在他的兒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員的護送下，



王保春、王文耀向陳伯達遺體告別。（王東升攝）



葬儀簡約，參加者冷落肅然。（王東升攝）

緩緩地從告別室送到火化爐旁，排隊等待火化。

告別儀式結束後，我們和一位幫助辦理此事的同志談及陳伯達，他講，醫院大夫問他怎麼看陳，他答道：「我認為陳有功有過，功、過分開，他還是做了不少事的。」說完他極小聲地對我們耳語道：「大夫對我講，陳老對毛主席、周總理和共產黨，有很深的感情呀！」

告別儀式中，姚黎民自帶相機照了像，他流着淚把陳送至火化爐旁。他嘆了口氣對我們說：「就這樣完了！他是中國的一個文化大名人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就是他參與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國四十週年了，而他就這樣走了。」

陳伯達去世以後，1989年9月29日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就作了報道，也不知他們是從哪裏得知消息的。

10月1日《北京日報》第二版發了一條消息：「陳伯達因病去世。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幾天以後，陳曉農和張蘭華在王東升陪同下，到殯儀館領取了陳伯達的骨灰，將骨灰放到八寶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規定存放期不能超過三年，1991年陳曉農一家將陳伯達的骨灰帶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陳伯達生前的遺言

悄悄地生，悄悄地死

死後燒了的骨灰或放入毛坑作為肥料（康有為的〈大同書〉裏已有這種建議），或撒之四野，或放之溝壑流水。死後不作任何訃告。

陳伯達

1987年5月書

9月30日下午3點半，我帶兒子王東升去陳曉農家，讓東升把陳老生前的書房、臥室、洗浴室以及老人去世時的飯桌，都用相機照下來，以作永久紀念。老人是在小小的過廳的飯桌上與世長辭的。在書房裏我和曉農、蘭華懷念了一下老人恍如昨日的往事。曉農將夾在書裏的、陳老關於自己死後骨灰安放的親筆遺書拿了出來。以上是我回家之後的追記。

葉永烈採訪王保春（1988年11月4日，上午）

上海作協葉永烈來採訪王保春約一個多小時，其內容（1）傅崇碧衝釣魚台的前後；（2）「九大」報告起草問題；（3）馬列主義研究院解散經過。

葉永烈採訪王文耀（1988年12月20日）

1988年12月20日，晚7時許，上海作家葉永烈，又來採訪王文耀。主要是核對一下王力1981年7月5日給中央的信。內容是王看了中央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不提陳伯達的名字，王力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就陳伯達的問題向中央反映了八條，其內容大概是：陳伯達知道主席要整劉少奇時，心裏很着急，認為劉是個好同志，應該找劉談談，讓他寫個檢討；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最厲害的詞句不是陳伯達原稿中的，而是主席看後加上去的；要中央文革成員都去參加軍委會並講話時，陳伯達推辭有病不去參加，主席生氣地說：「誰不去，滾！」陳受批評後想自殺；奪權時陳反對；寫「九大」報告時，陳主張應主要抓生產。……

傳說鄧力群與陳聯繫受攻擊

1989年10月20日，下午我去邱德新家中拜訪。閒談及陳老去

世，他很愕然，他還準備去看望陳呢，深感遺憾！邱對陳老文字一向欣賞，我談陳老去世後，去告訴鄧力群了，鄧表示關注，邱講，為陳的事，鄧兩次受到胡（耀邦）的攻擊，一次說鄧、陳聯在一起，把陳寫一些農業問題的東西印發下去（中央），胡抓住不放，後來陳雲講鄧和陳聯繫是中央的意思，（經查是胡簽的字），即陳寫的農業材料，也算做一種個人的意見沒有甚麼不可以。這樣一來胡沒有甚麼意見了。另一件事，是陳的一篇文章在東北發表了，也不知是誰說出去了，這是很保密的呀！

鄧力群與王保春、王文耀的談話（1998年5月14日）

《當代中國》的劉志男約我們下午3時去新鮮胡同鄧力群家。我們準時到那後，鄧力群午休還未起來，我們就在秘書朱元石的辦公室閒談了一會兒，鄧力群起來了，我們和劉志男一起去了鄧力群辦公室，寒暄之後，劉志男先向鄧力群談了請我們來的目的，他說：「我們《當代中國》研究所，想找他們倆談談陳伯達的一些情況，他們思想有顧慮，怕不好談，但是這段歷史應該把它留下來。」

鄧力群說：「陳伯達這個人還是做過一些事情的，有一件事可以提一下，就是中央在起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寫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曾經考慮是否列上陳伯達的名字。在這一點上，胡喬木同志比較顧全大局很大氣地說，陳伯達還是為中央起草了不少文件的。如果把陳伯達的名字列上了，哪些文件就不好說清楚了。照顧到這一點，《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

「你們作為內部談可以，只在這個範圍內講，我們記錄下來的也不擴散，作為內部檔案。你們知道的情況就講，猜想的東西不要，不知道的也不要附會。是對是錯，不用去判斷，原原本本地把你們知道的事情說出來就行了。我們不給你們傳，你們也不必去跟別人說。」

事情原本是甚麼樣子，就說成甚麼樣子，不必顧慮，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是現在談，還是以後談？

劉志男：「我們先給他們搞個大事記，他們好回憶。」

力群：「那好，以後再談。陳過去的著作，有個目錄，我看到是中央發了個目錄？」

王保春：「是葉永烈寫的，他從檔案館等抄的。」

王文耀：「批陳整風時，出了一套書叫《陳伯達反動言論集》，比較全，借了一本來，陳伯達看了以後非常高興，說他要給江青立一大功，將他過去的文章收集得那麼全，要他自己都做不到。同時他說：「以後如果能出版，還得靠你們倆，光靠曉農一個不行。」

力群：「是呀。那些東西在哪兒？」（問劉志男）

劉志男：「老邱（原鄧的秘書邱德新）說在中南海瀛台的庫房裏。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他說那兒堆的東西很多很亂。」

力群：「能盡力給找出來，提供些材料。批陳整風的文件附過一個很長的目錄，是他寫的文章和書。不能說他過去寫的都是反動言論。有一些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他給中學生寫的文章，宣傳三民主義等等。那時候，他應該叫做國民黨左派吧！」

批陳整風的文件附錄裏的東西，不包括陳伯達為中央起草的文件。

批陳整風的文件也不知道是誰起草的。陳伯達已經把我整得一塌糊塗了，這個時候又說我是陳伯達的親信，說我、胡繩和周揚，是他重用過的人。想辦法向檔案館要一下這個文件。

曉農回來的時候，曾經讓他收集一下，也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了。我們說：不太清楚。

力群：陳伯達出來以後寫了十幾篇文章，有兩、三篇我轉給周揚

了，他沒有退回來。其他的文章都在書記處小範圍內部發了，書記處的書記也沒有全發。當時，是胡耀邦讓做這件事情，後來李銳就拿這個來攻我。

陳的資料能收集到的盡可能收集，可以給你們配一些書。

從整個歷史評價陳伯達，應該說好事還是多的，多數是做好事的。

廬山會議前，陳伯達還特意到石家莊「紅旗」幹校去了一趟，把我罵了一通，說我哥哥是國民黨，我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歷史也真是滑稽！

陳搞文件的習慣是，給他一個任務，不限時間，甚麼時間搞好都行，他是這樣幹的。

陳伯達遇着個江青，也確實難呀！主席都惹不起她，何況一個陳伯達呢！

在這次的談話中，王文耀講了，陳和鄧1961年在起草《農村工作60條》時，在廣東農村調查時，還保存了一些當時的資料，鄧很感興趣。